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黃河與長江之間

——周代南陽盆地的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

Between the Yellow and Yangzi Rivers:

Political Domination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the Nanyang Basin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李修平

Hsiu-ping Li

指導教授：杜正勝 教授

Advisor: Cheng-sheng Tu

中華民國 99 年 8 月

August, 2010

致 我的父親、母親與妹妹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黃河與長江之間——  
周代南陽盆地的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

Between the Yellow and Yanzi Rivers: Political Domination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Nanyang Basin during Zhou Dynasty



本論文係李修平君（學號 R94123013）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99 年 8 月 6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朱伯楨 (指導教授)

2008.8.6

朱伯楨

國史所



## 謝 辭

這篇論文的完成，首先得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杜正勝先生。非常謝謝杜老師四年多來的教誨與啟發，使我能有機會一窺中國上古史的學術殿堂，並逐漸摸索出研究學問的方法。另外，在寫作的過程中，亦曾多次受到陳伯楨先生的鼓勵，謝謝陳老師總是熱心而親切地提供協助。同時我也要感謝王明珂先生與閻鴻中先生同意擔任我的學位論文口試委員，兩位老師的寶貴建議，點出我在思考上的盲點，使我獲益良多。

其次，為了蒐集寫作材料，我曾兩度至中國大陸參訪。一路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吳耀利先生、陳星燦先生、許宏先生與唐際根先生、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張弛先生、武漢大學歷史系的徐少華先生與張昌平先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胡永慶先生、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柴中慶先生、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先福先生，以及其他許多未具名的先進與朋友，您們的盛情款待，總是讓我滿載而歸。在此特別向諸位致上誠摯的謝意。

再者，感謝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經會與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承蒙貴單位提供經費，使我能無後顧之憂，順利至中國大陸進行學術交流。

我還得向古偉瀛老師與陳南之助教致敬，謝謝您們願意提供工作機會給我，讓我能有穩定的經濟來源，可以安心地完成學業。

最後，謝謝家人默默的代禱、四隻小貓的陪伴，以及妳的支持。終於，在父親八十一歲的生日前夕，我完成了這份禮物，為您祝壽。

2010年8月17日午後於臺北公館



## 摘要

位於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南陽盆地，自新石器時代起，便是溝通中國北方黃河流域與南方長江流域最重要的交通通道。然而，在考古學以「文化核心」與歷史學以「政治核心」為論述架構的典範下，長期以來，以南陽盆地為主體的研究受到學界忽視。換言之，在不同考古學文化的論述中，諸如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周文化、楚文化，以及在不同國別史的研究裡，諸如西周史、楚國史、秦國史，或顯或隱，或多或少，都可以見到南陽盆地的身影。但是，由於南陽盆地是南北雙邊典型考古學文化與政治集團的「中間地帶」，因此在上述的研究中，南陽盆地的物質文化與歷史發展，總是被考古學與歷史學一再切割，而我們對南陽盆地的認識，也始終見樹不見林。必須指出的是，夾在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南陽盆地，其實自新石器時代起，就已經發展出又南又北且獨樹一幟的歷史面貌。當地的歷史發展，自有其內在理路。因此，本研究的首要目的，便是利用考古材料與傳世文獻，建構南陽盆地自新石器時代至戰國時期的區域發展史。

其次，根據傳世文獻記載，進入周代以後，南陽盆地先後歷經周王朝、楚國與秦國的統治，而中國大陸的考古學者，往往依此架構，將南陽盆地周代的考古學文化，先後區分為周文化、楚文化與秦文化三大階段。這種以「朝代」或「國別」為考古學文化命名的方式，預設具有相同「歷史背景」的人群，必定使用相同的「物質文化」。特定區域上層統治集團的更迭，可以是一朝一夕的事，但特定區域物質文化的演變，卻往往必須歷經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光陰。因此，筆者認為，雖然以「朝代」或「國別」為考古學文化命名有其合理性與便利性，但政治支配是否真的與物質文化的變化緊密相連，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南陽盆地恰好位於北方周朝、南方楚國與西方秦國的「中間地帶」，先後更歷經這三大政治集團的支配，是故，這個地區正是檢驗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互動關係的最佳場域。

關鍵字：周代 南陽盆地 政治支配 物質文化 中間地帶 區域史



# Abstract

Nanyang Basin, between the Yellow and Yangzi River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 channel to communicate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 since the Neolithic Age. In spite of being geographically significant, this region were seldom dealt with by historians and archaeologists. The key factor is that Nanyang Basin is neither political center nor cultural center. In fact, we can find different kinds of historical researches an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related to Nanyang Basin. However, being the *middle area* of political groups and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 the ancient China, Nanyang Basin'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material culture are fragmentary in the scope of our knowledge. What must point out is that Nanyang Basin has had its own particular history since the Neolithic Age. Therefore, the first aim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construct regional history of Nanyang Basin from the Neolithic Age to Warring States Period based on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s.

Secondly,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texts, the political entities of Zhou, Chu and Qin had ruled Nanyang Basin in succession during Zhou Dynasty, so archaeologists sort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into three periods: the cultures of Zhou, Chu and Qin. Calling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fter dynasty or political entities presumes that people who have the same historical background share the same material culture. This area was within the sphere of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olitical entities, but it would be a highly sophisticated question about delimiting a boundary of material culture, which is developed gradually over a relatively long time. Consequently, the relation between political domination and material culture is still an ambiguous issue. Nanyang Basin, the *middle area* among the northern Zhou, southern Chu and western Qin, provides us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olitical domination and material culture.

Keywords: Zhou Dynasty, Nanyang Basin, political domination, material culture, middle area, regional history



# 目 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謝辭.....	iii
中文摘要.....	v
英文摘要.....	vii
目錄.....	ix
圖版目錄.....	xiii
附表目錄.....	xvi
<b>第一章 緒論.....</b>	<b>1</b>
第一節 旅人的疑問.....	1
第二節 在歷史學與考古學中缺席的南陽盆地.....	6
第三節 生態資訊、考古材料與傳世文獻.....	18
第四節 三層架構.....	21
<b>第二章 自成一格又四通八達的地理空間.....</b>	<b>23</b>
第一節 自然環境.....	23
第二節 交通網絡.....	27
一、【路徑 1】：南陽至許昌.....	28
二、【路徑 2】：唐河至信陽.....	29
三、【路徑 3】：南陽至洛陽.....	29
四、【路徑 4】：襄樊至荊州.....	30
五、【路徑 5】：棗陽至武漢.....	31
六、【路徑 6】：淅川至西安.....	31
七、【路徑 7】：丹江口至漢中.....	33
八、【路徑 8】：信陽至武漢.....	34
第三節 小結——「夏路」不只是條「路」.....	35

<b>第三章 沒有文字的歷史——新石器時代的南陽盆地.....</b>	<b>37</b>
第一節 始興期 (ca. 5000 BC) ——裴李崗文化的輸入.....	39
第二節 發展期 (5000-3800 BC) ——仰韶文化影響下的本地風格.....	42
一、半地穴式或地面式的圓形房址.....	43
二、仰韶式的墓葬.....	45
三、特有的埋豬土坑.....	47
四、兼具北方、本地與南方風格的陶器.....	47
五、大同與小異.....	49
第三節 成熟期 (3800-2600 BC) ——超越南北之別的聚落發展.....	50
一、大幅改變的聚落佈局.....	51
二、特徵突出的多間式地面建築.....	54
三、隨葬豬骨的墓葬與埋豬土坑.....	57
四、地域特色鮮明的陶器.....	59
五、本地傳統的堅持.....	60
第四節 衰退期 (2600-2000 BC) ——北方勢力的再度南下.....	61
第五節 二里頭文化與殷商文化.....	63
第六節 小結——大歷史與小歷史.....	66
<b>第四章 周文化？楚文化？秦文化？——周代南陽盆地的考古材料.....</b>	<b>69</b>
第一節 地理環境與考古遺存.....	73
一、南陽.....	73
二、淅川.....	77
三、襄樊.....	81
四、棗陽.....	87
第二節 「周文化」時期 (ca. 1050-678 BC) ——多元的區域風格.....	92
一、有別於豐鎬地區的墓葬結構.....	92
二、地域色彩漸強的陶器.....	94
三、層次豐富的青銅器群.....	100
四、中原風格的玉覆面.....	116
五、不只有「周文化」的南陽盆地.....	118
第三節 「楚文化」時期 (678-279 BC) ——陶、銅器發展上的落差.....	119
一、逐漸與江陵地區趨同的陶器.....	120
二、楚式作風的青銅器群.....	129
三、速變與漸變.....	148
第四節 「秦文化」影響時期 (279-221 BC) ——本地傳統與外來因素的交融.....	149
第五節 小結——考古材料描繪的歷史圖像.....	153

第五章 南土與北疆——傳世文獻中的周代南陽盆地.....	163
第一節 周王朝的南土.....	163
一、南陽盆地的諸侯國.....	164
二、昭王南征與南陽盆地.....	168
第二節 楚國的北疆.....	169
一、楚國控制南陽盆地的經過.....	171
二、楚國北疆的軍事重鎮.....	173
三、列國侵擾下的南陽盆地.....	174
第三節 小結——政治中心視角下的歷史.....	178
第六章 結論——不斷變動的傳統.....	181
引用書目.....	185





## 圖版目錄

圖一	中國南北的天然分界：秦嶺—南陽盆地—淮河.....	3
圖二	南陽盆地.....	4
圖三	以「政治核心」/「文化核心」解釋古代中國文明（春秋晚期） 發展的慣用架構.....	11
圖四	「核心」與「中間地帶」的三種關係.....	14
圖五	南陽盆地地形圖.....	24
圖六	南陽盆地北方的邊緣地帶.....	25
圖七	以南陽盆地為中心的交通網絡.....	28
圖八	信南高速公路沿途風景一瞥.....	29
圖九	由南陽盆地向北穿越伏牛山的自然環境.....	30
圖十	隨棗走廊隨州境內的沿途風光.....	31
圖十一	秦嶺上的丹江河谷.....	32
圖十二	從信陽穿越大別山至長江中游的道路.....	35
圖十三	南陽盆地新石器時代遺址分佈圖.....	38
圖十四	新石器時代南陽盆地區域發展史分期示意圖.....	39
圖十五	方城大張莊遺址出土陶器.....	40
圖十六	城背溪圓底陶鉢、青龍山三足陶鉢與裴李崗三足陶鉢比較圖.....	41
圖十七	雕龍碑遺址一期房址 F11.....	44
圖十八	南陽盆地仰韶房址（下王崗 F52）與典型仰韶房址（姜寨 F127） 比較圖.....	45
圖十九	下王崗仰韶文化二期 M300 的二次葬.....	46
圖二十	下王崗遺址仰韶文化一期與二期遺跡分佈比較圖.....	47
圖二十一	附杯圈足盤，雕龍碑 F6：15.....	49
圖二十二	高圈足豆，下王崗 M279：1.....	49
圖二十三	下王崗遺址仰韶文化三期遺跡分佈圖與房址復原圖.....	51
圖二十四	八里崗遺址仰韶文化三期與黃棟樹遺址屈家嶺文化遺跡分布圖.....	52
圖二十五	雕龍碑遺址一期、二期、三期遺跡分佈比較圖.....	53
圖二十六	雕龍碑 F19 平面結構復原圖與牆體結構復原圖.....	55
圖二十七	雕龍碑 F15 第 3 號門址的推拉門遺跡與復原圖.....	56
圖二十八	大河村房址、尉遲寺房址、門板灣房址、青龍泉房址.....	57
圖二十九	空心陶球，下王崗 F32：6.....	60
圖三十	南陽盆地二里頭時期與殷墟時期遺址分佈圖.....	65
圖三十一	南陽盆地周代主要遺址分佈區域圖.....	72

圖三十二	南陽周代遺址分佈圖.....	74
圖三十三	丹浙交會川地與順陽川地位置圖、浙川周代遺址分佈圖.....	78
圖三十四	襄樊周代遺址分佈圖.....	82
圖三十五	鄧城遺址衛星空照圖.....	83
圖三十六	棗陽周代遺址分佈圖.....	89
圖三十七	瘞牆錐足鬲、瘞牆柱足鬲、紅陶缸.....	95
圖三十八	豐鎬地區的瘞牆錐足鬲、袋足疣瘤鬲、柱足仿銅陶鬲.....	96
圖三十九	棗陽郭家廟墓地仿銅陶鼎與仿銅陶壺.....	98
圖四十	【伯多父簋】.....	102
圖四十一	【伯庸父盃】、【龍紋盃】.....	103
圖四十二	【史頌鼎】、【毛公鼎】、【垂腹凸弦紋鼎】.....	104
圖四十三	襄陽王坡 M55 隨葬青銅容器組合.....	105
圖四十四	【仲冉父簋】.....	106
圖四十五	襄陽王坡 M1 銅鼎、襄陽王坡 M55 明器銅鼎.....	107
圖四十六	襄陽王坡 M55 銅匜、【筭侯匜】.....	108
圖四十七	襄陽王坡 M55 銅匜紋飾拓片.....	108
圖四十八	棗陽曹門灣 1972 年立耳銅鼎、棗陽郭家廟 M1 附耳銅鼎.....	110
圖四十九	曾國附耳鼎的來源.....	111
圖五十	棗陽郭家廟 M8 銅匜、棗陽郭家廟 M17 銅杯.....	111
圖五十一	郭家廟 M17 方形銅器座、郭家廟 M17 立鳥銅住首、郭家廟 M21 銅鉢.....	112
圖五十二	新野 71 年墓銅盆、新野 74 年墓銅盆.....	113
圖五十三	棗陽郭家廟 M17 折肩扁體銅鬲.....	115
圖五十四	萬家園 M202、M202 出土玉覆面.....	117
圖五十五	襄陽周台遺址的折盤豆、折肩盆與折肩罐.....	122
圖五十六	小口柱足鬲、弦紋常頸壺、仿銅盃、仿銅小口鼎.....	124
圖五十七	仿銅陶器組合：鼎、敦、壺.....	124
圖五十八	仿銅陶器組合：鼎、簋、缶.....	125
圖五十九	矮蹄足陶鼎、高足陶鼎.....	125
圖六十	陶高柄壺、陶盒.....	126
圖六十一	襄樊山灣仿銅陶鼎、襄樊蔡坡仿銅陶鼎、棗陽郭家廟仿銅陶鼎.....	127
圖六十二	鎮平程莊遺址所見敞口寬體陶鼎.....	128
圖六十三	【王子午升鼎】.....	130
圖六十四	【鄭子嫿尊缶】、浙川下寺 M11 銅尊缶.....	133
圖六十五	【朋浴缶】、【夔鳳紋罍】.....	134
圖六十六	【朋鼎】、【獸目交連紋鼎】.....	135
圖六十七	【蟠蛇紋盃】.....	135

圖六十八	【變形蟠蛇紋敦】、【幾何紋敦】.....	136
圖六十九	淅川下寺 M8 銅盃、【蟠蛇紋盃】.....	136
圖七十	【棄疾簋】.....	142
圖七十一	【鑲嵌龍紋鉶】.....	143
圖七十二	淺盤銅豆、方形蓋銅豆.....	143
圖七十三	九連墩 M1、M1 出土晉系銅器：銅鼎、銅圓壺、銅鑑.....	144
圖七十四	九連墩 M2 銅鼎局部紋飾、山西侯馬鑄銅作坊出土陶範紋飾復原圖、2003 年山西侯馬鑄銅作坊出土的陶範.....	144
圖七十五	九連墩 M1 銅鑑鑑耳出土晉系銅器、山西長治分水嶺 M126 鑑耳.....	145
圖七十六	九連墩 M2 銅立鳥盆、九連墩 M1 銅高柄壺.....	146
圖七十七	【獸紋人形足方座】、【鳩柱房屋模型】.....	147
圖七十八	雙耳陶罐.....	150
圖七十九	銅鍪.....	151
圖八十	【四葉立鳥銅鏡】.....	152
圖八十一	楚方城.....	175



## 附表目錄

附表一	南陽盆地新石器時代已發掘遺址文化序列.....	68
附表二	南陽盆地周代遺址分期表.....	155
附表三	南陽盆地「周文化」時期墓葬出土青銅容器統計表.....	156
附表四	南陽盆地「楚文化」時期墓葬出土青銅容器統計表.....	157



# 第一章 緒論

十餘年前，舊一點的史學家篤信三皇五帝的傳說，新一點的史學家只是懷疑這種傳說而已……。直等到考古學家的鋤頭把地底下的寶物掘出來，史學界的風氣才發生些轉變。

——李濟，〈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sup>1</sup>

## 第一節 旅人的疑問

這是一篇探討古代中國的區域史研究，討論的核心地區，是位於今天河南省西南部與湖北省西北部的南陽盆地。在開始進入主題之前，我想先談談為何挑選南陽盆地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這得從一段個人的旅行經驗說起。

2007 年暑假，我與幾位對古代中國文明有興趣的同學，到大陸展開為期一個月的訪古之旅。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尋找撰寫碩士論文的方向，並蒐集相關材料。在短短的三十天內，我們拖著行李趕著車，風塵僕僕，走訪黃河流域各大省分的考古研究所、博物館及考古工地，會晤當地的考古工作者，上手目驗出土文物。旅程從西安開始，在陝西盤桓數日後，大夥便轉赴甘肅、山西、河南各省，最後落腳北京。

原本預計結束北京之行後隨即返臺，但大家意猶未盡，想再多去幾個地方看看。幾經討論，我們決定抽出三天空檔，離開華北，驅車南下湖北武漢。8 月 27 日晚上 9 時，一行人在霓虹閃爍的北京西站，搭上直達武昌的 Z37 班次軟臥夜車。12 個小時後，我與友人坐在武漢街頭的永和豆漿店裡，吃著有點熟悉又不太一樣的早餐。

幫我們點餐的是位女服務員。她那和緩的動作，細軟的聲音，讓我大為吃驚。前此，我們也曾在北京與太原的永和豆漿店用過飯。店裡的服務員，不論男女老少，無不扯著大嗓門兒招呼我們，動作直截爽利。在造訪

<sup>1</sup> 李濟，〈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東方雜誌》，第 31 卷第 7 號（1934）；後收入張光直、李光謨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 46。

武漢之前，我以為先前所見的一切，就是當代中國的市井性格。這位女服務員的出現，讓我開始懷疑過去二十多天已逐漸習慣的「中國經驗」。

餐後，在武漢街頭閒晃。那是個多雲的陰天，氣候卻異常悶熱，直到深夜。穿梭在武漢的街道巷弄內，我全身黏膩，汗如雨下，彷彿置身夏日的臺北。還記得在北方的日子，雖然白晝暑氣蒸騰，酷熱難當，但向晚時分，微風徐徐，甚至還帶些初秋的涼意。一夜之隔，竟是兩樣世界。

時光倏乎飛逝，在武漢短暫停留三天後，30 日晚上 9 點，我們搭乘 Z38 班次軟臥列車，兼夜趕回北京，準備搭機返臺。伴隨喀噠喀噠的鐵軌聲，我躺在異鄉陌生的逆旅，回想過去一個月的所見所聞。毫無疑問，這段旅程令我感受最為強烈的，是中國不同地域間明顯的差異，尤其是所謂的「南北之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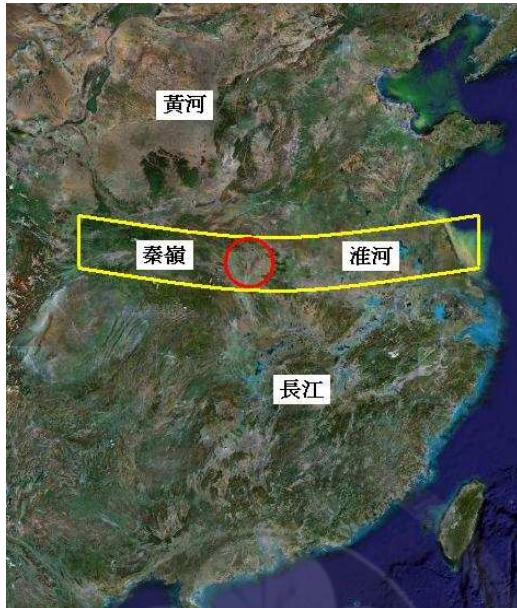
「南稻北麥」與「南船北馬」，是形容中國南北飲食與交通差異的俗諺，儘管不盡正確，只反映出部分事實，但兩地在自然環境和人文景觀上的差別，卻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就自然環境而言，在氣候上，北方屬暖溫帶季風氣候，冬季嚴寒，一月月均溫低於攝氏  $0^{\circ}\text{C}$ ，河湖結冰，夏季則高溫炎熱，年雨量為 400 至 800 毫米，氣候較為乾燥；南方為北亞熱帶季風氣候，冬季溫暖，一月月均溫高於攝氏  $0^{\circ}\text{C}$ ，河水全年無冰，夏季則潮濕悶熱，年雨量為 800 至 1600 毫米，氣候相對濕潤。在地貌、植被以及土壤的特性上，北方自黃河中游以下為黃淮平原，地勢開闊平緩，植被以針葉林與落葉闊葉林為主，土壤多為富鈣質的黑土；南方則自長江中游以下多湖泊丘陵，地形破碎支離，植被以常綠闊葉林為主，土壤多為酸性的紅土。若自人文景觀而論，在農業上，北方多旱田，種植小麥與雜糧；南方多水田，種植水稻、甘蔗與茶葉。而在交通上，北方由於平原寬廣，陸運興盛；南方則因河湖密佈，水運便捷。<sup>2</sup>

大抵而論，中國的北方與南方是兩個不同的世界。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在兩地之間，是否真的存在一條區分彼此的分界線？如果真有這條分界線，那它該位於何處？而生活在這條分界線上的人們，又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們是所謂的北方人？還是南方人？抑或兩者皆非，而自成一格？帶

---

<sup>2</sup> 所謂中國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的「南北差異」，當然只是一種粗略的分別，若仔細探究，各地區均有其獨特的自然特徵與人文風貌。

著這樣的困惑，我開始對中國北方與南方之間的中間地帶，產生濃厚的興趣。



圖一 中國南北的天然分界：秦嶺—南陽盆地—淮河

(地圖底圖採自 Google Map。另外，以下地圖底圖，除特別說明者，均採自 Google Map)

一般認為，在中國的地理上，確實存在一條所謂的南北天然分界，即秦嶺—南陽盆地—淮河一線（圖一）。前面提及的中國南北之別，即是以此線劃分。然而，與其說秦嶺—南陽盆地—淮河是一條區分中國南北的「分界線」，倒不如說它是一條「分界帶」。<sup>3</sup>儘管這三個地理區的自然環境大不相同，但據考古資料表明，自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以來，這個地帶的考古遺存卻有著明顯的共性：一方面同時受到北方黃河流域與南方長江流域考古學文化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卻又獨樹一格。<sup>4</sup>這種兼容南北又個性鮮明的物質文化表現，當然與秦嶺—南陽盆地—淮河的所在位置息息相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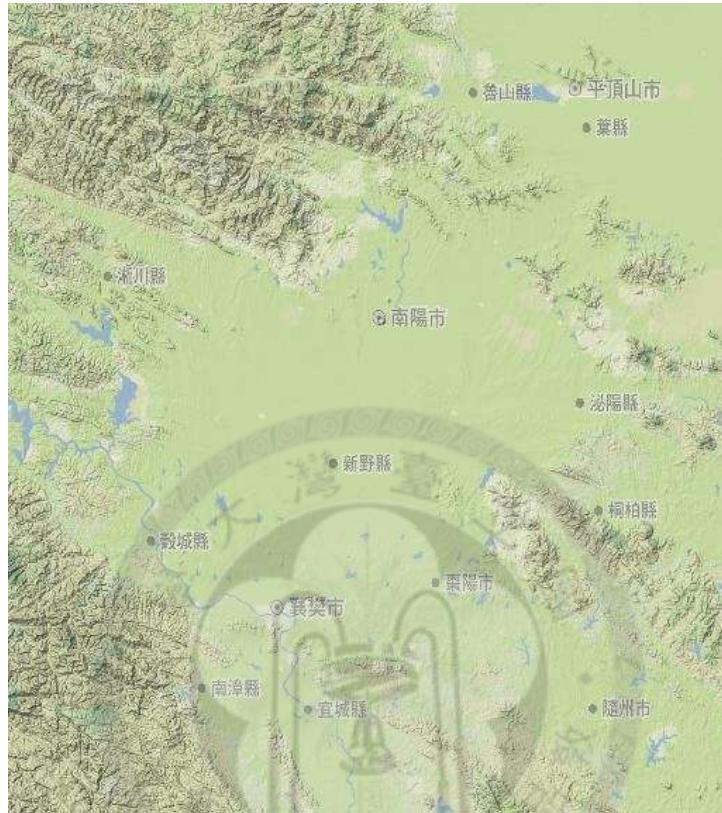
然而，秦嶺—南陽盆地—淮河不僅是中國南北的「分界帶」，還是雙邊

3 一般而言，所謂中國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指的是位於北緯 $32^{\circ}$ 到 $34^{\circ}$ 的秦嶺與淮河，南陽盆地正好夾於兩者之間，緯度與秦嶺、淮河相同，因此本文亦將南陽盆地歸入這條分界之中。張光直在《古代中國考古學》的〈序言〉中，亦曾提及這條作為「黃河流域」與「南方落葉林帶」的分界線，而張氏則將其明確定義在「北緯 $33^{\circ}$ 附近」。

張光直著，印群譯，《古代中國考古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頁3。

4 張之恒已對秦嶺、淮河一線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進行初步分析，指出秦嶺、淮河為「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史前文化相互傳播和滲透的中間地帶」，強調其溝通中國南北考古學文化的角色。張之恒，〈秦嶺至淮河一線史前文化的特徵〉，《中國歷史文物》2008年第5期，頁46-50。

的「中介帶」，生活於北方與南方的人群，都必須共同經由這條中間地帶相互交流。本文所欲討論的南陽盆地（圖二），正是中國南北相互聯繫、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



圖二 南陽盆地

作為聯繫中國南北的交通要津，在秦朝一統中國之前，南陽盆地在物質文化的表現上與歷史文明的發展上，均呈現多元而複雜的面貌，可說是或南或北，又南又北。就考古學文化而言，自新石器時代起，當地曾歷經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亂石灘文化、二里頭文化、商文化、周文化與楚文化，最後又受到秦文化的影響；若自歷史的發展觀之，南陽盆地可能曾是商王朝強盛時期的控制範圍，是周王朝的南土，春秋早期後成為楚國的北疆，戰國晚期後又納入秦國的版圖。南陽盆地在物質文化與政治支配的複雜性與多元性，由此可見一斑。但可惜的是，這個處於溝通中國南北關鍵位置的區域，在古代中國的研究裡，一直處於「見樹不見林」的狀態。學者往往各取所需，將南陽盆地的考古材料，或者傳世文獻中關於南陽盆地的記載，割裂在不同的考古學與歷史學框架中

討論。至於以南陽盆地這個自然地理區為主軸的研究，仍是一片有待開發的園地。因此，本文的首要目標，便是利用目前所有能夠掌握到的材料，試圖更細緻地描繪南陽盆地在秦帝國建立前的歷史發展脈絡。

除了探明先秦南陽盆地歷史發展的內在理路外，更進一步，本文還嘗試觸及在中國上古史研究裡，一項極具普遍性的議題，即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間的關係。在前述南陽盆地的考古學與歷史學框架中，似乎揭示了一件「不言而喻」的「歷史事實」，即當進入周代以後，南陽盆地因政權的改變（周王朝→楚國→秦國），遂促使當地物質文化發生變化（周文化→楚文化→秦文化）。自總體趨勢而論，這樣的看法大致無誤。然而，在此大趨勢之下，我們也必須同時認清一件客觀事實：統治階級甚至是國家的興亡，常是一夕之事；但是物質文化乃至國屬與身分認同的改變，卻非一朝可成，往往需要經過長時間的調整，更何況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原本就是不同的概念。兩者所涵蓋的時空範圍雖然時常重疊，卻無法遽然劃上等號。

先秦時期南陽盆地錯綜複雜的歷史環境，正好提供一個探索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間相互關係的場域。據文獻記載，春秋早期的楚文王時期（689-677 BC），南陽盆地已由原先小國分立之局，逐步納入楚國的統治範圍之內；至戰國晚期的秦昭襄王二十八年（279 BC），南陽盆地再度易主，成為秦國的領土。在此歷史背景之下，我們可以追問：不同的政權，對於生活在南陽盆地的人群，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本地傳統，尤其是在物質文化上的表現，是否因政權的改變而隨之發生變化？物質文化的改變是立即的，還是漸進的？是全面的，還是局部的？這些變化，又與當時整體的歷史發展有何關連？透過對先秦時期南陽盆地歷史發展的個案研究，筆者期待能對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間的關係，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sup>5</sup>

5 Bruce G. Trigger, *Time and Traditions: Essays in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15-121. 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的關係，是研究古代中國文明學者不斷反思的問題。有別於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文化的命名方式，多與政治勢力有直接的關係，舉凡商文化、周文化、晉文化、楚文化、秦文化，莫不將特定時空範圍內的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中可對應的朝代與國名相連接。但必須指出的是，這種以「朝代」或「國名」所命名的考古學文化，其實意義相當含混，蘇秉琦與杜正勝均曾撰文檢討。蘇氏認為，「楚文化」所論及的「楚」，內含地域、國家、民族與文化四個概念；杜氏則認為，「夏文化」也至少包含夏代、夏朝和夏人（或夏族）三層意義。由此可見，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是不同層次的討論範疇，不可一概而論。蘇秉琦，〈從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問題〉，《江漢考古》1982年第1期，頁3-8；杜正勝，〈夏文化可能討論嗎？〉，《新史學》第1卷第2

最後，回到本文的開頭。這是一篇探討古代中國的區域史研究。空間範圍既已限定，時間範圍亦需加以說明。本文將以周代（ca. 1050-221 BC）作為討論的主要時段，一則因此時的傳世文獻較為豐富，二則因南陽盆地內曾出土大量周代的考古材料。分頭疏理考古材料與傳世文獻，當有助於探明兩周時期南陽盆地的歷史軌跡，以及盆地內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間的交互關係。然而，本文不僅研究周代的南陽盆地，還將討論的時間上限，回溯至遙遠的新石器時代（當然，新石器時代的南陽盆地，僅可論其物質文化的表現；至於政治支配的變化，由於材料限制，暫不處理）。之所以採取這樣的論述方式，除了可以更全面地關照南陽盆地不同時期的歷史演變外，還能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位於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南陽盆地，其在中國歷史發展上的特殊性與普遍性。

## 第二節 在歷史學與考古學中缺席的南陽盆地

在探討古代中國文明的論著裡，不論是歷史學還是考古學，僅有少數文章以先秦時期的南陽盆地為討論的核心區域，而其中又以樊力的研究最為重要。樊力曾發表一系列的文章，探討河南、湖北與陝西三省交界處的新石器考古學文化，而南陽盆地正是他研究的重點區域。<sup>6</sup>樊力不僅清楚地排列了南陽盆地的新石器考古學文化序列，而且明確地指出各種考古學文

期（1990），頁 115-130。另外，杜正勝曾討論中國上古史研究裡政治與文化的關係，認為在〈禹貢〉中所描述的「中國」這個區域裡，自古以來，不論是生態或族群都異常複雜，文化本質上的多元性是極其自然的。但由於三代以來人為政治力量的強加控制，逐漸形成一股「表面上」一統化的趨勢。然而，本質的多元性與人為的一統性的相互激盪，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共向，只是近代以來民族主義史觀流行，才把中國的歷史發展形塑成一個模樣。在這樣的思考底下，杜氏提出了幾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是政治力量規範文化之成形，還是文化力量在導引政治的統合？有沒有特定的發展模式？統一化的表層其實包含多少多元的底層？」杜正勝，〈中國古代社會多元性與一統化的激盪——特從政治與文化的交涉論〉，《新史學》第 11 卷第 2 期（2000），頁 1-39。本文則嘗試以古代中國區域史的角度，討論政治與文化（尤其是物質文化）間的相互關係。

<sup>6</sup> 樊力，〈豫西南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序列及其與鄰近地區的關係〉（北京：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碩士論文，1993），後發表於《考古學報》2000 年第 2 期，頁 147-182；〈丹江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存試析〉，《江漢考古》1997 年第 4 期，27-37；〈亂石灘文化初論〉，《江漢考古》1998 年第 4 期，頁 41-48；〈論屈家嶺文化青龍泉二期類型〉，《考古》1998 年第 11 期，76-89；〈論石家河文化青龍泉三期類型〉，《考古與文物》1999 年第 4 期，頁 50-61。

化間的傳承與演變關係，為本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再者，馬保春則以歷史地理學的角度，析論南陽盆地作為湖北、河南與陝西三省間「文化交流通道」的重要性，指出南陽盆地在古代中國地理上的特殊意涵。<sup>7</sup>此外，有些通論性的文章，則論及「部分」的南陽盆地，但討論的範圍僅限於河南省的西南部，至於湖北省的西北部則付之闕如。<sup>8</sup>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南陽盆地在歷史學與考古學的研究中缺席呢？為說明這個問題，以下，讓我們先簡單回顧百餘年來中國上古史的研究走向。

進入二十世紀後，在中國上古史的領域裡，由於新材料、新觀念、新方法的出現，興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首先，王國維（1877-1927）利用河南安陽殷墟發現的甲骨卜辭，考辨商王世系，證明《史記·商本紀》記載的可信度，<sup>9</sup>使得中國的「信史」可上溯至殷商時期；隨後，以顧頡剛（1893-1980）與錢玄同（1887-1939）為代表的疑古學派，藉由「層累造成說」，解構漢代以來，以儒家聖王思想為典範的古史觀。<sup>10</sup>儘管兩造對於中國古代歷史的理解南轅北轍，前者「信古」，後者「疑古」，各自對當時的史學界帶來極大的影響，但從研究方法上來看，雙方均以傳世文獻與文字史料為研究的基本素材。<sup>11</sup>

7 馬保春，〈早期鄂豫陝間文化交流通道的初步研究〉，《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頁31-38；馬保春、楊雷，〈新石器時代晚期鄂豫陝間文化交流通道的初步研究〉，《江漢考古》2007年第2期，頁42-51。

8 安金槐，〈河南南陽地區在我國考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收入氏著，《安金槐考古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頁37-42；楊育彬、孫廣清，〈從考古發現談南陽在華夏古文明中的歷史地位〉，收入南陽市博物館編，《學術研究文集——紀念南陽市博物館建館四十週年（1959-1999）》（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45-78；許順湛，〈史前民族融合在豫西南地區的反映〉，收入南陽市博物館編，《學術研究文集——紀念南陽市博物館建館四十週年（1959-1999）》，頁36-44；李陳廣，〈南陽地區楚文化的發現和研究〉，《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頁38-42。

9 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收入氏著，《觀堂集林（外兩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頁209-230。

10 杜正勝，〈考古學與中國古代史研究〉，收入氏著，《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辰文化，1992），頁4。一般以為，顧頡剛所謂的「疑古」，即全盤質疑中國古代（尤其是先秦以前）歷史的真實性，並認為中國古史只是「層累地造成的」。然而，只要重讀顧氏的〈古史辨自序〉，我們將會發現上述的講法僅論及顧頡剛「疑古」的一面。顧氏在〈古史辨自序〉中曾坦言，他所做的工作，僅是破壞「文獻」內的「偽古史」系統，而非認為中國古代沒有歷史。其次，顧頡剛認為，若要重建古史，就必須仰賴對出土材料進行研究，但他自認能力有限，無法勝任，所以顧頡剛能做的，只是盡其所能，推翻故紙堆中的「偽古史」。換言之，顧頡剛所謂的「疑古」，實是懷疑「傳世文獻」中記載的古史，而非認為中國古代沒有歷史。顧頡剛，〈古史辨自序〉，收入氏著，《走在歷史的路上——顧頡剛自述》（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1-112。

11 當然，王國維研究的甲骨卜辭是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但獲取甲骨的方式並非嚴格意

在疑古之風方熾的 1920 年代，西方考古學的引進，<sup>12</sup>促使中國上古史的研究，邁入一個全新的紀元。兩千年來以傳世文獻為研究基礎的局面為之改觀，大量經科學考古發掘的地下材料出土，使得學者得以運用新發現的考古材料，重建古代中國的歷史面貌。雖然學者曾一度視西方考古學為史學的輔助學門，<sup>13</sup>而且不論是傅斯年（1896-1950）、李濟（1896-1979）還是夏鼐（1910-1985），都認為考古學是歷史學的一部分，<sup>14</sup>然而時至今日，中國的考古學早已不再只是史學的配角。考古學家除了是「新史料」的發現者，其觀點與理論，更常常影響史家對中國上古史的理解與詮釋。<sup>15</sup>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曾說，「要建設一部信史，發展考古學是一種必要的初步工作」；<sup>16</sup>當代大陸著名的考古學家蘇秉琦（1909-1997），更力倡「近代考古學的目標就是修國史」。<sup>17</sup>兼容歷史學與考古學的治學取徑，無疑是促進當代中國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推手，也是目前學界研究古代中國文明的主流方法；但另一方面，中國上古史卻也經常不自覺地受制於考古學的理論框架，無法超越考古學的學術典範，另闢蹊徑。蘇秉琦所提出的「區系類型」考古學文化分類架構，正是中國考古學界最具影響力的理論之一。

---

義上的「科學考古」發掘；其次，王氏的研究乃奠基於中國傳統的金石學之上，屬中國傳統學問的一支，他的研究門徑亦與 1920 年代傳入的西方考古學判然有別。

12 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肇興，大致有兩派說法：其一，以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於 1921 年對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的發掘算起；其二，以李濟於 1926 年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的發掘，以及其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 1928 年對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作為中國考古學的開端。嚴文明，〈走向 21 世紀的中國考古學〉，收入氏著，《走向 21 世紀的考古學》（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頁 5；李學勤，〈二十一世紀的古代文明研究〉，收入氏著，《中國古代文明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頁 17。

13 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 29-31。

14 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收入氏著，《傅斯年全集》第 4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 289-299；李濟，〈田野考古報告編輯大旨〉，收入李濟總編輯，《田野考古報告》第 1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1；夏鼐，〈什麼是考古學〉，《考古》1984 年第 10 期，頁 931-935、948。

15 杜正勝，〈新史學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收入許倬雲、張忠培主編，《中國考古學的跨世紀反思》上冊（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頁 23。

16 李濟，〈田野考古報告編輯大旨〉，收入李濟總編輯，《田野考古報告》第 1 冊，頁 1。

17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頁 4。

## 一、從「區系類型」的提出到重視「核心」的研究態度

為了釐清並建構古代中國各地的考古學文化譜系，蘇秉琦建議以地層學與器型學為基礎，運用當時所能掌握到的考古材料（主要是利用陶器），依「區」、「系」、「類型」三個層次，將中國境內所有的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按時間先後次序，搭建成有系統的時空框架，並分為六大區域。<sup>18</sup>在這六大區域中，不但有具代表性的「典型遺址」，同時也包含數個特徵鮮明，但自整體而論，又與典型遺址關係密切的「區域類型」。雖然蘇氏提出的六大區域考古學文化體系，隨著新出土的材料而有所修正，不過「區」、「系」、「類型」的分類架構，仍為現今的大陸考古學家所沿用。在此學術背景之下，探明各考古學文化「核心地區」的「典型特徵」，成為中國考古學的研究重心之一；至於兼含數種考古學文化的遺址，因為不具「典型特徵」，是故較不為學界所重視。<sup>19</sup>南陽盆地內的考古遺址多屬後者。1980年代初期，亦即蘇秉琦提出六大區域的架構時，南陽盆地曾同時被列入「陝豫晉鄰境

18 這六大區域，包括陝豫晉鄰境地區、山東籍鄰省一部分地區、湖北和鄰近地區、長江下游地區、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地區，以及以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至於該如何建構中國考古學的時空框架，蘇秉琦認為，首先，挑選若干處的「典型遺址」進行科學挖掘，以獲取可供分析的「典型材料」；其次，以「典型材料」劃分「文化類型」，並在較大的區域內以「文化類型」比較其他遺址的文化內涵，進而歸納為若干文化系統；最後，以「區、系、類型」為分類層次，搭建中國考古學的時空框架，並從中尋繹各文化的內含與彼此間的互動關係，以達到恢復歷史原貌的目的。蘇秉琦、殷瑋璋，〈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文物》1981年第5期（北京），頁10-17。附帶一提的是，蘇秉琦提出的新石器時代「六大區域」說，對古代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帶來深遠的影響。前此，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探討，大多採取「一元起源論」，即認為古代中國的文明，乃興起自一中心地域，之後則以輻射狀向外傳播，逐漸形成今日我們所認知的中國。但在蘇氏的研究裡，卻顛覆「一元起源論」的說法，取而代之的是「多元起源論」。隨後，佟柱臣、張光直與嚴文明亦採用「多元論」的看法，惟分區的方式不同於蘇秉琦。佟柱臣將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分為七個中心，並強調這些文化中心其來有自，可以上溯至舊石器時代晚期；張光直則利用「交互作用圈」（interaction sphere），來解釋不同區域考古學文化的互動過程；蘇秉琦與嚴文明分別以「滿天星斗」及「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體結構」，作為理解古代中國文明的發展模式。佟柱臣，〈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多中心發展論和發展不平衡論——論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的規律和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1986年第2期，頁16-30、39；張光直著，印群譯，《古代中國考古學》；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臺北：稻香出版社，1999），頁47-52；蘇秉琦，〈滿天星斗〉，收入氏著，《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頁85-106；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物》1987年第3期，頁38-50；〈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頁10-16。

19 大陸學界在面對「非典型」的考古遺址時，除非是形態特殊，有獨立成為一支新考古學文化的必要性，否則通常僅是將該遺址的考古文化，在分析其內的文化因素後，便拆解至現有的框架中，較少再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地區」與「湖北和鄰近地區」。<sup>20</sup>當年，南陽盆地的考古學文化內涵，尚處於混沌不清的狀態。隨著考古工作的持續拓展，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南陽盆地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已從原先模糊的狀態逐漸明朗。即便如此，由於南陽盆地不屬於特定考古學文化的「核心地區」，出土的遺跡與遺物亦不具備「典型特徵」，因此南陽盆地始終無法受到考古學界的重視。<sup>2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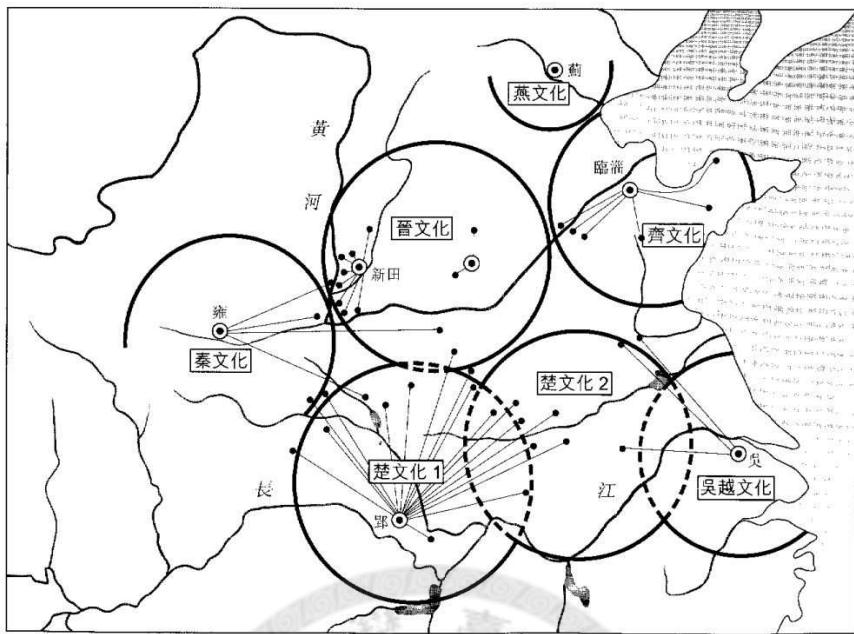
中國考古學界著重探討「文化核心」的態度，亦對上古史的研究帶來直接影響。當考古學家關心「文化核心」的典型特徵時，歷史學家則側重論述「政治核心」的歷史發展。這股風潮，在歷史時期的三代研究中尤其明顯。有別於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命名方式，進入歷史時期後，中國的考古學文化，多以傳世文獻中的「朝代」或「國別」命名。<sup>22</sup>這種命名方式，背後蘊含著一項理論預設，即分屬不同朝代、國別與族屬的人群，必定具備相對應的考古學文化。因此，梳理不同系統的考古學文化特徵，也就成為歷史時期考古學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這股以「朝代」或「國別」為核心的考古學研究，促使大量的上古史論著，亦將「朝代史」與「國別史」作為首要的討論課題（圖三）。當然，以「政治中心」為主題的歷史研究，豐富了我們對古代中國區域特性的認識，然而無可避免地也讓史家忽略一些亟待開發的領域。以東周時期為例，釐清「楚文化」與「晉文化」的特徵，是考古學研究的焦點；而探討「楚國」與「晉國」的歷史，則是史學研究的重心。至於本文所欲探討的南陽盆地，因為地處楚文化／楚國與晉文化／晉國的中間地帶，既不具備考古學文化的典型特徵，又不是國家的權力中心，自然不受學界關注。

上述考古學界與史學界重視「核心」的研究態度，是導致南陽盆地不受學界重視的關鍵因素。此外，以「省」為單位的考古發掘現況、關注重點遺址與重點文物的研究取徑，以及過去對聚落考古學方法的忽視，亦是重要原因。

20 蘇秉琦、殷瑋璋，〈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文物》1981年第5期，頁12-16。

21 嚴文明即認為，儘管南陽盆地及其南方的襄樊谷地與東南方的隨棗走廊，在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相當發達，但由於這些地區是中原與長江中游的中間地帶，並未具備一個穩定且有自身特色的發展譜系，難以成為一個獨立的文化區，因此將這些地區置於不同的考古學文化體系中討論即可。嚴文明，〈序〉，收入張弛著，《長江中下游地區史前聚落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II。

22 王仁湘，〈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收入氏著，《中國史前考古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頁141-150。



圖三 以「政治核心」／「文化核心」解釋古代中國文明（春秋晚期）發展的慣用架構  
 （採自孫華，〈中原青銅文化系統的幾個問題〉，收入許倬雲、張忠培主編，《中國考古學的跨世紀反思》下冊，頁 327。）

## 二、以「省」為單位的考古發掘狀況

眾所周知，中國大陸考古工作的執行狀況，是以「省」為發掘與研究的基本單位。除了中央層級的研究機構，可以直接受到特定的考古遺址進行發掘外，幾乎所有的考古工作，則全權交付給各省的文物考古研究所負責。這樣的分工方式，一方面，各省可以視實際工作的需要，有效率地運用人力與物力，並對該省內部的考古遺址，進行較為全面的掌控；但另一方面，畢竟「省」是人為劃分的行政單位，本非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區，因此當碰上跨省分的發掘工作或研究時，往往各省分頭進行，無法兼顧全局。

南陽盆地內的考古工作，即遭遇上述窘境。南陽盆地地跨河南與湖北兩省，雖然在自然景觀上是一個完整的地理區域，但卻分屬豫鄂兩省管轄，因此對於南陽盆地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總是一分為二，也使得在實際的研究成果上，我們經常看到以「豫西南地區」、「鄂西北地區」、「南陽」、「淅川」、「襄樊」為題的論著，卻始終罕見以「南陽盆地」為中心的研究。

### 三、關注重點遺址與重點文物的研究取徑

儘管作為自然地理區的南陽盆地，鮮少受到研究者的注意，盆地內仍發現許多受人矚目的考古遺址，諸如淅川下寺墓群，與最近發掘的棗陽九連墩墓群。這些重量級的遺址，及其伴出的精美文物，一方面展現古代精緻的工藝之美，反映當時上層社會的物質文化與生活水平，同時在學術研究上，更每每成為考古學家及藝術史家關注的焦點。至於盆地內發現的小型墓葬與聚落遺址，以及陶器、石器等生活用品，聞問者甚寡。

然而，站在純粹的研究立場，無論是大墓、小墓或聚落遺址，無論是精緻的青銅器、玉器，或是日常生活使用的陶器、石器，這些出土材料，都共同組成了古代中國物質文化的不同側面，理應具備同等的價值。若吾人期待對古代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跡，獲得較為全面的認識，就必須同時將這些材料納入研究之內。因此，就南陽盆地的研究而言，不應只關注部分「明星遺址」，更應當照看全局。

### 四、對聚落考古學方法的忽視

過去，對於聚落考古學（settlement archaeology）方法的忽視，使得大陸考古學界僅重視對特定遺址的發掘，而不太關注對自然地理區的討論，因此，更談不上以南陽盆地為主體的考古學研究。<sup>23</sup>

西方的聚落考古學肇興於 1940 年代，若以美國考古學家哥登·威利（Gordon R. Willey, 1919-2002）於 1953 年發表的〈秘魯維魯河谷聚落形態之研究〉（“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Vira Valley, Peru”）一文算起，至今則已發展超過 50 個年頭。至於將聚落考古學帶入中國的學者，則是知名的華裔考古學家張光直（1931-2001）。1962 年，張光直主編《聚落

<sup>23</sup> 必須說明的是，過去的中國考古學界並非不發掘聚落遺址。1954 年至 1957 年對西安半坡遺址的發掘工作，便是首次針對特定聚落遺址所進行的考古工作。然而，直到 1980 年代，中國考古學界一方面僅關注個別重點遺址的發掘，鮮少做區域性的探索；其次，研究的課題則多集中於探明聚落所反映的社會性質與發展階段，諸如該遺址屬於母系還是父系社會，而當時人類的財產分配為公有制還是私有制等議題。這與今日學界強調全景式的聚落考古學大異其趣。張弛，〈史前聚落與房屋的研究〉，收入嚴文明主編，《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世紀回顧·新石器時代考古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 41-58。

考古》(Settlement Archaeology)一書，<sup>24</sup>便力倡以聚落型態作為新考古學研究的方法，成功奠定他在西方考古學界的地位；1984年，張氏受邀至北京大學考古系講課，首次將聚落考古學引入中國；<sup>25</sup>1990年代初期，大陸的考古學家才第一次利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對湖北石家河的遺址群，進行小範圍的調查；1995年以來，在中外學者的合作之下，於山東日照、河南鞏義、內蒙古赤峰、河南安陽與河南靈寶等地，展開一系列的區域系統調查；<sup>26</sup>2000年以後，大陸更正式啟動以聚落考古為研究依據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至此，聚落考古漸成為中國考古學界研究的重點課題。<sup>27</sup>

所謂的聚落考古學，其研究的基本單位是「聚落」，而非「考古學文化」。相對於傳統考古學著重於分析遺址的文化屬性，聚落考古學則強調研究聚落本身。在實際工作上，除了對個別遺址進行深入的發掘外，聚落考古更重視「系統區域考古調查」(systematic regional archaeological survey)。<sup>28</sup>至於探討的議題，則包括聚落與外在自然環境的關係、鄰近地區不同聚落間的相互關係、聚落本身的佈局型態，與同一遺址內不同時期聚落的變化。<sup>29</sup>很明顯地，這是一種全景式的研究方法，不僅關心遺址內的考古學文化屬性，更著重探討聚落與外在自然環境的有機連結。期待在可預見的未來，大陸的考古學家能以聚落考古學的方法，對南陽盆地進行深入的探索。

## 五、中間地帶研究的萌芽

雖然在種種主客觀的因素之下，我們鮮見以南陽盆地為中心的研究，但是近些年來，部分學者卻開始探討一項與本研究同質性極高的課題，筆者逕稱之為「中間地帶研究」。以下，筆者將嘗試說明何謂「中間地帶」，

24 K. C. Chang ed., *Settlement Archaeology* (Palo Alto: National Press Books, 1968).

25 張光直，〈前言〉，收入氏著，《考古學專題六講》，頁3。

26 方輝，〈對區域系統調查法的幾點認識與思考〉，收入氏著，《海岱地區青銅時代考古》（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頁1-3。

27 王巍，〈聚落型態研究與中華文明探源〉，《文物》2006年第5期，頁58。

28 或稱「全覆蓋式考古調查」(full coverage archaeological survey)，即俗稱的「拉網式調查」。陳星燦、劉莉、李潤權、〔美〕華翰維(Henry T. Wright)、〔英〕艾琳(Arlene Miller Rosen)著，〈中國文明腹地的社會複雜化進程——伊洛河地區的聚落型態研究〉，《考古學報》2003年第2期，頁162。

29 K. C. Chang, *Settlement Patterns in Archaeology*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Rethinking Archae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後者中譯本見張光直著，曹兵武譯，《考古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

以期拋磚引玉，求教於方家。

所謂的「中間地帶」，指的是夾雜在兩個或多個「核心」之間的地區。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審視，「中間地帶」亦即各「核心」的「邊緣」或「外圍」。「核心」可以是政治的、宗教的、經濟的、文化的，甚至是認同的；也可以是自然環境的、物質文化的，乃至精神層面的。而夾於「核心」間的「中間地帶」，或者兼被各「核心」影響，或者不受任何「核心」掌控。大抵而言，「核心」與「中間地帶」的關係，可簡單表示如圖四：



圖四 「核心」與「中間地帶」的三種關係

左側的中間地帶，介於核心的影響範圍之外，可能處於真空狀態，也可能獨立發展為另一型態；中央的中間地帶，則位於核心的分界上，雖然仍兼受雙方影響，但看似壁壘分明，關係緊張對立；右側的中間地帶，則兼備雙邊核心的因子，或者產生「過渡」現象，或者形成雜糅雙方、兼容並蓄的特殊型態。

必須說明的是，除了真空狀態，中間地帶都會受到核心的影響，只是程度深淺不一。再者，隨著內外條件的改變，中間地帶可能遊走於上述三種模式之中，有可能獨立成為另一個核心，或者整併至強勢的核心之中。最後，這種核心與中間地帶的關係並非是平面的、單層次的，而是立體的、多層次的。核心可能同時兼為政治、宗教、經濟、文化的核心，因此夾於核心間的中間地帶，在不同的層次上，便可能表現出不同的模式（比如某中間地帶在政治上強烈受到兩邊核心的左右，在經濟上則必須同時部分仰賴兩造的協助，但在宗教與文化上卻全然不受干涉）。筆者必須強調，上述三種「核心」與「中間地帶」的關係，僅是作為思考問題的切入點，並非

理論。採取這樣的思考方式，將有助於理解南陽盆地在中國地理、歷史，以及物質文化上的特殊性。

遼耀東（1933-2006）〈試釋論漢匈之間的甌脫〉一文，可算是中間地帶研究的開山之作。遼氏認為，在《史記》與《漢書》〈匈奴列傳〉中所載的「甌脫」，即塞普爾（Ellen C. Semple, 1863-1932）在《地理環境之影響》（*Influence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一書裡所論及的「邊荒」，是草原民族間為減少戰端與衝突所設的緩衝地帶。類似的緩衝地帶，亦存在於漢人與匈奴人之間。<sup>30</sup>

王明珂對羌族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則是探討族群認同上中間地帶的重要作品（儘管王氏強調這是一種「邊緣研究」）。在論述「華夏邊緣」形成的過程時，王氏發現，位於今日中國西南部的「羌族」，是 1960 年代中國民族劃分之下的產物。所謂的「羌族」，是一群生活在漢族與藏族之間，但既非漢族又非藏族的人群。他們雖共享類似的歷史記憶，諸如「弟兄故事」及「祖先英雄傳說」，但在服飾、宗教及語言等方面，則出現近漢則漢化、近藏則藏化的過渡現象。<sup>31</sup>

童恩正（1935-1997）所提出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則屬於另一種型態的中間地帶研究。所謂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將中國分成農耕與游牧兩大地區，東起大興安嶺，向西經過陰山山脈與賀蘭山脈後，最後南折四川西部通向雲南西北部的橫斷山脈。從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儘管在此地生活的群族各異，但由於相似的生態環境，促使這條文化傳播戴上的人群，發展出類似的物質文化，並共同以畜牧或半農半牧維持生計。<sup>32</sup>這是一種探討生態環境、物質文化與生業活動的中間地帶研究。

上述的研究成果，是分別從歷史學、人類學與考古學來討論中間地帶的重要作品。此外，近年來亦陸續出現與本文研究區域——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南陽盆地——息息相關的論著。賈漢清以位於湖北省宜城市南部的顧家坡墓地為例，探討「文化交叉地帶」的武裝衝突現象。該遺址位於南陽

30 遼耀東，〈試釋論漢匈之間的甌脫〉，收入氏著，《從平城到洛陽》（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頁 273-283。

31 王明珂，《華夏邊緣》（臺北：允晨文化，1997）；《羌在漢藏之間》（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32 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收入文物出版社編輯部編，《文物與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 17-43。

盆地的南方，屬新石器時代晚期早段（3300-2600 BC）。除了出土的陶器帶有融合南北文化的獨特風格外，在墓葬中還發現不少多人二次合葬墓，且在男性墓中隨葬大量的石鉞與骨鏃，部分墓主甚至可能死於人為暴力。賈氏在比較同時器周遭的考古遺址後認為，「文化交叉地帶」部落衝突的激烈程度遠遠高過「文化中心地帶」。<sup>33</sup>

徐少華則以歷史地理的取徑切入，結合歷史文獻、考古材料與實地考察紀錄，剖析「周代南土」的歷史發展。所謂的「周代南土」，在時間上包括西周、春秋、戰國三個階段，空間上則涵蓋南陽盆地、淮河中上游及淮北汝潁地區。除了考辨、整理該區域諸小國的起源、族姓、地望、文化等議題外，徐氏還進一步放寬視野，將前述研究成果置於楚國歷史的發展脈絡中，尋繹楚國北部疆域的變遷過程。<sup>34</sup>

陳昭容則從性別的角度，利用青銅器銘文與傳世文獻，分析位於中原大國及荊楚勢力間的「漢淮地區」諸國，其與周王室、黃河流域各國、長江流域各國，以及彼此之間的婚姻關係。陳氏認為，西周時期王室與淮漢諸國聯姻，主要是為了鞏固王國南土；進入春秋時期，隨著國際局勢的流轉，夾於南北兩大勢力間的漢淮諸國為求自保，除了彼此透過通婚相互連結外，更積極與當時勢盛的國家聯姻，或是北方的齊、晉，或是南方的楚、吳。<sup>35</sup>婚姻不僅是「居大國之間」諸小國求生存的政治籌碼，更是被迫屈服於現實的具體表徵。

除了前述不同學科與課題對「中間地帶」的探索之外，其實自 1985 年起，大陸已出現極少數的學者，嘗試利用「三個中間地帶」的架構，對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文化進行討論。這種觀點，成為大陸考古學界分析史前文化隱然成形的暗流。雖然在不同地區發掘的考古工作者，或多或少都曾察覺到中間地帶的特殊現象，但在「區系類型」理論強烈的影響之下，以「三個中間地帶」為核心的論述，始終未獲得應有的重視。佟柱臣、<sup>36</sup>魏

33 賈漢清，〈從顧家坡墓地的發掘看史前時代文化交叉地帶的部落衝突〉，《華夏考古》2004年第4期，頁 77-86、96。

34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

35 陳昭容，〈從青銅器銘文看兩周漢淮地區諸國婚姻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5 本第 4 分（2004），頁 635-697。

36 佟柱臣，〈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三個接觸地帶論——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綜合研究之一〉，《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後收入氏著，《中國考古學要論》（福州：鶯江出版社，2004），頁 416-437。

京武<sup>37</sup>與張之恒<sup>38</sup>均曾撰文探討此一課題，並分別稱這些地區為文化的「接觸地帶」、「交匯帶」或「過渡地帶」。這三處中間地帶，指的是中國東半部三座東西向的山脈，即陰山、秦嶺與南嶺，及與這些山脈同緯度的河川或地區，而這些中間地帶，又將中國分成北方、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與南方四大地理區。儘管這三位學者均嘗試討論中間地帶的特性，分類方式大同小異，卻反映不同時代對中間地帶研究不同的認知：1985年，佟柱臣著重「接觸地帶」的「分界性」；1998年魏京武突顯「交匯帶」的「融合性」；2008年，張之恒倡議「過渡地帶」的「獨立性」。這種由「分界性」到「融合性」，再到「獨立性」的發展歷程，對本研究頗具啟發。

再者，有的研究者開始關注考古學文化上的中間地帶，<sup>39</sup>或探討地理中間地帶與考古學文化的關係，<sup>40</sup>或討論中間地帶的物質文化，<sup>41</sup>或分析氣候變遷對中間地帶的形成與影響，<sup>42</sup>或開始初步討論相關的理論。<sup>43</sup>更有考古遺址的發掘，是為了探明中間地帶的過渡現象而展開的。<sup>44</sup>這些論著，都已經開始正視「中間地帶研究」這個議題，也為本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礎。儘管如此，有意識的「中間地帶研究」仍受主流學界忽略，而這正是本文亟欲探索的方向。

37 魏京武，〈中國史前文化的多樣性與融合性——論中國文明形成的融合性〉，收入《遠望集》編輯委員會編，《遠望集——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華誕四十週年紀念文集》（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頁27-39。

38 張之恒，〈生態環境對史前文化的影響和中國史前文化的三個過渡地帶〉，《考古與文物》2008年第2期，頁33-37、112。

39 宋豫秦，〈夷夏商三種考古學文化交匯地域淺談〉，《中原文物》1992年第1期，頁11-19；張正明，〈淮漢之間——周代的一個文化交錯地帶〉，《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頁1-4；石興邦，〈橫亘東西的淮漢中介文化帶——青連崗一下王崗文化傳統〉，《長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屆亞洲文明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96）；〔日〕宮本一夫著，張國碩譯，〈從交錯地帶看社會集團的地域性和文化交流〉，《華夏考古》2006年第3期，頁106-112。

40 張之恒，〈秦嶺至淮河一線史前文化的特徵〉，《中國歷史文物》2008年第5期，頁46-50。

41 李學勤，〈論漢淮間的春秋青銅器〉，《文物》1980年第1期，頁54-58。

42 韓茂莉，〈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的形成與氣候影響〉，《考古》2005年第10期，頁57-67。

43 宋豫秦，〈生態過渡帶之人地關係芻議〉，收入周昆叔、宋豫秦主編，《環境考古研究》第2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13-16。

44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駐馬店市文物保護管理所編著，《駐馬店楊莊——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遺存與環境信息》（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

### 第三節 生態資訊、考古材料與傳世文獻

為了能清楚地描繪周代南陽盆地的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間的交互關係，本文將以生態資訊、考古材料與傳世文獻，作為研究的基本素材。其中，又以後兩項為主。然而，該如何運用這兩類性質截然不同的史料，來討論古代中國的文明走向，則是學者必須設法解決的問題。王國維於 1920 年代提出的「二重證據法」，<sup>45</sup>時至今日，仍為許多的研究者奉為圭臬。但僅作為「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的二重證據法，早已無法解釋許多文獻未曾提及，甚至是與文獻記載相悖的考古發現與現象。<sup>46</sup>為克服上述困難，美國學者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建議：「若要同時採用文獻史料與考古材料進行有意義的討論，就必須先分頭將這兩類材料，在各自的脈絡中梳理清楚。」<sup>47</sup>這是本文處理考古材料與傳世文獻的基本態度。

45 王國維道：「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使得為之。」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 2。

46 關於文字資料引導並限制考古材料的解釋，美國藝術史家貝格立（Robert Bagley）曾撰文批判。他以商代考古為例，認為學界大多持「安陽中心觀」，除了由於安陽是第一個被發現的商代遺址外，大量的甲骨文出土，以及不經批判便輕易接受傳統對商代歷史的觀點，是三個最主要的原因。此外，文字資料與歷史記載不單指示考古學家去哪裡看，還引導考古學家看出些什麼。然而這樣的作法，往往導致學者竭盡心力去證成原本的預設框架，至於無法納入此框架的考古發現，不是強加解釋，便是視而不見。Robert W. Bagley，〈Changjiang Bronzes and Shang Archaeology〉，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輯，《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器物（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頁 21-124；中譯本：〔美〕貝格立著，任汶譯，許杰校，〈長江流域青銅器與商代考古〉，《南方文物》1996 年第 2 期，頁 31-45。

47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 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6), p. 12. 另外，英國的藝術史家羅森（Jessica Rawson），曾撰文討論青銅器與文字材料（包含傳世文獻與青銅銘文）中所反映周人的不同面貌。她的研究方法正是分頭梳理這兩類性相異的材料，並進一步解釋何以根據不同的材料，會出現完全不同的認識。Jessica Rawson, “Statesmen or Barbarians? The Western Zhou as Seen through their Bronze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75, 1989, pp. 79-95; 中譯本：〔英〕羅森著，黃愛梅譯，〈是政治家，還是野蠻人？——從青銅器看西周〉，收入氏著，孫心菲等譯，《中國古代的藝術與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134-163。

## 一、生態資訊

人類的活動絕對與其所賴以維生的自然環境脫離不了關係。時代越早，人類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也就越大。然而長久以來，歷史研究大多僅關心文獻上對自然環境的記載，進行「紙上談兵」式的分析；而在過去的中國考古學界裡，則往往將遺址所在的自然環境，視為背景資料而一筆帶過。部分的歷史學家或考古學家，則開始反省上述狀況，學者亦逐漸將生態資訊納入研究之中，並取得可喜的成果。<sup>48</sup>為了更能具體說明南陽盆地在中國地理上的特殊性與重要性，本文亦將當地的生態資訊納入討論。此外，筆者亦利用親赴南陽盆地考察的紀錄為補充資料。

## 二、考古材料

考古材料指已正式發表的考古報告，包括完整的考古報告，以及發表於期刊雜誌的考古簡報。目前有關南陽盆地的完整報告，包括《淅川下王崗》、<sup>49</sup>《淅川下寺春秋楚墓》、<sup>50</sup>《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sup>51</sup>《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sup>52</sup>《棗陽雕龍碑》<sup>53</sup>及《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sup>54</sup>至於簡報則有 80 餘篇。若將這些考古報告依遺址的性質分類，則包含了聚落與墓

48 許倬雲是力主將自然環境納入研究範圍的學者之一，他希望考古學家能運用更多的生態資料進行研究，包括地質學與氣候學；而方輝所主編《聚落與環境考古學理論與實踐》一書，其中收錄十六篇翻譯自西方學界有關聚落與環境考古的研究，則提醒學者應多關注外在的自然環境與生態網絡。近年來，主張將自然地理環境納入研究內的學者不乏其人，除前述的童恩正與王明珂外，還包括李峰。為闡明西周滅亡的原因，李氏首先架構西周國家的地理基礎，不但利用現有的地理研究成果，並親赴渭河谷地及其支流，考察山川地勢與道路交通。在此基礎上，李峰發現，犬戎的地理位置，原本就離鎬京相當接近，一旦西周內部政局不穩，反叛勢力便能立即連結外族，一舉攻滅西周王朝。許倬雲，〈另一類考古學〉，收入氏著，《倚杖聽江聲》（臺北：三民書局，2003），頁 76-83；方輝主編，《聚落與環境考古學理論與實踐》（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李峰，《西周的滅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164-263。

4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編著，《淅川下王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5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編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5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編著，《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5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編著，《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5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54 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編著，《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葬兩大類，其中又以墓葬為主，聚落較少。之所以產生墓葬多而聚落少的狀況，一則因中國考古學界重視發掘墓葬（尤其是大墓），二則與大陸直到晚近才開始重視聚落考古有關（詳前文）。

附帶說明的是，許多的考古報告，尤其是簡報，僅提供報告撰寫者認為重要的資料，材料的甄別亦多存主觀判斷。為求審慎，使用考古報告時不可盡信，必須採取批判的態度。

### 三、傳世文獻

至於本文使用的傳世文獻，則包括了《詩經》、《春秋》、《左傳》、《國語》、《國策》、《史記》等古代文書。由於這篇文章所要處理的核心議題，是探討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的關係，後者既利用考古材料進行分析，前者則透過傳世文獻進行討論。

在周代長達八百年的歷史裡，自東周以降，始有較豐富的文獻可供參考。當時的南陽盆地，除春秋早期與戰國晚期外，在將近四百年的時間裡，均受南方楚國的控制。南陽盆地不但是楚國防禦中原各國南侵的軍事重鎮，更是楚人北上中原的根據地。為清楚描繪楚國在東周時期勢力消長的趨勢，並進而探討南陽盆地對楚國重要的戰略價值，因此，本文將利用文獻中對列國戰役的紀錄，辨析上述問題。然而，傳世文獻亦有其侷限性。吾人僅能仰賴編年式的紀錄，窺探南陽盆地易主的時間，卻無法更深入地探究政權的嬗代對當地人民所造成的影响。考古材料的加入，則正好彌補傳世文獻的不足。

## 第四節 三層架構

本文由六章組成，是一部嘗試整合自然生態、考古學與歷史學的區域史研究。<sup>55</sup>除了第一章〈緒論〉與第六章〈結論——不斷變動的傳統〉外，文章將依時空背景、考古材料與歷史發展的三層架構，對周代的南陽盆地展開討論。

第二章〈自成一格又四通八達的地理空間〉，利用有關南陽盆地自然環境與交通網絡的研究成果，輔以筆者親訪南陽盆地的經驗，架構南陽盆地區域發展史的地理舞台。南陽盆地四周由群山環繞，實是一個完整的地理空間。然而由於周邊存在低地與河谷，因此以南陽盆地為中心，形成了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將北方的中原與關中地區、南方的江漢平原、東邊的淮水流域、西邊的漢水谷地連接在一起。南陽盆地無疑居於溝通上述地域的心臟地帶。

第三章〈沒有文字的歷史——新石器時代的南陽盆地〉，則利用考古材料，重構南陽盆地新石器時代的區域發展史，並分為「始興期」、「發展期」、「成熟期」與「衰退期」。南陽盆地的「始興期」與「發展期」，與北方黃河流域的裴李崗文化及仰韶文化早、中期文化關係密切，但已逐漸展現獨特的特徵；「成熟期」的南陽盆地則發展出鮮明的地域特色，諸如多間式的地面建築與埋豬土坑，這些現象不只出現於北方系統的仰韶文化三期，更由其後南方系統的屈家嶺文化所繼承，顯示當地物質文化的本地傳統已然成形。「衰退期」的南陽盆地則處處顯現頽敗之勢，不但遺址驟減，而且發現人群衝突現象。此外，南陽盆地還出土二里頭文化與殷商文化時期的遺址，但材料甚少。筆者認為，南陽盆地「小歷史」的發展，實是一窺古代中國「大歷史」演變的觀測站。

第四章〈周文化？楚文化？秦文化？——周代南陽盆地的考古材料〉，則繼續使用考古材料，探討周代南陽盆地物質文化變化的軌跡。首先，筆

<sup>55</sup> 整合地理學、考古學與歷史學為一體的研究方式，乃是受了許倬雲先生的啟發。2006年秋季，筆者選修許先生在臺大歷史系開設的「中國文化教研專題討論」。在課堂上，許先生除了提示有志研究中國上古史的後學必須一手抓文獻史料、一手抓考古材料外，另外便是點出自然環境對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重要性。許先生認為，若要使中國上古史的研究有所突破，就必須走出書本，親身探訪古人活動的自然世界。許倬雲，《傳鐘回響——許倬雲先生臺大講學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8)，頁148-165。

者先分析南陽盆地周代考古遺址與地理環境的關係。相較於新石器時代的遺址散布於南陽盆地各地的情況，周代的遺址則相對集中發現於南陽、淅川、襄樊與棗陽。引人注目的是，這些地區恰好均位於盆地周邊的出入口上，此外，還各發現周代城址。城址及其周邊遺址的出現，正說明上述地區重要的戰略位置。再者，筆者將本期的區域發展史分為「周文化」時期、「楚文化」時期與「秦文化」影響時期三大阶段。「周文化」時期出土的青銅器與陶器，一方面與「周文化」有相近之處，但本地特色較為鮮明，並與隨棗走廊及淮河上游地區存在明顯的共性。一進入「楚文化」時期，南陽盆地的青銅器立即展現強烈的楚式風格，然而，當地陶器的形制卻繼承「周文化」時期的特色，保留不少已形成「本地傳統」，中原因素亦持續影響南陽盆地，顯然銅器的變化與陶器的發展有時間上的落差。「秦文化」影響時期的南陽盆地，當地的物質文化仍保有前個階段的特徵，並增添秦文化的影響，可見此時的「楚文化」因素，反而成為南陽盆地的「本地傳統」。由上可見，儘管統治集團的改變，的確對當地的物質文化造成一定的影響，但「本地傳統」與「外來因素」則存在多層次性的互動關係。

第五章〈南土與北疆——傳世文獻中的周代南陽盆地〉，則透過傳世文獻，勾勒周代歷史上的南陽盆地。南陽盆地曾是西周時期周王朝的「南土」，亦是東周時期楚國的「北疆」，因此不論是周王朝南征江漢平原，抑或楚國北進中原，均利用南陽盆地與其周邊的低地河谷作為交通網絡。除了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南陽盆地更肩負保衛國土的重責大任。對周王朝而言，南陽盆地是鞏固南方領土最重要的戰略要地，因此在當地「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對楚國而論，南陽盆地則是確保北方邊防的軍事防線，一旦敵軍突破南陽盆地，便可長驅直入楚國的政治中心，對楚國造成重創。戰國晚期，在中原列強持續不斷的侵伐之下，南陽盆地最終易主成為秦地。然而筆者認為，其實傳世文獻所描繪的並非是以南陽盆地為主體的歷史，而是以「政治中心」——亦即周王朝、楚國或秦國——為核心的歷史論述。唯有以考古材料為主，傳世文獻為輔，並利用區域史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加真切掌握周代南陽盆地的發展軌跡。

## 第二章 自成一格又四通八達的地理空間

自新石器時代起，生活於南陽盆地的人類，便過著兼容南北文化，同時又帶有本地傳統的生活。這種由多元文化共同交織而成生活，自外觀之，混合了各式不同的文化因素，經由縝密的分析與研究，學者可以將不同系統的文化因子，從中單獨拆解出來，並考辨其各自的來源；然而由內而論，源流各異的文化因素，卻又共同組成了當地文化的整體，一經分割，便面目全非。南陽盆地的文化面貌，長期處於這種複雜的狀態之下。在往後的討論中，我們將反覆看到南陽盆地文化的多元性。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樣的結果？

南陽盆地位於黃河中游與長江中游之間（約於東經 111.5 度至 113.5 度、北緯 33.5 度至 31.5 度之間），雖然在地理上，它是一座四周環山、形狀完整的盆地，然而輻射狀的交通網絡，則又讓南陽盆地便於與鄰近地區相互交流。這種看似封閉實則開放的地理空間，實是造成南陽盆地文化多元的關鍵因素。因此，在正式開始討論南陽盆地的區域發展史之前，筆者想稍微花點篇幅，談談這個地區的自然環境與交通網絡，以建構本研究的地理舞台。

### 第一節 自然環境

翻開中國的地形圖，在黃河中游與長江中游之間，我們可以輕易地找到南陽盆地的位置。它是一個近似圓形、半大不小的區域，四周為叢山峻嶺環繞，正符合「盆地」的特徵（圖五）。然而，只要有機會親自到南陽盆地一趟，便會立即察覺上述的「認識」與實際的感受大不相同。除了在邊緣地帶外，盆地內觸目所及的盡是廣大無垠的平原，根本看不到山地（圖六）。這片寬廣的盆底平原是由長江最大的支流漢水，以及漢水主要的分支，包括丹江、湍河、唐河、白河等河川共同沖積而成，總面積約有 26000 平方公里，為臺灣的三分之二強，平均海拔高度則為 80 至 120 公尺。平原的邊緣是波狀起伏的崗地，崗地外側才是環繞盆地的山脈。整體而言，地勢北高南低。

這座地處內陸的大型盆地，受到燕山造山運動的影響，形成約於距今 8000 萬年前，即古地質學上的中生代晚期。當時的南陽盆地並非今日我們熟悉的模樣，而是一座巨大的內陸湖泊。歷經 7000 多萬年的演變，湖水逐漸乾涸。進入距今約 11000 年的全新世後，其內的水系才基本定型，現代的地貌格局也於焉形成。<sup>1</sup>相較於遠古的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南陽盆地的地理環境，大抵上已較為穩定。<sup>2</sup>儘管如此，直到西元前 5000 左右，當地才開始出現人類活動的痕跡。<sup>3</sup>



圖五 南陽盆地地形圖

今日的南陽盆地位於北亞熱帶與暖溫帶氣候的過渡地區，年均溫為 14 至 16°C，年雨量則有 800 至 1000 公釐，氣候溫和，降雨適中，盆地河道密佈，水利資源豐沛，不但相當適合人居，亦有利於農作物的生長。盆地

1 馮祖傑、周旗、王軍、谷保俊，〈豫西南中新生代古地理環境變遷〉，《河南地質》第 15 卷第 4 期（1997），頁 274-275。

2 張弛，〈長江中下游地區史前聚落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7。

3 實際更準確地說，遠在舊石器時代，南陽盆地的邊緣地區，諸如今日河南省的淅川與南召，以及湖北省的襄樊等地，均曾發現舊石器時代古人類活動所遺留下來的痕跡，包括牙齒化石以及打製石器。由於時代過早，當時的自然環境與今日相比差距過大，因此舊石器時代的南陽盆地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吳汝康、吳新智，〈河南淅川的人類牙齒化石〉，《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第 20 卷第 1 期（1982），頁 1-9；南陽地區文管會，〈南召縣小空山發現舊石器時代文化〉，《中原文物》1982 年第 1 期，頁 31-36；李天元，〈襄陽山灣發現的幾件打製石器〉，《江漢考古》1983 年第 1 期，頁 29-42；襄陽縣文物管理處，〈襄陽縣三處舊時器時代遺址調查〉，《江漢考古》1999 年第 4 期，頁 1-6。

內除遍植小麥、雜糧等旱作穀物外，同時還盛產性喜多水的稻米，展現南北氣候過渡帶的特徵，而棉花、芝麻與菸葉則是主要的經濟作物。如此豐饒多元的物產，無怪乎當地素有「中州糧倉」的美稱。雖然當代的南陽盆地氣候宜人、沃壤千里，然而古代的氣候條件又是如何？



圖六 南陽盆地北方的邊緣地帶（作者攝於 2009 年 4 月 10 日）

自大趨勢而論，隨著最後一次冰河期的結束與東亞季風的增強，自西元前 9000 至 8000 年起，古代中國的氣候逐漸由乾冷變得濕暖。在接下來的數千年裡，氣溫與雨量持續攀升，約於西元前 5200 至 4000 年達到高峰。據目前的資料顯示，在這個最為濕暖的階段，南陽盆地首次出現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址。西元前 4000 年左右，由於東亞季風減弱，雨量隨之減少，氣溫亦逐漸下降。直至西元前 2000 年為止，也就是新石器時代的末期，古代中國的氣候均維持在乾冷的狀態。<sup>4</sup>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南陽盆地的氣候變化自然無法超脫其外。

為了更細緻地分析當地古代的自然環境，學者曾對盆地西側淅川下王崗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進行物種鑑定，以確定當時的氣候條件。在該遺址的仰韶文化一、二期 (ca. 4900-3800 BC)，發現了孔雀、蘇門犀、亞洲象、麂（未定種）等生活在熱帶地區的動物，以及今日大多於四川盆地北部山區活動的貓熊，證明當時盆地的氣候與今日的長江流域甚至是東南亞相

<sup>4</sup> 劉莉著，陳星燦、喬玉、馬蕭林、李新偉、謝禮暉、鄭紅莉譯，《中國新石器時代——邁向早期國家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20-23。安田喜憲則進一步提出，西元前 3,700 年前曾出現一次大的氣候變動，使得歐亞大陸的氣候變得更加寒冷而乾燥。[日]安田喜憲，〈5000 年前の気候変動と古代文明〉，《科学》58 卷 8 号（1988），頁 468-476，轉引自安田喜憲，〈從地理環境和氣候變動看文明的誕生〉，收入高崇文、安田喜憲主編，《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頁 20。

似，不但潮溼炎熱，而且森林密布。其後，直到龍山文化時期（ca. 3000-2000 BC），上述的動物全部消失，不僅如此，當地還出現了無法適應過熱環境的狗，氣候顯得較為涼爽。<sup>5</sup>此外，有的學者則對盆地東南方棗陽雕龍碑遺址採樣的孢粉進行分析，發現該遺址於西元前 4300 至 2800 年，氣候呈現上下擺動之勢。<sup>6</sup>由上可知，不論是分析動物骨骼或植物孢粉，都可以得到以下類似的結論：首先，約自西元前 5000 年以後，南陽盆地與古代中國整體的氣候變化趨勢雖然有所出入，不過大抵一致；其次，即便在較為涼爽的階段，古代仍比今日炎熱，平均而言，可能約高於現在 2°C。<sup>7</sup>古代南陽盆地乾濕冷熱不定的氣候變化，連帶地亦改變當地的自然環境與生態系統，並對定居於此的人類生活造成衝擊。所以，氣候變遷是影響南陽盆地區域發展史（尤其是周代以前）相當較重的背景因素之一。

除了良好的氣候條件，遍佈於盆地內的大小河流，則提供連綿不絕的水源，滋養著這片廣袤的沃壤。前述的漢水及其支流丹江、湍河、唐河與白河，是盆地內最主要的河川，其與旁支如同微血管密布於盆底平原之上，狀似一把中式摺扇，匯聚於盆地南端的襄樊，之後順勢繼續南下，於武漢匯入長江。今日盆地內的城市和鄉鎮大多位於河道附近，<sup>8</sup>而早自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址，亦經常發現於河邊的台地之上，不但便於取水，更有利於防洪。此外，源於盆地外圍山區的河流，諸如漢水、丹江與滾河，其所形成的河谷，則是南陽盆地聯繫周邊地區的主要道路。這些河谷加上盆地周圍山地的斷陷地壘，不但是進出盆地的必經之路，更甚者，它們還將北方黃河流域的黃淮平原與渭河谷地、南方長江流域的江漢平原，以及西方的漢中盆地連為一體，形塑一有機的地理空間。這片幅員遼闊的區域，正是古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要舞台。南陽盆地居於天下的心臟地帶，而輻射狀

5 賈蘭坡、張振標，〈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中的動物群〉，收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編著，《淅川下王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 429-439。

6 齊烏雲，〈湖北棗陽雕龍碑遺址孢粉分析研究〉，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 397-408。

7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國科學》1973 年第 2 期，頁 168-171、186。

8 例如盆地內最大的兩座城市，即北部的南陽與南部的襄樊，便分別位於白河與漢水邊上，後者乃由漢水北岸的樊城與南岸的襄陽共組而成。自古以來，每當南北分屬不同政治勢力時，一水之隔的兩座城市，往往旗幟各異，相互對峙，是兵家必爭的軍事要點。

的河谷隘道，則宛如連接百體的血脈。在交通運輸不若今日便捷的年代，各地的文化不單聚集於此，更共同經由此地傳向遠方。

至於盆地四周的山地，依順時鐘方向，分別為西部的秦嶺、北部的伏牛山、東南部的桐柏山、南部的大洪山，以及西南部的荊山與武當山。西半部的山勢較為險峻，其中以秦嶺為最，平均海拔高度為 2000 至 3000 公尺，其它諸如伏牛山、荊山、武當山，高度亦超過 1200 公尺；至於東半部的山勢則較為和緩，桐柏山與大洪山平均高約 500 公尺。環盆山脈一方面讓南陽盆地成為完整而獨立的自然地理區，同時亦使得居於盆地內的人們，或是控制當地的政治勢力，得以藉此地理形勢抵禦外侮侵略。在先秦的傳世文獻中，就已出現利用南陽盆地的周邊山地作為軍事屏障的記載。<sup>9</sup>

綜上所述，南陽盆地本身的自然環境非常優越，不但氣候溫和、資源豐富，更兼有易守難攻之勢。然而有意思的是，上自新石器時代，下至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南陽盆地卻鮮少成為中國文明與歷史發展的主要舞台。相較之下，它卻往往以交通樞紐或戰略要地的角色，活躍於中國的歷史之中。為能突顯南陽盆地作為中國南北地區橋樑的特殊意義，以下，筆者將接著說明盆地四周的交通網絡，以及其與周邊地區的關係。

## 第二節 交通網絡

為群山環繞的南陽盆地，儘管在地理區上自成一格，但因其周邊由河谷與隘道所共同形成的輻射狀交通網絡，反倒使得這座盆地的開放性大於封閉性。以南陽盆地為中心的道路共有 7 條（圖七，【路徑 1】至【路徑 7】），除了 3 條連接黃淮平原（【路徑 1】至【路徑 3】）與 2 條溝通江漢平原的道路（【路徑 4】、【路徑 5】）外，另外在盆地的西北部與西南部，則各有 1 條聯繫渭河谷地（【路徑 6】）與漢中盆地的通道（【路徑 7】）。這些道路的狀況各不相同，或為平坦寬闊的大道，或為縣長細狹的河谷，或為崎嶇迂迴的山徑。由於它們各自聯繫不同的彼方，並都以南陽盆地為中心，共同

<sup>9</sup> 以南陽盆地周邊山地作為軍事屏障，最早見於《左傳·僖公四年》所載「楚國方城以為城」一語。雖然對於「方城」的解釋甚夥，不過大抵均與南陽盆地四周的山地有關。相關問題，筆者將在第五章進行討論。

構成聯繫中國南北的交通網絡，因此在交通運輸完全仰賴自然地勢的古代，這 7 條道路都具備獨特的價值。



圖七 以南陽盆地為中心的交通網絡

(1-7 為南陽盆地對外的七條交通路徑，8 為溝通黃淮平原與長江中游地區的旁道。)

A：南陽 B：唐河 C：棗陽 D：襄樊 E：丹江口 F：淅川）

## 一、【路徑 1】：南陽至許昌

以盆地北側的南陽為起點，向東北行經方城，在穿越伏牛山與桐柏山之間的隘道方城缺口後，即可抵達黃淮平原西南緣的葉縣。<sup>10</sup>所謂的方城缺口，其實是一處斷陷地壘，狀似漏斗，窄端指向東北。通過方城離開盆地，往東北經過許昌，便可直指黃淮平原的心腹區域。由於方城缺口的地勢相對平坦，穿越此地的路程又短，因此這是一條聯繫南陽盆地與中原地區最重要也最便捷的幹道，<sup>11</sup>或可稱為「方城路」。<sup>12</sup>

10 蘭南高速公路即沿此徑修築。

11 史念海，〈春秋時代的交通道路〉，收入氏著，《河山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頁 68-69；王文楚，〈歷史時期南陽盆地與中原地區間的交通發展〉，《史學月刊》1964 年第 10 期，頁 25。另外，據李孝聰的研究指出，從黃河流域南下長江流域的交通路線，最重要的共有東西兩條。東線沿山東丘陵西側，經濟南、曲阜、徐州，南抵宿州。西線則自鄭州南下，經新鄭、許昌後，或向東南行經郾城、汝南、正陽，往信陽或羅山，通過義陽三關，穿越大別山；或向西南行經葉縣、方城，抵達襄陽。這段由南陽至許昌的道路，即指李氏所言的西線西南路，至於西線的東南路，即後文所論【路徑 8】。李孝聰，《中國區域歷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186。

12 徐少華、江陵，〈明清時期南陽盆地的交通與城鎮經濟發展〉，《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第 10 卷第 3 期（2001），頁 199-202。

## 二、【路徑 2】：唐河至信陽

在【路徑 1】的東南方，也就是盆地的東側，自唐河出發，向東通過泌陽的河谷，或向東南順著桐柏山北面的山腳低地而行，可抵達淮河上游的信陽。<sup>13</sup>此徑沿途不但平整開闊，而且是片連綿不絕的大緩坡。除了夾道的丘陵與山地外，中間大多為可耕地，其上則遍植小麥與油菜花（圖八）。隨著地勢漸高，耕地的面積隨之減少。自居高臨下的淮河上游地區進入南陽盆地，雖然遠比反向的交通來得便利，但這條寬廣的東方大道，確實便於兩地的交流。<sup>14</sup>



圖八 信南高速公路沿途風景一瞥（作者攝於 2009 年 4 月 13 日）

## 三、【路徑 3】：南陽至洛陽

第三條連結中原的道路，則通往南陽盆地正北方的洛陽盆地。這個地處黃河南岸且四面環山的區域，在古代中國歷史的發展上極其重要，不但周代的東都雒邑位於其內，當地還發現早商時期的偃師商城遺址，以及可能是夏代晚期都城的二里頭遺址，可說是三代的政治核心。然而由於兩地間橫亘著伏牛山脈，因此南陽盆地溝通洛陽盆地的道路，相對於前述的【路徑 1】與【路徑 2】，顯得較為不便。由南陽溯白河、鴨河河谷北上，越過伏牛山脊（圖九），沿瀼河河谷可達魯山。這段穿越伏牛山東脈的道路即所

13 信南高速公路取道泌陽，而 312 國道則沿桐柏山北坡修建。

14 由南陽盆地到淮河流域的道路，除了【路徑 2】外，亦可走前述【路徑 1】的方城路，即出盆地後向東南折。譚其驥在考訂【鄂君啟節】的車節銘文後認為，其中所載道路，是「從南陽盆地東北逾伏牛山口，折東南經汝、潁下游平原，渡淮抵壽春」之道。譚其驥，〈鄂君啟節銘文釋地〉，收入氏著，《長水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 208。

謂的「三鴉路」，<sup>15</sup>地勢最高處約為 600 公尺，其與西側海拔超過 2000 公尺的主峰老君山與石人山（堯山）相比，「三鴉路」所經之河谷更便於通行。在橫跨伏牛山後，自魯山轉向東北，至寶豐後再折向西北，沿汝河河谷至汝州後繼續北行，即可到達洛陽。<sup>16</sup>儘管路程曲折，但這條通道是南陽盆地聯繫洛陽盆地的捷徑。



圖九 由南陽盆地向北穿越伏牛山的自然環境（作者攝於 2009 年 4 月 10 日）

#### 四、【路徑 4】：襄樊至荊州

自盆地南緣的襄樊出發，沿漢水河谷而下，經宜城、荊門，便可進入江漢平原西部的荊州。<sup>17</sup>荊州於先秦時期，曾長期為楚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核心。2002 年，在湖南省的里耶遺址發現大批秦簡，當中的 J1 (16) 52 簡載：

鄖到銷百八十四里  
銷到江陵二百四十六里<sup>18</sup>

簡文所書的鄖、銷與江陵，均為秦縣名。據學者考證，鄖位於今日宜城縣的南方，銷地處荊門市的北面，<sup>19</sup>而江陵則在荊州市的江陵縣境。<sup>20</sup>這條里

<sup>15</sup> 王文楚，〈歷史時期南陽盆地與中原地區間的交通發展〉，《史學月刊》1964 年第 10 期，頁 25-26；盧雲，〈戰國時期主要陸路交通線初探〉，《歷史地理研究》第 1 輯（1986），頁 41-42。

<sup>16</sup> 焦枝鐵路大抵順此徑而行。

<sup>17</sup> 襄荆高速公路大抵沿此路修築，總長則約有 188 公里。

<sup>18</sup>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岳麓書社，2006），頁 198-199。

<sup>19</sup> 銷在「荊門市北面」之說，乃《里耶發掘報告》採周振鶴的解釋；王煥林則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銷與鄖均在漢水之上，是故銷應在漢水旁的鍾祥市附近。儘管兩說不同，銷位於今湖北宜城與江陵之間卻無爭議。周振鶴，〈秦代漢初的銷縣——里耶秦簡小識之一〉（2003 年 12 月 1 日），「簡帛網」：<http://www.jianbo.org>，2008 年 11 月 7 日讀取；王煥林，《里耶秦簡校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7），頁 214-217。

耶秦簡的出土，直接證實了襄樊、荊州間古道的存在。

### 五、【路徑 5】：棗陽至武漢

以盆地東南方的棗陽為起點，往東南方進入隨棗走廊後順勢而行，中經隨州，於安陸出境。其後繼續向東南行，通過孝感，便可抵達江漢平原東部的武漢市。<sup>21</sup>隨棗走廊是條西北—東南向的狹長通道，由走廊向兩旁望去，東北方的桐柏、大別二山與西南方的大洪山清晰可見。走廊內部約莫在中段的隨州一帶地勢較高，首尾兩端則較為低緩。沿路並非一片坦途，反而遍佈大小丘陵，地形甚為破碎。錯落起伏的地勢，確實為聯繫南陽盆地與武漢地區帶來一定的不便。儘管如此，當地的農民仍利用有限的土地種植農作物（圖十）。有意思的是，愈靠近北方南陽盆地的麥田愈多，而鄰近南方的江漢平原則出現較多的稻田，呈現一幅鮮明的過渡景象。



圖十 隨棗走廊隨州境內的沿途風光（作者攝於 2009 年 4 月 15 日）

### 六、【路徑 6】：淅川至西安

在盆地的西北方則有條穿越秦嶺、通向渭河谷地的山路。以淅川為起點，往西北走，途經商南、丹鳳、商洛，在翻越秦嶺山脊後，通過藍田，便可到達谷地中部偏東的西安（圖十一）。<sup>22</sup>渭河谷地又稱「關中」，<sup>23</sup>其與

20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發掘報告》，頁 199。

21 漢丹鐵路、漢十高速公路以及 316 國道均取道於此。

22 滬陝高速公路與 312 國道大抵沿此徑而行。

23 渭河谷地是座巨大的斷陷地壘，位於南邊的秦嶺與北方的北山山系之間，地勢相對封閉。一方面，由於必須利用谷地周邊的關隘，諸如東邊的函谷關、南邊的武關、西邊的隴關及散關，與北邊的蕭關，以作為交通四方的要道；另一方面，上述關隘還共同護衛谷地，具備重要的戰略價值。因此，居於諸關隘之中的渭河谷地又稱「關中」。

東側的洛陽盆地，同是古代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舞台。自新石器時代起，當地便是古代中國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區之一；西周時期，位於今日西安西南方灊河兩岸的豐、鎬二京，是周王室的政治中心；<sup>24</sup>東周以降，秦國則取代周王室成為渭河谷地的新主人，並以其為根據地，逐步擊潰東方諸國，創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政治一統的帝國。儘管寬廣高聳的秦嶺，造成南陽盆地與渭河谷地間交通的阻礙，然而這條斜貫秦嶺、縣長曲折的山路，仍是溝通兩地最直接的道路。<sup>25</sup>其中丹鳳至商洛一段地勢最為平緩開闊，是南陽盆地與渭水谷地之間最為重要的戰略要地。在今日丹鳳縣城西北方的古城村，曾發現一群春秋中期至戰國中期的楚墓；<sup>26</sup>墓地的西邊，則發現一處戰國時期的遺址，論者多以為此即戰國時期秦國商鞅（395-338 BC）的封邑。<sup>27</sup>由此可見，在戰國的中、晚期，這段丹鳳—商洛間的丹江河谷平原，是楚、秦兩國兵家必爭之地。



圖十一 秦嶺上的丹江河谷（作者攝於 2009 年 4 月 19 日）

李峰，《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37-38；史念海，〈古代的關中〉，收入氏著，《河山集》，頁 26-27。

2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兩周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 45、56。

25 史念海，〈春秋時代的交通道路〉，收入氏著，《河山集》，頁 72；盧雲，〈戰國時期主要陸路交通線初探〉，《歷史地理研究》第 1 輯，頁 41-42。

26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市博物館編著，《丹鳳古城楚墓》（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另外，在丹鳳西南方的山陽鵩嶺遺址亦發現一群楚墓，然相關材料尚未公布。同書，頁 163。

27 商洛地區考古調查組，〈丹江上游考古調查簡報〉，《考古與文物》1981 年第 3 期，頁 30；王子今、周蘇平、焦南峰，〈陝西丹鳳商邑遺址〉，《考古》1989 年第 7 期，頁 598-602；楊亞長、王昌富，〈商鞅封邑遺址的考古調查、發掘與初步研究〉，收入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市博物館編著，《丹鳳古城楚墓》，頁 177-188。

## 七、【路徑 7】：丹江口至漢中

以盆地西南方的丹江口市為起點，溯漢水西行，經過十堰、紫陽，即可抵達位於漢水上游的漢中盆地。<sup>28</sup>這段由漢水沖積而成的河谷，翻越北方的秦嶺可達關中，翻越南方的大巴山可到四川盆地，是連接兩地的中途站。雖然漢中盆地的平原面積有限，但自新石器時代的老官台文化時期（6000-5000 BC）起，在漢水兩側的平原台地與河谷階地，便出現許多大小不一的聚落遺址。<sup>29</sup>而在盆地中的城固與洋縣，則曾出土 600 多件殷商時期的青銅器，<sup>30</sup>其風格雜糅中原地區的殷商文化、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以及渭水谷地的周文化，<sup>31</sup>甚至與安徽、湖南、江西等地出土的青銅器，共享類似的藝術表現手法。<sup>32</sup>論者或將該銅器群指向特定族屬，<sup>33</sup>或以為是不同區域風格的混合體。<sup>34</sup>此外，在城固北邊的寶山，還發現一處商

28 316 國道即大抵沿此徑修築。

29 陶衛寧，〈陝南漢江走廊新石器時代考古聚落研究〉，《經濟地理》第 23 卷第 4 期（2003），頁 486-490。

30 段紹嘉，〈介紹陝西省博物館的幾件青銅器〉，《文物》1963 年第 3 期，頁 43-45；祝培章、卜哲民、程學華，〈陝西城固、寶雞、藍田出土和收集的青銅器〉，《文物》1966 年第 1 期，頁 1-3；唐金裕、王壽芝、郭長江，〈陝西省城固縣出土殷商銅器整理簡報〉，《考古》1980 年第 3 期，頁 211-218；王壽芝，〈陝西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文博》1988 年第 6 期，頁 3-9；李燁、張歷文，〈洋縣出土殷商銅器簡報〉，《文博》1996 年第 6 期，頁 73-75；苟保平，〈城固縣文化館收藏的青銅器〉，《文博》1996 年第 6 期，頁 80-81；柴福林、何滔滔、龔春，〈陝西城固縣新出土商代青銅器〉，《考古與文物》2005 年第 6 期，頁 3-4；曹瑋主編，《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2006）；趙叢蒼主編，《城洋青銅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31 施勁松，〈長江流域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200-206；李朝遠，〈城固洋縣所含中文化因素之我見〉，收入氏著，《青銅器學步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184-201。

32 Jessica Rawson, “Statesmen or Barbarians? The Western Zhou as Seen through their Bronze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75, 1989, pp. 79-95; 中譯本：羅森著，黃愛梅譯，〈是政治家，還是野蠻人？——從青銅器看西周〉，收入氏著，孫心菲等譯，《中國古代的藝術與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134-163；Robert W. Bagley, “Shang Archaeology,” 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78-179.

33 李伯謙認為城固、洋縣的青銅器屬於早期蜀文化，唐金裕等人則認為是羌文化，王壽芝與黃尚明則歸之為巴文化，趙叢蒼則言屬巴蜀文化。李伯謙，〈城固銅器群與早期蜀文化〉，《考古與文物》1983 年第 2 期，頁 66-70；唐金裕、王壽芝、郭長江，〈陝西省城固縣出土殷商銅器整理簡報〉，《考古》1980 年第 3 期，頁 211-218；王壽芝，〈陝西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文博》1988 年第 6 期，頁 3-9；黃尚明，〈城固洋縣商代青銅器群族屬再探〉，《考古與文物》2002 年第 5 期，頁 40-45；趙叢蒼，〈城固洋縣銅器群綜合研究〉，《文博》1996 年第 4 期，頁 3-26。

34 李朝遠，〈城固洋縣所含中文化因素之我見〉，收入氏著，《青銅器學步集》，頁 184-201。

代遺址，<sup>35</sup>有學者推論當地是商代控制巴、蜀、氐、羌的軍事重鎮。<sup>36</sup>儘管漢中盆地的考古工作甚少，許多的問題目前還無法梳理清楚，無論如何，北方的殷商文化與南方長江流域的考古學文化，均對這個地區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而漢水上游谷地在連接南陽盆地後，不僅通向中原，同時還聯繫了長江流域。值得注意的是，漢中盆地與南陽盆地一樣，同屬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中間地帶。當地頗負特色的物質文化，諸如青銅器重食器組合的現象、造型特殊的人面與獸面青銅牌飾，以及帶有單條或三條起脊的三角援戈，加上個性鮮明的陶器群等，共同組成了當地強烈的區域風格。筆者認為，綜合上述材料進而挖掘漢中盆地的區域發展史，應是一項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 八、【路徑 8】：信陽至武漢

除了前述【路徑 1】至【路徑 6】等交通通道外，在盆地東側，另有一條聯繫黃河中游與長江中游地區的道路。從今日河南省南部的山城信陽，向南進入大別山區，穿越「義陽三關」，便可通往湖北省東部的武漢。大別山是淮河與長江的分水嶺，平均高度為 500 至 800 公尺，而「義陽三關」則位於山脈西段之上。<sup>37</sup>相較於大別山的東段，西段不僅地勢較低、坡度較緩，而且南北寬度較窄，因此容易通行（圖十二）。最晚至晚商殷墟時期（ca. 1250-1050 BC），在這條通道正北方的信陽地區，就已與安陽為中心的殷商文化關係密切。信陽市東邊的羅山蟒張遺址，曾發現一群殷墟時期的墓葬，<sup>38</sup>而其中隨葬的青銅器大多帶有相同的銘文，學者釋之為「息」

35 西北大學博學院，《城固寶山——1998 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36 王壽芝，〈從漢中出土文物看商與巴蜀氐羌的關係〉，《文博》2003 年第 4 期，頁 3-6。

37 義陽三關由東至西，分別為九里關、武勝關與平靖關。京廣鐵路與 107 國道均由中間的武勝關穿山而過，而京珠高速公路則取道東側的河谷修建。史念海亦曾討論過這條道路，與【路徑 1】相比較為不便，只能算是聯繫黃淮平原與長江中游地區的側道。史念海，〈春秋時代的交通道路〉，收入氏著，《河山集》，頁 69。

38 該墓地共經過六次發掘，目前僅公布其中三次的資料，發現的商代墓葬共計 25 座。信陽地區文管會、羅山縣文化館，〈河南羅山縣蟒張商代墓地第一次發掘簡報〉，《考古》1981 年第 2 期，頁 111-118；信陽地區文管會、羅山縣文化館，〈羅山縣蟒張後李商周墓地第二次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81 年第 4 期，頁 4-13；河南省信陽地區文管會、河南省羅山縣文化館，〈羅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學報》1986 年第 2 期，頁 153-197；信陽地區文管會、羅山縣文管會，〈羅山蟒張後李商周墓地第三次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88 年第 1 期，頁 14-20。

字。<sup>39</sup>一方面，墓葬本身的形制與出土器物的特徵，大多與殷商文化的面貌相似；但另一方面，其物質文化又具備獨特的區域風格，例如墓主棺板均髹黑漆；有些銅器紋飾的陰線部分亦填髹黑漆，目的是為使紋路更加清晰，諸如鼎（M5：1、M11：14、M28：10）與提梁卣（M8：6）；另發現漆器9件隨葬，包括1件碗與8件豆。這些現象均極其特殊。<sup>40</sup>論者以為該遺址為商代「息國」的貴族墓地，而且殷商王室還曾與息國聯姻。<sup>41</sup>假如上述的推論成立，商王朝與息國保持友好的關係，大概就是為了控制這條通往長江中游地區的交通路線。



圖十二 從信陽穿越大別山至長江中游的道路（作者攝於2009年4月13日）

### 第三節 小結——「夏路」不只是條「路」

在《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中，曾經記載一條從長江流域的荊楚地區，北上黃河流域中原諸夏的「夏路」。<sup>42</sup>譚其驥（1911-1992）曾據【鄂君啟節】舟節銘文中的「逾夏」一語，認為此「夏」即為「夏路」，亦即前述的【路

39 李伯謙、鄭杰祥，〈後李商代墓葬族屬分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頁33-35、46。

40 河南省信陽地區文管會、河南省羅山縣文化館，〈羅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學報》1986年第2期，頁155、160-165、181；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1033-103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318-319；岳洪彬，《殷墟青銅禮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359-365。

41 李伯謙、鄭杰祥，〈後李商代墓葬族屬分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頁33-35、46。

42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1748。

徑 1】。<sup>43</sup>儘管如此，時至今日，我們無法準確地得知「夏路」究竟始於何處、經過何地，最終又通向何方，然而筆者認為，所謂的「夏路」，應該不出上述討論的交通通道之外。<sup>44</sup>

其次，如果我們換個角度，將「夏路」一詞，理解為聯繫黃河中游地區與長江中游地區的某一道路，甚或是若干道路的總稱，那麼根據現有的考古材料，早在文獻出現這個名詞之前的新石器時代，生活於兩地的人群就已經共同利用這些道路相互交流。

第三，位於「夏路」中央的南陽盆地，除了是聯繫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交通樞紐之外，其實如本章第一節所論，這個區域是一個完整的地理空間，而且相當適於人類居住。如果我們僅從黃河流域或長江流域為主體的觀點立論，南陽盆地不是被理解為上述兩大核心區域的邊緣地帶，就是僅視其為溝通兩地的交通通道。然而，假若我們轉換視角，跳脫固有的思考框架，將目光焦點聚於南陽盆地本身，我們將會發現一個出人意料的事實：在先秦時期，尤其是尚未出現強勢政治集團的新石器時代，地處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南陽盆地，雖然同時受到周邊地區文化的影響，但當地的考古遺存，諸如仰韶晚期至屈家嶺時期的多間式的地面建築，卻表現出相當程度的一致性，特徵鮮明，自成一格。筆者將於第三章繼續申論相關問題。

43 譚其驥，〈鄂君啟節銘文釋地〉，收入氏著，《長水集（下）》，頁 197。

44 雖然【路徑 7】連接的是南陽盆地西方的漢中盆地，而後者與前者類似，亦位於黃河與長江之間的中間地帶，並不直接通向中國的南方或北方；但經由漢中盆地南北兩側的河谷，則可間接通向北側黃河流域的渭水谷地與南側長江流域的四川盆地。

## 第三章 沒有文字的歷史

### ——新石器時代的南陽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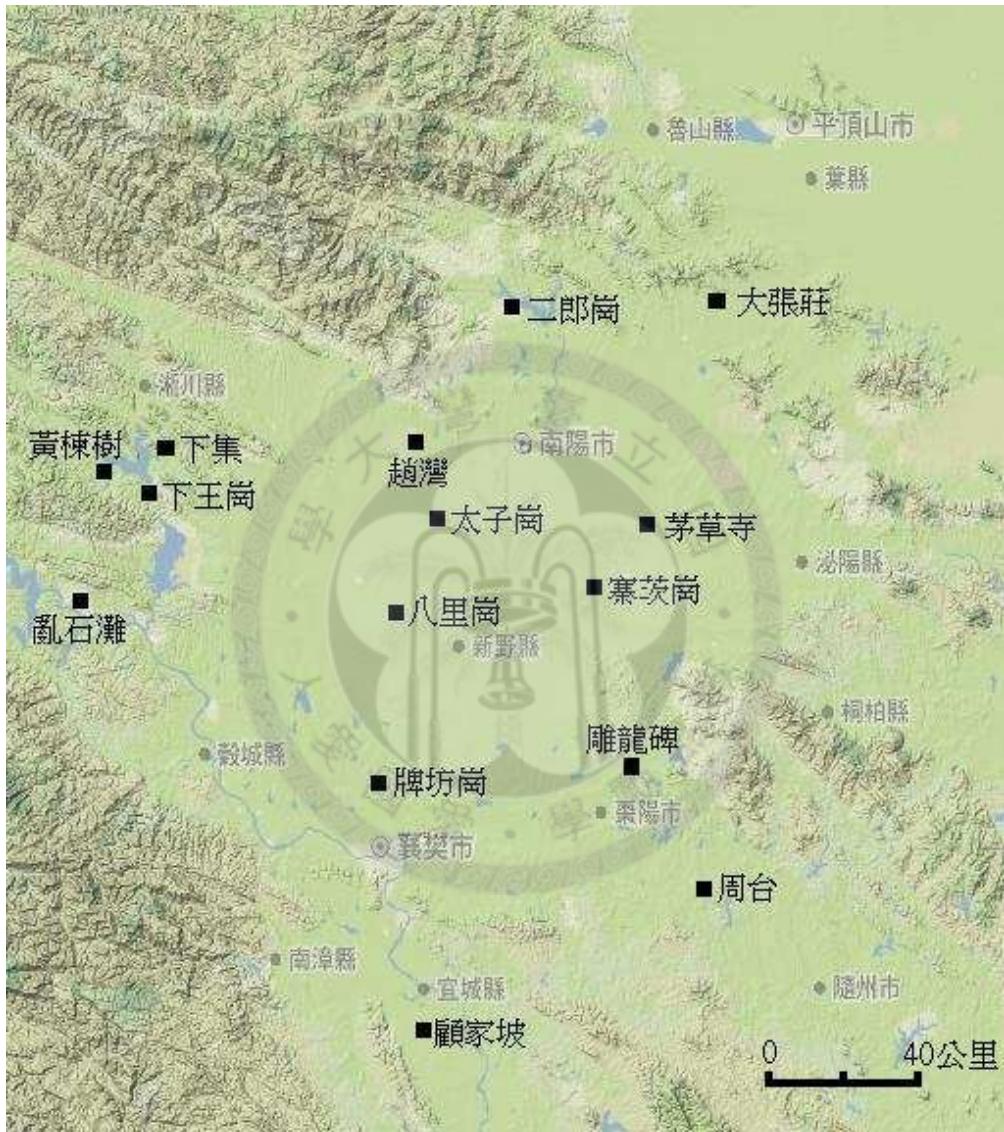
位於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南陽盆地，自發現人類活動痕跡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之交起，<sup>1</sup>也就是西元前 5000 年左右，當地的物質文化，不論是房址、墓葬等遺跡，或是陶器、石器等遺物，都共同表現出或南或北又獨樹一幟的特殊景象。為了說明周代南陽盆地區域發展史的複雜性乃是其來有自，在本章中，筆者將討論南陽盆地周代以前的歷史發展狀況。

據已發表的考古材料顯示，相對於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南陽盆地的古代文化起步較晚。自有人類活動以來，本地的歷史持續發展，未嘗停歇（圖十三），並歷經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與亂石灘文化等五大階段（附表一）。<sup>2</sup>這是依據出土遺物，並參照既有的考古學文化框架所做的分期。儘管這樣的考古學文化序列，明確排列了南陽盆地物質文化的發展次序，然而筆者認為，由於這些考古學文化的名稱，大多分屬黃河或長江流域系統，往往強調這個地區受到外來文化影響的一

1 關於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分期，時至今日，仍是學界爭論不休、懸而未決的問題。嚴文明先在〈中國新石器時代聚落形態的考察〉一文中分為五期，後於〈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一文內分為四期；張弛因研究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史前聚落，於是依嚴文明的五期說而稍做修改；張江凱與魏峻分為四期，但各期的起迄年代與分期標準與前兩者不同；劉莉亦分為四期，然其著眼點以黃河流域為主。本文由於較著重分析聚落型態的變遷，因此主要參考嚴文明與張弛的說法。嚴文明，〈中國新石器時代聚落形態的考察〉，收入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編輯組編，《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 24-37；嚴文明，〈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 年第 1 期，頁 10-16；張弛，〈長江中下游地區史前聚落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3、242；張江凱、魏峻，《新石器時代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 20-23；劉莉著，陳星燦、喬玉、馬蕭林、李新偉、謝禮嘯、鄭宏莉譯，《中國新石器時代——邁向早期國家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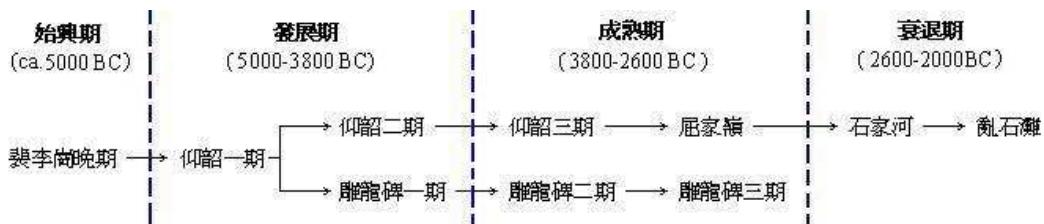
2 樊力，〈亂石灘文化初論〉，《江漢考古》1998 年第 4 期，頁 41-48；〈論屈家嶺文化青龍泉二期類型〉，《考古》1998 年第 11 期，76-89；〈論石家河文化青龍泉三期類型〉，《考古與文物》1999 年第 4 期，頁 50-61；〈豫西南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序列及其與鄰近地區的關係〉，《考古學報》2000 年第 2 期，頁 147-182。樊力認為，新石器時代南陽盆地最晚段的考古學文化，可分為盆地西部山區的亂石灘文化與盆地平原的八里崗四期文化。這兩類文化的面貌差異較大，屬不同類型的文化遺存。然而相對於前者而言，後者的資料較少，目前尚無法進行更細緻的討論。樊力，〈論石家河文化青龍泉三期類型〉，《考古與文物》1999 年第 4 期，頁 60；〈豫西南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序列及其與鄰近地區的關係〉，《考古學報》2000 年第 2 期，頁 168。另外，位於盆地東南方出口處的棗陽雕龍碑遺址，使用年代雖歷經仰韶及屈家嶺文化時期，但自身的特色較強，亦無法完全置入上述的考古學文化框架之中。相關討論，請參見下文。

面，反而輕忽以南陽盆地為主體的歷史演變。因此在本章中，為探討本地物質文化的特殊性及歷史的變遷趨勢，我將在上述考古學文化序列的基礎上重新分期，以「始興期」、「發展期」、「成熟期」與「衰退期」四大階段（圖十四），申論南陽盆地新石器時代的區域發展史。



圖十三 南陽盆地新石器時代遺址分佈圖

至於討論的考古材料則集中於房址、墓葬等遺跡，以及以陶器為主的遺物。藉由分析這些沒有文字的史料，筆者嘗試說明的是：一方面，南陽盆地的考古遺存雖受南北兩大勢力的強烈影響，仍然保有本地特色；另一方面，在自然環境上看似自成一格的南陽盆地，當地的歷史卻始終無法擺脫於古代中國的大歷史之外。這種與南北兩大考古學文化系統「若即若離」的模糊關係，實是先秦時期南陽盆地歷史發展的基調。



圖十四 新石器時代南陽盆地區域發展史分期示意圖

## 第一節 始興期 (ca. 5000 BC)

### ——裴李崗文化的輸入

所謂的始興期，指的是南陽盆地新石器時代區域發展史的萌芽階段。經由考古學家長年的調查與發掘工作，在方城大張莊、<sup>3</sup>鄧州八里崗、<sup>4</sup>淅川單崗，<sup>5</sup>以及南陽黃山等地，<sup>6</sup>發現一批盆地內最早的考古遺址，依據出土器物特徵，均可歸入裴李崗文化的範疇。<sup>7</sup>其中，僅有方城大張莊遺址發表正式簡報。

大張莊坐落於盆地東北方的方城缺口內（圖十三），亦即前述的【路徑1】沿線，是黃淮平原連接南陽盆地的交通要衝。遺址位於河流環繞的高地上，未發現房址與墓葬，僅清理出14座灰坑，出土器物兼具裴李崗文化因子與本地特色（圖十五）。就同者而言，以紅棕陶與紅陶為主的陶器群，手工製作，火候較低，質鬆易碎，不僅作風與裴李崗文化如出一轍，出土的雙耳圓腹壺與深腹罐，以及帶有鋸齒的石鏟與石磨棒，均為裴李崗文化典

3 南陽地區文物隊、方城縣文化館，〈河南方城縣大張莊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83年第5期，頁398-4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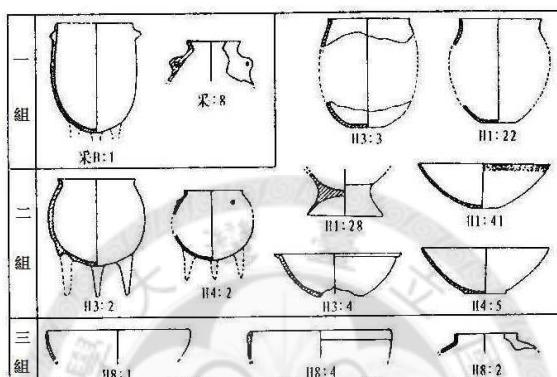
4 鄭州八里崗遺址有關裴李崗文化的材料尚未公布，感謝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張弛教授提供相關資訊。

5 長江水利委員會文物考古隊，〈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丹江口水庫淹沒區文物調查概況〉，《江漢考古》1996年第2期，頁64；樊力，〈丹江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存試析〉，《江漢考古》1997年第4期，頁34-35。

6 此外，在盆地內的南召與西峽等地，亦曾發現與大張莊類似的考古遺存。靳松安、任偉，〈略論漢水中游地區的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頁20。

7 靳松安與任偉則持不同意見，認為以大張莊遺址為代表的考古學文化，其性質有別於裴李崗、磁山、老官台等黃河流域的考古學文化，應單獨稱為「大張莊類型文化」。然而由於大張莊遺址並未進行全面發掘，再者目前學界大多認為其屬裴李崗文化的一支，因此筆者暫從主流論述。靳松安、任偉，〈略論漢水中游地區的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頁19-20。

型的器物。<sup>8</sup>就異者而言，兩者雖然都有夾砂陶器，但屬合物有別，大張莊以滑石粉為主要原料，<sup>9</sup>裴李崗文化則內含蚌殼、雲母碎片或碳屑；<sup>10</sup>其次，大張莊流行「黏貼口沿」，即製作陶器時先捏成頸部，其後再黏貼口沿，這種製陶工藝頗具地方特色；第三，本地陶器紋飾簡單，未發現裴李崗文化常見的劃紋與篦紋。<sup>11</sup>此外，大張莊另出土帶有仰韶文化因素的器物，簡報據此推定該遺址的年代處於裴李崗與仰韶文化的過渡階段，<sup>12</sup>亦即西元前 5000 年前後。



圖十五 方城大張莊遺址出土陶器

(採自樊力，〈豫西南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序列及其與鄰近地區的關係〉，頁 156，圖 7)

時至今日，儘管大張莊等遺址仍無法肯定就是新石器時代南陽盆地最早考古發現，但根據有限的材料，並配合相關的研究成果，我們仍可對始興期的南陽盆地得到以下初步的認識。

首先，源自黃淮平原的裴李崗文化分布於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區，<sup>13</sup>主要的遺址多發現於河南省中部的嵩山四周，而其中的賈湖類型則離裴李崗

8 李驍、范海，〈方城大張莊新石器時代文化源流〉，《中原文物》1998 年第 4 期，頁 44-45。

9 在大張莊遺址中的 H1，曾發現一層厚約 4 公分的滑石粒堆積。據張馳教授指出，在南陽盆地其它的裴李崗遺址裡，亦發現相同的現象，可惜材料尚未公布。感謝張教授提供相關資訊。南陽地區文物隊、方城縣文化館，〈河南方城縣大張莊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83 年第 5 期，頁 398。

10 李友謀，《裴李崗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55。

11 南陽地區文物隊、方城縣文化館，〈河南方城縣大張莊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83 年第 5 期，頁 403。

12 南陽地區文物隊、方城縣文化館，〈河南方城縣大張莊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83 年第 5 期，頁 403。

13 裴李崗文化首次發現於河南省新鄭的裴李崗遺址，其年代始於西元前 6,000 年，迄於西元前 5,000 年，主要分布範圍即今日河南省全境，北起安陽洪岩，南至潢川陳崗，東抵項城後高老家，西達盧氏薛家嶺。李友謀，《裴李崗文化》，頁 11-13、80-82；趙春青，〈裴李崗文化研究〉，收入嚴文明主編，《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世紀回顧·新石器時代考古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 187-195。

文化的核心區域較遠，處於豫南的淮河上游地區。<sup>14</sup>前者可利用【路徑 1】及【路徑 3】與南陽盆地相連，而後者則正好就在方城缺口之外。因地利之便，南陽盆地最初的物質文化，應由這兩條道路輸入。<sup>15</sup>

其次，南陽盆地始興期的考古文化，雖然源自黃淮平原的裴李崗文化，但如前所述，裴李崗文化傳進盆地後，便隨即孕育出獨有的特色。這種境外考古文化移植入南陽盆地後產生變體的現象，實貫穿整個新石器時代。

其三，地處江漢平原西部屬於城背溪文化（6,500-5,000 BC）的枝江青龍山遺址，曾發現 3 件侈口淺腹三足鉢，<sup>16</sup>此類陶器與城背溪文化大量出土的圓底鉢或平底鉢不同，反倒與裴李崗文化流行的三足鉢一樣（圖十六）。青龍山所見的侈口淺腹三足鉢應是受到裴李崗文化影響的結果。<sup>17</sup>這個現象表明，早在西元前 5000 餘年，位於黃河中游地區的裴李崗文化，可能已利用南陽盆地及其南緣的【路徑 4】，將北方的物質文化傳播至長江中游地區。<sup>18</sup>



圖十六 城背溪圓底陶鉢（左）、青龍山三足陶鉢（中）與裴李崗三足陶鉢（右）比較圖  
(圖左、中採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宜都城背溪》，彩版：1、彩版 11：2；  
圖右採自李友謀，《裴李崗文化》，圖版 4)

1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舞陽賈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

15 相對於盆地東北方的裴李崗文化而言，同時期位於盆地西北方的老官台文化則對南陽盆地的影響較小。老官台文化主要分布於陝西省南部的渭水流域、丹江上游與漢水上游，雖然利用【路徑 6】與【路徑 7】可直通老官台文化的分佈範圍，但樊力指出，盆地內位於丹江下游的淅川單崗遺址與裴李崗文化較為接近；而張弛則推測距漢水上游地區較近的鄧州八里崗遺址，可能亦屬裴李崗文化。由此可見裴李崗文化對南陽盆地初期發展的影響力較大。楊亞長，〈老官台文化研究〉，收入嚴文明主編，《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世紀回顧·新石器時代考古卷》，頁 177-186；樊力，〈丹江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存試析〉，《江漢考古》1997 年第 4 期，頁 34-35。

1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宜都城背溪》(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 139-140、146、282。

17 另外，魏京武亦指出，黃河中游的裴李崗文化、老官台文化與長江中游的彭頭山文化和皂市下層文化關係密切，後者則受到前者的影響。魏京武，〈中國史前文化的多樣性與融合性——論中國文明形成的融合性〉，收入《遠望集》編輯委員會編，《遠望集——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華誕四十週年紀念文集》(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頁 33。

18 此假說為筆者 2009 年春季於北京拜訪張弛教授時，張教授所做的推測。

## 第二節 發展期（5000-3800 BC）<sup>19</sup>

### ——仰韶文化影響下的本地風格

當黃河流域的裴李崗、磁山與老官台文化，逐漸為新興的仰韶文化取代之際，南陽盆地則由始興期邁入了發展期。在始興期時，北方的裴李崗文化輸入南方的南陽盆地，並在此建立零星而分散的活動據點；進入發展期後，不僅後起的仰韶文化持續影響南陽盆地，而且盆地內遺址數目增加，使用時間亦大幅拉長。可以說，發展期的南陽盆地是承繼始興期的格局「發展」而來。

據粗略的統計，南陽盆地帶有仰韶文化因素的遺址至少有 30 多處，<sup>20</sup>面積大多為數萬平方公尺，鄧州太子崗遺址則有 25 萬平方公尺。<sup>21</sup>相對於始興期而言，本期的考古材料大增，<sup>22</sup>但並非所有帶仰韶文化因素的遺址

19 嚴文明曾將仰韶文化分為七小區與四大期，南陽盆地則屬「漢水中游」區，時代橫跨一至三期（4,900-4,000 BC、4,000-3,500 BC、3,500-3,000 BC），第四期（3,000-2,500 BC）則為長江流域的屈家嶺文化取代。鞏啟明則將仰韶文化分為三期五段，另分成大六區，而南陽盆地所在的「豫西南鄂西北區」，由早到晚，則分別為大張莊類型（5,000-4,900 BC）、下王崗類型（4,900-4,000 BC）、八里崗類型（4,000-3,500 BC）與趙灣類型（3,500-2,900 BC）。雖然嚴、鞏二氏對仰韶文化分期的看法不一，但都以西元前 4,000 年將其分成前後兩大階段，此觀點與本文所論大致相符。然而由於本文將棗陽雕龍碑一期納入發展期討論範疇，報告將其年代定為西元前 4,300 年至 3,800 年，而且在八里崗仰韶二期與雕龍碑二期均發現大溪文化油子嶺類型特有的「附杯圈足盤」，後者的時代約為大溪文化二、三期之交，亦即西元前 3,700 年前後，因此南陽盆地的發展期應比嚴、鞏的分期略晚，故將發展期的下限定於西元前 3,800 年左右。相關討論亦見本文頁 48-49。嚴文明，〈略論仰韶文化的起源和發展階段〉，收入氏著，《仰韶文化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 122-165；鞏啟明，《仰韶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 159-162、166-16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 343-345；沈強華，〈油子嶺一期遺存試析〉，《考古》1998 年第 9 期，頁 53-63；郭立新，《長江中游地區初期社會複雜化研究（4300B.C.-2000B.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55-57。

20 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河南分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頁 526-576。

21 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河南鄧州太子崗遺址複查記〉，《古代文明》第 5 卷（2006），頁 333-346。

22 在南陽盆地帶有仰韶文化因素的遺址中，只有淅川下王崗與棗陽雕龍碑出版完整的考古報告，方城大張莊、鄧州八里崗、唐河茅草寺、鎮平趙灣、南召二郎崗，以及淅川下集、黃棟樹與雙河鎮僅發表簡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南陽地區文物隊、方城縣文化館，〈河南方城縣大張莊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83 年第 5 期，頁 398-403；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南陽地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的調查與試掘〉，《華夏考古》1994 年第 2 期，頁 1-5；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南陽地區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市八里崗遺址 1992 年的

均歸入筆者所論的發展期。本文所謂的發展期，僅包含仰韶文化的一、二期，至於仰韶文化三期將於「成熟期」一節討論。之所以如此劃分，是因為南陽盆地仰韶文化三期的陶器雖踵繼前期演變而來，但諸如淅川下王崗、鄧州八里崗與棗陽雕龍碑等遺址的聚落內涵，在仰韶文化三期均出現顯著的變化，展現極其強烈的地域特色。相對之下，歸入發展期的仰韶文化一、二期，其物質遺存均承襲始興期的演變趨勢，蘊含較濃厚的北方色彩。以下，筆者將就房址、墓葬、埋豬土坑與陶器四個側面，概述南陽盆地發展期物質文化的特色。

## 一、半地穴式或地面式的圓形房址

本期發現的房址不多，約有 10 餘座。其中，又以下王崗揭露最多，共 10 座，分屬仰韶文化一、二期；與下王崗同時期的八里崗因公布材料有限，詳細數目不明；至於與仰韶二期同時略晚的雕龍碑僅發現 1 座房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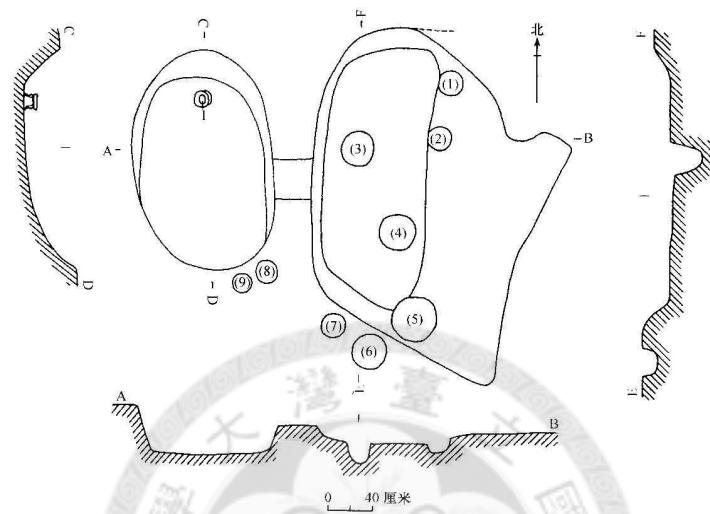
自整體而論，房址的型態大致相同，多為圓形的半地穴式或地面式建築，面積則有大小之別。大者均為地面式建築，全屬仰韶一期，如下王崗的 F28 可達 50 平方公尺，<sup>23</sup>是發展期最大的房址；小者平均面積不足 10 平方公尺，仰韶一期多為半地穴式（如下王崗 F4、F52、F53），至仰韶二期則演變為地面式（如下王崗 F7、F26、F27、F29）。除了單間式的圓形房址外，雕龍碑一期文化的 F11 結構較為特殊，是座由東、西兩個橢圓形坑組合而成的半地穴「二室」建築（圖十七）。<sup>24</sup>以上的材料表明，仰韶一期

發掘與收獲》，《考古》1997 年第 12 期，頁 1-7；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河南省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8 年第 9 期，頁 31-45；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南陽地區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 1998 年度發掘簡報〉，《文物》2000 年第 11 期，頁 23-3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唐河茅草寺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65 年第 1 期，頁 1-3；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鎮平趙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考古》1962 年第 1 期，頁 23-2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南召二郎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59 年第 7 期，頁 55-59；原長辦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集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中原文物》1989 年第 1 期，頁 1-19；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河南淅川黃楝樹遺址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0 年第 3 期，頁 1-69；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淅川雙河鎮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2 年增刊，頁 13-22、38。

2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頁 17。

2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頁 16-17。遺址發掘者之一的王杰認為，F11 的結構與形式，類似今日的蒙古包。王杰，〈雕龍碑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收獲〉，《江漢考古》1995 年第 3 期，頁 43。

房址的面積與營建技術有直接的對應關係，大型房屋為地面式建築，小型房屋為半地穴式建築；進入二期後，地面式建築較為普及，半地穴房址罕見，可知前者已成為當時南陽盆地建築的主流樣式。至於前後期房址的營建工藝，據云亦有承襲之處。<sup>25</sup>



圖十七 雕龍碑遺址一期房址 F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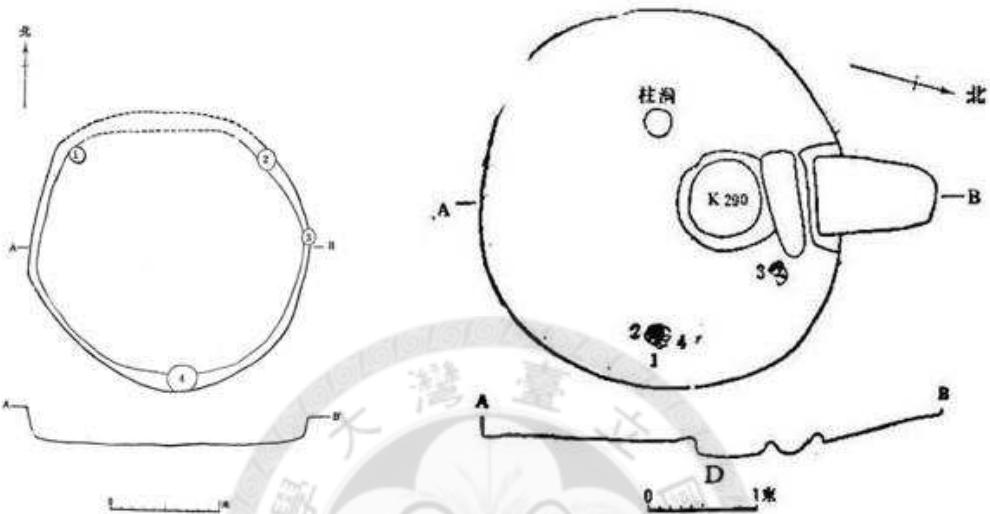
(採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頁 17，圖 9)

在簡要討論過南陽盆地發展期的房址型態後，令人好奇的是，當地與黃河流域同時期仰韶房址的關係為何？嚴文明曾針對後者進行系統性的研究，相當值得參考。<sup>26</sup>顯而易見的是，南陽盆地的房址雖與黃河流域有相似之處，如均發現圓形的地盤式或半地穴建築，然而兩者的歧異更大。首先，兩地於仰韶一期共出圓形房屋，關係似乎較近，但二期時華北的圓屋基本消失，方形房址遍佈各地，而南陽盆地卻仍使用圓形房址；其次，南陽盆地的房址面積偏小，並未發現 80 平方公尺以上的大型建築；第三，或

2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頁 19；樊力，〈豫西南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序列及其與鄰近地區的關係〉，《考古學報》2000 年第 2 期，頁 172。

26 嚴文明指出，仰韶文化一期的房址包括小型與中型圓屋，以及小、中、大三種尺寸的方屋，還可進一步細分為淺穴式、半穴式與平地起建三類，愈往西邊的渭河中上游方屋愈多，東部的黃淮平原則以圓屋為主，而其中的淺穴式小圓屋乃是承繼裴李崗、磁山與老官台文化的傳統而來，方屋則為新型房屋，需要較發達的建築技術。至仰韶文化二期時，圓屋基本不見，除了小、中、大型的方屋外，另新添小型分間屋，同時東、西部的房址型式趨同。這些房址雖然形狀、大小不類，但幾乎都具備相同的特徵，不僅大多設有斜坡形門道，而且除了較小的房址外，面對門道的室內地面均有火塘（圖十六）。嚴文明，〈仰韶房屋和聚落型態研究〉，收入氏著，《仰韶文化研究》，頁 180-207。

許由於保存的狀況較差，因此南陽盆地未見黃河流域帶有門道與火塘組合的典型房址（圖十八）。由上可知，南陽盆地的房址到了仰韶二期，仍與中原仰韶一期的房屋型態相近，顯得較為簡陋。礙於材料限制，我們無法得知這種狀況是否為當地的普遍現象，還需更多的考古發才能證實或修正。



圖十八 南陽盆地仰韶房址（左：下王崗 F52）與典型仰韶房址（右：姜寨 F127）比較圖  
(圖左採自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崗》，頁 16，圖 8；圖右採自半坡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潼縣博物館編，《姜寨——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頁 32，圖 23)

## 二、仰韶式的墓葬

墓葬（包括土坑墓與甕棺葬）是本期揭露最多也最為重要的考古遺跡，其中，僅下王崗就發現 596 座，數量驚人；八里崗雖然尚未發掘完畢，但至少也有 120 多座；至於時代較晚的雕龍碑則清理出 19 座土坑墓。<sup>27</sup>

以下王崗與八里崗為代表的墓葬群亦可分為仰韶一期與二期。仰韶一期多為單人一次仰身直肢葬，隨葬品以鼎、罐等日用陶器為主，兼有石器與骨器；二期雖仍有單人一次仰身直肢葬，但出現大量二次葬（圖十九），而且時代愈晚，合葬的人數愈多，隨葬品除日用陶器外，更有許多的陶製明器。雖然仰韶二期的二次葬與使用陶製明器的現象與一期差異頗大，但前後兩期除了陶器型制一脈相承外，遺址佈局亦呈持續發展之勢。以下王

<sup>27</sup> 另外，在淅川黃棟樹遺址，亦零星發現可能屬於發展期的墓葬。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河南淅川黃棟樹遺址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0 年第 3 期，頁 5。

崗遺址為例，仰韶一期的墓葬區位於遺址的東、中、西三區；二期雖然東區墓地消失，出現了新興的東北部墓地，然而中、西區的墓葬區則在前期的基礎上繼續沿用（圖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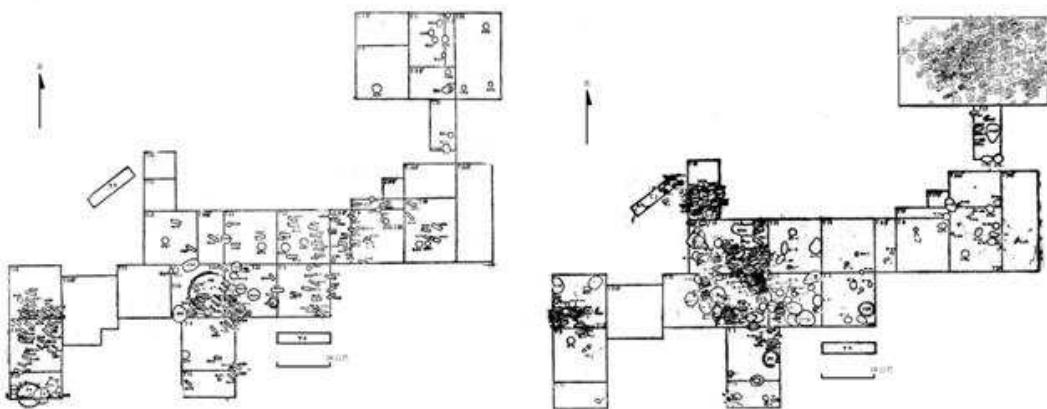
圖十九 下王崗仰韶文化二期 M300 的二次葬

（採自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崗》，頁 107，圖 129）

張弛曾經指出，本階段漢水中游地區（包括南陽盆地）葬俗的轉變（即逐漸流行二次葬），一方面與北方關中地區的情況類似，同時也是當地普遍的現象。<sup>28</sup>筆者認為，儘管南陽盆地與黃河流域的葬俗變化趨勢大致吻合，隨葬品的內容卻不相同，除罕見北方大量出土的小口尖底瓶外，另發現較多的陶鼎與陶器座，進入仰韶二期後陶製明器更成為隨葬品的主流。另外，盆地內不同遺址的葬俗仍有歧異，雕龍碑便是個最明顯的例子。與仰韶二期同時略晚的雕龍碑一期不僅未發現二次葬，而且全為單人一次仰身直肢葬，未見任何隨葬品。<sup>29</sup>這些例子不僅說明在仰韶文化的強力影響下，南陽盆地的葬俗仍保有一定的地方色彩外，相對於地理位置較接近黃河流域的下王崗與八里崗而言，離長江流域較近的雕龍碑，其文化的獨特性更加鮮明。

28 張弛，《長江中下游地區史前聚落研究》，頁 29-31。

2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頁 23-28。



圖二十 下王崗遺址仰韶文化一期（左）與二期（右）遺跡分佈比較圖  
(圖左採自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崗》，頁 13，圖 5；圖右採自頁 53，圖 49)

### 三、特有的埋豬土坑

埋豬土坑是本期非常特殊的考古遺跡，分別見於雕龍碑與八里崗。雕龍碑一期共揭露 8 座埋豬土坑，或埋全豬，或埋部分肢體，報告將其認定為「祭祀坑」，但無法確認祭祀對象；<sup>30</sup>八里崗亦發現類似土坑，分布於墓葬附近，少數的墓葬（如 M13）還隨葬大量的豬下頷骨。<sup>31</sup>在土坑或墓葬中埋藏豬骨，不僅出現在南陽盆地的發展期中，隨後的成熟期亦然。關於遺址埋藏豬骨的現象，筆者將於「成熟期」一節再做討論。

### 四、兼具北方、本地與南方風格的陶器

除了上述遺跡外，陶器是判斷南陽盆地發展期文化屬性最重要的依據。學者一般認為本期的陶器源自始興期的大張莊遺址，<sup>32</sup>跨入發展期後，

30 類似的埋豬土坑見於雕龍碑遺址各個時期。報告認為，由於雕龍碑二、三期類似的土坑有比較明顯的祭祀對象，因此將之稱為「祭祀坑」。筆者則傾向用「埋豬土坑」這個中性的名詞稱呼此類遺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頁 28-30。

31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南陽地區文物研究所，〈河南鄭州八里崗遺址 1992 年的發掘與收穫〉，《考古》1997 年第 12 期，頁 1、3；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河南省南陽市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8 年第 9 期，頁 38-39。

32 樊力，〈豫西南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序列及其與鄰近地區的關係〉，《考古學報》2000 年第 2 期，頁 168-171、178；余西云，〈下王崗「仰韶文化一期」遺存試析〉，收入張忠培、許倬雲主編，《中國考古學跨世紀的回顧與前瞻——1999 年西陵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 199-206；靳松安、任偉，〈略論漢水中游地區的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94 年第 4 期，頁 19-20。

樊力進一步指出，由於下王崗較接近黃河流域，因此受關中與中原仰韶文化的影響較深；八里崗則因位於盆地中央，所以本地特色較強。這樣的差別在進入仰韶二期後逐漸消失，呈現更加明顯的一致性。<sup>33</sup>

本期的陶器以紅陶為主，褐陶與黑陶次之，彩陶較少。仰韶一期時均為日用陶器，主要有鼎、罐、鉢、盆與器座，多為素面，彩陶僅見寬帶紋以及菱形與三角組合紋兩種。二期的日用陶器製作更加精良，火候高，質地堅硬，器類則與前期相同，另新增灶、器蓋與附杯圈足盤，八里崗還出土造型獨特的倉形器，下王崗與雕龍碑則發現空心陶球，而彩陶也比前期增加，流行三角葉紋與迴旋鉤連紋。此外，隨葬於墓葬中的明器，種類與日用陶器無別，只是時代愈晚，火候愈低，品質愈差。<sup>34</sup>

的確，本期的陶器群與北方的仰韶文化關係密切，然而兩者間存在顯著的差異。相較於黃河流域，南陽盆地發現大量的鼎與器座，罕見北方典型的小口尖底瓶，主要器類有別；彩陶則以抽象的紋飾為主，不見半坡與廟底溝流行的動、植物寫實圖樣；進入仰韶二期後，隨葬品大量明器化。<sup>35</sup>這三項均為本地陶器的重要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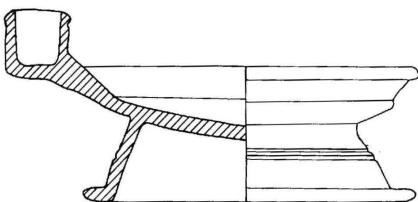
除了北方的影響與本地的特色外，南陽盆地的發展期亦與南方有所聯繫。如前節所論，始興期的南陽盆地似乎僅將黃河流域的考古學文化輸入長江中游地區，是一單向的傳播過程。然而，進入發展期後情況有所轉變。南陽盆地的仰韶一期約與其南方的邊畈遺址一、二期（或稱邊畈文化）同

33 樊力，〈豫西南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序列及其與鄰近地區的關係〉，《考古學報》2000年第2期，頁166。至於時代較晚、位置更南的雕龍碑，雖然文化的獨特性較強，但其陶器仍可歸入這個大系統中。王杰，〈湖北棗陽雕龍碑遺址的考古收穫〉，《江漢考古》1997年第4期，頁2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頁340。

3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頁126、146；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南陽地區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1992年的發掘與收穫〉，《考古》1997年第12期，頁3；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河南省南陽市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第9期，頁4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頁44；樊力，〈豫西南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序列及其與鄰近地區的關係〉，《考古學報》2000年第2期，頁168-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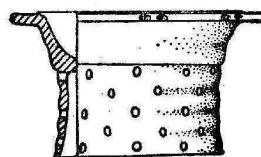
35 張勇認為，位於南陽盆地東北方的舞陽賈湖遺址，是新石器時代最早出現陶製明器的遺址，而張弛與魏尼則進一步指出，與賈湖同屬裴李崗文化的其它遺址卻未發現明器，而是以殘陶器為隨葬品，意義可能與明器相同。筆者以為，或許南陽盆地仰韶二期發現的大量明器，便與位置接近且時代較早的賈湖遺址，具備某種程度上的關聯性，但詳細情況仍有待研究。張勇，〈明器起源及相關問題探討〉，《華夏考古》2002年第3期，頁25；張弛、魏尼，〈裴李崗文化墓葬隨葬品研究〉，《古代文明》第7卷（2008），頁7-8。

時，該遺址與下王崗出土的陶器，不論在器形或組合上均有類似之處；<sup>36</sup>仰韶二期的年代則約與大溪文化油子嶺類型（或稱油子嶺文化）相當，但南陽盆地似乎僅選擇接受後者造型搶眼的附杯圈足盤（圖二十一）<sup>37</sup>與高圈足豆（圖二十二），<sup>38</sup>並未全面引入南方的文化因素。由此可見，南陽盆地的發展期儘管與長江中游地區有所接觸，但兩者的關係乃由親密轉向疏離。



圖二十一 附杯圈足盤，雕龍碑 F6：1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  
《襄陽雕龍碑》，頁 110，圖 84：1）



圖二十二 高圈足豆，下王崗 M279：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  
《淅川下王崗》，頁 152，圖 167：5）

## 五、大同與小異

透過以上對房址、墓葬、埋豬土坑與陶器的分析可知，南陽盆地的發展期是一不斷汲取外來文化因素（北方為主），同時又持續建構自我傳統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盆地內看似文化面貌「大同」的各個遺址，其實往往展現「小異」的內涵。舉例而言，下王崗與八里崗的房址、墓葬與典型的仰韶文化接近，而雕龍碑則個性強烈，可見前兩者的一致性較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八里崗與雕龍碑不僅均發現埋藏豬骨的現象，而且還共出陶灶，<sup>39</sup>以及大溪文化油子嶺類型特有的附杯圈足盤，<sup>40</sup>下王崗反而未見這

36 相對於揭露大量遺址的黃河中下游地區而言，長江中游以北地區發現的遺址甚少，而邊緣遺址則是當時最靠近南陽盆地的長江流域遺址，位於大洪山西南側，自盆地順【路徑 4】而下即可抵達。該遺址出土大量陶鼎，型制與下王崗仰韶一期相近，兩者還共出罐、鉢、盆、碗、器座等陶器，但前者不見後者的細頸瓶與壺，後者則不見前者的釜。何介鈞，《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 162-163。

37 附杯圈足盤是大溪文化油子嶺類型非常獨特的器物，不見其他考古學文化與時代。由於此類陶器在八里崗仰韶二期以及稍晚的雕龍碑二期（3,800-3,300 BC）均曾經出土，因此兩者的時間應與大溪文化油子嶺類型同時，亦即西元前 3,700 年前後。沈強華，〈油子嶺一期遺存試析〉，《考古》1998 年第 9 期，頁 55；何介鈞，《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頁 164。

38 樊力，〈豫西南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序列及其與鄰近地區的關係〉，《考古學報》2000 年第 2 期，頁 170-171。

39 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河南省南陽市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8 年第 9 期，頁 40-4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襄陽雕龍碑》，頁 37。

類遺存，似乎又說明八里崗與雕龍碑的關係較親。

南陽盆地之所以產生這種複雜的文化樣貌，地理位置應是關鍵因素。當時的黃河流域由仰韶文化所主導，長江中游北部的江漢平原則尚未發展出與之匹敵的考古學文化。因此，盆地西北方的下王崗與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更加接近，盆地東南方的雕龍碑則獨特性更強，至於中間的八里崗則是兩者的綜合體。自大處觀之，本期的南陽盆地受仰韶文化的強力影響而逐漸整合，並漸次展露自身特色；自小處而論，由於盆地內的遺址分散在不同地點，外在環境的差異，遂使得不同遺址的文化內涵有別，過渡於南北文化之間。

### 第三節 成熟期（3800-2600 BC）

#### ——超越南北之別的聚落型態

如果始興期與發展期是以濃厚的北方氣息為特色，繼之而起的成熟期則展現極度鮮明的本地色彩，可說是新石器時代南陽盆地區域發展史的黃金時期。以既有的考古學文化框架而論，成熟期包括仰韶文化三期與屈家嶺文化的早、晚期，<sup>41</sup>前後約有 1000 餘年。儘管這兩支文化分屬黃河與長江流域兩大系統，表面上毫無交集，然而南陽盆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卻讓這一北一南、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考古學文化在此接上了頭，較晚的屈家嶺文化甚至還繼承當地仰韶時期部分的物質文化傳統。因此，南陽盆地的成熟期不但是物質文化最為發達的時期，當地特有的聚落型態，更成功地跨越南北之別的藩籬。換言之，南陽盆地在進入成熟期後，已經形塑出根深蒂固的本地傳統，這種本地傳統並不會隨著考古學文化系譜的轉變而發生全面性的變化，反而在接納新因素的同時，一方面維持固有的傳統，另一方面更將新舊紛陳的文化因子鎔鑄於一體。這是南陽盆地的歷史邁入成熟階段的最佳詮釋。以下，筆者將從聚落佈局、房址、隨葬豬骨的墓葬與埋豬土坑，以及陶器等四個側面，描繪南陽盆地成熟期的歷史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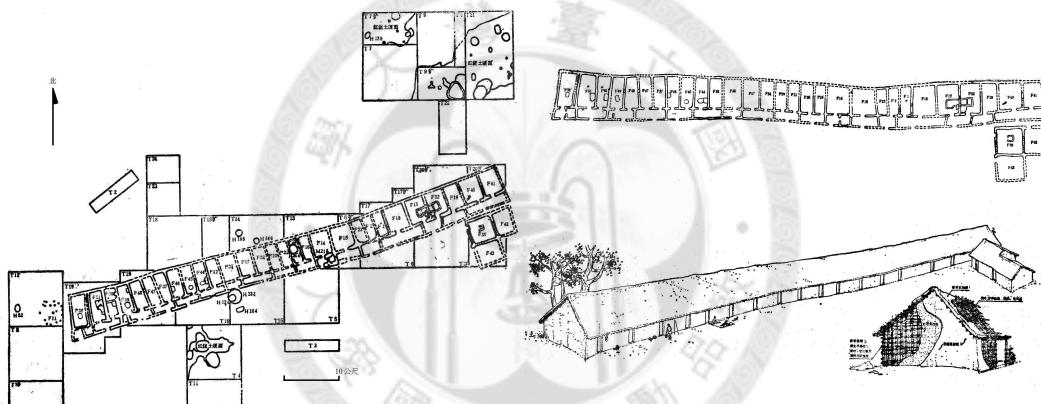
4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頁 110-111。

41 據不完全的統計，南陽盆地帶有屈家嶺文化因素的遺址約有 100 多處，數量遠多於帶有仰韶文化因素的遺址。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河南分冊》。

## 一、大幅改變的聚落佈局

南陽盆地許多長期使用的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在進入成熟期後，或早或晚，其佈局均出現驚人的變化。其中，又以下王崗、八里崗、黃棟樹與雕龍碑的演變脈絡較為清晰。

如前所述，下王崗發展期的遺址部局，基本上呈現連續演變之勢（圖二十）。進入成熟期的上半段（即仰韶三期），當地由1座連間排房佔據（圖二十三），聚落面貌驟變。隨著仰韶時代的結束與屈家嶺時代的來臨，連間排房消失，僅殘存少量的灰坑與墓葬。<sup>42</sup>八里崗的發展過程，可說與下王崗如出一轍，不僅在仰韶三期達到顛峰，亦發現成群東西向的連間排房，而且房址分為北、中、南3排，聚落規模比下王崗更大（圖二十四左）。<sup>4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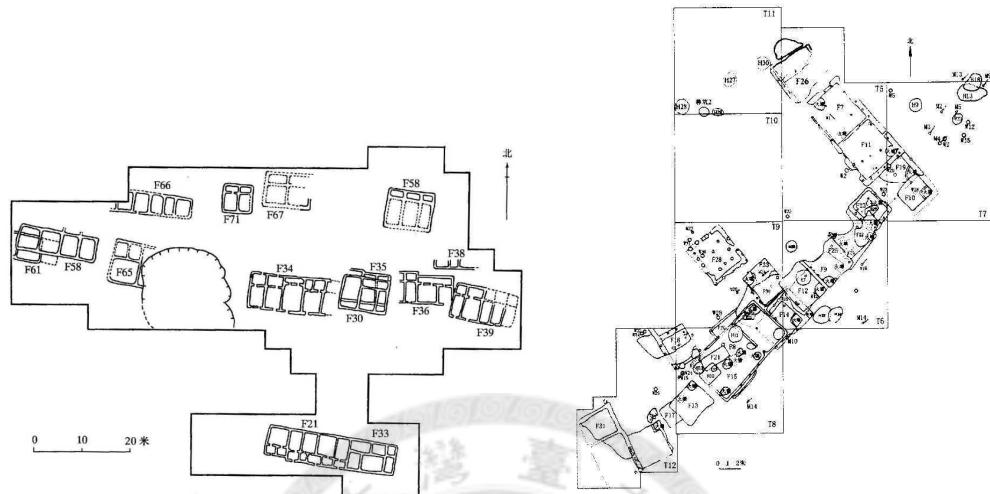
圖二十三 下王崗遺址仰韶文化三期遺跡分佈圖（左）與房址復原圖（右）  
(圖左採自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崗》，頁 165，圖 177；圖右採自頁 167，圖 178)

相較於下王崗與八里崗，黃棟樹聚落佈局變化的時間較晚。由於黃棟樹的仰韶文化堆積較薄，因此報告未做進一步分期，遺跡也僅發現少量的房址、墓葬與灰坑。隨後的屈家嶺時期則為當地考古遺存最為豐富的階段，

4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頁 165-184、201-206。樊力認為，《淅川下王崗》所謂的「屈家嶺文化一期」雖屬屈家嶺文化的範疇，但「屈家嶺文化二期」實為石家河文化，本文從樊氏之說。樊力，〈豫西南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序列及其與鄰近地區的關係〉，《考古學報》2000年第2期，頁 159。

43 八里崗發展期的居住區與墓葬位置相對固定；至成熟期上半段的仰韶三期，與下王崗相同，亦揭露大批東西向的連間排房；隨後的屈家嶺時期，連間排房消失，取而代之的則為少量的房址、窯址與甕棺葬。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南陽地區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 1992 年的發掘與收穫〉，《考古》1997 年第 12 期，頁 1-3；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河南省南陽市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8 年第 9 期，頁 31-38；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南陽地區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 1998 年度發掘簡報〉，《文物》2000 年第 11 期，頁 26-27。

揭露成群房址，除少數例外，大致可分為北、東兩排（圖二十四右）。<sup>44</sup>當地房屋雖歷經多次破壞，但隨後又在原地重建，並且始終維持成排房址圍繞中央廣場的「庭院式」格局。<sup>45</sup>



圖二十四 八里崗遺址仰韶文化三期（左）與黃棟樹遺址屈家嶺文化（右）遺跡分布圖  
 （圖左採自張弛，《長江中下游地區史前聚落研究》，頁 32，圖 15；圖右採自長江流域規  
 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河南淅川黃棟樹遺址發掘報告〉，頁 14，圖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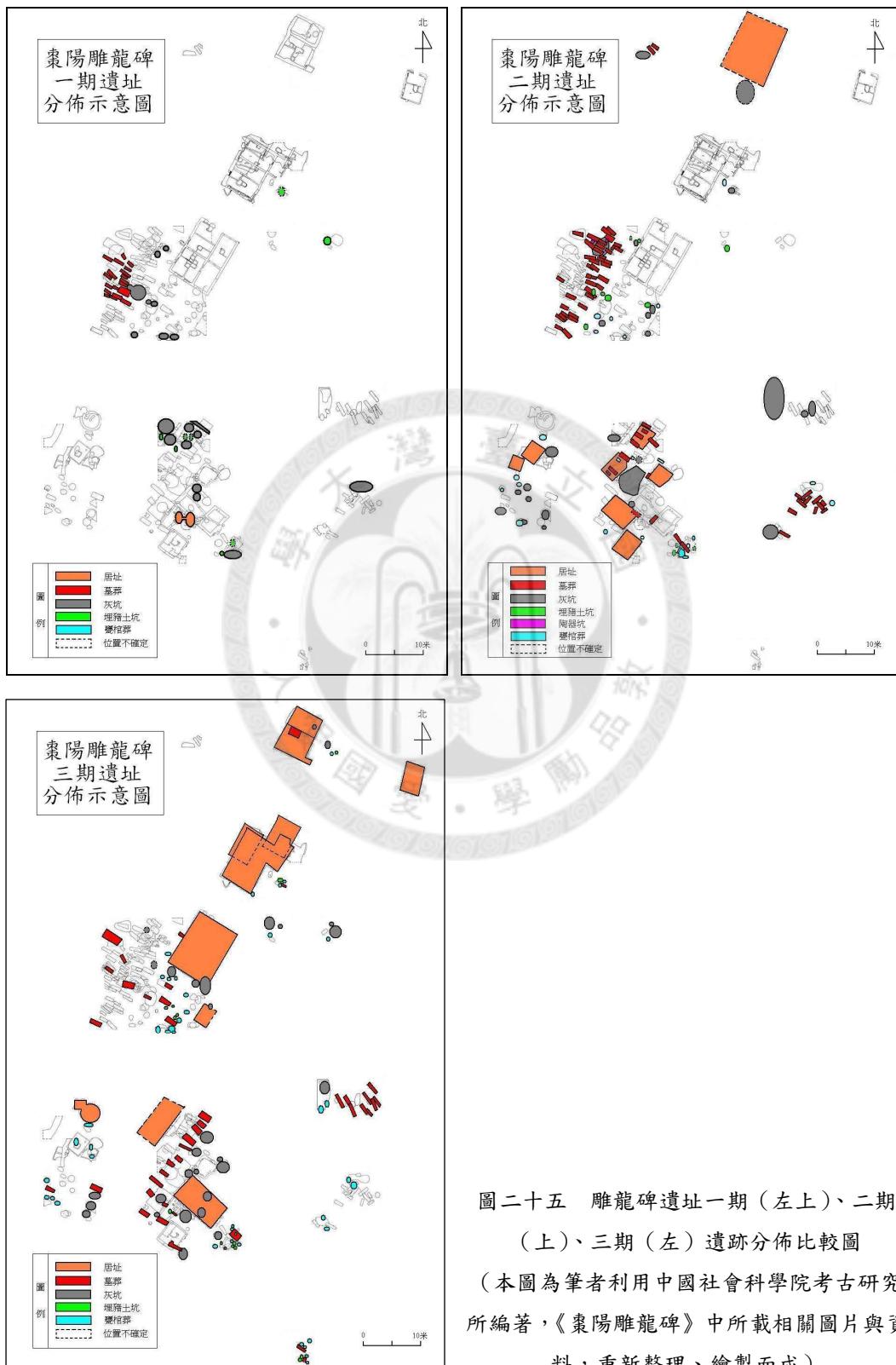
相較於前三處遺址的劇烈變化，雕龍碑自發展期（雕龍碑一期）至成熟期（雕龍碑二、三期），聚落佈局的變遷脈絡清晰可循（圖二十五）。儘管如此，雕龍碑二期的房址一改前期的半地穴式建築作風，興起單間或雙間的長方形地面式房址；三期則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發展出多間式的地面建築。<sup>46</sup>雖然該遺址在整體的佈局上並未發生全面性的變化，但進入成

44 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河南淅川黃棟樹遺址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0年第3期,頁3-5、13-15。附帶說明的是,在黃棟樹遺址的仰韶文化時期,曾發現2座圓形房址,但並非南陽盆地習見的半地穴式或地面式建築,而是高於地面的土台。此外,遺址內還發現兩個石頭坑,坑底則殘存水漬痕跡。針對這些現象,報告推論乃是仰韶時期的黃棟樹遺址地勢較為低濕所致。再者,黃棟樹還發現1座埋狗土坑。有意思的是,在下王崗的仰韶一期,曾發掘出隨葬狗骨的墓葬5座。由於兩遺址的位置接近,或許在風俗上相互影響。同前文,頁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頁24-37。

45 張弛與郭立新均曾針對黃棟樹屈家嶺文化的房址佈局進行分析，但兩者的觀點差異頗大。張氏認為原始報告所說的「屈家嶺文化」與「龍山文化」，實均屬屈家嶺文化時代，因此將這兩期發現的房址一併納入討論，共 31 座；郭氏則依據報告的分期，僅述及屈家嶺文化的 25 座房址。此外，兩者對於房址營建的先後次序看法亦不相同。雖然如此，兩位共同認為，先後起建的黃棟樹屈家嶺文化聚落，都屬於所謂的「庭院式」佈局。張弛，《長江中下游地區史前聚落研究》，頁 202-206；郭立新，〈屈家嶺文化的聚落型態與社會結構分析——以淅川黃棟樹遺址為例〉，《中原文物》2004 年第 6 期，頁 9-14。

4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襄陽雕龍碑》，頁 51-63、163-187。

熟期後，房址的結構與營造技術則展現全新的氣象。



圖二十五 雕龍碑遺址一期（左上）、二期  
（上）、三期（左）遺跡分佈比較圖  
(本圖為筆者利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  
所編著，《襄陽雕龍碑》中所載相關圖片與資  
料，重新整理、繪製而成)

## 二、特徵突出的多間式地面建築

除了遺址佈局的劇烈變動外，多間式的地面建築則為成熟期另一項極具指標性的考古發現，遍佈於盆地境內各遺址中。<sup>47</sup>基本上，這類房址共同具有「多間相連」及「平地起建」的特徵，而且均為「木骨泥牆」建築，營建方式亦大抵相同。首先，在房址選定的範圍四周挖一圈溝槽，溝槽內栽植木柱以為牆壁的骨架，並且取土填實；其次，在豎立的木柱間以簾條綑繩橫向木棍，並塗抹草拌泥築成土牆；第三，在室內地面上鋪設數層墊土以為居住面，部分房址甚至使用近似水泥的材料塗抹地面，使其堅硬光潔，有些居住面上則設有灶或火塘；第四，用火烘烤泥牆與居住面，使其更加堅固耐潮；最後，搭建房頂。<sup>4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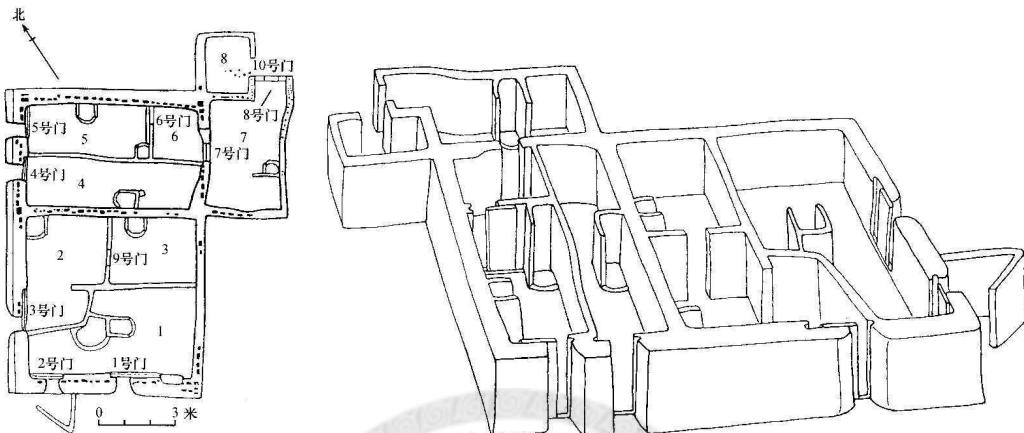
除了相似的特徵之外，不同地點與時代的房址，其結構仍有差異，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以下王崗與八里崗為代表，前者發現1座長達85公尺的東西向排房，共29間房（圖二十三）；後者亦揭露類似的排房，但整體規模更大，共有3排，約50餘間房，最長者約有100公尺（圖二十四左）。<sup>49</sup>第二類以黃棟樹為代表，房址亦成排分布，但整體佈局則為「庭

47 諸如淅川下王崗、下集、黃棟樹、九女冢、鄧州八里崗、太子崗、棗陽雕龍碑、南召二郎崗、唐河茅草寺、鎮平趙灣與南陽黃山均曾發現多間式的地面建築。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頁165-183；原長辦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集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中原文物》1989年第1期，頁3-4；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河南淅川黃棟樹遺址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0年第3期，頁13-21；張劍，〈淅川丹江水庫區的文物調查與發掘〉，《中原文物》1979年第3期，頁76；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南陽地區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1992年的發掘與收獲〉，《考古》1997年第12期，頁1-3；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河南省南陽市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第9期，頁32-38；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南陽地區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1998年度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第11期，頁23-28；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河南鄧州太子崗遺址複查記〉，《古代文明》第5卷，頁338、34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頁51-63、160-18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南召二郎崗新石器時代遺址〉，《文物》1959年第7期，頁55-5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唐河茅草寺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65年第1期，頁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鎮平趙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考古》1962年第1期，頁23-24、27。

4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頁183；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河南淅川黃棟樹遺址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0年第3期，頁15；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河南省南陽市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第9期，頁3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頁51-52、161-162。

49 類似的排房還發現於鄧州太子崗，同屬仰韶晚期。在淅川九女冢亦見一座長74公尺、寬6公尺的排房，時代則可能為屈家嶺或龍山文化時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

院式」(圖二十四右)，屬年代較晚的屈家嶺時期。<sup>50</sup>第三類則以雕龍碑為代表，時代跨越仰韶三期至屈家嶺早期，包括單間以及雙間以上的多間式地面建築(圖二十六)，大部分為東北—西南向(圖二十五)。<sup>51</sup>



圖二十六 雕龍碑 F19 平面結構復原圖(左)與牆體結構復原圖(右)

(採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頁 391，圖 270：2、圖 270：1)

再者，設計精巧且特色強烈的「推拉門」(圖二十七)，亦為本期房址的重要特徵之一。帶有這類設施的房址集中於盆地內的唐白河流域及丹江下游部分地區，<sup>52</sup>至於盆地西北方的下王崗與黃棟樹則未見。

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頁 165-182；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南陽地區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 1992 年的發掘與收獲〉，《考古》1997 年第 12 期，頁 1-3；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河南省南陽市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8 年第 9 期，頁 32-38；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南陽地區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 1998 年度發掘簡報〉，《文物》2000 年第 11 期，頁 23-28；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河南鄧州太子崗遺址複查記〉，《古代文明》第 5 卷，頁 338、341；張劍，〈淅川丹江水庫區的文物調查與發掘〉，《中原文物》1979 年第 3 期，頁 76。

50 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河南淅川黃棟樹遺址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0 年第 3 期，頁 13-21。學者認為這種「凹」字形院落為屈家嶺文化的特徵，只是黃棟樹的規模更大。張弛，〈長江中下游地區史前聚落研究〉，頁 218；郭立新，〈屈家嶺文化的聚落型態與社會結構分析——以淅川黃棟樹遺址為例〉，《中原文物》2004 年第 6 期，頁 11。

5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頁 160-187、51-63。

52 淅川下集、鄧州八里崗、唐河茅草寺、鎮平趙灣、棗陽雕龍碑的房址，均發現類似構造的推拉門。原長辦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集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中原文物》1989 年第 1 期，頁 4；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南陽地區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市八里崗遺址 1992 年的發掘與收獲〉，《考古》1997 年第 12 期，頁 3；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南陽地區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 1998 年度發掘簡報〉，《文物》2000 年第 11 期，頁 26；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唐河茅草寺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65 年第 1 期，頁 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鎮平趙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考古》1962 年第 1 期，頁 2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頁 176-177、180-181、172。

此外，在盆地北方的河南鄭州大河村、<sup>53</sup>東方的安徽蒙城尉遲寺、<sup>54</sup>南方的湖北應城門板灣，<sup>55</sup>以及西方的湖北鄖縣青龍泉等遺址，<sup>56</sup>亦發現構造類似的房址（圖二十八），但出現的時間較晚，建築的型態與工藝亦不盡相同：大河村的房址結構與雕龍碑較為接近；尉遲寺則與下王崗雷同，均屬排房，但並非為平地起建，而是淺穴式建築；門板灣與青龍泉雖發現多間式建築，卻都築於土台之上，牆壁則由土坯磚砌成，前者的牆體與地面未經燒烤，房址外還設有圍牆。



圖二十七 雕龍碑 F15 第 3 號門址的推拉門遺跡與復原圖

（圖左採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圖版 65：2；

圖右採自頁 386，圖 269：2）

隨著考古材料的不斷累積，部分學者已逐漸意識到，多間式的地面建築乃源自仰韶文化偏晚階段的南陽盆地，<sup>57</sup>並且與同時期其它地區的房屋型態不同。<sup>58</sup>然而，囿於以「考古學文化」為核心的研究傳統，這類房址常被視為特定考古學文化在特定階段的產物（即仰韶文化晚期），<sup>59</sup>反而忽

53 房址屬大河村的仰韶文化三期（3,100-2,700 BC），利用【路徑 1】可達。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大河村》（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 163-182。另外，在大河村的仰韶四期（2,700-2,400 BC），亦出土多間式的地面建築，但牆體多直接用草辦泥築成，不見木骨。同前書，頁 238-264。

54 房址屬尉遲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2,800-2,500 BC），利用【路徑 2】可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遲寺——皖北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存的發掘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 17-8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蒙城縣文化局，《蒙城尉遲寺·第二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頁 11-94。

55 房址屬屈家嶺文化時期（3,000-2,600 BC），利用【路徑 5】可達。陳樹祥、李桃元，〈應城門板灣遺址發掘獲重要成果〉，《中國文物報》1999 年 4 月 4 日；李桃元，〈應城門板灣遺址大型房屋建築〉，《江漢考古》2000 年第 1 期，頁 71、96；〈湖北應城門板灣新石器時代遺址〉，收入國家文物局主編，《1999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 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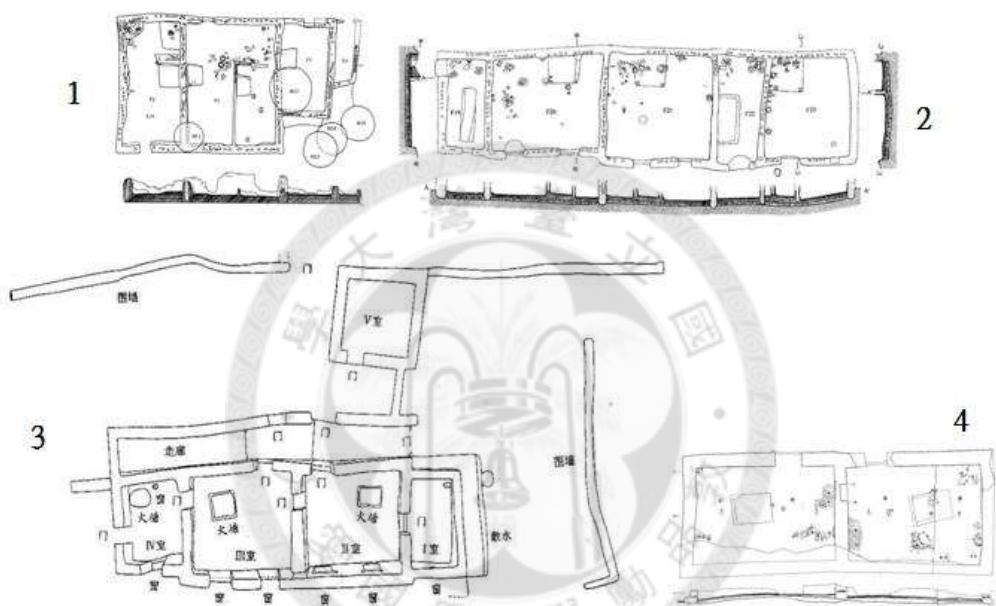
56 房址屬屈家嶺文化晚期（2,800-2,600 BC），利用【路徑 7】可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青龍泉與大寺》（北京：科學出版社，1991），頁 21-23。

57 趙輝，〈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的形成〉，《文物》2000 年第 1 期，頁 46。

58 張弛，《長江中下游地區史前聚落研究》，頁 111。

59 嚴文明，〈仰韶房屋和聚落型態研究〉，收入氏著，《仰韶文化研究》，頁 221-222、

略了具體的時空脈絡。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多間式的地面建築大量集中出現於「南陽盆地」的「成熟期」。在本期的上半段，這類遺跡僅分佈於盆地境內，大多屬仰韶文化系統，各別遺址（如雕龍碑）則屬融合南北的混合型文化；<sup>60</sup>至下半段，屈家嶺文化成為南陽盆地的主流，連帶引入「庭院式」的佈局，然而本地屈家嶺時期的房址，不僅其建築工藝承自前期，<sup>61</sup>而且盆地四周分屬不同考古學文化的遺址，亦陸續出現類似的房址。筆者推測，這些位於豫中、鄂北與皖北的房址，應或多或少受到南陽盆地的影響。



圖二十八 1：大河村房址、2：尉遲寺房址、3：門板灣房址、4：青龍泉房址

（圖 1 採自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鄭州大河村》，頁 168，圖 92；

圖 2 採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蒙城尉遲寺》，頁 65，圖 49；

圖 3 採自國家文物局主編，《1999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頁 10；

圖 4 採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青龍泉與大寺》，頁 24，圖 17）

### 三、隨葬豬骨的墓葬與埋豬土坑

如本章第二節所論，發展期的雕龍碑曾發現埋豬土坑，八里崗則有少數墓葬隨葬豬下頷骨。根據現有材料，我們雖然仍無法得知八里崗進入成

237-240；鞏啟明，《仰韶文化》，頁 129-132、136-138、160-161、180-184；張弛，〈史前聚落與房屋的研究〉，收入嚴文明主編，《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世紀回顧·新石器時代考古卷》，頁 46-47。

6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頁 341。

61 樊力，〈論屈家嶺文化青龍泉二期類型〉，《考古》1998 年第 11 期，頁 82、85。

熟期後的狀況，但雕龍碑的確沿襲這種特殊的風俗：雕龍碑二期發現 11 座埋豬土坑，另有 3 座甕棺葬（W7、W11、W12）隨葬豬骨；三期不僅有 16 座埋豬土坑與 3 座隨葬豬骨的甕棺葬（W14、W31、W44），土坑墓更流行隨葬豬下頷骨，一般約有 10 餘副，M16 甚至隨葬 72 副之多。<sup>62</sup>另外，在黃棟樹屈家嶺文化的 M11，亦發現 1 件豬頭骨隨葬。<sup>63</sup>

相較於發展期，南陽盆地成熟期的墓葬明顯較少，雕龍碑則是其中數量最多的遺址。當然，若只以此例來說明本地成熟期具備上述特殊的風俗習慣，證據似乎稍嫌薄弱，位於湖北的宜城顧家坡遺址，則恰好提供相當重要的補充材料。顧家坡位於南陽盆地正南方的【路徑 4】之上（圖十三），是一處大溪文化晚期至屈家嶺文化時期（3,300-2,600 BC）的墓地，在 237 座墓葬中，便有 131 座隨葬豬下頷骨，M59 更隨葬超過 40 副。<sup>64</sup>雖然我們尚無法有力地論證在遺址中埋藏大量豬骨是南陽盆地成熟期特有的風俗習慣，但這的確是一個相當引人矚目的地域現象。<sup>65</sup>

附帶一提的是，在黃棟樹遺址的屈家嶺時期，曾發現 3 座帶有腰坑的墓葬，坑內則為甕棺。<sup>66</sup>類似帶腰坑的墓葬在盆地西側的青龍泉亦曾發現，但坑內僅放置陶器。<sup>67</sup>屈家嶺時期同類型的墓葬，目前似乎只出現在南陽盆地的西部，不見於其它地區。<sup>68</sup>

6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頁 88-96、194-223。除豬骨外，雕龍碑罕見其它質材與種類的隨葬品。

63 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河南淅川黃棟樹遺址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0 年第 3 期，頁 23。

64 賈漢清，〈從顧家坡墓地的發掘看史前時代文化交叉地帶的部落衝突〉，《華夏考古》2004 年第 4 期，頁 77-79。

65 羅運兵指出，漢水中游地區是海岱地區以外另一個重要的隨葬豬骨中心，賈湖遺址可能是此風俗的源頭，並由下王崗繼承。這個風俗雖在衰退期（2,600-2,000 BC）後自南陽盆地消失，但在盆地西部的均縣亂石灘、鄖縣青龍泉與房縣七里河等遺址，則於石家河文化時期繼續保留此傳統。羅運兵，〈漢水中游地區史前豬骨隨葬現象及相關問題〉，《江漢考古》2008 年第 1 期，頁 65-73。

66 如 M11 與 W21、M15 與 W24、M23 與 W35，報告則進一步推論為母親因難產而導致母子雙亡的具體表現。然而由於僅 M15 確定為女性，其它墓葬性別不明，因此此說尚有討論空間。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河南淅川黃棟樹遺址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0 年第 3 期，頁 22-23。

6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青龍泉與大寺》，頁 37。

68 張緒球，〈屈家嶺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 175-181。進入石家河時代後，設有腰坑的單人墓出現於南陽盆地的西部山區，至於盆地內尚未發現。樊力，〈論石家河文化青龍泉三期類型〉，頁 58。

## 四、地域特色鮮明的陶器

南陽盆地成熟期的陶器內涵可分為前後兩大階段。前半段屬仰韶三期，乃是繼承本地發展期的傳統而來，以紅陶為大宗，器型則以罐、鼎、鉢、盆、器蓋與灶較多，紋飾不發達，彩陶甚少，大多為寬帶紋。<sup>69</sup>整體而言，本階段的陶器雖然仍與仰韶文化的面貌接近，但已形成獨特的地方風格。

成熟期的後半段則屬屈家嶺文化，以灰陶為主，明顯與以紅陶為主的仰韶時期有別，此外，這個時期的南陽盆地還發現大量屈家嶺文化的典型器物。儘管如此，有些陶器則延續本地仰韶時期的傳統，<sup>70</sup>除了日用器物外，還包括造型奇特的空心陶球（圖二十九）。<sup>71</sup>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陶器的作風融合了本地與屈家嶺文化的特色，如下王崗出土的大口鼓腹罐，其器型雖屬南陽盆地的仰韶文化晚期，但器身腹部卻飾有屈家嶺文化常見的凸弦紋一周。<sup>72</sup>

毫無疑問，在成熟期的前、後兩大階段之間，南陽盆地的陶器面貌出現重大的轉折，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取代了黃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成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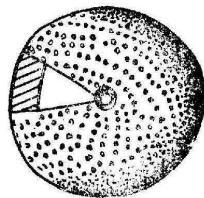
69 樊力，〈豫西南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序列及其與鄰近地區的關係〉，《考古學報》2000年第2期，頁171。相對於盆地內其它遺址，雕龍碑二期文化的彩陶除具備北方的仰韶文化因素外，還帶有南方的大溪文化因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頁341。

70 樊力曾將南陽盆地及其附近的屈家嶺文化，稱為「屈家嶺文化青龍泉二期類型」（一般稱為「屈家嶺文化青龍泉類型」），並將這個類型的出土器物分為甲、乙兩群。甲群屬於典型的屈家嶺文化，源自江漢平原，較具特色的器型包括雙腹豆、雙腹碗、小口高領罐、高圈足杯、薄胎喇叭形杯、壺形器與彩陶紡輪等；而乙群則屬於南陽盆地仰韶文化晚期傳統，主要器型則有釜形鼎、帶流盆、大口鼓腹罐與紅頂薄胎鉢等。樊力的研究，提供我們分析南陽盆地屈家嶺時期文化屬性重要的參考依據。樊力，〈論屈家嶺文化青龍泉二期類型〉，《考古》1998年第11期，頁83-85。

71 這類空心陶球最早發現於下王崗遺址的仰韶二期，共有10件，仰韶三期11件，屈家嶺時期2件，甚至到更晚的亂石灘文化時期還發現2件。此外，在唐河茅草寺的仰韶文化三期以及棗陽雕龍碑的一、二、三期均曾出土，後者更發現有彩繪的空心陶球。除了南陽盆地外，在周邊地區亦曾發現類似的遺物，例如盆地南方的宜城曹家樓的屈家嶺文化時期就曾出土1件。雖然空心陶球的實際功能有待研究，但這類遺物似乎具備明顯的地域色彩，值得關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頁163-164、199-200、215、263；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唐河茅草寺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65年第1期，頁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頁43-44、144、296-300；武漢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襄樊市博物館、宜城縣博物館，〈湖北宜城曹家樓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8年第1期，頁59。

7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頁211；樊力，〈論屈家嶺文化青龍泉二期類型〉，《考古》1998年第11期，頁83-84。

影響當地陶器最為深遠的考古學文化。雖然北方的文化因素在成熟期的後半段迅速消退，但以仰韶文化為基礎所發展出的本地風格卻繼續存留，並與屈家嶺文化共同建構新的本地傳統。這是一種看似「斷裂」、實則「連續」的歷史變遷過程。



圖二十九 空心陶球，下王崗 F32：6（《淅川下王崗》，頁 199，圖 198：9）

相對於盆地內的其它遺址，雕龍碑的情況則格外引人矚目。該遺址的陶器面貌雖兼受南、北考古文化的影響，然而時代愈晚，獨特性卻愈強。<sup>73</sup>必須指出的是，雕龍碑的陶器特徵最為鮮明的時期，正好是仰韶文化漸衰、屈家嶺文化漸盛之際。或許位於南陽盆地東南部的位置，加上身處南北兩大考古文化陣營彼消此長的過渡階段，正是促成雕龍碑展現自我個性的絕佳契機。

## 五、本地傳統的堅持

趙輝曾經指出，廟底溝期（4000-3300 BC）是仰韶文化最為興盛的階段，內部的文化面貌呈現高度的一致性，是當時華北最為強勢的考古學文化；然而大約於西元前 3500 年起，黃河流域原本高度一統的局面發生變化，不僅仰韶文化的勢力衰退，各區域的獨立性與不平衡性逐漸顯露；到了廟底溝二期文化時期（3000-2500 BC），中原地區的考古學文化明顯沒落，周邊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反倒對中原施加影響。<sup>74</sup>此一黃河流域考古學文化由極盛走向衰微的階段，正是南陽盆地區域發展史的成熟期。

73 簡言之，在雕龍碑一期時，總體面貌與下王崗仰韶文化相似；二期時，不但具備仰韶與本地的文化因子，更混雜較多的大溪文化油子嶺類型的因素；進入三期後，儘管仍兼具南、北的文化因素，但流行大量帶小矮圈足的陶器，非但為一、二其所未見，亦不見於同時期其它的考古學文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襄陽雕龍碑》，頁 324-325。有鑑於此，部分學者甚至提議將雕龍碑三期視為一新的考古學文化，稱為「雕龍碑三期文化」。王杰，〈雕龍碑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收獲〉，《江漢考古》1995 年第 3 期，頁 47-48。

74 趙輝，〈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的形成〉，《文物》2000 年第 1 期，頁 43、45；〈中國的史前基礎——再論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文物》2006 年第 8 期，頁 51-52。

由前述的討論可知，在成熟期的上半段，北方的仰韶文化仍處於繁盛時期，也依舊對南陽盆地帶來一定的影響，但不論是房址的結構、埋豬的習俗，以及陶器的型制，本地色彩鮮明。換言之，位於仰韶文化南方邊陲的南陽盆地，至此已跳脫文化核心的掌控。進入成熟期的下半段，南陽盆地成為屈家嶺文化的勢力範圍。一方面，文化屬性改變的背後，反映世局的動蕩不安，亦造成許多仰韶時期盛極一時的考古遺址呈頽敗之勢；然而另一方面，繼之而起的聚落與物質遺存，在面臨新興考古文化的衝擊之際，仍然繼續保存當地的文化傳統。這種不因外在大環境的變遷而固守本地傳統的現象，實說明南陽盆地的歷史正處於成熟階段。

## 第四節 衰退期（2600-2000 BC）

### ——北方文化因素的再度南下

隨著成熟期的結束，新石器時代南陽盆地的區域發展史邁入了最後一個階段，亦即衰退期。相對於成熟期在物質文化甚至風俗習慣上極為突出的本地色彩，衰退期雖然仍維持相當程度的區域傳統，但總體而言，各遺址的繁榮不再，處處呈現頽敗之勢。例如成熟期高度發達的多間式地面建築，在進入衰退期後，除黃棟樹仍有零星的發現外，<sup>75</sup>這類遺跡消失殆盡。其次，衰退期許多的聚落雖興建於成熟期下半段的屈家嶺文化遺址之上，但數量減少，亦不見人口繁盛的村落。<sup>76</sup>以下王崗遺址為例，自成熟期的後半段至衰退期的前半段為止，當地僅存少量的灰坑與墓葬，顯示當地已不再是人類主要的活動區域；到了衰退期的後半段，該遺址雖有復興的跡象，出現較多的灰坑與墓葬，甚至發現窯址與灶，然而部分灰坑埋有人骨架，有些墓葬則缺少頭骨或骨架散亂。<sup>77</sup>這些現象表明，南陽盆地部分聚

75 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河南淅川黃棟樹遺址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0年第3期，頁40-47。張弛認為，報告中所謂屬「龍山文化遺存」的房址，其實亦為屈家嶺時期所建。張弛，《長江中下游地區史前聚落研究》，頁202。

76 張弛，《長江中下游地區史前聚落研究》，頁202。

7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頁201-206、215-218、230-242。其實在屈家嶺與石家河文化時期，下王崗已經發現灰坑中埋藏人骨，只是此現象在亂石灘文化時期更加普遍。另外，在八里崗遺址新石器時代的最晚階段，其中亦發現亂葬人骨的灰坑。張弛，《長江中下游地區史前聚落研究》，

落的衰退，在成熟期的後半段已出現端倪外；此外，族群的衝突應是導致聚落衰退的重要因素。

陶器屬性的轉變，則提供另一個觀察當地歷史發展趨勢的側面。據相關的研究指出，衰退期可分為前後兩大階段，前半段屬「石家河文化青龍泉三期類型」，除了受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影響較深外，亦直接繼承本地屈家嶺文化的傳統，罕見黃河流域考古學文化的因素。後半段的文化面貌則較為複雜，盆地的西北部屬亂石灘文化，為石家河文化、關中客省莊二期文化與中原王灣三期文化的混合體；中部則屬八里崗四期遺存，帶有較多的本地與中原文化的因素，關中的影響較小；南部則屬石家河晚期文化，雖亦受到中原龍山文化的影響，但以石家河文化為主體。<sup>78</sup>由此可見，黃河流域的考古學文化經過近千年的沈寂，再度於新石器時代的尾聲影響南陽盆地。不僅如此，南陽盆地自發展期後半段以來文化面貌相對一致的態勢，到了衰退期的後半段漸次瓦解，而盆地內不同遺址的文化內涵，則過渡於周邊強勢的考古學文化之間。綜上所論，北方文化因素的重新南下，以及南北兩大考古學文化系統的角力，應是造成新石器時代南陽盆地的區域發展史走向沒落的重要原因。

必須指出的是，雖然在衰退期的後半段，本地考古遺存的內涵發生鉅變，然而其中部分物質文化的特徵，早在當地文明興起的初始階段，就開始流行於盆地境內與周邊地區，直到衰退期，可說是一脈相承。除了前述在遺址中埋藏豬骨的現象外，鼎、罐、鉢、盆便一直是這個地區陶器群的主要器類，縱貫整個新石器時代，前後長達約 3000 年；而自始興期就出現的紅頂鉢，則持續使用至衰退期的前半段；<sup>79</sup>至於構造奇特的空心陶球則

頁 225。

78 樊力，〈亂石灘文化初論〉，《江漢考古》1998 年第 4 期，頁 41-48；〈論石家河文化青龍泉三期類型〉，《考古與文物》1999 年第 4 期，頁 50-61；〈豫西南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序列及其與鄰近地區的關係〉，《考古學報》2000 年第 2 期，頁 147-182；襄樊市考古隊，〈襄樊市牌坊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7 年第 4 期，頁 3-11；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棗陽市文物考古隊，〈棗陽周台遺址發掘報告〉，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頁 39-46、91。常懷穎認為，下王崗的龍山文化（也就是樊力所論的亂石灘文化），其陶器呈現紛繁複雜的面貌，除了有本地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的傳統之外，還包含了關中的客省莊晚期文化與中原的王灣三期文化，另外，鄂西與湖南湘江流域的考古學文化亦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呈顯一股雜糅的態勢。常懷穎，〈淅川下王崗龍山至二里頭時期陶器群初探〉，《四川文物》2005 年第 2 期，頁 30-38。

79 樊力，〈豫西南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序列及其與鄰近地區的關係〉，《考古學報》2000

為另一個頗具代表的例子。<sup>80</sup>

雖然我們無法得知這種長期採用特定器物與習俗的現象，是當地居民刻意維持的傳統，或是文明演進中無心插柳的結果，但可以肯定的是，歷經不同考古學文化洗禮的南陽盆地，除了展現其適應大環境變遷的彈性外，當地的物質文化與歷史發展，並非只是外來強勢文化的地方變體，仍有其自身的內在理路可循。

## 第五節 二里頭文化與殷商文化

在中國考古學的分期框架中，西元前 2000 年前後是一條重要的斷代分界。以黃河與長江流域為核心區域的古代中國，在此之前屬於新石器時代，之後則進入傳世文獻中所論的夏、商、周三代時期。然而，相對於商、周兩大階段，「夏朝」與「夏文化」等一系列問題的爭議尚多。<sup>81</sup>有關「夏」的相關議題並非本文討論的重點，然而南陽盆地繼亂石灘文化、八里崗四期類型與石家河晚期文化而起者，正是當時北方中原地區最為強勢，同時也被大多學者視為夏朝晚期遺存的二里頭文化。

目前，在南陽盆地發現帶有二里頭文化因素的遺址有淅川下王崗、<sup>82</sup>鄧州穰東、<sup>83</sup>鄧州陳營、<sup>84</sup>方城八里橋、<sup>85</sup>襄陽王樹崗<sup>86</sup>與棗陽墓子崗<sup>87</sup>（圖三

年第 2 期，頁 179；〈論石家河文化青龍泉三期類型〉，《考古與文物》1999 年第 4 期，頁 58-59。

80 見本章註 71。

81 認為夏朝確實存在的學者，目前傾向將夏代定於西元前 2,100 年至 1,600 年之間，並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作為夏代晚期都城，與該遺址相對應的二里頭文化（1,850-1,550 BC）則為晚期的夏文化，而把二里頭文化之前的新寨期與王灣三期晚段視為早期的夏文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21-81。

8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頁 264-306。

8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鄧州市穰東遺址的發掘〉，《華夏考古》1999 年第 2 期，頁 7-24。

84 袁廣闊，〈鄧州市陳營二里頭文化遺址〉，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年鑑（199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85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南陽市文物研究所、方城縣博物館，〈河南方城縣八里橋遺址 1994 年春發掘簡報〉，《考古》1999 年第 12 期，頁 16-27。

86 襄石復線襄樊考古隊，〈湖北襄陽法龍王樹崗遺址二里頭文化灰坑清理簡報〉，《江漢考古》2002 年第 4 期，頁 44-50。

87 襄樊市文物普查辦公室、襄樊市博物館，《襄樊市文物史蹟普查實錄》（北京：今日中

十)。一般而言，二里頭文化可分為四期，<sup>88</sup>下王崗則發現了最早的一期遺存。常懷穎認為，下王崗本期的陶器群，基本上承襲之前的亂石灘文化，南方的石家河文化與關中的客省莊文化因素銳減，中原的王灣三期文化則一枝獨秀，至於典型的二里頭文化面貌仍模糊不清。<sup>89</sup>二里頭文化二期以後的遺存則散見上述遺址之中，整體而論，典型二里頭文化的因素較強，但仍帶有少量的地方色彩。舉例而言，南陽盆地的夾砂陶始終較多，中原的二里頭文化前半段多泥質陶，後半段夾砂陶才逐漸增加；其次，除了典型二里頭文化大量流行的灰陶外，棕黃陶與紅褐陶則在本地佔有一定的比例；第三，南陽盆地仍殘存少量的石家河文化因素，但影響甚微。<sup>90</sup>

中原地區繼二里頭文化而起的是殷商文化，南陽盆地雖亦零星發現這個時期的遺址，<sup>91</sup>但經報導者僅有南陽十里廟（圖三十）。<sup>92</sup>該遺址未經正式發掘，歷年來卻陸續出土不少晚商的陶器與青銅器。經正式公布的青銅器包括鼎、觚、爵、戈、鑊與鑊，其中1件銅爵扳下的器壁上有「父辛」銘文。<sup>93</sup>另外，經筆者目驗，尚有1件未見報導的弓形器殘件，其上則鑲嵌綠松石。<sup>94</sup>除銅器外，十里廟還發現大批鑄造銅器的陶範、冶銅的坩鍋殘片與銅渣，<sup>95</sup>可見當地應存在鑄銅作坊。此外，在盆地東南方的棗陽與南方的襄樊（圖三十），亦曾出土晚商銅器，前者發現鼎與尊各1件，銅鼎通高有65公分；<sup>96</sup>後者則發現1件帶有「父戊」銘文的爵。<sup>97</sup>綜合以上

國出版社，1995）。

8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夏商卷》，頁69-70。

89 常懷穎，〈淅川下王崗龍山至二里頭時期陶器群初探〉，《四川文物》2005年第2期，頁35-36。

9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鄧州市穰東遺址的發掘〉，《華夏考古》1999年第2期，頁23；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南陽市文物研究所、方城縣博物館，〈河南方城縣八里橋遺址1994年春發掘簡報〉，《考古》1999年第12期，頁26；襄石復線襄樊考古隊，〈湖北襄陽法龍王樹崗遺址二里頭文化灰坑清理簡報〉，《江漢考古》2002年第4期，頁5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夏商卷》，頁96-97；常懷穎，〈淅川下王崗龍山至二里頭時期陶器群初探〉，《四川文物》2005年第2期，頁35。

91 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河南分冊》，頁526-576。

92 游清漢，〈河南南陽市十里廟發現商代遺址〉，《考古》1959年第7期，頁370；南陽市博物館，〈南陽市博物館館藏的商代青銅器〉，《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頁95-96；南陽市文物工作隊，〈南陽市十里廟遺址調查〉，《江漢考古》1994年第2期，頁14、27-29。

93 南陽市博物館，〈南陽市博物館館藏的商代青銅器〉，《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頁95-96。

94 感謝南陽市博物館赫玉建館長同意目驗庫房收藏青銅器。

95 游清漢，〈河南南陽市十里廟發現商代遺址〉，《考古》1959年第7期，頁370。

96 棗陽市博物館，〈湖北棗陽發現一件商代銅尊〉，《文物》1990年第6期，頁57；〈湖

零散的跡象顯示，南陽盆地至遲在商代晚期已與中原的商王朝有所聯繫，而發現銅器的遺址或地區，其性質可能與淮河上游的天湖羅山遺址類似，或是商朝控制南方的據點，或是與商王室存在某種關係的方國，十里廟則為其中代表。這些發現商代銅器的遺址與地區，均位於溝通黃河中游與長江中游地區的交通要津之上，不僅在殷商時期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兩周時代亦然。



圖三十 南陽盆地二里頭時期與殷墟時期遺址分佈圖

北襄陽市博物館收藏的幾件青銅器》，《文物》1994年第4期，頁77-79。  
97 襄樊市文物管理處，〈湖北襄樊揀選的商周青銅器〉，《文物》1982年第9期，頁84-88。

## 第六節 小結——大歷史與小歷史

正如本文第二章所言，南陽盆地與其四周輻射狀的道路，是溝通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重要通道。這個自成一格的地理空間，不僅是聯繫中國南北重要的橋樑，其上聚落遍佈，聚居的人群則創造屬於自己的歷史。儘管以歷史學與考古學的眼光觀之，南陽盆地自新石器時代至殷商時期，始終不是推動古代中國大歷史發展的中心，然而當地長達 4000 年沒有文字記載的小歷史，卻總是明快地反應大時代的演變趨勢。因此，位於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南陽盆地，是一窺古代中國歷史進程——特別是中原與長江中游地區間互動關係——的重要指標。

始興期是南陽盆地區域發展史的開端，不但當地古代文明的起步比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來得晚，而且屬北方裴李崗文化的一支，並非獨立起源。隨後的發展期則延續始興期的格局，同樣受到北方文化的強烈影響。黃河流域的考古學文化之所以能長期影響南陽盆地，除了長江中游尚未出現足以與之抗衡的考古學文化外，<sup>98</sup>更根本的因素在於：最早定居於南陽盆地的人群可能來自北方。換句話說，南陽盆地是北人南下的移民地。學者曾對下王崗與雕龍碑遺址出土的人骨進行體質特徵的分析，相關的研究一致認為，這兩處居民的人骨與華北類型（尤其是黃河下游地區）的關係較近，與華南類型的關係疏遠。<sup>99</sup>因此，南陽盆地始興期與發展期的歷史，實是黃河流域的北方人南下移民與土著化的過程。

成熟期是南陽盆地遠古歷史的黃金時期，除了出現特徵鮮明的考古遺存外，當地還歷經考古學文化譜系由北轉南的巨變。作為觀察古代中國大歷史走向的指標區域，南陽盆地本期的歷史發展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在成熟期的上半段，當地已出現多間式地面建築與埋豬習俗等地域特色，而此時的黃河流域，正處於仰韶文化的廟底溝期。雖然廟底溝期是仰韶文

98 見本章第二節的相關討論。

99 張振標、陳德珍，〈下王崗新石器時代居民的種族類型〉，《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頁 69-76；潘其風，〈中國古代居民種系分佈初探〉，收入蘇秉琦主編，《考古學文化論集》第1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 221-232；朱泓，〈中國南方新石器時代居民體質類型的聚類分析〉，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編輯，《中國考古學會第七次年會論文集（19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頁 68-75；張君，〈湖北襄陽市雕龍碑新石器時代人骨分析報告〉，《考古》1998年第2期，頁 76-84。

化最為強盛的階段，其內的物質文化看似呈現高度的一致性，<sup>100</sup>然而，透過本文的分析表明，南陽盆地不僅在本階段已經脫離文化核心的影響，更為日後仰韶文化從較強的一致性走向分崩離析的發展預埋伏筆。其二，在成熟期的下半段，隨著仰韶文化的衰亡與周邊地區考古學文化的興起，屈家嶺文化始將南陽盆地納入勢力範圍。儘管典型的屈家嶺文化已成為南陽盆地主要的組成部分，然而仰韶時期的物質文化特點仍繼續流行，並未隨文化系統的轉換而消散，可見南陽盆地自身的區域傳統已然成形。南陽盆地成熟期的歷史，正是南北勢力彼消此長下的時代產物。

衰退期是新石器時代南陽盆地區域發展史的尾聲。相對於成熟期而言，本期不僅罕見人口集中的聚落，還出現人群衝突的痕跡，而當地的考古學文化譜系則由南方系統轉為北方系統。筆者認為，這些現象均與中原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再度崛起有關。在衰退期的前半段，早先分裂的中原地區逐步整合為中原龍山文化，長江中游地區的屈家嶺文化則由新興的石家河文化所取代，南陽盆地雖然亦屬石家河文化的一支，但遺址明顯不如屈家嶺時期興盛，顯示當地可能已成為兩大考古學文化對抗的前線，族群間的衝突使得當地不再適合人居。進入衰退期的後半段，中原因素成為南陽盆地的主要內涵，南方因素驟減。儘管石家河文化仍殘存於長江中游地區，但受到中原龍山文化的強烈影響，最終還是走向滅亡。<sup>101</sup>由此可見，南陽盆地衰退期的歷史，恰好是中原的考古學文化再度復興並向南擴張的註腳。

至此以降，南陽盆地長期受到中原政治勢力的影響。直到兩周時期，這個夾於黃河與長江之間的中間地帶，才又成為各方勢力相互爭勝的戰場。

100 趙輝，〈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頁43。

101 郭立新，〈長江中游地區初期社會複雜化研究（4300B.C.-2000B.C.）〉，頁192。

附表一 南陽盆地新石器時代已發掘遺址文化序列

文化分期 遺址名稱	第 I 階段	第 II 階段			第 III 階段		第 IV 階段		第 V 階段
		一期	二期	三期	一期	二期	一期	二期	
方城 大張莊	第一、二組	第三組							
鄧州 八里崗		仰韶早期	仰韶中期	仰韶晚期	屈家嶺早期	屈家嶺晚期	石家河早期	石家河晚期	八里崗四期
唐河 寨茨崗					第一組 <u>屈家嶺文化</u>		第二組 <u>屈家嶺文化</u>		
唐河 茅草寺			第一組 <u>下層</u>	第二組 <u>上層</u>					
鎮平 趙灣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南召 二郎崗			◎						
淅川 下王崗		仰韶一期	仰韶二期	仰韶三期	屈家嶺文化 <u>屈家嶺一期</u>			石家河晚期 <u>屈家嶺二期</u>	亂石灘文化 <u>龍山文化</u>
淅川 下集		仰韶文化			屈家嶺文化		石家河早期 <u>龍山文化</u>	石家河晚期 <u>龍山文化</u>	龍山文化
淅川 黃棟樹		仰韶文化*			屈家嶺文化		石家河文化* <u>龍山文化</u>		
棗陽 雕龍碑			一期*	二期*	三期*				
棗陽 周台							◎*		
襄樊 牌坊崗								石家河晚期*	

說明：

1. 本表乃據樊力，〈豫西南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序列及其與鄰近地區的關係〉，《考古學報》2000年第2期，頁147-182，並補充相關材料而成。
2. 表格內加「底線」者為原始報告內的文化分期，標註「\*」者為樊力未提而由筆者參考原始報告增補。
3. 楊力在其研究中，將豫西南地區又細分為「南陽盆地」與「丹江下游」。在本文內，則將楊氏置於「丹江下游」的淅川下王崗、下集與黃棟樹遺址納入討論範圍。

## 第四章 周文化？楚文化？秦文化？

### ——周代南陽盆地的考古材料

歷經二里頭文化與殷商文化約莫千年的沈寂，周代的南陽盆地再度出現大量人類活動的痕跡。

所謂的「周代」，指涉的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時期。就普遍的認識而論，史家依據文獻記載，將武王克商視為周代的起點，以秦始皇一統六國為終。其中，又以平王東遷為分水嶺，依據王朝首都位置的不同，再將周代分為西周與東周。此外，又因《春秋》與《戰國策》分別記述了東周前、後期的歷史發展，因此東周又可再細分為春秋時期與戰國時期。相對於平王東遷於西元前 771 年與秦始皇一統六國於西元前 221 年，武王克商以及西周列王在位的精確定年，目前仍是學界聚訟不休的大問題；<sup>1</sup>而春秋與戰國該如何分期，各家亦有不同意見。<sup>2</sup>儘管如此，周代前後長達約有 800 餘年的看法應無疑義。

所謂的「周代考古」，簡言之，即是研究「周代」考古遺存的學門。更精確地說，「周代考古」研究的對象，不僅在時間範圍上與歷史學中的「周代」同時，在空間範圍上則涵蓋文獻記載中「周朝」的疆域——兼指周朝直接與間接統治的地區。必須指出的是，這種以「朝代」，甚至是「國別」、「族屬」為考古學文化命名的方式，普遍流行於中國「歷史時期」的考古學研究中，與新石器時代乃至舊石器時代的考古學，以「首次發現地名」

1 朱鳳瀚、張榮明編，《西周諸王年代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

2 楊寬認為，所謂的戰國時期，大抵而言指的是「中原地區韓、趙、魏『三家分晉』，『田氏代齊』，再加上原有的秦、楚、燕三國」，「七強並立而相互兼併的形勢出現，直到秦完整統一為止」的這一段時間。至於羅泰則將春秋與戰國的分界斷於西元前 450 年，他認為，這樣的斷代一方面符合考古學實際工作上的需求，同時也兼顧文獻記載。《左傳》、《國語》及《戰國策》均載韓、趙、魏分掌晉國大權的歷史事件，時約西元前 453 年。該事件是《左傳》、《國語》中提及最晚的歷史事件，同時也是《戰國策》中最早的歷史事件。楊寬，《戰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 1-4；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 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6), p. 8.由於本文試圖分頭處理考古材料與傳世文獻，為了連結兩類不同性質的材料，以便討論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相互關係的發展趨勢，因此採用羅泰之說，即以西元前 450 年，作為春秋與戰國的分界。

或「典型特徵區域」為考古學文化命名的原則大不相同。<sup>3</sup>

以「朝代」、「國別」或「族屬」為考古學文化命名的方式，預設了相同「歷史背景」的考古學文化，必然具備相似的考古學文化特徵。以此前提為基礎，由於傳世文獻內曾記載周代的南陽盆地先後受到周王朝、楚國與秦國的統治，因此，學者大多將此時南陽盆地的考古學文化，分為「周文化」時期、「楚文化」時期與「秦文化」影響時期三大階段。換言之，周代的南陽盆地在受到不同政治集團的支配時，必然隨之展現出不同的物質文化面貌。在這種思考邏輯之下，周代南陽盆地的考古學文化隨著統治集團的更迭而受到切割。然而，上層政治支配的改變，真的連帶造成物質文化立即而全面的改變嗎？還是這當中其實存在更複雜、更多層次的變化？隨著南陽盆地考古材料的不斷累積，時至今日，我們已經具備反省上述問題——亦即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互動關係——的可能性。以下，筆者將利用已發表的考古材料，重構周代南陽盆地的區域發展史。

與第三章不同的是，在本章中，筆者不打算為周代的南陽盆地重新分期，而是採用學界普遍接受的「周文化」時期、「楚文化」時期與「秦文化」影響時期為年代框架，其原因在於：一方面，前述的分期架構自大歷史發展的趨勢而論有其合理性；另一方面，儘管如此，但各階段實質的文化內涵，卻又與典型的「周文化」、「楚文化」與「秦文化」的特徵若即若離。這種現象，恰好可以用來反省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的互動關係，並突顯以「朝代」、「國別」或「族屬」為考古學文化命名可能帶來的問題。

至於如何將南陽盆地的「周文化」時期、「楚文化」時期與「秦文化」影響時期，分別對應入周代的考古學文化框架，在此仍必須稍加說明。一般而言，周代考古與周代史的分期方式相同，前後歷經西周、春秋與戰國三大階段，而每一階段可再進一步細分為早、中、晚三期。<sup>4</sup>據相關研究指

3 張國碩，〈論考古學文化的命名方法〉，《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頁102-107。

4 儘管大部分學者均使用上述架構對周代的考古材料進行分期，然而各期的起迄年代，或仍有爭辯，或無清楚定義。本文對於周代南陽盆地考古材料與傳世文獻的探討，由於強調該地區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間互動關係的變遷趨勢，而非詳細考訂個別出土遺存的年代，因此分期採取較寬鬆的觀點。西周分期採用陳夢家的看法，早期包括武王、成王、康王與昭王時期，中期包括穆王、恭王、懿王、孝王與夷王時期，晚期包括厲王、宣王與幽王時期。由於西周諸王的明確定年爭議頗大，故僅取其大概。至於東周的分期採羅泰之說，以西元前450年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分界。陳夢家，《西周年代考·六國紀年》（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51-52；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出，大約至西元前 678 年前後，亦即春秋早期晚段，南陽盆地已成為楚國疆域；《史記·秦本紀》則載，西元前 279 年，也就是戰國晚期早段，秦國佔領南陽盆地南部的鄧（今湖北襄樊），至此盆地全境納入秦國的控制範圍。<sup>5</sup>為方便進行討論，大抵而論，本文所謂的「周文化」時期上起西周早期，下至春秋早期；「楚文化」時期則介於春秋中期至戰國中期之間；「秦文化」時期則屬戰國晚期。

另外，周代南陽盆地考古遺址本身的內涵與分佈狀況亦值得關注。相對於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遍布盆地境內各處、遺跡以房址與墓葬為主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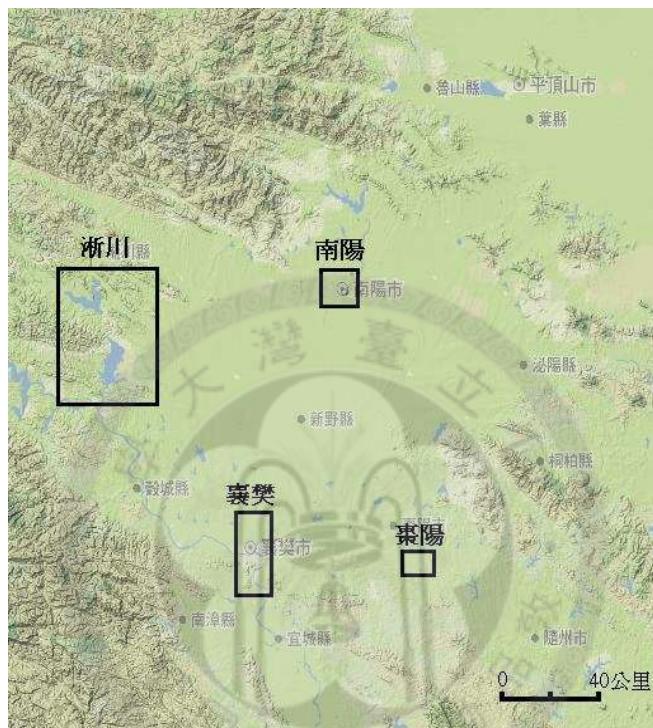
---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 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p. 6. 本文所論周代的考古分期框架如下表所示：

西周	早期	1,050-960 BC
	中期	960-860 BC
	晚期	860-771 BC
春秋	早期	770-650 BC
	中期	650-550 BC
	晚期	550-450 BC
戰國	早期	450-375 BC
	中期	375-300 BC
	晚期	300-221 BC

5 何浩，《楚滅國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1989），頁 3-14；〔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213。徐少華認為，周代的南陽盆地有鄧、鄂、申、呂、謝、西蓼與唐等諸侯國，依考古材料所見，僅有鄧、申兩國確定位於盆地境內。最近發表的湖北隨州安居羊子山 M4 屬西周早期，據出土的銅器銘文，當地應屬鄂國。李學勤認為隨州為西周鄂國的中心，南陽盆地東南部亦屬鄂國統治，至西周晚期鄂國被滅才為後起的曾國所接管；張昌平則認為西周時期鄂（噩）國與曾國並立，分據隨州與棗陽一帶。筆者認為張氏之說可從。其次，南陽盆地曾出土春秋早期以前的呂器甚少，諸如南陽萬家園 M202 發現 1 件帶有「輔白乍兵戈」銘文的銅戈，另在淮河上游地區的信陽，發現兩批分別帶有「甫伯享」與「甫哀伯者君」銘文的青銅容器，說明至少在春秋早期呂國可能位於信陽，但是西周的呂國地望仍不清楚。然而，以上的立論基礎，是建立於「甫」即「呂」的假設之上，李學勤持此說；徐紹華則持不同意見，認為「呂」與「甫」乃不同國名。至於謝、西蓼與唐的地望有待更多的考古材料加以補充。最後，張昌平在對曾國銅器的討論中指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南陽盆地東南部的棗陽至隨棗走廊南部的隨州，應是曾國的領地。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頁 10-70；隨州市博物館編，《隨州出土文物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李學勤，〈由新見青銅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 年第 1 期，頁 40-43；張昌平，〈論隨州羊子山新出的噩國青銅器〉（待刊稿）；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陽市萬家園 M202 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07 年第 5 期，頁 8-13、33；信陽地區文管會、信陽縣文化館，〈信陽發現兩批春秋早期呂國銅器〉，《中原文物》1979 年第 4 期，頁 6、10-11；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 106-108；徐少華，〈南陽新出「輔伯作兵戈」的年代和族屬〉，《考古》2009 年第 8 期，頁 79-83；張昌平，〈曾國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 326-344。感謝張昌平先生提供文稿及相關意見。

而言，周代的考古發現不僅在地理位置上相對集中，而且遺跡大多為墓葬，鮮見房址，另有少量的城址。之所以出現這種考古遺址「相對集中」與「多為墓葬」的現象，一方面與今日中國考古的現實狀況有關，<sup>6</sup>另外一項可能的原因在於：密集發現考古遺址的區域，正是周代人類在南陽盆地內主要活動的範圍。



圖三十一 南陽盆地周代主要遺址分佈區域圖

(圖中的方框即以下圖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六所包含的區域)

河南省的南陽與淅川，<sup>7</sup>以及湖北省的襄樊與棗陽，是南陽盆地發現周代遺址最為集中的地區（圖三十一）。南陽與襄樊分別是今日盆地北方與南方最重要的中心都市，而淅川與棗陽則各自隸屬於這兩座城市的管轄。這

6 簡言之，中國大陸的考古工作以「搶救發掘」為主，至於具有明確研究目標、有計畫性的考古工作僅佔少數。所謂「搶救發掘」，指的是為配合國家基本建設，諸如建房造橋，在施工前，必須在建設區域內先進行考古鑽探調查，如發現文化層則立即進行「搶救發掘」。由於上述工程多集中於城市內或特定地區（如高速公路與「南北水調」工程沿線），因此發掘的考古遺址往往相對集中。其次，相對於聚落，大陸考古工作者更重視挖掘墓葬，亦即部分學者所論的「挖寶心態」。這些狀況，使得大陸發掘的考古遺址「相對集中」，而且「多為墓葬」。李修平，〈動手動腳找東西——記2009年春季南陽盆地探訪之旅〉，《臺大歷史學術通訊》第7期（2010），頁23-31。

7 以當今中國大陸的行政區劃分而言，南陽市下轄2個市轄區（臥龍區、宛城區）、1個縣級市（鄧州市），以及10個縣（方城縣、社旗縣、唐河縣、桐柏縣、南召縣、新野縣、鎮平縣、內鄉縣、西峽縣與淅川縣）。本章所論的南陽，如無特別說明，指的是包括宛城區與臥龍區的南陽市城區。

四座城市在當代的行政體系上有主次之別，然而，若從地理位置來考量其歷史意義，它們則都共同具備極重要的戰略價值。如果說南陽盆地是溝通中國南北最重要的橋樑，那麼上述區域，便是這座橋樑上四扇最為關鍵的大門。<sup>8</sup>佔據這些重要的交通樞紐，無疑即掌控聯繫中國南北的先機，因此在這些地區發現成群的考古遺址也就不足為怪。是故，在開始正式利用考古材料架構周代南陽盆地的區域發展史之前，筆者將首先討論這四個區域的地理環境與考古遺存間的關係。

## 第一節 地理環境與考古遺存

南陽、淅川、襄樊與棗陽是目前南陽盆地發現周代遺址最多的區域。可惜的是，直到現在，南陽盆地尚未進行拉網式的聚落考古調查工作，導致我們無法全面釐清上述四個區域不同類型考古遺址的布局狀況，以及這些遺址與地理環境的相互關係。然而，考古工作者長期積累的調查與發掘成果，卻使得今日的研究者能透過零星、片段的材料，逐漸拼湊當地周代聚落的初步模樣，也為周代南陽盆地的區域史研究奠定基石。以下，筆者將利用現今已發表的考古材料，以聚落考古的眼光，嘗試分析南陽、淅川、襄樊與棗陽考古遺址的分佈狀況，藉此點明南陽盆地在周代歷史上的意義。

### 一、南陽

南陽位於南陽盆地中部偏北的平原上，北倚伏牛山脈，漢水的支流白河由北向南流經城區的東南方。從南陽溯白河而上，沿【路徑3】（圖七）可抵洛陽盆地；自南陽往東北穿越方城缺口，即順【路徑1】（圖七）而行，可直通中原。這個地區是南陽盆地北方最重要的交通門戶。目前，南陽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較少，相關的考古材料亦均未發表。<sup>9</sup>至於經正式報導

8 由南陽經【路徑1】與【路徑3】分別可連接黃淮平原與洛陽盆地，由淅川沿【路徑6】可達關中，自襄樊順【路徑4】可南下江漢平原西部的荊州，自棗陽行【路徑5】可通江漢平原東部的武漢。

9 黃山遺址即為南陽附近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位於南陽城區東北約12公里的白河西側，雖經試掘，但相關材料並未正式發表。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河南分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頁40；南陽師範學院獨山玉文化研究中心，〈南陽黃山遺址獨山玉製品調查簡報〉，《中原文物》2008年第5期，頁4-9。

且年代最早的遺址，則是第三章所論的十里廟，屬殷商晚期至西周早期，地處城區的東北部。筆者在前文曾經指出，十里廟遺址的出現，說明商王朝已經開始關注這個國土南方的戰略要地。



圖三十二 南陽周代遺址分佈圖

此外，在今日南陽城區的地底下，還埋藏著一座被學者稱為「宛城」的古代城址，依據伴出的陶器碎片顯示，可能建於東周時期。遲至 1990 年代，部分的城垣還清晰可見，<sup>10</sup>並發現戰國時期的水井。<sup>11</sup>隨著快速的都市化，今日我們已難清楚掌握這座古城的具體位置。據南陽市文物考古所所長柴中慶表示，古城址座落於白河北岸，大致範圍北至天山路，南抵中洲路，東起明山路，西迄人民路，<sup>12</sup>長約 3 公里，寬約 2 公里。筆者認為，這座周代城址興建於此，正是為了控制這個聯繫古代中國北方與南方極為關鍵的戰略據點。

引人注目的是，南陽歷年來正式公布的周代遺址，均分佈於城址周遭，

10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頁 31；王建中，〈南陽宛城建置考〉，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四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 351-354。

11 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陽市宛城遺址戰國水井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03 年第 3 期，頁 12-14、40。

12 以上資料為 2009 年 4 月 10 日筆者拜訪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時，由柴中慶所長告知。感謝柴先生提供相關資訊。

除十里廟位於城址東北方約 3.5 公里處外，餘者相對集中於城址的東部與西部，尤以西部較多（圖三十二）：

- (一) 北郊遺址，位於城址東側約 1 公里處，考古工作者認為是 1 座破壞嚴重的墓葬，出土一批青銅器，包括容器與車馬器，屬西周晚期。其中的鼎、簋均有銘文，上帶「仲禹父」、「仲禹父宰南申」、「南申白大宰仲禹父」等字樣。據此，以及南陽其它出土帶有「申」字的銅器（詳後），學者大多認為南陽即西周晚期以降申國的所在地。<sup>13</sup>
- (二) 萬家園墓地，亦位於城址東側，其與北郊遺址應屬於同一塊墓地，<sup>14</sup>共發現 247 座西周至明清時期的墓葬，目前僅發表 M202 及 M181 的相關資料。M202 屬西周晚期，隨葬青銅兵器、車馬器與玉器。其中的 1 件銅戈帶有「輔白乍兵戈」銘文，報告認為「輔」即「甫」，亦即文獻中的「呂」，可能與西周晚期分封至南陽盆地的呂國有關；徐少華則持不同意見，認為「輔」與「呂」為不同國族，並指出 M202 為春秋早期的申國墓葬。<sup>15</sup>儘管該墓國屬仍有爭議，然而 M202 出土甚為特殊的玉覆面。<sup>16</sup>目前，發現玉覆面的西周墓葬，均為身分甚高的貴族墓，<sup>17</sup>相對於此，萬家園 M202 的不見任何青銅容器，規格較低，出土玉覆面的況狀便十分特殊。至於 M181 屬春秋中期，出土的銅器兼具中原與楚文化因素。<sup>18</sup>
- (三) 西關墓地，位於城址西側約 1 公里處的臺地上，因該臺地面積

13 崔慶明，〈南陽市北郊出土一批申國青銅器〉，《中原文物》1984 年第 4 期，頁 13-16；李學勤，〈論仲禹父簋與申國〉，《中原文物》1984 年第 4 期，頁 31-32、39；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頁 29-34。

14 北郊遺址發現於 1981 年，原始報告上僅指出該遺址是「南陽市郊委磚瓦場的同志在取土時，挖出一批青銅器，……墓葬西據古宛城東北角約 1300 米，……」，但具體位置不明。2009 年 4 月 11 日，筆者有幸至南陽市博物館拜訪尹俊敏先生，尹先生提及，該遺址即位於今日獨山大道與光武東路交會處附近，與 2005 年發掘的萬家園墓地位置相近，因此可能這兩處遺址原本屬於同一塊墓地。感謝尹俊敏先生提供相關資訊。

15 徐少華，〈南陽新出「輔伯作兵戈」的年代和族屬〉，《考古》2009 年第 8 期，頁 79-83。

16 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陽市萬家園 M202 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07 年第 5 期，頁 8-13、33。

17 孫慶偉，〈周代用玉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236-245。

18 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萬家園 M181 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09 年第 1 期，頁 4-11。

約有五百四十畝地，故當地原稱為「五頃四」。<sup>19</sup>在這座臺地的範圍內，先後發現許多周代墓葬。1975年，在臺地北側的西關煤場發掘出1座不晚於春秋中期的墓葬，據銅器銘文，學者認為墓主為「申公彭字」。<sup>20</sup>在煤場南側約100公尺處，發現墓主為「申公無所」的物資城M1。<sup>21</sup>在物資城M1南方50公尺處，則發現「彭子壽」墓；南方偏西另出土一批春秋晚期與戰國中晚期的墓葬，其中M38與M1屬春秋晚期，前者較早，墓主為「彭子射」，後者較晚，墓主為「彭啟」。就整體墓地而論，北邊時代較早，南邊較晚。學者根據以上材料推斷，這裡應是春秋時期「楚國彭氏的家族墓地」。<sup>22</sup>此外，在這片墓地的東部另發現一批周代墓葬，目前僅發表M1、M22、M40的材料，均為春秋晚期隨葬青銅器的墓葬，其西側各有1座車馬坑；<sup>23</sup>附近的汽車發動機廠亦曾出土數批青銅器，其中又以帶有楚平王名字「棄疾」的銅簠最引人關注。<sup>24</sup>

#### (四) 五文化儲運站墓地，位於西關墓地北側，發現戰國中期墓葬1座，隨葬施有朱彩的陶容器。<sup>25</sup>

- 
- 19 南陽市文物工作隊，〈南陽市西關三座春秋楚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頁107；南陽市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南陽市煙草專賣局春秋、西漢墓葬的發掘〉，《華夏考古》1999年第3期，頁46；董全生、李長周，〈南陽市物資城一號墓及其相關問題〉，《中原文物》2004年第2期，頁47。
- 20 王儒林、崔慶明，〈南陽市西關出土一批春秋青銅器〉，《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頁39-41；何浩，《楚滅國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1989），頁208；尹俊敏，〈南陽出土的彭伯壺〉，《文物》1997年第12期，頁58-60；〈〈南陽市西關出土一批春秋青銅器〉補記〉，《華夏考古》1993年第3期，頁43-45、58。
- 21 董全生、李長周，〈南陽市物資城一號墓及其相關問題〉，《中原文物》2004年第2期，頁46-48；林麗霞、王鳳劍，〈南陽市近年出土的四件春秋有銘銅器〉，《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頁9；柴中慶、喬保同、王鳳劍，〈河南南陽楚彭氏墓地〉，收入國家文物局主編，《2008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82。
- 22 柴中慶、喬保同、王鳳劍，〈河南南陽楚彭氏墓地〉，收入國家文物局主編，《2008中國重要考古發現》，頁82-85。此外，在屬於這個地區範圍內的煙草專賣局，亦曾發現1座春秋晚期的銅器墓葬。南陽市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南陽市煙草專賣局春秋、西漢墓葬的發掘〉，《華夏考古》1999年第3期，頁46-47、52。
- 23 南陽市文物工作隊，〈南陽市西關三座春秋楚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頁107-113。
- 24 徐俊英，〈南陽徵集「楚子棄疾」銅簠〉，《中國文物報》1989年5月26日；裴明相，〈「棄疾簠」與「析鼎」釋略〉，《中原文物》1989年第4期，頁1-2；董全生、李長周，〈南陽市物資城一號墓及其相關問題〉，《中原文物》2004年第2期，頁47。
- 25 南陽市文物工作隊，〈河南南陽五文化儲運站戰國墓〉，《江漢考古》1996年第3期，頁24-26。

(五) 麒麟崗墓地，位於城址西側約 2.8 公里處，發現 1 座「甲」字形墓 M1，屬戰國中期晚段，雖然遭盜掘，仍出土陶升鼎與玉璧等隨葬品，並帶有 1 座車馬坑。<sup>26</sup>

(六) 彭營墓地，位於城址西南方約 3 公里處，發現 1 座戰國中期墓葬，出土銅、陶、玉、鐵、漆等質材的隨葬品。<sup>27</sup>

以上的材料顯示，南陽的周代遺址多為墓葬，並且集中分佈於「宛城」城址的東、西兩側，城東的墓地似乎較早，可上推至西周晚期；城西則偏晚，至遲不晚於春秋中期。墓葬隨葬的青銅器，以帶有「彭」字銘文者佔多數，而且僅西關墓地，目前便至少發現 5 座春秋時期的「彭」墓。這個現象有力地支持當地為「彭氏家族墓地」的看法。其次，由於部分「彭」墓墓主又稱「申公」，同時於北郊遺址另出土帶有「仲禹父宰南申」、「南申白大宰仲禹父」等銘文的銅器，因此間接證實南陽是西周晚期以來申國的所在地。必須特別指出的是，南陽博物館的尹俊敏曾向筆者表示，在「五頃四」臺地上，亦即西關墓地，在西部彭氏墓地與東部的「楚墓」之間，不僅兩者在空間上相互區隔，而且墓向不一，彭氏墓地多為南北向，東部「楚墓」則為東西向。<sup>28</sup>儘管目前關於西關墓地發表的材料仍相當零散，但大抵與尹氏的觀察相符。期待相關的考古材料能儘快公布，以利進一步的討論。

## 二、淅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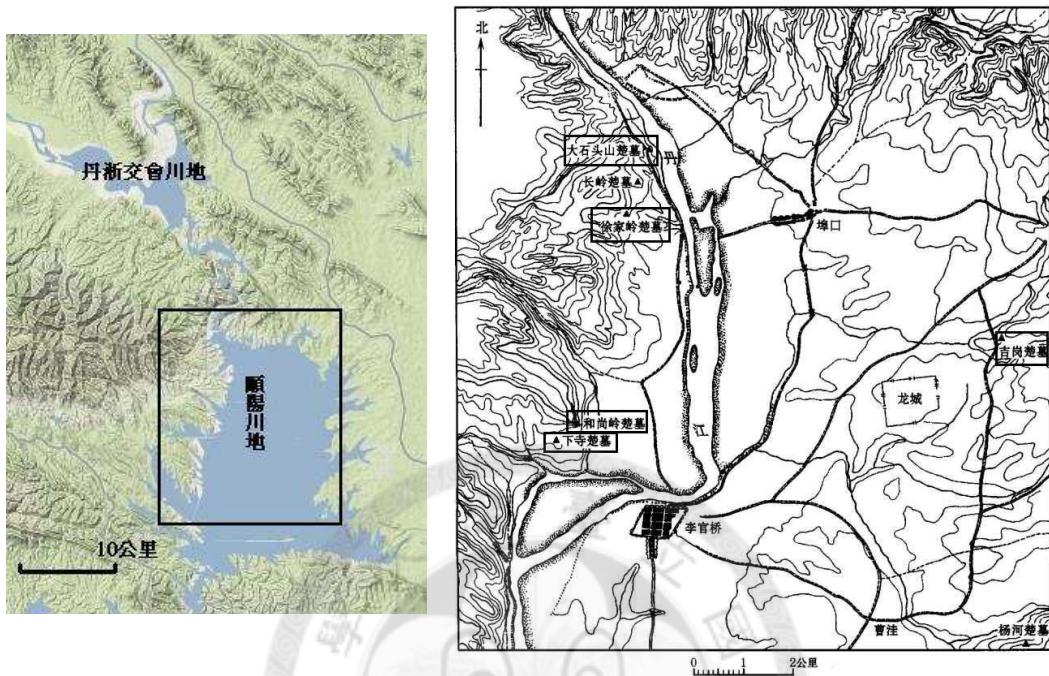
淅川地處南陽盆地的西北部，全境位於秦嶺的東南餘脈之上，地形以淺山丘陵為主。丹江是漢水最重要的支流，自秦嶺南坡向東南流經淅川；而丹江的分支淅水，則與丹江在淅川的中部交會。這兩條河共同形成的谷地，便為淅川最主要的平原地帶。一是丹江與淅水交會的川地，另一處則為丹江下游的沖積平原，亦即順陽川地。前者居北，平面呈「V」字形，佔地較小，為群山包圍；後者居南，大致為長方形，幅員較廣，北、西、

26 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建七局南陽設備公司材料庫 M1 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07 年第 5 期，頁 14-18。

27 南陽市文物工作隊，〈南陽市彭營磚瓦廠戰國楚墓〉，《中原文物》1994 年第 1 期，頁 91-95。

28 感謝南陽市博物館尹俊敏先生提供相關資訊。

南三面為山地，東面則為丘陵（圖三十三左）。1958 年，中國政府利用當地的天然地勢興建丹江水庫，水庫建成後，這兩處河谷平原均沈入水底。<sup>29</sup>



圖三十三 左：丹浙交會川地與順陽川地位置圖 右：淅川周代遺址分佈圖  
(圖右採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編著，《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頁 3，圖 2)

如第三章所言，淅川自新石器時代起，便已是人類活動的重要區域，前述的下王崗、黃棟樹、下集與雙河鎮遺址，<sup>30</sup>均分布於丹浙交會川地周邊的高地。相對於新石器時代，經正式發表的周代考古遺址，除了出土西周早期遺存的下王崗遺址、<sup>31</sup>出土西周中晚期遺存的雙河鎮遺址，<sup>32</sup>以及發

2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 1。

3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原長辦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集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中原文物》1989 年第 1 期，頁 1-19；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河南淅川黃棟樹遺址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0 年第 3 期，頁 1-69；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淅川雙河鎮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2 年增刊，頁 13-22、38。

31 下王崗遺址發現的遺跡包括房址與墓葬，遺物則有陶器與石器，此外，另出土少量的青銅兵器。這是目前淅川地區唯一正式公佈的西周遺存。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頁 307-331。

32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淅川雙河鎮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2 年增刊，頁 13-22、38。

現春秋中期至戰國中期小型墓葬的毛坪遺址外，<sup>33</sup>餘者均分布於順陽川地周邊的丘陵與山地上。

自淅川沿【路徑 6】(圖七)，即溯丹江而上，越過秦嶺，便可到達關中盆地。換言之，淅川是連接南陽盆地與關中的交通樞紐，地理位置重要。1978 年，趁著丹江水庫水位下降，在原順陽川地的中央，考古工作者發現一座先秦時期的城址——龍城。該城址西、北兩邊各長 900 公尺，東、南兩邊各長 800，城牆殘厚 8 公尺。由於夯土內發現春秋時期的陶器，因此這座城址可能始建於春秋時期或稍晚。<sup>34</sup>龍城城址修築於順陽川地中央，應是為了控制溝通關中盆地與南陽盆地的交通通道，也就是丹江谷地。

若以龍城城址為中心，四周的山地丘陵，則分布著數群東周墓地（圖三十三右）：

(一) 下寺墓地，位於龍城西側的龍山山腳下，距城址約 6 公里，由北到南，共發現春秋中、晚期的大、中型墓葬 9 座，可再細分為 5 組，每組各附有 1 座車馬坑。雖然部分墓葬被盜，仍出土大量的青銅器與玉器。<sup>35</sup>學者根據下寺出土青銅器的銘文，認為這個地區應是春秋中、晚期與楚國王室關係深厚的鄖氏家族墓地，<sup>36</sup>屬於「楚墓」的範疇。必須說明的是，下寺墓地是目前春秋中、晚期發現等級最高的「楚墓」，隨葬的青銅器不僅質量精美，而且年代脈絡較為清晰，學者多以這批青銅器作為

33 淅川縣博物館、南陽地區文物隊，〈淅川縣毛坪楚墓發掘報告〉，《中原文物》1982 年第 1 期，頁 42-46。

34 張劍，〈淅川丹江水庫區的文物調查與發掘〉，《中原文物》1979 年第 3 期，頁 76。

3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36 關於下寺墓地的墓主身分，尤其是其中 M2 的墓主是誰，曾經引起學界廣泛的討論。由於 M2 中分別出土了帶有「王子午」以及「楚叔之孫嫗」的銘文，因此一派認為墓主為楚莊王的兒子公子午(王子午)，即令尹子庚，另一派則主張為薳子馮(楚叔之孫嫗)。筆者贊成後說。河南省丹江庫區文物發掘隊，〈河南省淅川縣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 年第 10 期，頁 13-2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頁 320-324；李零，〈「楚叔之孫嫗」究竟是誰〉，《中原文物》1981 年第 4 期，頁 36-37；陳偉，〈淅川下寺二號墓主及其相關問題〉，《江漢考古》1983 年第 1 期，頁 32-33、37；張亞初，〈淅川下寺二號墓年代與一號墓編鐘的名稱問題〉，《文物》1985 年第 4 期，頁 54-58；張劍，〈淅川下寺楚墓的時代及其墓主〉，《中原文物》1992 年第 2 期，頁 51-55；李零，〈再論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 年第 1 期，頁 47-60。

斷定「楚系」銅器年代的標準器。<sup>37</sup>

(二) 和尚嶺墓地，位於下寺墓地東北 400 公尺處，發現 2 座春秋晚期帶有銅器的墓葬，報告以銅器銘文判定 M1 的墓主為楚莊王（？-591 BC）時期的箴尹克黃，M2 的墓主則為克黃夫人。<sup>38</sup>

(三) 徐家嶺墓地，位於和尚嶺北部 3 公里處，共發現 11 座墓葬，年代上起春秋晚期，下至戰國中期。儘管被盜嚴重，仍出土大量青銅器與玉器。<sup>39</sup>根據銅器銘文，這裡應是下寺墓地以外另一處鄒氏家族墓地。

(四) 大石頭山墓地，南距徐家嶺約兩公里，可能內含上百座墓葬，但正式僅發掘 15 座，全為隨葬陶器的小墓，時代為春秋戰國之際。<sup>40</sup>

(五) 吉崗墓地，位於龍城城址東側的白崗嶺崗脊上，共發現 75 座戰國中期墓葬，呈東西向一字排開，均是以陶器為主要隨葬品的小型墓。<sup>41</sup>

除上述遺址外，順陽川地的南部另有老龍崗墓地與太子山大墓，東南部則有戰國時期的楊河大墓，<sup>42</sup>但由於相關資料尚未發表，因此詳細情況不得而知。

綜觀上述分析，我們對淅川的地理環境與考古遺址的關係，可以得到以下初步的認識。首先，新石器時代與周代遺址分佈的主要區域有別，前者分佈於北部丹淅交會川地的邊緣高地，後者則集中於南部順陽川地的周遭地區，筆者推測，應與順陽川地的面積較廣，能夠提供更豐富的糧食資源給扼守當地的軍民有關。其次，除下王崗與雙河鎮遺址屬西周早期與中

37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 41-82；李零，〈論楚國銅器的類型〉，收入氏著，《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 271-333。

3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編著，《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頁 5-121。

3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編著，《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頁 122-353；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調文物保護辦公室、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淅川縣徐家嶺 11 號楚墓〉，《考古》2008 年第 5 期，頁 41-48。

4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河南淅川大石頭山楚墓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3 年第 3 期，頁 11-19。

4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南陽地區文物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河南淅川吉崗楚墓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3 年第 3 期，頁 20-27。

4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編著，《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頁 2。

晚期外，其餘遺址均為墓葬，年代偏晚，皆為春秋中期至戰國中期，亦即文獻記載楚國控制南陽盆地的時期，而且大多分佈於龍城城址的鄰近山地，這樣的現象顯示楚國、龍城與墓葬間，存在整體性的關連。最後，本地大、中型墓葬出土的青銅器，尤其在春秋中、晚期階段，不論是數量與品質，在「楚系」青銅器中極具典範，同時，銅器的組合與配置、紋飾與藝術風格，甚至背後可能蘊含的用器制度，堪稱目前討論「楚系」青銅器的標準器，反映楚國統治階層對物質文化的品味與喜好。然而另一方面，這批重要的材料，又與當地隨葬陶器的小型墓葬形成鮮明的對照，兩者的關係值得進一步探討。

### 三、襄樊

襄樊地處南陽盆地南方漢水沿岸的沖積平原上，原是兩座分立的城市，漢水南側為襄陽，北側為樊城，今日則合稱襄樊。由此地順漢水谷地而下，即【路徑 4】，可直通江漢平原西部，東周楚國的都城郢都便位於此地。<sup>43</sup>就地理位置而論，襄樊是漢西地區通向南陽盆地、亦即北上中原的第一道門戶；反過來說，中原勢力只要通過襄樊，便可長驅直入漢西地區。因此，在中國歷史上南北分立時期，襄樊每每是兵家必爭之地，而這也解釋為何至遲自漢代以來，襄陽與樊城就已隔著漢水相互對峙。<sup>44</sup>

自新石器時代起，襄樊已有人類居住，然而正式發表的考古材料甚少，僅有城區北方的牌坊崗遺址，以及城區南方約 30 公里處的三步兩道橋遺址。<sup>45</sup>在漢水南方的王樹崗遺址，則曾出土少量的二里頭文化遺存。<sup>46</sup>相對於早期考古材料有限的情況，襄樊公布的周代考古發現十分豐富，更是目前南陽盆地內出土周代遺存最多的區域（圖三十四左）。在城區北方的襄北崗地，曾發現小馬家與南楊家遺址，前者出土襄樊最早的周代遺存，屬西

43 關於東周楚國郢都地望的相關討論，見本章註 193。

44 王先福，〈古代襄樊城市變遷進程中的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 25 卷第 1 輯（2010），頁 60-70。

45 襄樊市考古隊，〈襄樊市牌坊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7 年第 4 期，頁 3-11；湖北省博物館，〈襄陽三步兩道橋遺址調查〉，《江漢考古》1984 年第 2 期，頁 17-19。

46 襄石復線襄樊考古隊，〈湖北襄陽法龍王樹崗遺址二里頭文化灰坑清理簡報〉，《江漢考古》2002 年第 4 期，頁 44-50。

周早、中期，後者則發現春秋晚期遺存。<sup>47</sup>漢水以南則有真武山、許指巷、運動路與鄭家山四處遺址，其中又以真武山最為重要，是一處起自西周中期、終於戰國中期的聚落遺址，也是本地時間跨度最長的考古遺址。<sup>48</sup>另外，在襄樊市區東方的漢水沖積平原上發現屬戰國時期的洪山頭遺址，<sup>49</sup>而鄧灣與付崗遺址則在襄樊南方 20 餘公里處，出土東周時期的考古遺存。<sup>50</sup>



圖三十四 襄樊周代遺址分佈圖（左：全景圖 右：鄧城周遭局部圖）

除上述遺址外，在漢水北岸約 6 公里的地面上，尚存 1 座長方形的古代城址，南北長約 800 公尺，東西寬約 700 公尺，牆體厚約 20 公尺，殘高 2 至 5 公尺，四面均有城門，城牆外設有護城河（圖三十五）。雖然城牆未經正式剖面，但依據城內採集的陶器殘片研判，城址使用年代上起周代，下至南北朝。<sup>51</sup>在城址周圍，曾出土不少帶有「鄧公」銘文的青銅器，再

47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陽區文物管理處，〈襄陽黃集小馬家遺址發掘簡報〉、〈襄陽伙牌南楊家遺址灰坑清理簡報〉，均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頁 102-126、132-137。

4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遺址〉，《考古學集刊》第 9 集（1995），頁 138-161；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陽城內遺址發掘報告〉，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 152-19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鄭家山戰國秦漢墓〉，《考古學報》1999 年第 3 期，頁 367-392。

49 襄樊市考古隊、襄樊縣文物管理處，〈襄陽東津洪山頭遺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99 年第 4 期，頁 24-40。

50 焦枝復線襄樊考古隊，〈襄陽鄧灣遺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97 年第 4 期，頁 1-10；襄石復線襄樊考古隊，〈湖北襄陽法龍付崗墓地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2 年第 4 期，頁 51-56。

51 襄樊市文物普查辦公室、襄樊市博物館，《襄樊市文物史蹟普查實錄》（北京：今日中

者，根據傳世文獻記載，當地為周代鄧國的領土，因此學者大多認為這座城址即周代的「鄧城」。<sup>52</sup>此外，周代遺址密集分布於城址的北、東兩側，至少包括 3 處聚落與 10 處墓地，並已發掘約 2000 座墓葬。<sup>53</sup>儘管城址及其鄰近地區未能進行拉網式的聚落考古調查，但上述發表的考古材料，使我們已能初步分析當地的周代聚落佈局。



圖三十五 鄧城遺址衛星空照圖（採自 Google Map）

以鄧城城址為中心，周代的聚落與墓葬遺址廣布於半徑 4 公里內的低崗與平原之上（圖三十四右）：

（一）黃家村遺址，位於鄧城東城牆外的平原上，東西長約 1500 公尺，南北寬約 300 公尺，發現的遺跡均為灰坑，屬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之際，是城址周圍年代較早的村落遺址。<sup>54</sup>在其中 1 座灰坑內，出土鑄造青銅箭簇與容器的陶模與陶範，顯示當地可能存在鑄銅作坊，<sup>55</sup>也是目前南陽盆地少數確定發現鑄

國出版社，1995），頁 2。

52 石泉，〈古鄧國、鄧縣考〉，《江漢論壇》1980 年第 3 期，頁 91；徐少華，〈鄧國銅器及其歷史地理與文化〉，《華夏考古》1996 年第 1 期，頁 58-63、41。

53 王先福，〈古代襄樊城市變遷進程中的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 25 卷第 1 輯，頁 60-70。

54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鄧城黃家村遺址 2005 年西區周代灰坑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08 年第 3 期，頁 4-13；〈湖北襄樊市黃家村遺址周代灰坑的清理〉，《考古》2009 年第 11 期，頁 26-37。

55 王先福，〈古代襄樊城市變遷進程中的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 25 卷第 1 輯，頁 60-70。2009 年 4 月 16 日，筆者至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參訪，在王先福先

銅作坊的遺址。

- (二) 韓崗遺址，位於鄧城北城牆護城河外，東西長約 1500 公尺，南北寬約 850 公尺，發現灰坑、水井等遺跡，遺物以陶器為主，最早的遺存屬西周晚期，其後自春秋中期後持續發展，下迄西漢早期。<sup>56</sup>與黃家村相同，韓崗遺址亦是鄧城外的村落，但年代略晚。在韓崗遺址東部的解放店，亦出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遺存。<sup>57</sup>
- (三) 賈莊遺址，位於鄧城北方約 1 公里處，韓崗遺址在其西南方，發現春秋中期與戰國晚期墓葬各 1 座。前者 M2 為陶器墓；後者 M1 則隨葬青銅容器、兵器與漆器，顯示墓主有一定身分。<sup>58</sup>此外，尚發現 5 口戰國中晚期的水井。<sup>59</sup>
- (四) 卞營墓地，位於鄧城的東北方，韓崗與賈莊遺址在其西側，曾發掘出 4 座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的墓葬，隨葬品多為陶器。<sup>60</sup>
- (五) 嶺子墓地，位於卞營墓地東側約 500 公尺處的鄧城東側，發現數座隨葬陶器的秦代墓葬。<sup>61</sup>
- (六) 余崗墓地，位於鄧城東部約 3 公里的低崗上，西距鄧城約 1.5 公里，東西長約 1000 公尺，南北寬約 500 公尺，平面呈凹字形。該墓地曾出土春秋至漢代的墓葬，<sup>62</sup>但僅發表戰國晚期以後的資料。令人矚目的是，這批已公布的墓葬，期年代雖然已

---

生的同意下，目驗黃家村出土鑄造青銅器的陶模、陶範殘件。感謝王先生提供相關協助。

5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陽鄧城韓崗遺址發掘報告〉，《江漢考古》2002 年第 2 期，頁 14-49；襄樊市博物館，〈湖北省襄樊市鄧城遺址試掘簡報〉，《江漢考古》2004 年第 2 期，頁 19-26。

57 襄樊市博物館，〈湖北省襄樊市鄧城遺址試掘簡報〉，《江漢考古》2004 年第 2 期，頁 19-26。

58 王先福、王志剛、范文強，〈湖北襄樊市賈莊發現東周墓〉，《考古》2005 年第 1 期，頁 92-95。

59 襄樊市考古隊，〈襄樊市鄧城古井清理簡報〉，《江漢考古》1999 年第 4 期，頁 19-23。

60 襄樊市考古隊，〈襄樊團山卞營墓地第二次發掘〉，《江漢考古》2000 年第 2 期，頁 31-45、55。

61 襄樊市博物館，〈襄樊余崗戰國秦漢墓第二次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3 年第 2 期，頁 3-15。

62 王先福，〈古代襄樊城市變遷進程中的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 25 卷第 1 輯，頁 60-70；〈襄樊余崗墓地楚式青銅禮器分期研究〉(未刊稿)。感謝王先福先生提供文稿。

進入秦國統治時期，但隨葬陶器仍具有濃厚的楚文化因素。<sup>63</sup>

- (七) 沈崗墓地，位於余崗墓地南邊一條東北至西南走向的低崗上，西距鄧城約 1.5 公里，黃家村遺址在該墓地西側。歷年來雖發現西周、春秋、戰國至隋唐時期的墓葬 900 餘座，然而，目前僅公布 1 座西周中期隨葬陶、玉器的墓葬 M694。<sup>64</sup>
- (八) 彭崗遺址，位於鄧城東部一條南北向的低崗南端，該崗地長約 3 公里，寬約 1.5 公里，前述的余崗與沈崗墓地則夾於這條崗地與鄧城之間。該遺址共發現東周墓葬 90 餘座，起自春秋中期，終至戰國晚期，隨葬品幾乎均為陶器。除墓葬外，另有灰坑與灰溝等遺跡。<sup>65</sup>
- (九) 團山墓地，位於鄧城東北約 3 公里處，與前述的彭崗遺址同在一條南北向的低崗上，但在崗地北端。該墓地共發掘 17 座墓葬，年代分屬春秋晚期與戰國早、中、晚期四段，<sup>66</sup>而其中的 M1 格外引人關注。M1 為一槨二棺墓，應為夫妻合葬，同時出土帶有「鄭臧公之孫」銘文的銅鼎與銅尊缶。<sup>67</sup>王先福推測，團山墓地可能是鄧城城外「外國人」的墓葬區。<sup>68</sup>
- (十) 山灣墓地，位於鄧城北方約 3 公里土崗上。該土崗平面略呈圓形，直徑約 600 公尺，坡度平緩。經正式發掘的墓葬共有 34 座，年代屬春秋中期至戰國晚期，隨葬品以青銅器與陶器為

63 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陽余崗戰國墓發掘簡報〉，《考古》1992 年第 9 期，頁 795-802；〈湖北襄樊市余崗戰國至東漢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6 年第 3 期，頁 339-357；〈襄樊余崗戰國秦漢墓第二次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3 年第 2 期，頁 3-15。

64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沈崗西周墓發掘簡報〉，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 127-131；王先福，〈古代襄樊城市變遷進程中的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 25 卷第 1 輯，頁 60-70。

6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市彭崗東周墓群第三次發掘〉，《考古》1997 年第 8 期，頁 61-75；襄樊市文物管理處、襄樊市博物館，〈襄樊彭崗東周墓地第一次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99 年第 4 期，頁 7-18；襄樊市考古隊，〈襄樊市彭崗東周遺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0 年第 2 期，頁 1-15、23；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彭崗墓地第六次發掘簡報〉，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 138-151。

66 原始報告認為團山墓地除了以上四期外，還可上推至春秋中期，王先福則認為報告分期有誤，應不包含春秋中期。本文則採王氏之說。王先福，〈襄北楚陶器墓綜述〉，《江漢考古》2000 年第 2 期，頁 83-84。

67 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陽團山東周墓〉，《考古》1991 年第 9 期，頁 781-802。

68 感謝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先福先生提供相關意見。

主。此外，在山灣地區還採集到許多東周銅器。當地出土的青銅器，部分帶有諸如「鄧公乘」、「鄧尹侯」、「楚子」、「子季贏青」、「上都府」等銘文。學者認為此地當為楚國貴族墓地。<sup>69</sup>

(十一) 蔡坡墓地，位於鄧城北方約 3.5 公里的低矮山崗上，東與山灣墓地隔溝相望，兩者距離約有 1 公里。該墓地發現 20 座戰國早期至晚期的墓葬，相對於山灣墓地而言，時代偏晚。儘管如此，蔡坡墓地出土大量的青銅器，包括兩把分別帶有「徐王義楚元子」與「吳王夫差」銘文的銅劍，隨葬陶器相對較少。根據墓葬形制與隨葬品內容，學者認為此地為戰國時期鄧城城外的貴族墓地。<sup>70</sup>

(十二) 王坡墓地，位於鄧城正北方 4 公里的丘陵上，山灣與蔡坡墓地分布於這條丘陵的東南部。王坡墓地最南端處發現 4 座春秋早期墓葬，另有 39 座戰國晚期墓葬。前者隨葬較多的青銅容器，M1 的銅鼎與銅戈分別帶有「鄧公孫無忌」與「鄧子中無忌」銘文，報告因此推測這群墓葬為春秋早期的鄧國貴族墓；後者雖已進入秦國統治時期，但墓葬形制與隨葬器物，卻仍繼續保留受楚文化因素影響的本地特色。<sup>71</sup>

由上述資料顯示，襄樊地區周代考古遺址的數量十分龐大，僅鄧城周遭經正式報導的遺址便有 10 餘處。筆者認為，這種在單一地區密集發現周代遺址的現象，與襄樊重要的地理位置，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另一方面，透過這些材料，我們可以大致明瞭鄧城與周邊遺址的佈局。以鄧城為中心

69 陳振裕、楊權喜，〈襄陽山灣五座楚墓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江漢考古》1982 年第 1 期，頁 19-24、71；楊權喜，〈襄陽山灣出土的鄀國和鄧國銅器〉，《江漢考古》1983 年第 1 期，頁 51-53；湖北省博物館，〈襄陽山灣東周墓葬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3 年第 2 期，頁 1-35；湖北省博物館，〈襄陽山灣出土的東周青銅器〉，《江漢考古》1988 年第 1 期，頁 19-22；王少泉，〈襄陽市博物館收藏的襄陽山灣銅器〉，《江漢考古》1988 年第 3 期，頁 62、96-97。

70 襄陽首屆亦工亦農考古訓練班，〈襄陽蔡坡 12 號墓出土吳王夫差劍等文物〉，《文物》1976 年第 11 期，頁 65-71；沈湘芳，〈襄陽出土徐王義楚元子劍〉，《江漢考古》1982 年第 1 期，頁 45；湖北省博物館，〈襄陽蔡坡戰國墓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5 年第 1 期，頁 1-37；襄樊市考古隊，〈湖北襄樊市蔡坡戰國墓第二次發掘〉，《考古》2005 年第 11 期，頁 30-41；劉江生，〈湖北襄陽蔡坡 20 號戰國墓〉，《考古》2007 年第 7 期，頁 95-96。

7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點向東、北兩方眺望，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韓崗與黃家村等村落，其次是賈莊、嶺子、與卞營等墓地，第三層則是分布在低矮崗地上的余崗與沈崗墓地，最外圈則為分布於北側丘陵的王坡、蔡坡與山灣墓地，以及東側的團山與彭崗墓地。這種「類同心圓」的聚落分佈型態，是鄧城地區遺址佈局的基本架構。

當然，鄧城與周邊遺址的互動關係，在不同時期具備不同的特色。其一，在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即文獻所論的鄧國統治時期，鄧城由北側的韓崗與東側的黃家村，以及東南側的周家崗與南側的王家巷等村落環繞，<sup>72</sup>在黃家村還發現鑄銅遺址，而東側外圍低崗地帶的沈崗為平民墓區，北方的王坡則為貴族墓地。其二，自春秋中期至戰國中期，亦即楚國統治時期，村落分佈於韓崗與彭崗等地，城外的賈莊、卞營，以及低崗區的余崗、沈崗與彭崗則發現大批平民墓葬，春秋與戰國時期的貴族墓則分別集中於更外圍的山灣與蔡坡，其南方的團山則可能是外國貴族墓地。本階段的遺址數量大增，同時遺址的分佈範圍向外擴張，而且佈局井然有序，顯示此地已有大量定居的人民，也反映楚國對襄樊的重視。其三，戰國晚期，也就是秦國統治時期，村落僅存面積縮小的韓崗遺址，<sup>73</sup>墓葬僅零星分佈於嶺子、余崗、沈崗與王坡等地，而且數量較少、規格較低。這個時期的楚國因受秦國侵略，都城自漢西地區的郢都被迫遷至淮河上游，在此情勢下，襄樊原先重要的戰略價值不再，聚落的發展因而轉趨沒落。

最後，由於襄樊的周代考古遺址不僅類型豐富，包含城址、聚落與墓地，而且時代脈絡完整，縱貫西周、春秋與戰國時期，因此當地的考古遺存，是研究周代南陽盆地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互動關係最理想的材料。

#### 四、棗陽

棗陽位於南陽盆地的東南部，全境屬漢水流域，其支流唐白河的分支滾河，自西向東橫貫於棗陽境內，而滾河與其東側的湏水所共同沖積而成的河谷平原，即所謂的隨棗走廊。隨棗走廊夾於北側的大別山與南側的大

72 王先福，〈古代襄樊城市變遷過程的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5卷第1輯，頁60-70。

73 王先福，〈古代襄樊城市變遷過程的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5卷第1輯，頁60-70。

洪山之間，從棗陽經隨棗走廊，亦即【路徑 5】（圖七），可抵達江漢平原的東部地區，早商的黃陂盤龍城遺址便在此地。<sup>74</sup>自新石器時代起，棗陽便已是南陽盆地內人類長期活動的地區之一，第三章討論的雕龍碑遺址在棗陽的東北部，<sup>75</sup>發現石家河文化遺存的毛狗洞及周台遺址，則分別位於南部與東南部。<sup>76</sup>周代遺址則廣布棗陽境內，<sup>77</sup>正式發表的材料，除了在東北部的吉河出土 1 件西周時期銅鼎、<sup>78</sup>在西南部的毛狗洞與段營分別發現西周早期的遺存與 1 座帶有 289 件青銅器的兩周之際墓葬外，<sup>79</sup>其餘的遺址集中於棗陽的東南部。

棗陽的東南部是南陽盆地進入隨棗走廊的入口，戰略位置重要。引人注目的是，當地曾發現一座名為「忠義寨」的周代城址，長寬各約 300 公尺。<sup>80</sup>儘管考古工作者並未對城址進行正式的城牆剖面，無法確定實際的使用年代，但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座城址之所以修築於此，正是為了控制聯繫南陽盆地與漢東地區的隨棗走廊。

以忠義寨城址為中心，周邊分佈四群周代遺址（圖三十六）：

（一）周台遺址，位於城址北側約 600 公尺的緩坡上，除發現新石器時代石家河文化的遺存外，最重要的是出土了上自西周晚期、下迄戰國中期的考古遺存，包括灰坑、灰溝、房址、水井、墓葬等遺跡，以及大量以陶器為主的遺物。<sup>81</sup>筆者推測，該遺址應是忠義寨城址旁的村莊。<sup>82</sup>

7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盤龍城——1963-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7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 3。

76 襄樊市博物館，〈湖北棗陽毛狗洞遺址調查〉，《江漢考古》1988 年第 3 期，頁 10-13；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棗陽市文物考古隊，〈棗陽周台遺址發掘報告〉，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 39-46。

77 在《中國文物地圖集·湖北分冊》中，棗陽境內發現周代遺存的考古遺址近 70 處，數量相當可觀。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湖北分冊》下冊（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2），頁 113-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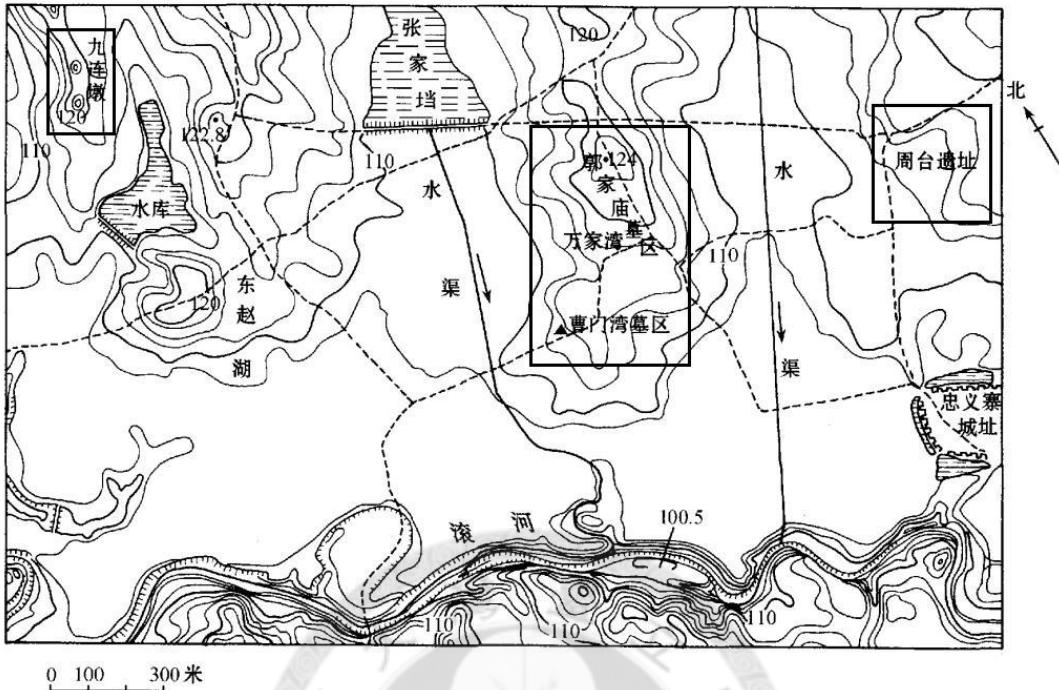
78 徐正國，〈湖北棗陽市博物館收藏的幾件青銅器〉，《文物》1994 年第 4 期，頁 77-78。

79 襄樊市博物館，〈湖北棗陽毛狗洞遺址調查〉，《江漢考古》1988 年第 3 期，頁 13-19；湖北省博物館，〈湖北棗陽縣發現曾國墓葬〉，《考古》1975 年第 4 期，頁 222-225。

80 襄樊市文物普查辦公室、襄樊市博物館，《襄樊市文物史蹟普查實錄》。

81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棗陽市文物考古隊，〈棗陽周台遺址發掘報告〉，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 46-91。

82 考古報告認為，鑑於西側的郭家廟墓地可能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曾國國君的墓地，因此忠義寨城址可能是當時曾國的王都，周台遺址則是拱衛忠義寨城址的外圍重地。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棗陽市文物考古隊，〈棗陽周台遺址發掘報告〉，收入襄樊市



圖三十六 襄陽周代遺址分佈圖

（採自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襄陽郭家廟曾國墓地》，頁5，圖2）

（二）郭家廟與曹門灣墓地，位在周台遺址西側約800公尺的南北向崗地上，郭家廟墓地在北，曹門灣墓地在南，均屬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sup>83</sup>由於郭家廟、曹門灣與前述段營遺址的墓葬，都發現帶有「曾」字銘文的青銅器，而且時代相當，因此學者認為三處遺址均屬早期曾國墓地。<sup>84</sup>

（三）九連墩墓地，位於忠義寨城址西北約4公里一條南北向的崗地上，東距郭家廟墓地約1.5公里，由於現存大中型墓塚9座，呈南北向排列於崗脊上，故稱為「九連墩」。目前僅發掘最南

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93。筆者對此說較為保留。首先，我們尚無法確定忠義寨城址的起迄年代；其次，「忠義寨城址」是否為當時曾國的都城仍有待商榷。

<sup>83</sup> 湖北省博物館，〈湖北襄陽縣發現曾國墓地〉，《考古》1975年第4期，頁222-225；田海峰，〈湖北襄陽又發現曾國銅器〉，《江漢考古》1983年第3期，頁103；襄陽縣文化館，〈襄陽東趙湖再次出土青銅器〉，《江漢考古》1984年第1期，頁106；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襄陽郭家廟曾國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sup>84</sup>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曾國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48-140；張昌平，《曾國青銅器研究》，頁42-47。

端的 M1 與 M2，出土大量的青銅器、漆木器與玉器，此外，M1 與 M2 還各帶有 1 座車馬坑。依出土文物特徵與墓葬規模，學者認為九連墩 M1、M2 為戰國中、晚期的楚國貴族墓葬。<sup>85</sup>

(四) 杜灣墓葬，位於忠義寨東南方約 6 公里的坡地上，曾經出土 8 件青銅器，其中 5 件帶有銘文，時代屬西周晚期。<sup>86</sup>

由上可知，若以忠義寨城址為中心，棗陽的周代遺址則多集中於城址周邊。北側的周台遺址則為南陽盆地內罕見的周代聚落遺址，不僅使用時間極長，而且上下連貫，毫無中斷。必須強調的是，這種在單一遺址內時代跨度自西周晚期至戰國中期的考古發現，對於我們瞭解南陽盆地地下層居民物質文化的演變，具有相當重要的研究價值。另外，在城址外圍的崗地上，分佈帶有青銅器的墓葬，除九連墩 M1、M2 屬戰國中、晚期外，大部分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儘管前後兩期間存在極大的空白，這些貴族墓葬的隨葬品仍代表當地統治者的喜好。最後，為何目前不見春秋中期至戰國早期帶有青銅器的墓葬，則是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除了前述的南陽、淅川、襄樊與棗陽外，其實在南陽盆地內，尚發現其它周代遺址，只是分布零散。舉例而言，位於盆地北部的鎮平程莊，發掘出近百座東周陶器墓葬，報告撰寫者認為該墓地春秋時期的陶器與洛陽的特徵接近，戰國時期則與楚文化類似；<sup>87</sup> 盆地中部的新野小西關，發現 2 座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隨葬銅器的墓葬；<sup>88</sup> 盆地西南方的老河口楊營屬春秋中、晚期遺址，曹營則出土 5 座戰國中、晚期墓葬；<sup>89</sup> 老河口南方的穀城新店與擂鼓台發現春秋早、中期的銅器，過山有 2 座戰國中期墓葬。<sup>90</sup>

8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棗陽市九連墩楚墓〉，《考古》2003 年第 7 期，頁 10-14；湖北省博物館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楚國貴族大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86 棗陽市博物館，〈湖北穀城、棗陽出土周代青銅器〉，《考古》1987 年第 5 期，頁 412-413、433。

87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北北調文物保護辦公室、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陽市程莊墓地東周墓葬發掘簡報〉，《考古》2008 年第 5 期，頁 21-40。

88 鄭杰祥，〈河南新野發現的曾國銅器〉，《文物》1973 年第 5 期，頁 14-20；河南省博物館、新野縣文化館，〈河南新野古墓葬清理簡報〉，收入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資料叢刊 (2)》(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頁 70-74。

8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老河口市博物館，〈湖北老河口楊營春秋遺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3 年第 3 期，頁 19-31；老河口市博物館，〈老河口市曹營戰國墓清理簡報〉，《江漢考古》1997 年第 3 期，頁 27-32。

90 陳千萬，〈穀城新店出土的春秋銅器〉，《江漢考古》1986 年第 3 期，頁 13-16；襄樊

這些遺址出土的考古材料，將於後文一併討論。另外，位於南陽南方約40公里處的龔營遺址，<sup>91</sup>是目前大陸境內少數經正式發掘且較完整的周代平民聚落，相當具有研究價值，可惜相關報告尚為正式發表。

經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周代南陽盆地的考古遺址，密集分布於南陽、淅川、襄樊與棗陽，這些地區正好是進出南陽盆地的交通門戶：南陽與淅川分別通向中原與關中，南邊的襄樊與棗陽各自連接將漢平原的西部與東部。若從宏觀的地理格局而論，它們均為聯繫中國北方黃河中游地區與南方長江中游地區的交通樞紐，戰略價值極高。在這四個地區發現的周代城址，以及城址外圍的村落與墓葬遺址，則有力地說明當時控制南陽盆地的政治集團對上述軍事據點的重視。

若純粹比較南陽盆地新石器時代至周代遺址分佈位置的變遷趨勢，我們將發現一項有趣的變化：從裴李崗文化至二里頭文化時期，亦即約自西元前5000年至前1500年左右，遺址廣布於盆地境內大小河流沿岸的臺地上，不但取水便利，兼可防範洪患，安全、舒適的生活機能是本階段人類選擇居址的首要條件；然而從晚商時期到周代結束，亦即約自西元前1250年至前221年，遺址逐漸集中於盆地北部的南陽與淅川，以及南部的襄樊與棗陽，這些地區不僅生活方便，戰略位置更加重要。遺址位置的改變，反映了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之下，人類對理想的居住環境亦有不同的要求。至少就南陽盆地的個案而論，最遲到商代晚期，政治目的是選擇居住地點的重要因素，而不僅只是單純的生活考量。這樣的現象，也為商周時期古代中國國家強烈的政治性格下一註腳。

以下，筆者將對周代南陽盆地的考古遺存展開具體討論。由於考古學工作者判斷南陽盆地考古學文化的屬性，多仰賴當地出土的陶器與青銅器，前者與後者分別反映下層庶民與上層統治者的物質文化，因此筆者主要分析的對象，亦以這兩類遺物為主。

---

市博物館，〈湖北穀城、棗陽出土周代青銅器〉，《考古》1987年第5期，頁410-13、433；陳千萬，〈湖北穀城發現的鄧國銅器及相關問題〉，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519-52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穀城縣博物館，〈穀城過山戰國西漢墓葬〉，《江漢考古》1990年第3期，頁8-16、62。

91 楊寶成、〔法〕杜德蘭（Alain Thote）著，何竟譯，〈南陽附近的龔營遺址的發掘：方法和結果〉，收入《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法國漢學》第11輯（2006），頁36-48。

## 第二節 「周文化」時期（ca. 1050-678 BC）

### ——多元的區域風格

所謂的「周文化」，有廣義與狹義之別。廣義的周文化，泛指武王克商、建立西周王朝後，「周人」統治地區的物質文化。這裡所說的周人，包括與周王同姓的姬姓貴族以及異姓的同盟諸侯。為保護關中豐鎬地區的統治中心——宗周，同時積極控制新征服的殷人故地，周王將周人分封於廣大的東土，大致包括中原與其鄰近的周邊地區，這個範圍內的考古學文化，即廣義的周文化。狹義的周文化，則特指周王朝統治中心區域——關中豐鎬地區——的考古學文化。由於考古學工作者認為該地區的周人文化傳統保存最多也最純粹，因此將其視為典型的周文化。

耐人尋味的是，各學者在使用「周文化」一詞時，往往因研究課題的不同而採取不同的定義。<sup>92</sup>但更普遍的狀況則為，只要是傳世文獻上記載周人統治的地區，當地的考古學文化就被歸為「周文化」的範疇。這種努力將文獻記載與考古材料結合的研究取徑，無疑是大陸學界普遍的態度。儘管南陽盆地本階段的考古遺存，廣義而言，確實與周文化有一定程度的關係，然而就筆者的觀察，實際情況則更加複雜。以下，筆者將就墓葬、陶器、青銅器、玉器與等四個面向，探討南陽盆地「周文化」時期物質文化的特色。

### 一、有別於豐鎬地區的墓葬結構

本階段南陽盆地發現的考古遺跡，包括房址、墓葬、車馬坑、灰坑與灰溝，其中，墓葬至少有 41 座，分見於南陽、淅川、新野、襄樊、穀城與

92 大抵而言，研究青銅器的學者多採取廣義的觀點，認為代表上層統治階層身分、品味與風尚的西周銅器，在周人控制範圍內呈現高度的一致性。在實際研究中，除關中地區，晉南晉國、豫西虢國，甚至是北京燕國等地發現的青銅器，亦屬典型的周式銅器之列，藉此以突顯西周王朝在封建體制下政治結構的穩定性。西周的陶器研究雖與銅器研究類似，多認為由周人所控制的各個區域，其陶器特徵亦屬周文化範疇，以此作為周人勢力支配當地的證據。可是，就實際研究而論，研究陶器的學者更傾向採用狹義的觀點，視關中豐鎬地區為典型的周文化，一方面指出各地陶器均具備周文化特徵，另一方面卻又嘗試尋繹不同區域的本地傳統。關於學界如何界定周文化的意涵，非本文所論重點，但這是個值得深入檢討的課題。

棗陽，<sup>93</sup>是當地數量最多的遺跡，因此可與代表典型周文化的豐鎬地區的墓葬進行比較。南陽盆地本階段的墓葬，除了在淅川下王崗發現五邊形與不規則形墓葬各 1 座外，<sup>94</sup>大多為長方形的豎穴土坑墓，墓坑常見「口大底小」或「口底同大」，至於如襄陽周台 M3「口小底大」的墓坑較為特殊，僅此 1 座。<sup>95</sup>墓底通常修飾平整，部分墓葬雖發現二層台，諸如新野的小西關、棗陽的郭家廟與周台遺址，<sup>96</sup>但數量較少。

相對之下，豐鎬地區的墓葬結構與南陽盆地差異明顯。首先，豐鎬地區「口小底大」的墓坑，在數量上明顯多於「口大底小」或「口底同大」的墓坑，前者又稱為「覆斗形墓」，是當地最具代表性的墓葬形制；其次，豐鎬地區的墓葬，絕大多數都設有二層台，未發現二層台的墓葬，則大多缺乏棺、槨等葬具。<sup>97</sup>由此可見，典型周文化的墓葬結構，亦即設有二層台的復斗形墓，罕見於「周文化」時期的南陽盆地。

93 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陽市萬家園 M202 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07 年第 5 期，頁 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頁 311-313；鄭杰祥，〈河南新野發現的曾國青銅器〉，《文物》1973 年第 5 期，頁 14；河南省博物館、新野縣文化館，〈河南新野古墓葬清理簡報〉，收入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資料叢刊（2）》，頁 7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頁 17-24；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棗陽市文物考古隊，〈棗陽周台遺址發掘報告〉，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 61-62；陳千萬，〈湖北穀城發現的鄧國銅器及相關問題〉，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 519-520；湖北省博物館，〈湖北棗陽縣發現曾國墓葬〉，《考古》1975 年第 4 期，頁 222；田海峰，〈湖北棗陽縣又發現曾國銅器〉，《江漢考古》1983 年第 3 期，頁 101；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頁 8-186；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棗陽市文物考古隊，〈棗陽周台遺址發掘報告〉，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 61-62。

9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頁 311-313。

95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棗陽市文物考古隊，〈棗陽周台遺址發掘報告〉，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 61-62。

96 鄭杰祥，〈河南新野發現的曾國青銅器〉，《文物》1973 年第 5 期，頁 14；河南省博物館、新野縣文化館，〈河南新野古墓葬清理簡報〉，收入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資料叢刊（2）》，頁 70；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頁 8-186；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棗陽市文物考古隊，〈棗陽周台遺址發掘報告〉，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 61-62。

97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澧西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頁 11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張家坡西周墓地》（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頁 36；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編著，《少陵原西周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 11-12。

## 二、地域色彩漸強的陶器

南陽盆地「周文化」時期的陶器，可分為生活陶器與隨葬陶器兩類。相當特別的是，本階段出於灰坑的生活陶器較多，而作為隨葬品者較少，與後來「楚文化」、「秦文化」時期陶器多出於墓葬的狀況明顯不同。其次，除了棗陽郭家廟墓地發現的仿銅陶鼎與陶壺外，<sup>98</sup>大部分的隨葬陶器均為生活陶器，因此兩者可以一併討論。至於已發表的材料，除淅川下王崗與雙河鎮位於盆地的西北部外，<sup>99</sup>餘者均在盆地的南部。

### (一) 融合南北又個性漸強的生活陶器

整體而論，本階段的生活陶器以紅陶為大宗；主要的器類包括鬲、甗、豆、盂、罐、盆；紋飾單純，以繩紋為主，弦紋次之。然而，陶器在不同時期，具備不同內涵。首先，陶鬲的數量最多，鬲襠為其主要特徵，西周早期盆地北部多為袋足鬲，<sup>100</sup>南部則流行錐足鬲（圖三十七左）；<sup>101</sup>西周中期後，雖然鬲襠作風繼續沿用，柱足鬲（圖三十七中）成為主流樣式<sup>102</sup>，迅速取代袋足鬲與錐足鬲。其次，陶豆為另一項流行的陶器，但西周早期少見，中期後才大量出現。<sup>103</sup>第三，盆地南部另發現一種大口、深腹、斜直壁的紅陶缸（圖三十七右），以西周早期最多，此後逐漸減少。<sup>104</sup>

如果我們將南陽盆地與關中豐鎬地區典型的周文化陶器相比，兩者雖有一定的共性，諸如流行的器類與紋飾接近，但殊性亦甚醒目。最顯著的差異莫過於陶色有別，南陽盆地多為紅陶，<sup>105</sup>豐鎬地區則盛行灰陶。<sup>106</sup>其

98 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頁 273-276。

9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淅川雙河鎮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2 年增刊，頁 13-22、38。

10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頁 326-327。

101 棗陽市博物館，〈湖北棗陽毛狗洞遺址調查〉，《江漢考古》1988 年第 3 期，頁 1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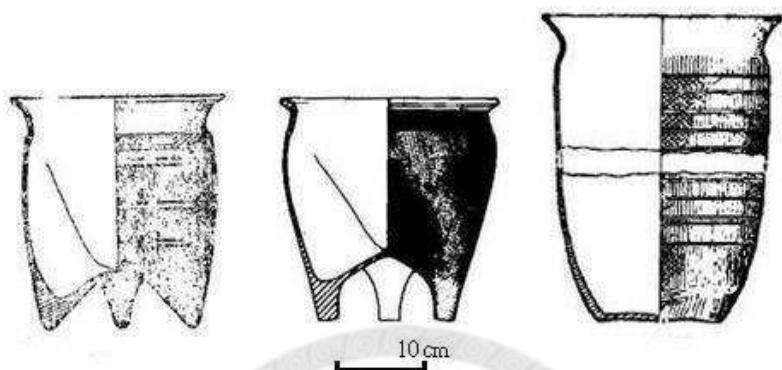
102 王先福，〈襄隨地區兩周遺址出土陶鬲分析〉，《江漢考古》2002 年第 4 期，頁 68。

10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頁 328；棗陽市博物館，〈湖北棗陽毛狗洞遺址調查〉，《江漢考古》1988 年第 3 期，頁 19。

104 棗陽市博物館，〈湖北棗陽毛狗洞遺址調查〉，《江漢考古》1988 年第 3 期，頁 15、18-2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遺址〉，《考古學集刊》第 9 集，頁 155。

105 必須說明的是，西周早期與關中較為接近的淅川下王崗，以及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襄樊韓崗、解放店與棗陽周台，這些遺址灰陶較多，紅陶較少。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頁 326；襄樊市博物館，〈湖

次，西周早期以來，陶豆一直是後者最重要的器類之一，<sup>107</sup>但如前所述，遲至西周中期，南陽盆地才出現較多的陶豆。<sup>108</sup>再者，南陽盆地罕見西周早期豐鎬地區流行的陶簋，<sup>109</sup>前者整體的器類組合亦較後者簡單。<sup>110</sup>最後，流行於盆地南部的紅陶鬲，豐鎬地區根本不見，極富地方特色。



圖三十七 爳縫錐足鬲（左）、鬻縫柱足鬲（中）、紅陶缸（右）

（圖左、右採自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陽毛狗洞遺址調查〉，《江漢考古》1988年第3期，頁17，圖7：1；頁18，圖8：5；圖中採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遺址〉，《考古學集刊》第9集，頁114，圖7：10）

除了以上差異外，南陽盆地與豐鎬地區陶鬲的關係，則是學者討論的焦點。豐鎬地區的西周陶鬲，早期以分縫袋足鬲及鬻縫錐足鬲（圖三十八左）為代表；中期以後，雖然繼續流行袋足鬲與錐足鬲，但鬻縫特徵式微；晚期之後，袋足鬲雖持續流行，但足尖呈圓形「疙瘩」（圖三十八中）；此

北省襄樊市鄧城遺址試掘簡報》，《江漢考古》2004年第2期，頁20、22；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陽市文物考古隊，〈襄陽周台遺址發掘報告〉，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65。

106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澧西發掘報告》，頁9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張家坡西周墓地》，頁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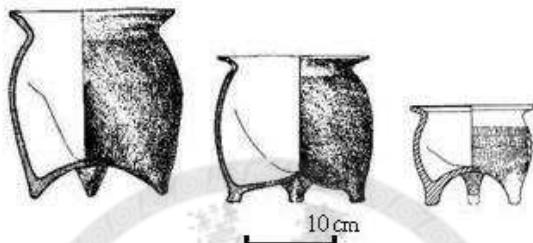
107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澧西發掘報告》，頁104、123-12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張家坡西周墓地》，頁113-115；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編著，《少陵原西周墓地》，頁29-33、764。

108 屬於西周中、晚期的襄陽小馬家遺址根本未見陶豆，相當特殊。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陽區文物管理處，〈襄陽黃集小馬家遺址發掘簡報〉，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123。

109 陶簋僅在襄陽毛狗洞、淅川雙河鎮與襄樊小馬家遺址零星出土。襄陽市博物館，〈湖北襄陽毛狗洞遺址調查〉，《江漢考古》1988年第3期，頁15；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淅川雙河鎮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2年增刊，頁20；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區文物管理處，〈襄陽黃集小馬家遺址發掘簡報〉，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108。

110 除前述兩地共同擁有的器類外，關中豐鎬地區另有較多的鼎、簋、壺、尊、盤、碗、甌、瓿等。南陽盆地雖亦偶見其它器類，但數量稀少。

外，西周的豐鎬地區還流行柱足、圓鼓腹的仿銅陶鬲（圖三十八右）。<sup>111</sup>顯而易見的是，南陽盆地與豐鎬地區典型的周文化陶鬲差異頗大。第一，南陽盆地除西周早期出現豐鎬地區長期流行的錐足鬲與袋足鬲外，柱足鬲為主流樣式；第二，瘞縫始終是南陽盆地陶鬲的特徵，然而豐鎬地區僅流行於西周早期，其後逐漸不明顯；第三，儘管豐鎬地區亦有柱足鬲，但多為仿銅式，與南陽盆地的形制不類。誠如張昌平與王先福所言，瘞縫袋足鬲是南陽盆地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最具代表性的陶器。<sup>112</sup>



圖三十八 豐鎬地區的瘞縫錐足鬲（左）、袋足瘞縫鬲（中）、柱足仿銅陶鬲（右）

（圖左、中採自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澧西發掘報告》，頁 98，圖 62：5；頁 102，圖 64：2；圖右採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張家坡西周墓地》，頁 107，圖 83：8）

南陽盆地「周文化」時期的生活陶器，雖然部分器類與裝飾風格近似於典型的周文化，但無論是陶色、組合，以及以陶鬲為代表的作器風格，均與豐鎬地區有別。值得注意的是，南陽盆地與典型周文化的相異之處，有些反而與南方的江漢平原接近，諸如兩者都以紅陶為主、紅陶缸較多、陶鬲多為柱足。學者認為，前兩項特徵源於殷商時期的本地（長江中游地區）傳統，<sup>113</sup>而柱足陶鬲則是所謂「楚式鬲」的源頭。<sup>114</sup>當然，南陽盆地

111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澧西發掘報告》，頁 95-97、101-103；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豐鎬考古隊，〈1961-62 年陝西長安澧東試掘簡報〉，《考古》1963 年第 8 期，頁 409。

112 張昌平，〈試論真武山一類遺存〉，《江漢考古》1997 年第 1 期，頁 51-52；王先福，〈襄隨地區兩周遺址出土陶鬲分析〉，《江漢考古》2002 年第 4 期，頁 68。

113 周厚強，〈孝感地區西周時期文化初析〉，《江漢考古》1985 年第 4 期，頁 71；張昌平，〈試論真武山一類遺存〉，《江漢考古》1997 年第 1 期，頁 51。張昌平還特別指出，這種紅陶缸是長江中游殷商時期考古學文化中典型器物，分佈範圍東起漢東的盤龍城遺址、西到長江三峽路加河類型文化、南至湖南的澧水流域。

114 「楚式鬲」一詞乃由大陸知名的前輩考古學家蘇秉琦所提出。蘇氏認為，所謂的「楚式鬲」，因其造型與鼎、壺相似，故又可稱為「鼎式鬲」或「壺式鬲」。這種江漢地區商周時期特有的陶鬲，以外接的柱足為主要特徵，不但與鄭州、安陽一帶為代表的「殷式鬲」，亦與關中為代表「周式鬲」顯然有別，更是楚文化的特徵因素之一。此後，許多的學者以「楚式鬲」作為探索早期楚文化的來源基礎，其中，楊權喜及楊寶成則先後指出，漢東地區（包括南陽盆地在內）的柱足鬲應即楚式鬲的早期型態，是中原商周文化與長江中游地區土著文化相互融合後的產物。另一批學者，如俞偉超及劉彬

與江漢平原亦有區別，比如後者的陶鬲多為聯縫。<sup>115</sup>

綜合言之，本階段南陽盆地的生活陶器，一方面融合了南北雙邊的文化特色，但同時又在此基礎上，試圖發展獨特的自身面貌，而且時代愈晚，個性愈強。那麼，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南陽盆地與豐鎬地區典型周文化的關係呢？丹江谷地——亦即聯繫南陽盆地與關中地區的交通通道——的西周考古遺存，則為解決這個問題帶來新的契機。

目前關於丹江谷地的考古報告甚少，張天恩在目驗當地發掘的材料後指出，丹江上游地區西周早期的陶器以灰陶為主，器類、形制、紋飾均與關中的西周文化十分類似；<sup>116</sup>進入中期後，雖然器類、紋飾與前期相近，但主流的陶色突然由灰轉紅，陶鬲的足部變為柱狀；晚期則與中期保持明顯的一致性。<sup>117</sup>因此，張氏將丹江上游地區的西周文化分為兩大階段，西周早期屬於典型的周文化系統，西周中、晚期則屬於地方特色鮮明的「過鳳樓類型」，而同時期位於南陽盆地西北部、也就是丹江下游的淅川雙河鎮遺址，其陶器特徵則與「過鳳樓類型」近似。<sup>118</sup>

若將丹江谷地的西周遺存跟南陽盆地相比，前者與豐鎬地區的共性較強，但這兩個地區生活陶器的變化趨勢，卻呈現相當程度的一致性：西周早期，丹江谷地（包括位於南陽盆地西北部、丹江下游的淅川下王崗遺址）以灰陶為主，盆地東南部的棗陽毛狗洞遺址則流行紅陶，兩派陶系一南一

徽，雖亦贊同楚式鬲乃融合中原文化與江漢土著文化的觀點，但強調該類陶鬲源於鄂西的沮漳河流域、湘西北的沅水下游及澧水流域。當然，以特定器物與特定考古學文化甚至族屬劃上等號的研究方法值得商榷，不過，外接柱足鬲作為西周中晚期以來南陽盆地至長江中游地區流行的陶鬲作風，應無太大問題。蘇秉琦，〈從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問題〉，《江漢考古》1982年第1期，頁3-8；楊權喜，〈江漢地區楚式鬲的初步分析〉，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一集）》（武漢：荊楚書社，1987），頁195-205；楊寶成，〈試論西周時期漢東地區的柱足鬲〉，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四集）》，頁460-468；俞偉超，〈先楚與三苗文化的考古學推測〉，《文物》1980年第10期，頁10-11；劉彬徽，〈長江中游地區西周時期考古研究〉，《考古學研究》5（2003），頁613-631。

115 周厚強，〈孝感地區西周時期文化初析〉，《江漢考古》1985年第4期，頁65-74；王宏，〈論江漢流域西周時期的文化分區〉，收入荊州博物館編著，《荊州博物館建館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頁180-200。

116 商縣圖書館、西安辦坡博物館、商洛地區圖書館，〈陝西商縣紫荊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3期，頁45-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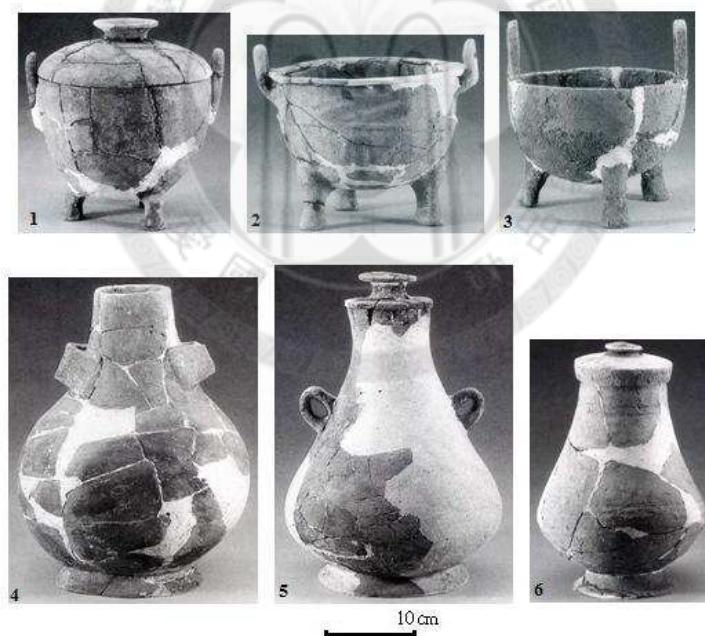
117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地區文管會，〈陝西丹鳳縣鞏家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6期，頁11-12。

118 張天恩，〈丹江上游西周遺存與早期楚文化關係試析〉，收入氏著，《周秦文化研究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166-175。

北，涇渭分明；西周中期後，南方因素向北擴張，不僅南陽盆地全境與丹江流域的陶色一致，而且陶鬲的柱足特徵相同。終西周之世，以紅陶、癟襠柱足鬲為代表的南陽盆地，雖然其文化因素並未對豐鎬地區的典型周文化帶來顯著的影響，但兩者在西周中期以後則形成平行發展之勢，前者甚至還向北傳播。筆者認為，南陽盆地「周文化」時期的生活陶器，儘管在西周早期受到典型周文化的影響，但在西周中期後，不僅已逐漸形成鮮明的自身風格，更甚者，還向北反餽新興的文化因素。

## (二) 郭家廟墓地的仿銅陶器

南陽盆地本階段作為隨葬品的陶器較少，目前僅出土於襄樊沈崗、棗陽周台遺址與棗陽郭家廟墓地。<sup>119</sup>相對於前兩處遺址，棗陽郭家廟墓地則於 17 座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中，出土 67 件陶器，較具代表性。材料雖然有限，特性卻十分鮮明。



圖三十九 棗陽郭家廟墓地仿銅陶鼎（1、2、3）與仿銅陶壺（4、5、6）

（採自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圖版 61：2、3、4；圖版 62：1、2、4）

119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棗陽市文物考古隊，〈棗陽周台遺址發掘報告〉；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沈崗西周墓發掘簡報〉，均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 46-101、127-131；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

首先，隨葬陶器以紅陶、繩紋為主的作風與生活陶器一致；其次，隨葬器類以罐為最，豆、鬲次之，孟（或盆）較少，雖然南陽盆地與西周中、晚期豐鎬地區及春秋早期洛陽地區的鬲、孟、豆、罐組合相近，但豐鎬與洛陽必備陶鬲，與南陽盆地以陶罐為主的狀況不同；<sup>120</sup>第三，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棗陽郭家廟墓地，除生活陶器外，更隨葬仿銅的陶鼎與陶壺（圖三十九），情形特殊。

郭家廟墓地共有 25 座墓葬，依隨葬品可分為銅器墓、陶器墓與無隨葬品墓三類，其中，銅器墓隨葬陶器者 8 座，陶器墓 9 座。銅器墓僅見生活陶器，然而甚有意思的是，出土仿銅陶鼎與陶壺者均為陶器墓。仿銅陶鼎共 6 件，其附耳或立耳、器身飾一周弦紋，以及鼎足近似獸蹄的作風，顯然取材自同時期的銅鼎，但整體型態罕見。陶壺亦有 6 件，細頸、圓鼓腹與圈足的特徵，與同墓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銅圓壺類似。

在郭家廟墓地之外，西周的豐鎬地區雖然亦曾發現隨葬仿銅陶器的現象，但後者的比例甚低。<sup>121</sup>進入東周以後，直到春秋中期，中原地區才再度出現隨葬仿銅陶器的墓葬，但數量仍然偏少，組合（鼎、豆、罐）、形制亦與郭家廟墓地有別。<sup>122</sup>另一方面，若與長江中游的漢西地區相比，當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以磨光黑陶器與紅陶製的生活陶器為主，前者製作精細，不見於郭家廟墓地，後者內涵雖與郭家廟類似，但隨葬更多的陶孟，<sup>123</sup>未見任何仿銅陶器。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郭家廟墓地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階段，密集出土仿銅陶器的狀況相當特別，具備強烈的本地特色。這個現象正好與前述

12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張家坡西周墓地》，頁 380；張辛，《中原地區東周陶器墓葬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頁 83。

121 印群指出，在《澧西發掘報告》中僅有張家坡 M222 隨葬仿銅陶器，包括 5 件仿銅列鼎與 1 件仿銅陶簋。查閱原始報告，M222 除鼎、簋形制仿銅外，同墓還發現仿銅的陶壺與陶盤。這種情況在發掘的 182 座西周墓中相當特殊。此外，在《張家坡西周墓地》所見的 439 件陶器中，亦發現仿銅陶器，至少包括鼎 4 件、簋 4 件、尊 2 件、壺 3 件與盤 2 件，但在整體出土器群中比例甚低。印群，《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東周墓葬制度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210；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澧西發掘報告》，頁 122-125，圖版柒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張家坡西周墓地》，頁 109、111-112、126、128。

122 印群，《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東周墓葬制度研究》，頁 209-212。

123 湖北省宜昌地區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系，《當陽趙家湖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江陵九店東周墓》（北京：科學出版社，1995），頁 12-27。

南陽盆地「周文化」時期生活陶器的發展趨勢若合符節，時代愈晚，個性愈強。當然，以上推論仍須更多的出土材料加以補充與修正。

### 三、層次豐富的青銅器群

如果陶器反映的是周代南陽盆地庶民的物質文化，那麼青銅器則代表統治階層對貴重物品的喜好與風尚。如前所述，自西周早期起，南陽盆地就已經出土大量的陶器，有別於此，青銅器則集中出現於西周晚期以後（附表三）。一般認為，南陽盆地在楚國佔領前，也就是春秋中期以前，屬於周人的統治範圍，<sup>124</sup>而當地的青銅器，無論在器類、組合、形制、紋飾與銘文風格上，均與典型的周文化無異。然而，筆者認為上述的看法過於簡單，有必要進行進一步的討論。必須說明的是，在大多學者的理解中，周代是個等級森嚴的社會，而墓葬內隨葬青銅容器的數量、組合與品質，通常能反映墓主生前的社會地位，因此，筆者以下的討論，將以青銅容器為主。

「周文化」時期的青銅器，分布於盆地北方的南陽、中部的新野，以及南部的棗陽、襄樊與穀城。<sup>125</sup>除少數的徵集品外，大多出於墓葬，其中又以棗陽郭家廟墓地的規模最大，在27座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裡，發現青銅器者共有15座（其中9座帶有青銅容器）。可惜的是，南陽盆地本階段的墓葬，大多被盜或經人為破壞，保持完整且發現青銅容器的墓葬甚寡，僅有4座。<sup>126</sup>

124 李玉潔，《楚史稿》（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頁27-32；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頁5-8；馬世之，《中原楚文化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86-87。

125 崔慶明，〈南陽市北郊出土一批申國青銅器〉，《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頁13-16；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陽市萬家園M202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07年第5期，頁8-13、33；鄭杰祥，〈河南新野發現的曾國銅器〉，《文物》1973年第5期，頁14-18；河南省博物館、新野縣文化館，〈河南新野古墓墓葬清理簡報〉，《文物資料叢刊（2）》，頁70-74；湖北省博物館，〈湖北棗陽縣發現曾國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頁222-225；田海峰，〈湖北棗陽縣又發現曾國銅器〉，《江漢考古》1983年第3期，頁101-103；徐正國，〈棗陽東趙湖再次出土青銅器〉，《江漢考古》1984年第1期，頁106；襄樊市博物館，〈湖北穀城、棗陽出土周代青銅器〉，《考古》1987年第5期，頁412-413、433；徐正國，〈湖北棗陽市博物館收藏的幾件青銅器〉，《文物》1994年第4期，頁7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編著，《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頁17-63；陳千萬，〈湖北穀城發現的鄧國銅器及相關問題〉，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519-525。張昌平在《曾國青銅器》中指出，上述有關棗陽曾國墓葬的報告內容記述有誤。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曾國青銅器》，頁49，註5。

126 包括襄陽王坡M1、M55，棗陽郭家廟M6，以及新野小西關1974年發掘的墓葬。

至於隨葬青銅容器的基本組合，則包括作為食器的鼎與簋、酒器的壺（圓壺與方壺）、水器的盤與匜，次一級的墓葬只有鼎與簋，再次一級者僅有鼎，部分墓葬另出土鬲、簠、甗、盆、觶與杯，但數量較少。引人矚目的是，南陽盆地還發現了專門作為隨葬品的青銅明器，如襄陽王坡墓地的M55。<sup>127</sup>紋飾則以竊曲紋、凸弦紋、重環紋、環帶紋、垂鱗紋、瓦紋與龍紋為主。從上述全景式的描述不難看出，本階段南陽盆地的青銅容器，似乎與典型的周文化一致。然而，兩者間仍然有所區別。

### （一）部分吸收的文化面貌

大抵而言，南陽盆地的青銅容器，的確受到周文化的影響，但前者的內涵並非與後者全然一致，呈現部分吸收的面貌。鼎、簋、壺、盤、匜是「周文化」時期南陽盆地出土最主要的器類，<sup>128</sup>與典型周文化的基本組合相同，佔當地所有隨葬青銅容器的82%。然而只要與同時期關中出土青銅器，與其它幾處代表性的墓地相比，諸如山西北趙晉侯墓地、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以及靠近盆地北方的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我們就可以發現南陽盆地的特別之處。

#### 1. 器類組合的選擇

西周時期南陽盆地墓葬所見的銅器組合，主要有鼎、簋、壺、盤、匜等器類，然而，在西周中晚期之交，銅器從器類組合到紋飾運用，均出現重要的變化，西方的藝術史家羅森(Jessica Rawson)稱為「禮制變革」(Ritual Revolution)。<sup>129</sup>首先，確立了爵位的差等乃根據鼎、簋組合的數量；其次，諸如盨、簠等新興器類的出現，酒器退出主要組合；第三，銅器主要飾以幾何紋飾；第四，成套的樂器開始出現。上述在關中地區與諸侯國之間非常重要的銅器變革，在南陽地區卻不見影響，例如前者西在周晚期可見的青銅容器，包括盨、簠、盃等器類，以及編鐘等樂器，均為後者所罕見。

12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編著，《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頁25-45。

128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1311。

129 Jessica Rawson,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Western Zhou Archaeology,” 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433-440.

最明顯的差異是隨葬的器類有別，舉其要者，包括作為食器的銅盨與水器的銅盃。目前所發現的銅盨（圖四十），始見於西周中期偏晚，流行於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基本上已經不見。<sup>130</sup>這種新興的食器，表現了鼎、簋組合之外的身份性，主要分布於關中地區與洛陽一帶，<sup>131</sup>西周重要的諸侯國，諸如晉侯墓地的 M92、M1、M2，<sup>132</sup>虢國墓地的 M2001，<sup>133</sup>以及應國墓地的 M95 均曾出土。<sup>134</sup>相對之下，南陽盆地並未出現這類銅器，反映周文化使用銅盨的新興風尚並未滲入南陽盆地。



圖四十 【伯多父盨】

（採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5·西周（1）》，圖版 80）

銅盃在西周以前已有很長的使用歷史，一般屬於酒器。<sup>135</sup>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盃作為溫水器或兼為注水器的地位已然確立，常與承水的盤共出，從其銘文與並置共出的脈絡，可知為一套水器。<sup>136</sup>而銅盃的形制可分為傳統式的三足鬲形盃（圖四十一左）與扁體圓盃（圖四十一右）兩類，後者為西周晚期特有的形制。出土銅盃的墓葬，一般而言，等級較高。晉侯墓地的 M8、M31、M63、M102，<sup>137</sup>虢國墓地的 M2001、M2012、M1052、

130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 277-280；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132-133；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頁 135-138。

131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灋西考古隊，〈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墓清理簡報〉，《考古》1965 年第 9 期，頁 447-450；陝西省博物館、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 年第 1 期，頁 31-38。；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東郊 C5M906 號西周墓〉，《考古》1995 年第 9 期，頁 788-791、801。

132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五次發掘〉，《文物》1995 年第 7 期，頁 16。

13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三門峽虢國墓（第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 48、51-55。

13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頂山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平頂山應國墓地九十五號的發掘〉，《華夏考古》1982 年第 3 期，頁 95-96。

135 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頁 241-250；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頁 297。

136 陳昭容，〈從古文字材料談古代的盥洗用具及其相關問題——自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的青銅水器自名說起〉，《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1 本第 4 分（2000），頁 857-932。

137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二次發

M1689,<sup>138</sup>與應國墓地的M1，均發現盤配盃的現象。<sup>139</sup>相對於銅盃，銅匜出現於西周晚期，並迅速取代銅盃的地位，成為與盤相配最重要的水器。<sup>140</sup>本階段的南陽盆地只發現盤配匜，未見任何銅盃，說明南陽盆地僅接受西周晚期周文化廣泛流行盤、匜配對的風尚，可能對西周中期以來流行盤配盃的水器組合不甚熟悉。



圖四十一 左：【伯庸父盃】 右：【龍紋盃】

(圖左採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5·西周(1)》，圖版115；

圖右採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三門峽虢國墓（第一卷）》，

圖版6：6)

## 2.罕見的垂腹鼎

除了器類外，南陽盆地也只部分接受周文化青銅容器的作風。以銅鼎為例，西周晚期典型的周文化銅鼎多為立耳、蹄足，依腹部形制可分為繼承自西周中期的垂腹鼎（圖四十二左），以及半球形腹鼎（圖四十二中）；進入春秋早期後，源於西周晚期的附耳鼎逐漸流行，前述的半球形腹鼎繼續沿用，垂腹鼎則消失。<sup>141</sup>南陽盆地本階段出土的銅鼎，以立耳的半球形腹鼎與附耳的近平底鼎為主，罕見垂腹鼎，後者不僅均為採集品，而且整

掘》，《文物》1994年第1期，頁1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三次發掘〉，《文物》1994年第8期，頁25、27-28；〈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四次發掘〉，《文物》1994年第8期，頁15；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五次發掘〉，《文物》1995年第7期，頁35。

13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三門峽虢國墓（第一卷）》，頁66-69、258-259；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上村嶺虢國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頁18、28、64。

13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頂山市文管會，〈平頂山市北滍村兩周墓地一號墓發掘簡報〉，《華夏考古》1988年第1期，頁33。

140 張臨生，〈說盃與匜——青銅彝器中的水器〉，《故宮學術季刊》第17卷第1期（1982），頁25-39；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頁296、1311。

141 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頁428；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頁1311-1312、1573-1576、1580。

體造型特殊（圖四十二右），<sup>142</sup>與典型西周中晚期流行的垂腹鼎差異極大。



圖四十二 左：【史頌鼎】 中：【毛公鼎】 右：【垂腹凸弦紋鼎】

（圖左、中分別採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5·西周（1）》，圖版 35、36；圖右採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曾國青銅器》，頁 49）

### 3. 青銅明器的使用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自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在晉南、豫西等地，紛紛出現隨葬青銅明器的現象，南陽盆地亦然，但使用青銅明器的脈絡與北方不同。前者出土青銅明器的墓葬，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墓葬的隨葬品較少，應為低階貴族墓，大多只有 1、2 件青銅明器<sup>143</sup>；第二類墓葬則屬高級貴族墓，如晉侯墓地的 M93 與 M102，<sup>144</sup>虢國墓地的 M2001 與 M2012，<sup>145</sup>以及應國墓地的 M95、M1 與 M8，<sup>146</sup>不僅隨葬一套完整的青銅容器，另外又附加一套青銅明器。青銅明器除了常見的鼎、簋、盤、匜、盃等食器與水器，更出現模仿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流行的爵、觚、觯與方彝等「復古酒器」。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認為，西周晚期至春

142 在棗陽的吉河鄉與沙河各採集到 1 件西周時期的垂腹鼎，由於器形、風格與紋飾特異，僅能依其垂腹特徵，籠統歸入西周中、晚期。徐正國，〈湖北棗陽市博物館收藏的幾件青銅器〉，《文物》1994 年第 4 期，頁 7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曾國青銅器》，頁 48-50。

143 如虢國墓地 M1612、M1620、M1651、M1762 等。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上村嶺虢國墓地》，頁 13、31，圖版拾伍、拾陸。

144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五次發掘〉，《文物》1995 年第 7 期，頁 4-39。

14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三門峽虢墓（第一卷）》，頁 30-71、241-264。

14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頂山市文管會，〈平頂山市北滍村兩周墓地一號墓發掘簡報〉，《華夏考古》1988 年第 1 期，頁 30-4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頂山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平頂山應國墓地九十五號墓的發掘〉，《華夏考古》1992 年第 3 期，頁 92-10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頂山市文物管理局，〈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八號墓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07 年第 1 期，頁 20-49。

秋早期隨葬青銅明器的現象，並非因為當時銅料的不足，而是體現了一種新的宗教觀。<sup>147</sup>



圖四十三 襄陽王坡 M55 隨葬青銅容器組合

(採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  
《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圖版 6：1、2；7：1、2)

南陽盆地亦出現隨葬青銅明器的墓葬。襄陽王坡 M55 出土銅盤與銅匜各 1 件，另外，還發現 13 件青銅明器，包括 5 件鼎、6 件簋與 2 件圓壺（圖四十三）。<sup>148</sup>相較之下，王坡 M55 的情況相當特殊：該墓墓主並未擁有一組完整的青銅容器，僅有盤與匜，與前述盆地以北的高級貴族墓，同時隨葬一組青銅容器與一組青銅明器的狀況不同，當然也與僅隨葬 1、2 件青銅明器的低階貴族墓有別。儘管如此，王坡 M55 仍然隨葬了一套包含食器、酒器與水器的完整組合。這樣的狀況十分耐人尋味：一方面，當地貴族確實知道，在喪葬過程中應隨葬一套完整的青銅容器，也樂於接受中原地區流行隨葬青銅明器的風尚，表明兩者有所聯繫；但另一方面，這些地方貴族卻不清楚中原地區是如何在墓葬中使用青銅明器，可能僅透過有限的知識，為親人安排後事，這也反映與周文化的隔閡。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

147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 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6), pp. 105, 302-304.

14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編著，《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頁 22-45。

另一種可能性，亦即當地貴族由於缺乏銅料，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能以品質粗糙的青銅明器充當隨葬品。

## (二) 地區之別

「周文化」時期南陽盆地的青銅容器，不僅反映對周文化的部分吸收，若更進一步比較盆地內的不同地區，我們將會發現，但各地在墓葬中使用青銅容器的方式與概念亦有所不同，盆地北方與典型的周文化接近，盆地南方則地方特色突出。



圖四十四 【仲禹父簋】(筆者於 2009 年 4 月 7 日攝於河南省博物院)

### 1. 南陽：典型的周文化作風

南陽北郊遺址是本時期盆地內出土青銅器最北的墓葬，包括鼎、簋、盤共 4 件容器，另有車馬器。整體而論，這批銅器與西周晚期典型的周文化無異。以鼎、簋為例，前者為半球形腹鼎，立耳，蹄足，飾以凸弦紋與竊曲紋；後者則為帶蓋圈足附耳簋，蓋上有圓形捉手，龍首狀附耳，圈足下另加三足，通體飾以竊曲紋及瓦紋（圖四十四），均為標準的西周晚期作風。<sup>149</sup>這兩類銅器均發現銘文，並帶有「仲禹父」字樣，其中的銅簋（【仲禹父簋】）銘文曰：

南申白大宰仲禹父厥司乍其皇祖考夷王、監白尊簋，用享用孝，用易眉壽，屯右康和，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享。<sup>150</sup>

149 崔慶明，〈南陽市北郊出土一批申國青銅器〉，《中原文物》1984 年第 4 期，頁 13-16。

150 【仲禹父簋】共 2 件，銘文略有不同，除上舉銘文外，另一篇銘文為：「仲禹父宰南申厥司乍其皇祖考夷王、監白尊簋，用享用孝，用易眉壽，屯右康和，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享。」另，正文所舉原釋文有「屯右佑康和」一句，其中「佑」為衍文。崔慶明，〈南陽市北郊出土一批申國青銅器〉，《中原文物》1984 年第 4 期，頁 15。

李學勤認為，該器器主「仲禹父」乃周夷王（865-858 BC）之孫、監伯之子，與周宣王（827/25-782 BC）同輩，時任南申伯，居大宰之職，亦即《詩經·大雅·崧高》中周宣王封於南土謝邑的申伯。<sup>151</sup>李氏之說，可從。據此，一則證明南陽即西周晚期以降的申國，二則由於器主仲禹父為王室重臣，因此也就解釋了為何北郊墓葬的青銅器為典型的周文化作風。

## 2. 襄樊：部分仿效與嘗試創新

襄陽王坡墓地位於盆地的正南方，目前僅有2座春秋早期墓葬，包括前述出土青銅明器的M55，以及隨葬1件銅鼎的M1。在這2座墓中，均發現與典型的周文化不類的附耳銅鼎，地域特徵強烈。M1銅鼎（圖四十五左）底部有煙炱痕，係實用器，敞口、直壁、寬體、圜底近平、附耳、三蹄足，器腹中部為凸弦紋，上側為竊曲紋，下側為垂鱗紋；M55出土的5件銅鼎（圖四十五右）為明器，造型特別，但諸如敞口、寬體、直壁、平底、附耳等基本特徵，則與M1銅鼎一致。<sup>152</sup>類似的附耳銅鼎還流行於本階段的南陽盆地與其周邊地區。



圖四十五 左：襄陽王坡 M1 銅鼎 右：襄陽王坡 M55 明器銅鼎

（採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

《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彩版 4：1、2）

M55出土的銅匜（圖四十六左）個性鮮明，<sup>153</sup>造型與紋飾極富特色。從銅匜的設計與澆鑄方式，暗示應為本地製造。該銅匜的器身接流口處轉折明顯，整體形制矮胖，流短，器底帶有與銅鼎相似的三蹄足等作風，與一般的銅匜（圖四十六右）明顯不同。就紋飾而論，口沿為交纏龍紋，下

151 李學勤，〈論仲禹父簋與申國〉，《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頁31-32、39。

15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編著，《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頁30-36。

15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編著，《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頁3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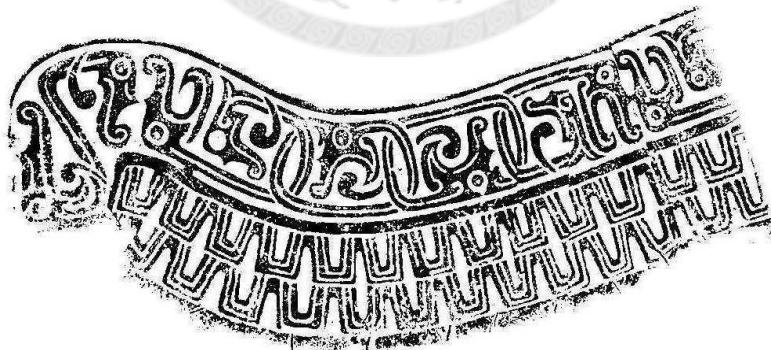
方為兩周狀似梯形的垂鱗紋（圖四十七），作風十分罕見。若仔細觀察龍紋本身，可發現中央四組相互交纏，前後均為雙首龍紋，方向相反，夾於其中則為兩組上下顛倒的單首龍紋，顯示設計紋飾的工匠乃有意而為，力求創新。可是，這兩兩成雙的四組交纏龍紋，卻在布局上左疏右密，分範痕跡亦相當清晰。



圖四十六 左：襄陽王坡 M55 銅匜 右：【筭侯匜】

（圖左採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彩版 7：2；右圖採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6·西周（2）》，圖版 63）

綜觀襄樊地區出土的青銅容器，就組合而言，與周文化一致，顯示當地貴族在青銅容器的使用概念上，有意師法於中原地區。然而，他們對於周文化在墓葬中配置青銅容銅器的脈絡認識有限，前述對青銅明器的使用便是最好的例子；<sup>154</sup>再者，就青銅容器的鑄造面而論，銅鼎呈現強烈的地域特徵，銅匜則力求創新，又表明襄樊的貴族試圖跳脫周文化的拘束。



圖四十七 襄陽王坡 M55 銅匜紋飾拓片

（採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頁 28，圖 17：3）

那麼，使用這批青銅容器的人是誰？M1 出土的銅鼎，則為判斷墓主的身分提供有力的線索。銅鼎內鑄有以下銘文：

154 本文頁 104-105。

隹九月初吉丁亥，登公孫無忌選吉金鑄其□鼎，其用追考朕皇高且，余用正用行，永壽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sup>155</sup>

此外，同墓隨葬的3件銅戈亦帶有銘文：

登子中無忌之用戈。<sup>156</sup>

銘文中的「登」釋讀為「鄧」，報告認為，M1的墓主應為無忌，鄧國人。石泉（1917-2005）曾經利用傳世文獻，推論西周時期至春秋早期的鄧國位於今日的襄樊，而本章第一節所述襄樊西北方的周代城址應為鄧城。<sup>157</sup>王坡出土帶有「鄧」字的春秋早期青銅器，正好應證石泉的論點。因此，襄樊至少為春秋早期的鄧國所在地，而王坡墓地M1與M55隨葬的青銅容器，則反映了鄧國貴族對周文化的態度，亦即在仿效周文化同時，又企圖另闢蹊徑。

### 3. 襄陽：地方特色濃厚的青銅器

襄陽位於盆地東南方，是目前南陽盆地發現「周文化」時期青銅容器最多的地區，在段營、曹門灣、郭家廟與杜灣，共發現13座隨葬青銅容器的墓葬，郭家廟墓地甚至發現帶有墓道的高等級貴族墓。<sup>158</sup>令人扼腕的是，這群墓葬保存完整的僅有出土1件銅鼎的郭家廟M6。<sup>159</sup>儘管資料殘缺，但我們仍可一窺當地貴族如何在墓葬中使用青銅容器。

襄陽與前述的襄陽情況相同，鼎、簋、壺、盤、匜為最主要的青銅容器，郭家廟M1出現以銅簋代替銅簋的現象，顯示時代較晚。<sup>160</sup>此外，在郭家廟墓地還出土南陽盆地少見的銅鬲、銅杯與銅醞。<sup>161</sup>總體而言，這批

15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編著，《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頁31-34。

15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編著，《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頁45-48。

157 石泉，〈古鄧國、鄧縣考〉，《江漢論壇》1980年第3期，頁89-96。

158 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編著，《襄陽郭家廟曾國墓地》，頁8-89。

159 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編著，《襄陽郭家廟曾國墓地》，頁117-120。

160 張昌平，《曾國青銅器研究》，頁99。

161 張昌平已指出，《襄陽郭家廟曾國墓地》雖重新報導了1983年發現的M02的地點，但對該墓出土的青銅容器登錄有誤，應以徐正國在1984年的報導為準。張昌平，《曾國青銅器研究》，頁47；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編著，《襄陽郭家廟曾國墓地》，頁64-65；徐正國，〈襄陽東趙湖再次出土青銅

青銅容器具備典型的周文化特徵，諸如青銅容器的組合，部分器類（簋、盤、匜）的形制，以及流行的紋飾（如竊曲紋、重環紋、垂鱗紋、瓦紋等），均與周文化相近。然而，在周文化的影響之下，本地的青銅容器與襄樊相比，則展現更加強烈的地方特色。

棗陽的青銅容器，部分器類雖常見於周文化，卻發展出十分醒目的自我特徵。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銅鼎。依耳部造型分類，棗陽的銅鼎可分為立耳鼎與附耳鼎兩類，前者口部微斂，腹徑稍大於口徑，少數立耳鼎僅在上腹飾竊曲紋，大多則在下腹多增一周龍紋或垂鱗紋（圖四十八左）；後者則敞口、直壁、寬體、底部近平，頸部飾以竊曲紋（圖四十八右），<sup>162</sup>襄陽王坡出土的附耳銅鼎亦屬此類。



圖四十八 左：棗陽曹門灣 1972 年立耳銅鼎 右：棗陽郭家廟 M1 附耳銅鼎

（分別採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曾國青銅器》，頁 65、88）

張昌平認為，這類立耳鼎雖源於周文化的半球形腹銅鼎，但器腹飾以兩層紋飾的作風較具特色；附耳鼎則更加特殊，不僅將周文化半球形腹鼎與垂腹鼎的特點融為一體（圖四十九），而且少見於其它地區，是當時「曾國」最具代表性的銅鼎造型。<sup>163</sup>其次，棗陽郭家廟墓地發現銅鬲與銅圓壺，雖然亦為周文化常見的器類，但前者的折肩扁體與後者的蓮瓣形壺蓋頂作風，地域特徵非常突出。<sup>164</sup>再者，郭家廟 M8 出土的短頸、深腹、平底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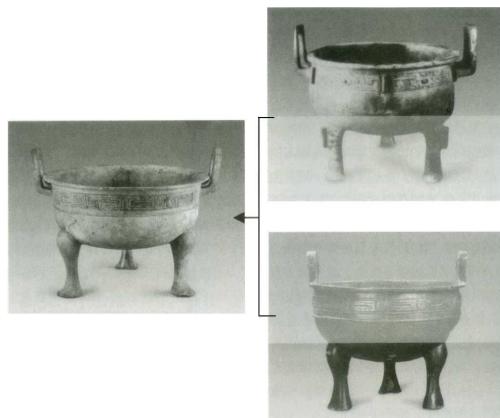
器》，《江漢考古》1984 年第 1 期，頁 106。

162 湖北省博物館，〈湖北棗陽縣發現曾國墓葬〉，《考古》1975 年第 4 期，頁 223、225；田海峰，〈湖北棗陽縣又發現曾國銅器〉，《江漢考古》1983 年第 3 期，頁 102；徐正國，〈棗陽東趙湖再次出土青銅器〉，《江漢考古》1984 年第 1 期，頁 106；襄樊市博物館，〈湖北穀城、棗陽出土周代青銅器〉，《考古》1987 年第 5 期，頁 412；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編著，《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頁 234-237。

163 張昌平，《曾國青銅器研究》，頁 124-126。

164 湖北省博物館，〈湖北棗陽縣發現曾國墓葬〉，《考古》1975 年第 4 期，頁 223；襄樊

匜，頸部與腹部則分別為龍首紋與交纏龍紋（圖五十左），作風奇特。<sup>165</sup>



圖四十九 曾國附耳鼎的來源

（採自張昌平，《曾國青銅器研究》，頁 126，圖 3.1-3）



圖五十 左：棗陽郭家廟 M8 銅匜 右：棗陽郭家廟 M17 銅杯

（分別採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曾國青銅器》，頁 91、106）

必須指出的是，在棗陽郭家廟墓地等級最高、帶有墓道的墓葬中，還出土一些十分特別的青銅器，例如 M17 的單鑿銅杯、方形器座與立鳥銅柱首，以及 M21 的「T」字型銅鉞，顯示當地高級貴族對特殊器類的喜好。M17 銅杯（圖五十右）的口部略殘，斂口、鼓腹，口沿下飾一周吐舌連體龍紋，腹部為瓦紋，帶有雙首曲體龍身狀的單鑿，龍鱗部分鏤空，造型別緻且罕見。M17 器座（圖五十一左）的平面成正方形，分上、中、下三層，各飾以卷體蛇紋、斜角雲紋與變體龍紋；立鳥銅柱首（圖五十一中）發現於方形器座旁，兩者應為一器的上、下兩個部分。<sup>166</sup> M21 銅鉞（圖五十一右）的刃部為「U」字型，帶有長方形銎口，<sup>167</sup> 類似的青銅兵器流行於殷

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編著，《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頁 64；張昌平，《曾國青銅器研究》，頁 127-132。

165 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編著，《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頁 65、68。

166 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編著，《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頁 65、68-70。

167 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編著，《棗陽郭家

墟時期至西周早期，為西周晚期所罕見，而郭家廟 M21 所出土的銅鉞，則可能反映墓主追求「復古」的心態。<sup>168</sup>引人矚目的是，在這把銅鉞兩面的刃部上，共鑄有 18 字銘文：

曾白旣鑄戚戈，用為民刑，非歷毆井，用為民政。<sup>169</sup>

出土銅鉞的郭家廟 M21 雖然嚴重被盜，然而由於該墓為帶墓道的一槨重棺墓，墓底面積亦居郭家廟墓地之冠，而且地處整片墓區的最高處，墓內還殘留大量的車馬器，因此報告斷定墓主即為曾白旣，是曾國的一代國君。此外，郭家廟的 M17 與 M1、曹門灣 1982 年墓葬，以及段營墓葬，<sup>170</sup>亦都發現帶有「曾」字銘文的銅器，所以學者認為上述遺址均為曾國墓地。<sup>171</sup>



圖五十一 左：郭家廟 M17 方形銅器座 中：郭家廟 M17 立鳥銅住首 右：郭家廟 M21 銅鉞  
(圖左、中採自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棗陽  
郭家廟曾國墓地》，彩版 15：1、2；圖右採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國青銅器》，頁 115)

張昌平在他對曾國青銅器的研究中指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國

廟曾國墓地》，頁 19。

168 張昌平，《曾國青銅器研究》，頁 133-134。

169 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編著，《棗陽郭家  
廟曾國墓地》，頁 19。

170 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編著，《棗陽郭家  
廟曾國墓地》，頁 62-63、91、200；田海峰，〈湖北棗陽縣又發現曾國銅器〉，《江漢考  
古》1983 年第 3 期，頁 102；湖北省博物館，〈湖北棗陽縣發現曾國銅器〉，《考古》  
1975 年第 4 期，頁 223。

171 至於棗陽東南方的杜灣墓葬，雖亦出土鑄有銘文的銅簋與銅匜，但器主或為「孟姬  
冶」，或為「陽飮生」，因此學者認為不屬於曾國銅器的範疇。襄樊市博物館，〈湖北  
穀城、棗陽出土周代青銅器〉，《考古》1987 年第 5 期，頁 412-413、433；張昌平，《曾  
國青銅器研究》，頁 333。

疆域，大致從南陽盆地的東南部，延伸至隨棗走廊及其兩側的山間河谷，<sup>172</sup>領土不算太小。總體而論，當時的曾國不僅處於周文化的邊緣地區，同時又具備一定的國力。因此，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包含棗陽在內的曾國青銅器，一方面無可避免地受到典型周文化的影響，但又因為遠離周王朝的掌控範圍，使其有機會製作自我特色更加搶眼的青銅器。

#### 4.新野：兼容周文化與南方地域文化

位於盆地正中央的新野，分別於1971年與1974年，各發現1座春秋早期隨葬青銅容器的墓葬（簡稱「71年墓」與「74年墓」），東西並陳，相距約20公尺。71年墓出土8件青銅容器，包含鼎、簋、甗、盆、盤、匜；74年墓則埋有鼎、簋、鬲、壺、甗、盆、盤、匜等17件青銅容器，是本階段南陽盆地隨葬最多青銅容器的墓葬。<sup>173</sup>



圖五十二 左：新野 71 年墓銅盆 右：新野 74 年墓銅盆

（圖左採自鄭杰祥，〈河南新野發現的曾國銅器〉，《文物》1973年第5期，頁20，圖23；圖右採自河南省博物館、新野縣文化館，〈河南新野古墓葬清理簡報〉，收入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資料叢刊（2）》，頁73，圖7：2）

大抵而言，新野的青銅容器與典型的周文化相近，均以鼎、簋（或簠）、壺、盤、匜為主，另外加上南陽盆地少見、但中原地區較多的鬲與甗，而其中71年墓所出土3件附耳銅鼎，形制與襄樊、棗陽同類的銅鼎一致，應是受到盆地南部的影響。最特別的是，這2座墓葬均發現不屬於基本隨葬組合的銅盆（原報告稱為「銅盤」），基本特徵為敞口、束頸與折肩，肩部附有兩對稱獸首環耳。然而這2件銅盆仍有不同之處，71年墓的銅盆有蓋、底略凹（圖五十二左），74年墓則無蓋、平底（圖五十二右）。類似的銅盆

172 張昌平，〈曾國青銅器研究〉，頁332-338。

173 鄭杰祥，〈河南新野發現的曾國銅器〉，《文物》1973年第5期，頁14-20；河南省博物館、新野縣文化館，〈河南新野古墓葬清理簡報〉，收入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資料叢刊（2）》，頁70-74。

尚見於盆地內的襄陽太平店，<sup>174</sup>以及淮河上游地區，時代與地域特徵鮮明。相關問題將於下文進一步討論。

相對於前述的南陽、襄樊與棗陽，新野墓葬的國屬仍有爭議。<sup>175</sup>儘管如此，由於新野墓葬位於盆地的正中央，因此當地出土的青銅容器，既具備周文化因素，又受到盆地南方地域文化的影響，兼容性十足。

### (三) 鮮明的區域特色

顯而易見的是，本階段南陽盆地的青銅器，對典型的周文化因素並非全然接受，而不同的區域向周文化汲取的養分亦各有所重。然而，在對周文化「選擇性」接受之餘，南陽盆地與其周邊地區，卻逐漸發展出具備鮮明區域特色的青銅器。這些有別於典型周文化的青銅器的出現，正說明南陽盆地及其鄰近地區的地方貴族，嘗試在既有的基礎上求新求變。一方面，他們沿用周文化的用器概念，以青銅器彰顯自己的身分；另一方面，這些地方貴族又不願對主流的周文化亦步亦趨，企圖以創新的設計來突顯自己的與眾不同。這類區域特色強烈的青銅器不在少數，舉其要者，包括寬體附耳鼎、折肩扁體鬲、敞口折肩盆，以及方形器座。

如上所述，張昌平認為寬體附耳鼎為曾國最具特色的器類之一，但在前面的討論已經指出，類似的銅鼎在南陽盆地內非屬曾國疆域的襄樊與新野亦曾出土。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情況，筆者認為有兩種可能性：其一，如張氏所言，寬體附耳鼎為曾國的產物，進而影響鄰近地區；其二，這類銅鼎的出現與國別無關，但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流行於南陽盆地中、南部至隨棗走廊一帶。

就折肩扁體鬲而論，其實南陽盆地目前僅在棗陽郭家廟 M17 出土 1 件（圖五十三），<sup>176</sup>實屬罕見，但若放在更大脈絡下考察，折肩扁體鬲具備強烈的區域特色。張昌平已經指出，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國疆域內，

174 曾昭岷、李謹，〈曾國和曾國青銅器綜考〉，《江漢考古》1980 年第 1 期，頁 72-73。

175 由於 71 年墓中出土的銅甗鑄有「曾子仲」銘文，因此一般認為這兩座墓均為春秋早期的曾國貴族墓；然而，張昌平在他關於曾國青銅器的研究中指出，「曾子仲」非新野 71 年墓的墓主，同時，該墓亦非曾國墓葬。張昌平，《曾國青銅器研究》，頁 336、385-387。

176 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編著，《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頁 64。

密集地出土這類銅鬲共 19 件，<sup>177</sup>此外，在南陽盆地東側淮河上游的河南信陽，<sup>178</sup>以及山東半島南部的山東濰州、臨沂與沂水等地亦曾出土。<sup>179</sup>可見折肩扁體鬲分布於東、西兩區，亦即山東半島的南部，以及南陽盆地、隨棗走廊與淮河上游一帶，均位於周文化的邊緣地帶。



圖五十三 漢陽郭家廟 M17 折肩扁體銅鬲

（採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曾國青銅器》，頁 99）

敞口折肩盆則為另一項區域特徵鮮明的青銅器。過去，學者對銅盆的出現與使用脈絡不甚清楚，而且爭議頗大。<sup>180</sup>然而，就筆者初步觀察，雖然銅盆始見於西周中期的關中地區與山西南部，<sup>181</sup>但數量較少，亦非青銅容器常見的器類。相較之下，南陽盆地與淮水上游地區出土的銅盆，一方面造型接近，同時出現的時代集中，大多屬春秋早期，而同時期的黃河流

177 張昌平，《曾國青銅器研究》，頁 127-128。

178 河南省博物館、信陽地區文管會、信陽市文化局，〈河南信陽市平橋春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 年第 1 期，頁 9；信陽地區文管會、信陽縣文化館，〈信陽縣明港發現兩批春秋早期青銅器〉，《中原文物》1981 年第 4 期，頁 16；信陽地區文管會、信陽市文管會，〈河南信陽市平西五號春秋墓發掘簡報〉，《考古》1989 年第 1 期，頁 21。

179 萬樹瀛，〈滕州後荊溝出土不繫簋等青銅器群〉，《文物》1981 年第 9 期，頁 28；臨沂市博物館，〈山東臨沂中治溝發現三座周墓〉，《考古》1987 年第 8 期，頁 701；孔繁剛，〈山東沂水縣出土一批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92 年第 2 期。

180 大抵而言，一般而言，所謂的「銅盆」，包括盆、盞、盞、孟、敦、簋、鋗、錡等器名，雖然已經有許多的學者嘗試討論，但其中仍有許多模糊不清的問題有待解決。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頁 357-359；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61），頁 131；張光裕，〈從𠂇字的釋讀到盞、盆、孟諸器的定名問題〉，《考古與文物》1982 年第 3 期，頁 76-82；陳芳妹，〈盆、敦與簋——論春秋早、中期間青銅粢盛器的轉變〉，《故宮學術季刊》第 2 卷第 3 期（1985）；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頁 152-164；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頁 136-141、151-153；李零，〈論楚國銅器的類型〉，收入氏著，《入山與出塞》，頁 298-301；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頁 144、315-317；海寧，〈試論青銅盆、孟、敦的關係〉（西安：西北大學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碩士論文，2005）。

181 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卷 9（成都：巴蜀書社，頁 2005）；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商周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著，《天馬—曲村：1980-1989》（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 300、546、549。

域則少見形制類似的青銅容器。除了前述的新野外，同樣位於盆地內的襄陽太平店，<sup>182</sup>以及淮水上游的河南信陽、潢川、羅山與固始，均曾發現敞口折肩銅盆。<sup>183</sup>至於出土於其它地區、被視為與銅盆同類的青銅容器，則多見於春秋中期以後，不僅時代偏晚，造型亦有所區別。

相對於上述三種青銅器，方形器座則顯得格外特別，非但不屬於常見的隨葬青銅器之列（既非容器、樂器，亦非車馬器、兵器與工具），而且相當罕見。目前所見時代最早的方形器座，如前所論，出土於棗陽郭家廟M17，屬春秋早期；另外，在河南東南部的光山縣——亦即淮河上游地區——所發現的黃君孟夫人的墓中（G2），亦發現1件屬春秋早期晚段的方形器座，通體飾以龍紋、垂鱗紋與竊曲紋，座頂平面還鑄有銘文「黃子作黃甫人孟姬器則永」。<sup>184</sup>由現在所能掌握到的材料可知，方形器座可能即源於春秋早期的南陽盆地與淮河上游一帶，地域特色極強。這類銅器在稍晚的南陽盆地、山東地區與長江下游亦曾出土，不僅繼續為本地後來的貴族沿用，而且向外傳播。筆者將於本章第三節繼續討論相關問題。

綜上所述，「周文化」時期南陽盆地的青銅器，儘管受到周文化的影響甚深，但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階段，已與周邊地區共同發展出風格鮮明的地域特色。這批介於黃河與長江之間的青銅器群，不僅嘗試改造既有的青銅容器作風，更試圖在原本的基礎上開創新局。

#### 四、中原風格的玉覆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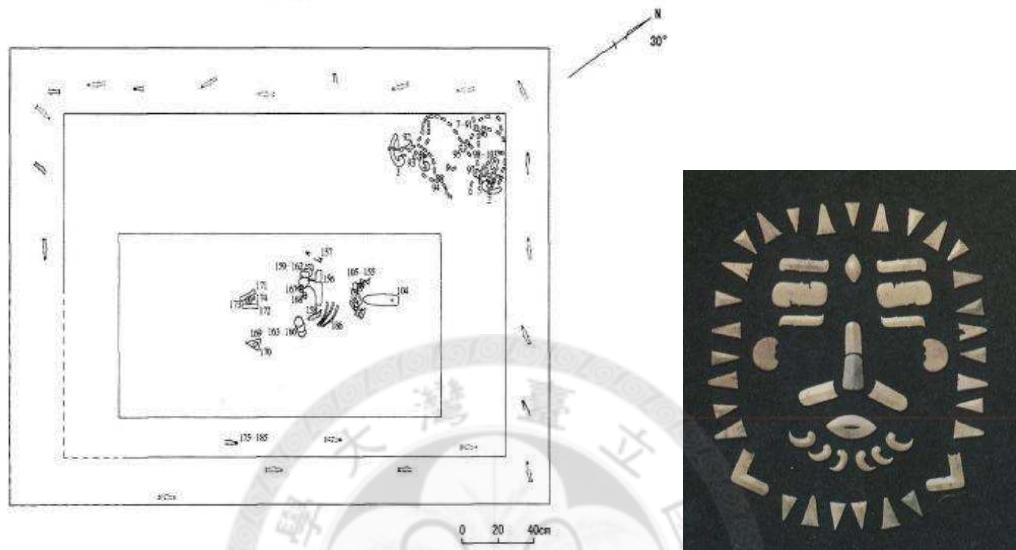
除了青銅器外，玉器則是另一類反映統治階層品味與喜好的隨葬品。「周文化」時期南陽盆地的墓葬中出土的玉器不多，其中以南陽萬家園M202（圖五十四左）發現的玉覆面最引人注目。該墓位於「宛城」城址東

<sup>182</sup> 曾昭岷、李謹，〈曾國和曾國青銅器綜考〉，《江漢考古》1980年第1期，頁72-73。

<sup>183</sup> 信陽地區文管會、潢川縣文化館，〈河南潢川縣發現黃國和蔡國銅器〉，《文物》1980年第1期，頁46；河南省博物館、信陽地區文管會、信陽市文化局，〈河南信陽市平橋春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1期，頁9；信陽地區文管會、信陽縣文化館，〈信陽縣明港發現兩批春秋早期青銅器〉，《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頁16；信陽地區文管會、羅山縣文化館，〈羅山縣高店公社又發現一批春秋時期青銅器〉，《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頁18-19；信陽地區文管會、信陽市文管會，〈河南信陽市平西五號春秋墓發掘簡報〉，《考古》1989年第1期，頁21；信陽地區文管會、固始縣文管會，〈河南固始萬營春秋墓清理簡報〉，《考古》1992年第3期，頁278。

<sup>184</sup> 河南信陽地區文管會、光山縣文管會，〈春秋早期黃君孟夫婦墓發掘報告〉，《考古》1984年第4期，頁322-323。

側約 1 公里處，單棺單槨，隨葬銅器與玉器，屬西周晚期。<sup>185</sup>銅器共 129 件，包括槧飾、車馬器與腰帶飾，另在墓主胸部放置 1 件帶有「輔白乍兵戈」銘文的殘戈，不見任何容器。玉器除圭、玦、手握外，還有 1 組由 51 件玉飾片拼綴而成的覆面（圖五十四右），置於墓主頭部。<sup>186</sup>



圖五十四 左：萬家園 M202 右：M202 出土玉覆面  
(採自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陽市萬家園 M202 發掘簡報〉，  
《中原文物》，頁 9，圖 2；封頁 3，圖 4)

據孫慶偉的研究，玉覆面盛行於西周中、晚期，集中發現在黃河中游地區，包括陝西長安張家坡井叔墓地、扶風黃堆墓地、山西北趙晉侯墓地，以及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而出土玉覆面的墓主身分較高，多為諸侯國的君主及其配偶。<sup>187</sup>相較之下，萬家園 M202 的情況便十分特殊，一方面玉覆面形制與中原地區近似，但另一方面該墓不僅地處南方的南陽盆地，而且規格偏低。儘管如此，隨葬玉覆面仍說明墓主應來自中原，同時具有一定身分。考量萬家園 M202 另隨葬青銅車馬器、兵器與腰帶飾，筆者推測，墓主可能是來自中原地區的軍事將領，因故身亡於此，隨身並未攜帶青銅容器。可以確定的是，南陽的萬家園 M202 與前述同樣位於「宛城」東部的北郊墓葬一樣，不僅墓主身分較高，而且都帶有濃厚的典型周文化特色。

185 徐少華認為屬春秋早期。徐少華，〈南陽新出「輔伯作兵戈」的年代和族屬〉，《考古》2009 年第 8 期，頁 79-83。

186 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陽市萬家園 M202 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07 年第 5 期，頁 8-13、33。

187 孫慶偉，〈周代用玉制度研究〉，頁 236-245。

## 五、不只有「周文化」的南陽盆地

透過以上對墓葬、陶器、銅器與玉器的分析，至此，我們可從當地居民與統治階級的二元視角，重新檢討「周文化」時期南陽盆地的考古遺存與「周文化」之間的關係。

正如本節一開始所言，「周文化」有狹義與廣義之別，前者指西周王朝的統治中心、亦即關中豐鎬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後者則指泛指周人統治地區的考古學文化。陶器與墓葬的形制，通常反映各地居民日常生活的習慣與風俗，就此而論，雖然南陽盆地曾受到豐鎬地區的影響，但前者亦同時接納長江中游地區的文化因素，並在此基礎上形塑出特徵鮮明的地方特色，顯然與狹義的周文化有別。相對之下，南陽盆地於西周晚期以降始出現的青銅器與玉覆面，則代表當地統治階層對於貴重物品的喜好與品味，雖然與廣義的周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共性，<sup>188</sup>然而，一方面青銅明器及玉覆面的使用脈絡有其獨特之處，更重要的是，在南陽盆地與其鄰近地區出土部分的青銅器上，則展現出與周文化不同的地域色彩，說明當地的貴族在仿效、學習周文化的同時，更嘗試擺脫周文化的約束，追求獨特的自我風格。

誠如一般所論，本階段的南陽盆地的確受到周文化的影響，然而，當地既非單純地繼承了周文化的因素，亦非僅是周文化的地方變體。南陽盆地的物質文化不僅融合南北雙邊的特點，而且層次豐富，風格多元。因此，無論就廣義或狹義的觀點而論，均無法與周文化簡單劃上等號。

188 西周晚期包括豐鎬地區在內的關中，品質較好的青銅器皆出於窖藏，相對而言，當地墓葬出土的青銅器一則質量較差，二則數量較少，三則組合簡略，因此只能以關中之外的高級貴族墓葬，諸如山西南部的晉侯墓地、河南西部的虢國墓地，以及河南南部的應國墓地，作為比較對象，而這些貴族墓葬所反映的物質文化，則可視為廣義的周文化。

### 第三節 「楚文化」時期（678-279 BC）

#### ——陶、銅器發展上的落差

歷經近 400 年的「周文化」時期後，南陽盆地繼之而起的是「楚文化」時期。夏鼐（1910-1985）與蘇秉琦（1909-1997）均認為，所謂的楚文化即「楚」的文化，這裡的「楚」，分別指涉地域、國家、民族與考古學文化等概念；<sup>189</sup>俞偉超（1933-2003）進一步提出，楚文化是「楚人」在特定的時空範圍內所具備的文化特徵；<sup>190</sup>楊權喜則更具體地點明，楚文化是東周時期，尤其是春秋中期以後，以荊楚地區（即長江中游地區）為主體、以楚國為中心，所逐漸發展出的考古學文化。<sup>191</sup>目前，楚文化的特徵與內涵，仍是學界努力探索的方向，然而，法國的藝術史家杜德蘭（Alain Thote）則點出許多人對「楚文化」一詞的誤解：不但視其為一個獨立的考古學文化體系，更甚者，還認為楚國疆域內所有的考古遺存，均代表楚文化的特色。<sup>192</sup>換句話說，楚國疆域內所見的物質文化，即是所謂的「楚文化」。

當然，政治力量經常牽動物質文化發展方向是不爭的事實，但必須強調的是，政治力量卻不是唯一決定物質文化走向的關鍵因素。正如杜德蘭所提醒，以「國家」為基本研究單位的論述模式，往往強調其內物質文化的共性，至於領地內不同區域間彼此的殊性，以及不同區域各自的本地傳統，總是備受忽視。就「楚文化」時期的南陽盆地而言，儘管已納入楚國的統治範圍，可是當地的物質文化，卻不僅只受到楚文化單方面的影響，還涉及境外、甚至是本地「周文化」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文化傳統。

本階段是周代南陽盆地出土考古遺存最為豐富的階段，除南陽、淅川、襄樊、棗陽外，在盆地北方的鎮平，以及西南方的穀城與老河口，亦曾發現聚落與墓葬遺跡，這些遺址所發掘出的陶器與青銅器，正可讓我們重新檢驗當地的物質文化與楚文化之間的關係。

189 夏鼐，〈楚文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江漢考古》1982年第1期，頁1-2；蘇秉琦，〈從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問題〉，《江漢考古》1982年第1期，頁3-4。

190 俞偉超，〈關於當前楚文化的考古學研究問題〉，收入氏著，《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243。

191 楊權喜，《楚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頁2-4。

192 杜德蘭（Alain Thote）著，劉玉堂、賈繼東譯，〈異質文化撞擊與交流的範例——淅川下寺墓隨葬器物的產地及相關問題〉，《江漢考古》1996年第2期，頁89。

## 一、逐漸與江陵地區趨同的陶器

「楚文化」時期南陽盆地的陶器，可分為生活陶器與隨葬陶器兩類。與「周文化」時期相比，本階段的隨葬陶器不僅數量大增，而且還出現大量的仿銅陶器，時代特徵鮮明。其次，雖然仍利用生活陶器作為隨葬品，但數量明顯較少，而且時代愈晚，組合愈不清楚，因此其形制可與在灰坑等遺跡出土的生活陶器一併討論。就已正式發表的材料而論，生活陶器絕大多數發現於盆地的南部，以襄樊一帶的數量最多，另見於盆地東南方的棗陽與西南方的老河口，而盆地北部的南陽亦曾發現，但數量甚少；隨葬陶器的分佈範圍較廣，分別見於盆地南方的襄樊、穀城、老河口，以及北方的南陽、淅川與鎮平。一般認為，本階段陶器的演變趨勢，大抵與典型的「楚文化」——亦即長江中游江陵地區的考古學文化——相近，然而，本地傳統與中原因素亦具備一定的影響力。

### (一) 源於本地傳統的生活陶器

本階段南陽盆地的生活陶器，就陶系而言，與「周文化」時期以紅陶為主的情況有別，灰陶較多，紅陶居次；就器類而言，以鬲、盆、盂、豆、罐、甕為主。其中，則又以襄樊與棗陽所出土的生活陶器最具代表性。襄樊位於盆地的正南方，與東周時期楚國的統治中心較為接近；<sup>193</sup>棗陽則位於盆地的東南部，與襄樊相比，離楚國的統治中心較遠。

引人注目的是，這兩個地區均發現跨越「周文化」時期與「楚文化」

193 《史記·楚世家》載：「……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據此，學者大多同意，楚國的都城在楚文王即位時，亦即西元前 689 年，由丹陽遷至郢，然而郢的具體位置，至今卻仍有爭議。過去，一般均認為楚郢都位於湖北江陵的紀南城，但根據考古工作者對該城址的勘查與發掘，顯示紀南城始建於春秋末葉或戰國初期，因此春秋早期以來的楚郢都可能不在紀南城。除紀南城外，顧鐵符認為，紀南城西北方 35 公里的當陽季家湖楚城為春秋郢都；石泉持不同意見，指出襄樊南方的宜城楚皇城才是春秋郢都的所在地；郭德維甚至提出早期的郢都在宜城楚皇城，其後遷至當陽季家湖楚城，三遷至紀南城的看法。儘管意見紛歧，不過春秋時期的楚國政治中心，應距南陽盆地正南方的襄樊較近，離東南方的棗陽較遠。司馬遷，《史記》，頁 1695；楊權喜，《楚文化》，頁 36-47；顧鐵符，〈楚三邑考〉，收入湖北省楚史研究會、武漢師範學院學報編輯部編，《楚史研究專輯》（武漢：武漢師範學院學報編輯部，1982）；石泉，〈楚郢都、秦漢至齊梁江陵城故址新探〉，收入氏著，《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頁 425-433；郭德維，《楚都紀南城復原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 20-39。

時期的考古遺址，其中，又以襄樊真武山與棗陽周台最為重要。<sup>194</sup>就考古學文化而言，所謂的周文化與楚文化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統，前者以西周時期的關中地區為中心，後者以東周時期的江漢平原的江陵地區為中心，一南一北、一早一晚，看似毫無關連。然而十分特別的是，據真武山與周台遺址的報告指出，這兩處遺址物質文化的發展脈絡，自總體而論，不僅循序漸進，而且一脈相承。<sup>195</sup>換言之，黃河流域系統的周文化與長江流域系統楚文化，在介於兩地之間的南陽盆地相互銜接。<sup>196</sup>

正如本章第二節所論，自西周中期以來，南陽盆地在汲取南北雙邊文化因素的同時，已經孕育出本地特色鮮明的生活陶器，其中又以大量的紅陶器與瘞縫柱足鬲最為醒目。儘管自西周晚期起，盆地南部的襄樊與棗陽，已經出現部分遺址的灰陶多於紅陶的狀況，<sup>197</sup>然而，以瘞縫柱足鬲為代表的生活陶器器群，卻始終在南陽盆地的「周文化」時期佔有一席之地。進入本文所論的「楚文化」時期，亦即春秋中期以後，一般認為，南陽盆地的生活陶器，不約而同地開始與長江中游江陵地區的考古學文化靠攏。就大趨勢而言，這樣的看法沒有問題，但關鍵的問題在於：當地的生活陶器究竟在什麼樣的基礎上，並以何種方式，與江陵地區的文化因素趨同。

就位於漢水南岸沖積平原上的襄樊真武山而言，該遺址在「周文化」時期，便已經展現鮮明的地方色彩，不但陶器以紅陶為主、陶鬲為南陽盆地常見的瘞縫柱足，而且還出土極具南方特色的紅陶缸。隨著時代變遷，紅陶所佔的比例下降，灰褐陶漸增，紅陶缸數量減少，柱足陶鬲的瘞縫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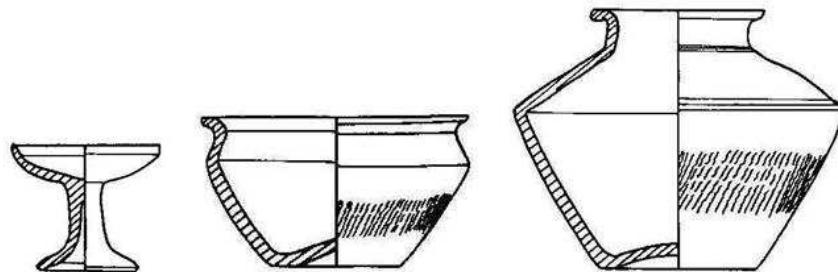
19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遺址〉，《考古學集刊》第9集，頁138-161；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棗陽市文物考古隊，〈棗陽周台遺址發掘報告〉，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34-101。

19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遺址〉，《考古學集刊》第9集，頁161；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棗陽市文物考古隊，〈棗陽周台遺址發掘報告〉，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91-92。

196 一般認為，東周時期湖北江陵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即所謂典型楚文化的代表，而楚文化的前身，則源於長江中游地區，尤其是鄂西地區的土著文化。然而，部分學者已經指出，楚文化其實源於中原文化，筆者亦認為，所謂的「楚文化」其實是中原文化在南下長江中游地區的過程中，與當地的土著文化相互融合後所逐漸產生的新型態考古學文化。然而由於這個問題非本文討論重點，而且材料有限，涉及的問題亦相當複雜，非筆者目前所能解決，因此僅能暫且存而不論。楊權喜，《楚文化》，頁16-26；趙世綱，〈淺論楚文化的淵源〉，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三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頁64-73；丁蘭，《湖北地區楚墓分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頁222。

197 同本章註104。

度亦愈來愈小。邁入「楚文化」時期，真武山的生活陶器延續上個階段的發展軌跡，灰褐陶開始佔有優勢，陶鬲則由鬲裆演變為聯裆，與一般認知的「楚式鬲」類似，而其它生活陶器的形制，包括豆、盆、甌，其與江漢平原同類陶器的特徵接近。<sup>198</sup>



圖五十五 襄陽周台遺址的折盤豆、折肩盆與折肩罐

(採自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陽市文物考古隊，〈襄陽周台遺址發掘報告〉，  
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  
頁 72，圖 46：6；頁 74，圖 48：1；頁 77，圖 50：1)

襄陽周台則呈現另外一幅景象。該遺址在「周文化」時期以灰陶為主，與同時期南陽盆地出土大量紅陶的情況有別。儘管如此，陶鬲的形制則流行本地特徵強烈的鬲裆柱足作風，此外，該遺址出土的折盤豆、折肩盆與折肩罐（圖五十五），則帶有較濃厚的關中周文化因素。<sup>199</sup>與襄樊真武山差異極大的是，周台遺址「周文化」時期生活陶器的特徵，在進入「楚文化」時期，也就是春秋中期以後，幾乎全部沿用，直到戰國中期。據原始報告指出，中原三晉地區在跨入東周時期以後，其文化面貌發生巨大的變異，相較之下，襄陽周台則更加堅守姬周文化的傳統。<sup>200</sup>筆者認為，這樣的看法有必要稍加修正。「周文化」時期的襄陽周台遺址，在接受外來文化因素（包括北方的周文化與南方的江漢平原地域文化）同時，不僅逐漸發展出本地特色鮮明的物質文化，而且對當地的居民而言，生活陶器上來源各異的文化因素，其實無法割裂，它們共同塑造了本地的文化傳統。更明確地

19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遺址〉，《考古學集刊》第 9 集，頁 159-161；張昌平，〈試論真武山一類遺存〉，《江漢考古》1997 年第 1 期，頁 52-54。

199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陽市文物考古隊，〈襄陽周台遺址發掘報告〉，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 92。

200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陽市文物考古隊，〈襄陽周台遺址發掘報告〉，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 92。

說，在周王室東遷的春秋早期，對棗陽周台的居民而言，當地的物質文化不再只是「周文化」的一支，實際上已成為本地文化的一部分。進入「楚文化」時期，雖然江漢平原的考古學文化對棗陽周台遺址造成一定的影響，但「周文化」時期早已落地生根的本地傳統，則持續在當地發揮功效。必須指出的是，在「楚文化」時期南陽盆地與鄰近地區的遺址中，或多或少，均可發現「周文化」時期本地傳統的影子，只是表現的方式不同，也未如棗陽周台遺址的狀況強烈。<sup>201</sup>

整體而言，無論是迅速與江漢平原接軌的真武山遺址，或是仍然堅持保存本地傳統的周台遺址，南陽盆地「楚文化」時期生活陶器的發展趨勢，均源於本地「周文化」時期的物質文化特色，自成理路，只是變化的速度或速或遲，變化的幅度或大或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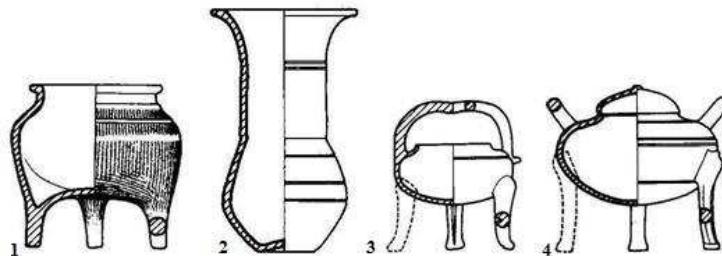
## （二）中原因素較強的「楚文化」隨葬陶器

隨葬陶器是本階段南陽盆地發現最多的考古遺物，不僅數量多於同時期的生活陶器，而且序列完整。出土隨葬陶器的遺址則集中於盆地的南部與北部，分別以襄樊與淅川最具代表性，縱貫這個時期各個階段，使我們能清楚地掌握隨葬陶器的演變趨勢。儘管「楚文化」時期的隨葬陶器數量豐富，但「周文化」時期甚少，並且僅集中發現於棗陽郭家廟，而該遺址與鄰近地區，目前未見春秋中、晚期的墓葬。這樣的狀況，對於我們探索由「周文化」時期轉入「楚文化」時期隨葬陶器的發展脈絡，帶來相當的困難度。

整體而言，本階段的隨葬陶器可分為生活陶器與仿銅陶器兩類。在「楚文化」的前半段，亦即春秋中、晚期，延續「周文化」時期的習俗，以隨葬生活陶器為主，灰陶較多，而前期流行的紅陶則退居次要。常見的器類

201 例如盆地南部的襄樊韓崗遺址直到春秋晚期，陶鬲仍作柱足瘞襠，只是襠部內瘞的程度愈來愈不明顯；盆地北方的鎮平程莊墓地於春秋時期出土折盤豆；在襄樊以南的宜城郭家崗遺址，至春秋晚期仍出土瘞襠柱足鬲；至於地處隨棗走廊的隨州廟台子遺址，儘管只見春秋早期與戰國早期的遺存，但整體特徵與棗陽周台類似。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陽鄧城韓崗遺址發掘報告〉，《江漢考古》2002年第2期，頁43-45；鄭州大學歷史學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調文物保護辦公室、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陽市程莊墓地東周墓葬發掘簡報〉，《考古》2008年第5期，頁22-29；武漢大學考古教研室、湖北省宜城市博物館，〈湖北宜城郭家崗遺址發掘〉，《考古學報》1997年第4期，頁515-551；武漢大學考古教研室、襄樊市博物館、隨州市博物館，《西花園與廟台子》（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與前期類似，以鬲、孟、豆、罐為大宗，部分墓葬則埋有陶壺。然而，大多墓葬僅埋有其中三種，組合亦不固定。下逮戰國時期，雖然仍以生活陶器隨葬，但數量減少，重要性不如春秋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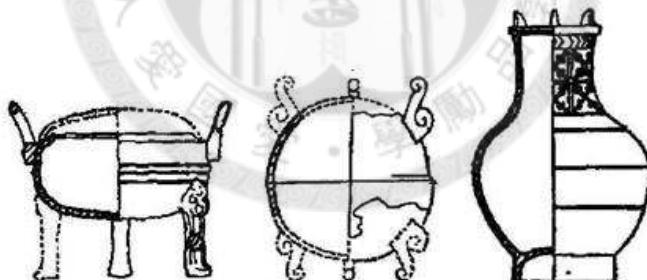


圖五十六 1：小口柱足鬲 2：弦紋常頸壺 3：仿銅盃 4：仿銅小口鼎

（採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江陵九店東周墓》，

頁 187，圖 126：1；頁 190，圖 128：3；頁 180，圖 123：2；頁 179，圖 122：3）

自春秋中期起，在盆地的南方已出現隨葬仿銅陶器的現象，但當時多與生活陶器混合使用，而且數量較少，直到春秋晚期才出現鼎、敦、壺組合。<sup>202</sup>進入戰國時期，仿銅陶器才全面取代生活陶器的地位，成為最重要的隨葬陶器。這個階段亦以鼎、敦、壺組合為主，或加上盤、匜，或加上豆、鑊壺、小口鼎。戰國晚期前段則新出現鼎、盒、壺組合。



圖五十七 仿銅陶器組合：鼎、敦、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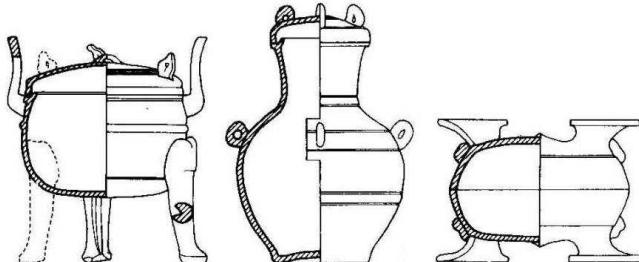
（採自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陽團山東周墓〉，《考古》1991年第9期，

頁 794，圖 18：7；頁 796，圖 20：5；頁 797，圖 21：2）

正如前文所論，學者大多認為，南陽盆地的隨葬陶器與生活陶器一樣，在進入春秋中期後，迅速與長江中游江陵地區的考古學文化靠攏。儘管就

<sup>202</sup> 據襄陽山灣的原始報告，該墓地屬春秋中期 M24，已經出土鼎、敦、盞、缶等仿銅陶器，楊權喜亦採此說。然而丁蘭指出，山灣 M24 的仿銅陶器時代偏晚，應屬春秋晚期，春秋早期僅見仿銅陶鼎；王先福則指出，襄樊地區在春秋晚期才出現以鼎、敦、壺為中心的仿銅陶器組合。湖北省博物館，〈襄陽山灣東周墓葬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3年第2期，頁 26；楊權喜，《楚文化》，頁 209；丁蘭，《湖北地區楚墓分區研究》，頁 159-160；王先福，〈襄北楚陶器墓綜述〉，《江漢考古》2000年第2期，頁 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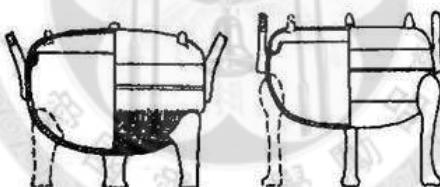
大趨勢而言的確如此，但本階段南陽盆地的隨葬陶器內涵，卻又與江陵地區存在一定的差異，此外，盆地南方與北方的狀況亦不盡相同。



圖五十八 仿銅陶器組合：鼎、簋、缶

(採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江陵九店東周墓》，頁 380，圖 252：9、10、11)

就盆地南方的襄樊地區而論，隨葬陶器的內涵較江陵地區單純。舉例而言，本地少見江陵地區常見的小口柱足鬲（圖五十六：1）、弦紋長頸壺（圖五十六：2），以及仿銅盃（圖五十六：3）與小口鼎（浴鼎，圖五十六：4）；仿銅陶器的組合僅有鼎、敦、壺（圖五十七），但罕見江陵地區流行的鼎、簋、缶組合（圖五十八）；陶鼎的形制較為單純，大多為實蹄足，不似江陵地區變化豐富。<sup>203</sup>



圖五十九 左：矮蹄足陶鼎 右：高足陶缶

(採自襄樊市文物管理處，〈襄樊彭崗東周墓地第一次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99 年第 4 期，頁 12，圖 7：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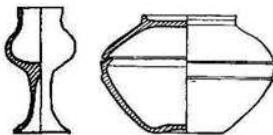
部分學者已經指出，本地的隨葬陶器帶有較多的外來因素，<sup>204</sup>春秋中、晚期與中原地區有不少相似特徵，諸如陶鬲的造型與陶蓋豆的使用；<sup>205</sup>戰

203 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陽團山東周墓〉，《考古》1991年第9期，頁80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市彭崗東周墓群第三次發掘〉，《考古》1997年第8期，頁75；楊權喜，〈襄陽楚墓與楚國勢力的擴展〉，《江漢考古》1986年第2期，頁72；〈襄陽余崗楚墓陶器的分期研究〉，《江漢考古》1993年第1期，頁61-67；王先福，〈襄北楚陶器墓綜述〉，《江漢考古》2000年第2期，頁89；丁蘭，〈湖北地區楚墓分區研究〉，頁170。

204 楊權喜，〈襄陽楚墓與楚國勢力的擴展〉，《江漢考古》1986年第2期，頁72；〈襄陽余崗楚墓陶器的分期研究〉，《江漢考古》1993年第1期，頁67；王先福，〈襄北楚陶器墓綜述〉，《江漢考古》2000年第2期，頁89-90；丁蘭，〈湖北地區楚墓分區研究〉，頁165-171。

205 楊權喜，〈襄陽余崗楚墓陶器的分期研究〉，《江漢考古》1993年第1期，頁64；王先

國早、中期雖然文化面貌更與江陵地區相近，但依舊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諸如矮蹄足陶鼎（圖五十九左）與同時期楚文化流行的高足陶鼎（圖五十九右）不類，流行於中原三晉地區，而高柄壺（圖六十左）亦來自三晉地區；<sup>206</sup>至於戰國晚期新出現的陶盒（圖六十右）脫胎於陶蓋豆，亦來自於中原地區。<sup>207</sup>



圖六十 左：陶高柄壺 右：陶盒

（圖左採自襄樊市博物館，〈襄樊余崗戰國秦漢墓第二次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3年第2期，頁10，圖10：6；右圖採自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市余崗戰國至東漢墓葬發掘簡報〉，《考古學報》1996年第3期，頁346，圖9：10）

此外，在少數的隨葬陶器上，似乎仍能看到本地「周文化」時期的影子。以襄樊山灣春秋晚期的M24與蔡坡戰國早期M4所出土的仿銅陶鼎（圖六十一左、中）為例，帶蓋、附耳、半圓形球腹與下接三蹄足的作風，<sup>208</sup>與棗陽郭家廟出土的仿銅陶鼎（圖六十一右）相近，<sup>209</sup>只是捉手、附耳、鼎足等附件的表現方式有別。另一方面，襄樊地區出土的春秋中、晚期作為隨葬品的生活陶器，無論在陶系、紋飾、形制與組合上，均與襄樊真武山遺址有類似之處，<sup>210</sup>而這也間接說明襄樊地區「楚文化」時期較早階段的隨葬陶器，其部分因素應是繼承自「周文化」時期的本地作風。當然以上的推論，仍須更多的材料加以補充與修正。

福，〈襄北楚陶器墓綜述〉，《江漢考古》2000年第2期，頁90；丁蘭，〈湖北地區楚墓分區研究〉，頁165；張辛，〈中原地區東周陶器墓葬研究〉，頁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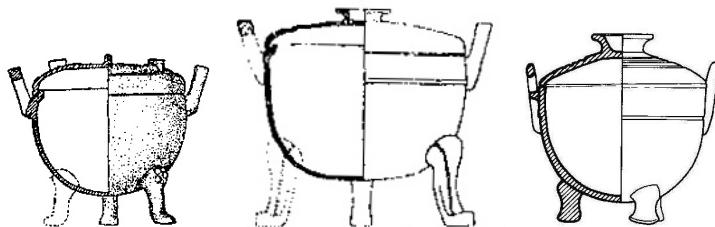
206 高至喜，〈論戰國晚期楚墓〉，《東南文化》1990年第4期，頁81；張辛，〈中原地區東周陶器墓葬研究〉，頁8；袁豔玲，〈高柄壺初探〉，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五集）》（合肥：黃山書社，2003），頁514-532。目前襄樊地區的高柄壺僅見於余崗YM15與彭崗M159，各2件，屬戰國晚期。襄樊市博物館，〈襄樊余崗戰國秦漢墓第二次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3年第2期，頁9；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彭崗墓地第六次發掘簡報〉，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148。

207 張辛，〈中原地區東周陶器墓葬研究〉，頁6；高至喜，〈論戰國晚期楚墓〉，《東南文化》1990年第4期，頁79-80。

208 湖北省博物館，〈襄陽山灣東周墓葬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3年第2期，頁15-16；〈襄陽蔡坡戰國墓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5年第1期，頁5-7。

209 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頁273-274。

210 王先福，〈襄北楚陶器墓綜述〉，《江漢考古》2000年第2期，頁90。



圖六十一 左：襄樊山灣仿銅陶鼎 中：襄樊蔡坡仿銅陶鼎 右：棗陽郭家廟仿銅陶鼎  
(圖左採自湖北省博物館，〈襄陽山灣東周墓葬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3年第2期，頁16，圖18：5；圖中採自湖北使博物館，〈襄陽蔡坡戰國墓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5年第1期，頁7，圖7：1；右圖採自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頁274，圖25：4)

相對於離楚國統治中心較近的襄樊而言，盆地西北部的淅川更接近中原地區。就整體面貌而言，在「楚文化」時期的淅川與襄樊類似，隨葬陶器的面貌與江陵地區的考古學文化更加接近，而且內涵亦較為單純，諸如亦罕見小口柱足鬲、弦紋長頸壺與仿銅陶簋等江陵地區常見的器類。然而，由於淅川與中原地區比鄰，因此當地的隨葬陶器比襄樊地區帶有更濃厚的中原文化色彩，至戰國時期，中原文化的因素才逐漸遞減。<sup>211</sup>

淅川地區「楚文化」時期隨葬陶器最醒目的特徵，莫過於將陶豆視為基本配置，與東周中原地區的情況一致。<sup>212</sup>首先，淅川出土大量的陶豆，在毛坪墓地，陶豆甚至是隨葬數量最多的隨葬陶器；<sup>213</sup>其次，仿銅陶器組合除了楚文化特有的鼎、敦、壺外，淅川同時還流行鼎、豆、壺組合，兩者分庭抗禮，不相上下，甚至出現兼容兩者的鼎、敦、豆、壺組合；<sup>214</sup>第三，儘管與襄樊相同，淅川亦出土陶蓋豆，但後者的數量明顯多於前者，襄樊的山灣、蔡坡與彭崗墓地共有6件，而淅川的大石頭山墓地便出土15

211 黃運甫，〈略談淅川毛坪楚墓的分期及其特徵〉，《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頁50-51；胡永慶，〈試論淅川縣境內的小型楚墓——兼談與中原地區文化的關係〉，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四集）》，頁134-142；張鴻亮，〈豫南地區楚系墓葬初步研究〉（鄭州：鄭州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碩士論文，2007），頁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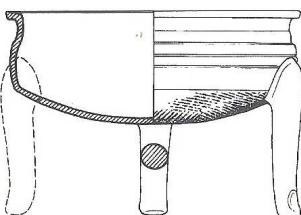
212 張辛，〈中原地區東周陶器墓葬研究〉，頁6。

213 淅川縣博物館、南陽地區文物隊，〈淅川縣毛坪楚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頁45。

214 黃運甫，〈略談淅川毛坪楚墓的分期及其特徵〉，《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頁4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河南淅川大石頭山楚墓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3年第3期，頁18；胡永慶，〈試論淅川縣境內的小型楚墓——兼談與中原地區文化的關係〉，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四集）》，頁140。

件。<sup>215</sup>除陶豆外，淅川地區春秋中期的陶鬲與長頸罐，其特徵亦與洛陽中洲路接近。<sup>216</sup>

至於淅川地區在「周文化」時期與「楚文化」時期隨葬陶器的相互關係，礙於材料限制，目前仍無法深入討論。不過，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是，直到戰國早期，淅川的隨葬陶器以紅陶器為大宗，<sup>217</sup>似與南陽盆地「周文化」時期的傳統一脈相承。



圖六十二 鎮平程莊遺址所見敞口寬體陶鼎

(採自鄭州大學歷史學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調文物保護辦公室、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陽市程莊墓地東周墓葬發掘簡報〉，《考古》2008年第5期，頁27，圖11：1)

除了襄樊與淅川外，其實在南陽盆地「楚文化」時期其它的墓葬遺址中，仍可發現部分中原文化的影響，例如在南陽的彭營與五交文化儲運站兩處墓地，<sup>218</sup>以及鎮平的程莊墓地，<sup>219</sup>均出土中原特徵鮮明的高柄壺。此外，在鎮平程莊屬春秋時期的墓葬中，還發現一種敞口、寬體、圜底近平的陶鼎隨葬（圖六十二），<sup>220</sup>形制非常特殊，罕見於其它地區，與前述南陽盆地「周文化」時期特有寬體附耳銅鼎形制類似，<sup>221</sup>只是程莊的春秋陶鼎無耳。

215 湖北省博物館，〈襄陽山灣東周墓葬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3年第2期，頁17；〈襄陽蔡坡戰國墓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5年第1期，頁7；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彭崗墓地第六次發掘簡報〉，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頁14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河南淅川大石頭山楚墓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3年第3期，頁15。

216 胡永慶，〈試論淅川縣境內的小型楚墓——兼談與中原地區文化的關係〉，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四集）》，頁141。

217 黃運甫，〈略談淅川毛坪楚墓的分期及其特徵〉，《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頁48-49；胡永慶，〈試論淅川縣境內的小型楚墓——兼談與中原地區文化的關係〉，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四集）》，頁135-136。

218 南陽市文物工作隊，〈南陽市彭營磚瓦廠戰國楚墓〉，《中原文物》1994年第1期，頁91-92；〈河南南陽五交文化儲運站戰國墓〉，《江漢考古》1996年第3期，頁24。

219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調文物保護辦公室、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陽市程莊墓地東周墓葬發掘簡報〉，《考古》2008年第5期，頁34、37。

220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調文物保護辦公室、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陽市程莊墓地東周墓葬發掘簡報〉，《考古》2008年第5期，頁26-29。

221 參見本文頁110-111、114。

令人好奇的是，這兩類先後出土於南陽盆地但質材不同的鼎，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關連？

## 二、楚式作風的青銅器群

南陽盆地「楚文化」時期另一項極具代表性的考古遺物，是作為隨葬品的青銅器，包含容器、樂器、車馬器、兵器與雜器。青銅器與陶器的情況類似，若與先前的「周文化」時期相比，不但器物本身的數量大幅增加，而且出土青銅器的墓葬數亦遠超過前期。以發現青銅容器的墓葬為例，「周文化」時期僅有 19 座（附表三），「楚文化」時期則至少發現 65 座（附表四，包含棗陽九連墩 M1、M2）。出土青銅容器的墓葬，則分佈於盆地北部的南陽<sup>222</sup>與淅川，<sup>223</sup>以及南部的襄樊、<sup>224</sup>棗陽<sup>225</sup>與穀城。<sup>226</sup>

據傳世文獻記載，南陽盆地在「楚文化」時期屬於楚國的疆域，因此學者一般認為，當地本階段發現的青銅器即典型的楚國銅器，其中又以淅川下寺墓群出土的青銅器群最為重要。就墓葬規模與隨葬品內容看來，下

222 王儒林、崔慶明，〈南陽市西關出土一批春秋青銅器〉，《中原文物》1982 年第 1 期，頁 39-41；南陽市文物工作隊，〈南陽市西關三座春秋楚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92 年第 2 期，頁 107-113；〈南陽市彭營磚瓦廠戰國楚墓〉，《中原文物》1994 年第 1 期，頁 91-95；南陽市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南陽市煙草專賣局春秋、西漢墓葬的發掘〉，《華夏考古》1999 年第 3 期，頁 46-52；董全生，〈南陽市物資城一號墓及其相關問題〉，《中原文物》2004 年第 2 期，頁 46-48；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萬家園 M181 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09 年第 1 期，頁 4-11；林麗霞、王鳳劍，〈南陽市近年出土的四件春秋有銘銅器〉，《中原文物》2006 年第 5 期，頁 8-9、90；喬保同、李長周，〈南陽發現蔡侯申簠〉，《中原文物》2009 年第 2 期，81-84。

22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編著，〈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淅川縣博物館、南陽地區文物隊，〈淅川縣毛坪楚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82 年第 1 期，頁 42-46；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調文物保護辦公室、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淅川縣徐家嶺 11 號楚墓〉，《考古》2008 年第 5 期，頁 41-48。

224 襄陽首屆亦工亦農考古訓練班，〈襄陽蔡坡 12 號墓出土吳王夫差劍等文物〉，《文物》1976 年第 11 期，頁 65-71；湖北省博物館，〈襄陽山灣東周墓葬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3 年第 2 期，頁 1-35；〈襄陽蔡坡戰國墓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5 年第 1 期，頁 1-37；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陽團山東周墓〉，《考古》1991 年第 9 期，頁 781-802；襄石復線襄樊考古隊，〈湖北襄陽法龍付崗墓地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2 年第 4 期，頁 51-56；王先福、王志剛、范文強，〈湖北襄樊市賈莊發現東周墓〉，《考古》2005 年第 1 期，頁 92-95；〈湖北襄樊市蔡坡戰國墓第二次發掘〉，《考古》2005 年第 11 期，頁 30-41；王先福，〈襄樊余崗墓地楚式青銅禮器分期研究〉。

22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棗陽市九連墩楚墓〉，《考古》2009 年第 7 期，頁 10-14；湖北省博物館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楚國貴族大墓〉。

226 陳千萬，〈穀城新店出土的春秋銅器〉，《江漢考古》1986 年第 3 期，頁 13-16。

寺墓群的年代上起春秋中期後段，下迄春秋晚期後段。引人注目的是，該墓群不僅是目前所見同時期級別最高的楚國貴族墓地，而且隨葬的青銅器群一方面組合較為完整，發展脈絡清晰，另一方面銅器上的銘文，又可與傳世文獻相互對應，如 M2 出土的【王子午升鼎】（圖六十三）所鑄的「王子午」，學者推測即《左傳》所載楚莊王（614-591BC 在位）之子公子午（？-552BC），<sup>227</sup>而同墓其它青銅容器上所鑄的「崩」，應為《左傳》上的楚國令尹鄭子馮（？-548BC）。<sup>228</sup>因此，淅川下寺墓地的青銅器群，被視為楚國春秋時期最典型的斷代標準器。<sup>229</sup>



圖六十三 【王子午升鼎】

（採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0·東周（4）》，圖版3）

如前所述，除了下寺墓地，在淅川境內其它墓群，以及南陽、襄樊、棗陽與穀城等地，亦發現大批屬於「楚文化」時期的青銅器。儘管「楚文化」時期與「周文化」時期一致，青銅器散見於盆地內的不同區域，但相較於前期各地銅器特徵各有偏重的狀況，本階段則表現出共性極強的作風，大多屬於楚器之列。筆者認為，區域性的消失與階級性的出現，是南陽盆地「楚文化」時期青銅器的特徵之一。此外，儘管本階段南陽盆地的

22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頁 320-324。

228 李零，〈「楚叔之孫崩」究竟是誰〉，《中原文物》1981 年第 4 期，頁 36-37；陳偉，〈淅川下寺二號墓主及其相關問題〉，《江漢考古》1983 年第 1 期，頁 32-33、37；張亞初，〈淅川下寺二號墓年代與一號墓編鐘的名稱問題〉，《文物》1985 年第 4 期，頁 54-58；張劍，〈淅川下寺楚墓的時代及其墓主〉，《中原文物》1992 年第 2 期，頁 51-55；李零，〈再論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 年第 1 期，頁 47-60。趙世綱則持不同意見，認為「崩」即「令尹子庚」，也就是「王子午」。趙世綱，〈再論淅川下寺 2 號墓的墓主與年代〉，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二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頁 133-143。

229 李零，〈論楚國銅器的類型〉，收入氏著，《入山與出塞》，頁 278-279。

青銅器帶有典型的楚式特徵，然而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仍持續受到中原因素的影響，更甚者，在部分的青銅器上，甚至延續了本地「周文化」時期的特色。以下，筆者將以青銅容器為中心，分析本階段南陽盆地青銅器的特點。

## (一) 楚式風格的青銅器群

所謂楚式風格的青銅器群，指的是常見於楚國境內且特徵明確、但又少見於其它地區的銅器風格。一般認為，自「周文化」時期進入「楚文化」時期後，南陽盆地的青銅器群隨即快速轉變為所謂的楚式銅器，不僅如此，位於盆地西北方的淅川下寺墓地所隨葬的青銅器，更被視為同時期（即春秋中、晚期）最為典型的楚式銅器。儘管以上的觀點大致可從，然而令人好奇的是，本階段的青銅器究竟在何等的程度上與前個時期不同，以致學者將之歸入楚式銅器之列？

## 1. 新增的器類

最顯目的變化，莫過於南陽盆地在本階段新增了許多前期未見的器類。若將青銅容器依性質區分，南陽盆地「楚文化」時期與「周文化」時期相同，均可分為食器、酒器與水器。不過，只要比對前後兩期的器類，我們便立即能發現明顯的差異。就同者而言，兩個時期均包括食器的鼎、鬲、甗、簋、簠、盆，酒器的方壺與圓壺，以及水器的盤、匜，共計 10 種；然而就異者而論，「周文化」時期的酳與杯等 2 種酒器不見於「楚文化」時期，而「楚文化」時期則發現至少 14 種「周文化」時期未見的器類，諸如盞、敦、豆、盒、匕、鐘等食器，尊缶、盉、鉶、勺等酒器，以及小口鼎、浴缶、鑑、斗等水器，<sup>230</sup>其中不乏典型的楚式銅器，又以尊缶、浴缶與小口鼎最具代表性。

尊缶是楚式青銅容器中最具特色的酒器之一。目前所見最早的尊缶發  
現於淅川下寺的 M1、M2、M3，屬春秋晚期前段，每座墓葬各有 2 件，形

230 南陽盆地「周文化」時期與「楚文化」時期青銅容器器類的比較如下表：

功能	食器										酒器							水器												
	鼎	簋	簠	鬲	盆	盨	敦	豆	甗	盒	匕	鑊	尊	缶	方	壺	圓	壺	盉	醞	杯	鉶	勺	小口	鼎	浴	缶	鑑	盤	匜
器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楚	○	○	○	○	○	○			○					○	○	○	○	○	○	○	○					○	○	○	○	○

制大致相同，帶蓋，短頸，鼓腹，腹部帶有 4 只分成 2 對的環鈕，每對環鈕各置一條提鍊（圖六十四左），自名尊缶。<sup>231</sup>時代略晚、屬春秋晚期後段的下寺 M10、M11 也各出土 2 件，只是形制略有變化，不但頸部加長，而且腹部的環鈕由 2 對 1 組變為 4 個相互對稱的形式（圖六十四右）。<sup>232</sup>這種頸部較長、腹部飾以 4 個對稱環鈕的型態，即為楚式尊缶的標準特徵，<sup>233</sup>不但在楚國的墓葬時有所見，被學者歸入楚系墓葬的安徽壽縣蔡侯墓<sup>234</sup>與湖北隨州擂鼓墩二號墓<sup>235</sup>亦曾出土，其它地區則較為罕見。過去，學者曾經認為尊缶只隨葬於等級較高的貴族墓內，等級較低的楚國墓葬則埋有仿銅陶缶。<sup>236</sup>然而在南陽盆地內，尊缶除了發現於隨葬青銅容器較多的墓葬，諸如淅川下寺與徐家嶺、<sup>237</sup>南陽物資城 M1、<sup>238</sup>襄樊團山 M1、<sup>239</sup>棗陽九連墩，<sup>240</sup>另外，在襄樊余崗墓地中，則分別在 4 座僅隨葬 3 至 5 件青銅容器的墓葬裡各發現 1 件尊缶，<sup>241</sup>顯示至少在襄樊地區，隨葬銅尊缶的風尚已經向下蔓延，並非只是中、高階貴族的專利。

另一項楚式特徵鮮明、亦自名為缶的青銅容器是作為水器的浴缶，最早見於屬春秋中期後段的淅川下寺 M7，在隨後的下寺 M1、M2 始見自名器，<sup>242</sup>安徽壽縣蔡侯墓所出同類青銅容器則自名為盥缶。<sup>243</sup>浴缶的基本特徵是帶蓋，深鼓腹，與早期的尊缶相近，然而整體形制更加矮胖，頸部較

23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頁 68-70、131-133、226-227。

23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頁 253、299、301。

233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頁 182。

234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省博物館，《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頁 8。

235 隨州市博物館編著，《隨州擂鼓墩二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236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頁 182。

237 淅川徐家嶺墓地則見於 M1、M9、M10 與 M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編著，《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頁 184、230、232、267；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調文物保護辦公室、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淅川縣徐家嶺 11 號楚墓〉，《考古》2008 年第 5 期，頁 44。

238 董全生、李長周，〈南陽市物資城一號墓及其相關問題〉，《中原文物》2004 年第 2 期，頁 48。

239 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陽團山東周墓〉，《考古》1991 年第 9 期，頁 783-784。

240 湖北省博物館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楚國貴族大墓》，頁 42、59。

241 包括 M175、M180、M214、M215。王先福，〈襄樊余崗墓地楚式青銅禮器分期研究〉。

24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頁 32、35、65、68、130-131。

243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省博物館，《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頁 9。

短，器蓋通常罩住整個頸部，器腹常帶兩獸首環耳。此外，大多數浴缶的器身均附加帶有渦紋的圓形枚飾（圖六十五左）。浴缶不僅見於盆地內的淅川、<sup>244</sup>南陽、<sup>245</sup>襄樊、<sup>246</sup>穀城，<sup>247</sup>更大量流行於楚國境內與周邊地區。相對之下，中原地區常見的水器為罍（圖六十五右），其形制雖然與浴缶接近，但前者的頸部較長，而且口沿的與器蓋相合的型態，與浴缶蓋大口小的作風有別。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浴缶與罍這兩類水器，分別屬於楚文化系統與中原文化系統。<sup>248</sup>



圖六十四 左：【鄭子睂尊缶】右：淅川下寺 M11 銅尊缶

（圖左採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0·東周（4）》，圖版 45；圖右採自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頁 301，圖 227）

小口鼎亦為楚式青銅器中常見的器類，以帶蓋、直領小口、圓腹、下接三蹄足為主要特徵，器蓋如同倒置的碗罩住整個器口，與浴缶的作法相同（圖六十六左）。目前，楚國境內所見最早的小口鼎，亦發現於淅川下寺，

24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頁 13、32、35、40、65、68、130-131、225-226、244、252-253、298-29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編著，《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頁 39、45、128、130、184、232、265、267；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調文物保護辦公室、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淅川縣徐家嶺 11 號楚墓〉，《考古》2008 年第 5 期，頁 44-45。

245 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萬家園 M181 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09 年第 1 期，頁 6-7。

246 湖北省博物館，〈襄陽山灣東周墓葬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3 年第 2 期，頁 8-9；〈襄陽蔡坡戰國墓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5 年第 1 期，頁 14。

247 陳千萬，〈穀城新店出土的春秋銅器〉，《江漢考古》1986 年第 3 期，頁 13。

248 劉彬徽，〈罍、缶辨正〉，《江漢考古》1982 年第 2 期，頁 92-93；《楚系青銅器研究》，頁 207-210；余慧君，〈淅川下寺器群研究——楚系青銅器區域風格及其成因〉（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頁 20、55。

在 M1、M2、M3 中各出 1 件，其中，M2 的小口鼎自名為「盪鼎」，M3 則自名為「浴鼎」，<sup>249</sup>一般則以「浴鼎」通稱，屬於水器，<sup>250</sup>但劉彬徽則持不同看法，認為小口鼎可能亦屬食器。<sup>251</sup>目前所見最早的小口鼎（圖六十六右）屬春秋早期，但並非發現於楚國境內，而是出土於安徽中部的繁昌與舒城一帶，<sup>252</sup>學者因此認為，楚式的小口鼎可能即源於安徽中部，自春秋中期後引入楚國，並轉而成為楚國重要的青銅器類。<sup>253</sup>南陽盆地除了在淅川下寺出土小口鼎外，尚見於淅川徐家嶺 M11<sup>254</sup>與南陽物資城 M1，<sup>255</sup>均為等級較高的貴族墓葬。



圖六十五 左：【朋浴缶】 右：【夔鳳紋罍】

（圖左採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0·東周(4)》，圖版 65；圖右採自《中國青銅器全集·8·東周(2)》，圖版 49）

除了前述的尊缶、浴缶、小口鼎外，食器的盞、敦，以及器酒的盃，亦為南陽盆地「楚文化」時期新增器類中典型的楚式銅器。盞（圖六十七）的形制與盆相近，帶蓋，不同之處在於下接三小足。劉彬徽指出，儘管盞在三晉與山東地區均曾發現，但楚國出土的該類銅器時代最早，而且數量

24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頁 54、110-112、218-220。

250 李零，〈論楚國銅器的類型〉，收入氏著，《入山與出塞》，頁 314-315。

251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頁 130-132。

252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繁昌縣文化館，〈安徽繁昌出土一批春秋青銅器〉，《文物》1982 年第 12 期，頁 47；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舒城縣文物管理處，〈安徽舒城縣河口春秋墓〉，《文物》1990 年第 5 期，頁 59。

253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頁 132-133；李零，〈論楚國銅器的類型〉，收入氏著，《入山與出塞》，頁 314-315。

254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調文物保護辦公室、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淅川縣徐家嶺 11 號楚墓〉，《考古》2008 年第 5 期，頁 44。

255 南陽物資城 M1 出土的小口鼎則自名為「湯鼎」。董全生、李長周，〈南陽市物資城一號墓及其相關問題〉，《中原文物》2004 年第 2 期，頁 46。

也最多，因此銅盞可能為楚人所創。<sup>256</sup>南陽盆地的盞出土於淅川下寺、<sup>257</sup>南陽萬家園、<sup>258</sup>襄樊山灣<sup>259</sup>與余崗<sup>260</sup>等地，但數量較少。



圖六十六 左：【𦨇鼎】右：【獸目交連紋鼎】

(圖左採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0·東周(4)》，圖版7；

圖右採自《中國青銅器全集·11·東周(5)》，圖版2)



圖六十七 【蟠蛇紋盞】

(採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0·東周(4)》，圖版29)

敦與盞同為食器，然而前者在楚文化的銅器系統中更加重要，是戰國時期隨葬青銅容器的基本配置。敦出現於春秋中期，以器蓋與器身皆圓為特徵，雖然在古代中國境內不同地區都曾發現這類銅器，但楚國所見的敦，基本上乃由兩個形狀完全相同的半球所組合而成，又稱圓體敦（圖六十八左），<sup>261</sup>特徵搶眼，與三晉、山東地區所見器蓋小於器身的型態不同（圖六十八右）。劉彬徽指出，圓體敦源自楚國境內，最早見於淅川下寺 M10，是楚國頗具代表性的青銅容器。<sup>262</sup>除了淅川以外，自春秋晚期以來，圓體敦大量流行於南陽盆地內各個地區，是本地最常見的青銅容器之一。

256 劉彬徽將盞稱為「盆形敦」。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頁152-158。

25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頁35、75、137、230。

258 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萬家園 M181 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09年第1期，頁7-8。

259 湖北省博物館，〈襄陽山灣東周墓葬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3年第2期，頁8。

260 王先福，〈襄樊余崗墓地楚式青銅禮器分期研究〉。

261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頁152-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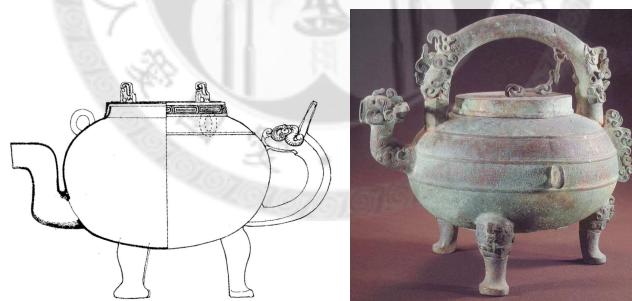
26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頁254；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頁152-164。



圖六十八 左：【變形蟠蛇紋敦】右：【幾何紋敦】

(圖左採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0·東周(4)》，圖版26；圖右採自《中國青銅器全集·8·東周(2)》，圖版48)

就銅盃而論，正如本章第二節所述，這類青銅容器在西周以前就已經有很長的使用歷史，而東周楚國所見的銅盃，學者大多認為屬於酒器。<sup>263</sup>楚式銅盃的造型與傳統的鬲形盃有別，自成一格，以淅川下寺M8出土者最早（圖六十九左），帶蓋、小口、鼓腹、三足，腹部前有彎管狀流，後帶獸首半環狀鑿；<sup>264</sup>時代稍晚的下寺M1、M3，出土銅盃的形制大致與M8相同，只是將獸首半環狀鑿改為提梁（圖六十九右），製作亦更加精美，<sup>265</sup>而後者的造型正是典型的楚式銅盃。南陽盆地除淅川下寺外，另在南陽八一路M1出土1件。<sup>266</sup>



圖六十九 左：淅川下寺M8銅盃 右：【蟠蛇紋盃】

(圖左採自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頁17，圖12；圖右採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0·東周(4)》，圖版62)

顯而易見的是，進入「楚文化」時期後，南陽盆地突然出現許多「周

263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頁198。

26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頁13。

26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頁75、230。

266 南陽市文物工作隊，〈南陽市西關三座春秋楚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頁108。

文化」時期未曾發現的青銅容器。透過以上的分析可知，這些新興的器類，不僅在一定的比例上即為典型的楚式銅器，而且在南陽盆地的青銅器群中，亦佔據重要的位置。然而，除了新興的器類展現典型的楚式風格外，即便是承繼自本地「周文化」時期固有的青銅容器，亦帶著典型的楚文化特徵。銅鼎便是最好的例子。

銅鼎是南陽盆地「楚文化」時期最常作為隨葬品的青銅容器，在本階段 65 座出土青銅容器的墓葬中，除極少數遭受盜掘或經人為破壞的墓葬外，無論規模大小，所有墓葬無一例外均隨葬銅鼎，與南陽盆地「周文化」時期的情況相彷彿。儘管銅鼎是南陽盆地隨葬青銅容器的基本器類，但前後兩大階段的造型卻出現極大的變化：南陽盆地「周文化」時期典型的寬體附耳鼎，以及常見的半球腹立耳鼎，在進入「楚文化」時期後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則是以帶蓋、附耳為主要特徵的銅鼎，並在等級較高的貴族墓葬中，諸如淅川下寺的 M1、M2，<sup>267</sup>和尚嶺的 M1，<sup>268</sup>徐家嶺的 M3、M9、M10，<sup>269</sup>以及棗陽九連墩的 M1，<sup>270</sup>出土造型奇特的束腰平底鼎。高崇文曾將楚國的銅鼎分為 7 類，<sup>271</sup>扣除少見的立耳鼎與越式鼎外，另外 5 類即為劉彬徽所論的折沿鼎、箍口鼎、子口鼎、束腰平底鼎與小口鼎。<sup>272</sup>這 5 類銅鼎均為楚國最為常見的銅鼎形制，亦正是南陽盆地本階段主要的銅鼎型態。由此可見，即便南陽盆地的「楚文化」時期繼承「周文化」時期喜用銅鼎隨葬的習俗，但本階段銅鼎的造型與前期大相逕庭，處處可見楚文化的影響，顯示楚式風格不僅展現於新興的器類之上，更滲入當地固有的器類之中。

## 2. 組合的變化

除了新增許多前期不見的器類，「楚文化」時期隨葬青銅容器的組合，亦與「周文化」時期有所差異。有別於南陽盆地「周文化」時期以鼎、簋、

26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頁 52、60、112-125。

26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編著，《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頁 7-9。

26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編著，《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頁 125-128、174、177-178、249、251-253。

270 湖北省博物館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楚國貴族大墓》，頁 28-29。

271 高崇文，〈東周楚式鼎型態分析〉，《江漢考古》1983 年第 1 期，頁 1-18、50。

272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頁 111-133。

壺、盤、匜為中心的隨葬組合，本階段雖仍保留烹煮食物的鼎，以及盥洗用的盤、匜，但出現明顯的變化。就粢盛器的簋而言，春秋中期以後，簋取而代之，成為隨葬青銅容器的基本配置，而春秋晚期才出現的敦，至戰國時期又代替了簋位置；就酒器的壺而言，儘管在春秋中期以後的南陽盆地仍時有所見，但南陽盆地新出的缶，即包括前述作為水器的浴缶及酒器的尊缶，亦取代原先壺的地位，在隨葬青銅容器中扮演要角。

「楚文化」時期以食器的鼎、簋、敦，酒器的尊缶，以及水器的浴缶、盤、匜為基調的隨葬青銅容器組合，顯然與本地「周文化」時期以鼎、簋、壺、盤、匜為主的青銅容器組合不同。不僅如此，若將本階段南陽盆地隨葬青銅容器的組合與中原地區相比，差別亦相當清楚，後者則以鼎、簋（豆）、鉶（罍、壺）、盤、匜為中心，<sup>273</sup>少見南陽盆地流行的簋、敦、缶。相較之下，本地與普遍認知的楚式隨葬青銅容器的基本組合近似，只是後者在戰國時期更加流行以銅壺隨葬。<sup>274</sup>

### 3.階級性的出現

進入「楚文化」時期後，南陽盆地不但新增了許多前期未見青銅容器，而且固有器類的形制亦變化明顯。此外，隨葬青銅容器的基本組合亦與「周文化」時期有別，而這些特徵鮮明的變化，均與典型的楚式風格無異。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便是區域性的消失與階級性的出現。

如前所述，「周文化」時期南陽盆地的青銅容器，在南陽、襄樊、棗陽與新野等地，均出現不同的特徵。簡言之，北方屬申國的南陽與典型的周文化更加接近，南方屬鄧國的襄樊在仿效周文化同時又試圖另闢蹊徑，東南方屬曾國的棗陽獨特性較強，而位居盆地中央的新野則過渡於北方的周文化與南方的地域文化之間。然而，這種區域性的差異在進入「楚文化」時期後迅速消失，除了少數墓葬，如南陽的西關煤場墓葬與煙草專賣局M1，<sup>275</sup>以及部分青銅器的作風較為特殊外，大部分的青銅容器皆屬楚式銅器的範疇。在此大前提之下，本階段南陽盆地的青銅容器，則呈現明顯的

273 高明，〈中原地區東周時代青銅禮器研究（上）〉，《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1期。

274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頁85-92。

275 王儒林、崔慶明，〈南陽市西關出土一批春秋青銅器〉，《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頁39-41；南陽市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南陽市煙草專賣局春秋、西漢墓葬的發掘〉，《華夏考古》1999年第3期，頁46-47。

階級性。

劉彬徽曾將楚系青銅器的隨葬組合，區分為甲、乙、丙三類。甲類即複合組合，不僅食器、酒器、水器與樂器俱全，而且各類中又往往包含幾種不同的器類；乙類即基本組合，以食器的鼎、簋、敦，酒器的尊缶、壺，水器的浴缶、盤、匜為基本配置；丙類即簡化組合，也就是乙類的簡化版本，僅隨葬基本組合的其中幾種，組合不全。<sup>276</sup>楊寶成依墓葬等級的高低，將楚國青銅禮器的組合區分為大、中、小型墓三類，這種分類方式基本上與劉彬徽得到的結論相同，只是楊氏指出楚國春秋時期的小型墓更加流行隨葬銅簋。<sup>277</sup>羅泰則將東周時期隨葬的青銅器，分為一般器群（Ordinary Assemblage）與特別器群（Special Assemblage）兩類，前者是各文化系統的基本器類，區域風格明顯，楚國銅器即以劉彬徽所論的乙類基本組合為代表，出現於中、低階級的貴族墓裡；後者則是東周列國高級貴族所共同流行的器類，同質性較高，但罕見於等級較低的貴族墓，就楚國而言，包括升鼎（即平底束腰鼎）、簋、鬲與方壺，而這些器類均源自於西周晚期以來的「禮制改革」（Ritual Reform），亦即前述羅森所謂的「禮制變革」，具有特定的宗教意涵。<sup>278</sup>南陽盆地「楚文化」時期墓葬所見青銅器群的階級性，亦可透過以上的研究成果進行分析。

第一級墓葬，亦即本階段南陽盆地等級最高的墓葬，可舉春秋晚期的淅川下寺 M1、M2 與淅川徐家嶺 M9，<sup>279</sup>戰國早期的淅川徐家嶺 M10，<sup>280</sup>以及戰國中晚期的棗陽九連墩 M1、M2 為代表。<sup>281</sup>這 6 座墓葬隨葬青銅器組合的特徵與劉彬徽所述的甲類組合一致，包含食器、酒器、水器與樂器四大類別，各類中又包含數種器類。以淅川下寺 M2 為例，墓主應為楚國令尹鄒子朋，該墓儘管遭受盜掘，但仍出土 50 件青銅容器，除了楚式器群常

276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頁 83-92。

277 楊寶成，〈楚國青銅禮器組合研究〉，《華夏考古》2000 年第 2 期，頁 87-93。

278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 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pp. 338-369.

27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頁 50-21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頁 173-217。

28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頁 247-331。

28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棗陽市九連墩楚墓〉，《考古》2003 年第 7 期，頁 10-14；湖北省博物館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楚國貴族大墓》。

見的鼎、簠、盞、尊缶、浴缶、小口鼎、盤、匜外，食器另有升鼎、簋、鬲、豆、盆、匕，酒器有方壺、鉶、勺，水器有鑑、斗，此外，還發現 26 件成套的【王孫誥甬鐘】。值得一提的是，這 6 座墓葬均出土羅泰所論的「特別器群」，亦即升鼎、簋、鬲、方壺等青銅容器，顯示墓主身分的特殊性。此外，時代屬春秋晚期的淅川和尚嶺 M1 與徐家嶺 M3 嚴重被盜，<sup>282</sup>儘管如此，由於這 2 座墓葬均發現銅升鼎，徐家嶺 M3 另見青銅樂器，包括 8 件編鎛與 9 件編鐘，顯示墓主身分較高，所以亦可歸入本類。

第二級墓葬則以淅川下寺 M10 與和尚嶺 M2 為代表。<sup>283</sup>這 2 座墓葬雖然與第一級墓葬相同，均埋有食器、酒器、水器與樂器等四類銅器，但前三項大多僅見楚式器群的基本組合，內容單純。就下寺 M10 而論，食器有鼎、簠、敦，酒器有尊缶、勺，水器則為浴缶、盤、匜與斗；和尚嶺 M2 的容器類別大抵與下寺 M10 相同，只是前者的酒器以圓壺替代尊缶。值得注意的是，2 座墓葬的青銅樂器組合幾乎一致，均為 8 件編鎛配上 9 件編鐘，另外加上 1 組石磬（下寺 M10 有 13 件，和尚嶺 M2 有 12 件）。這種樂器配置，與筆者列入第一級墓葬的徐家嶺 M3、M10 完全相同。<sup>284</sup>由此可見，南陽盆地屬第二級墓葬的青銅器組合，僅是第一級墓葬的簡化版本。至於下寺 M3 的情況則較為特殊，雖然共隨葬 24 件青銅容器，比前兩座墓葬更多，不過未見青銅樂器。<sup>285</sup>根據墓葬規模與隨葬品內容研判，當可列入本級。附帶一提的是，屬戰國早期的淅川徐家嶺 M11，據現有的簡報可知，亦隨葬較多的青銅器，包括 25 件容器與 11 件成套的編鐘。<sup>286</sup>該墓青銅容器的組合基本上與淅川 M10 與和尚嶺 M2 相同，但增加食器的鬲與甗，以及水器的小口鼎，規格介於第一級與第二級墓葬之間。筆者則暫時將徐家嶺 M11 歸入第二級墓葬之內。

28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頁 5-24、122-173。

28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頁 247-29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頁 24-119。

28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頁 122-173、247-331。

28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頁 212-240。

286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調文物保護辦公室、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淅川縣徐家嶺 11 號楚墓〉，《考古》2008 年第 5 期，頁 41-48。

第三級墓葬的數量比前兩級稍多，就保存較為完整的墓葬而論，至少有 11 座，包括南陽的物資城 M1，<sup>287</sup>浙川的下寺 M11，<sup>288</sup>襄樊的山灣 M6、M14、M15、M23、M33，<sup>289</sup>團山的 M1，<sup>290</sup>蔡坡的 M4，<sup>291</sup>賈莊的 M1，<sup>292</sup>以及穀城新店墓葬。<sup>293</sup>這群墓葬出土的青銅器，除少數例外，如穀城新店墓葬發現 1 件銅鉶外，大多僅見楚式銅器的基本組合，亦即劉彬徽所論的乙類組合，只有容器，不見樂器。儘管上列均屬筆者所論的第三級墓葬，但其中仍有高低之別，如穀城新店出土的青銅容器數量最多，共 17 件；襄樊山灣 M15 及 M23 則各僅有 5 件。由此可見，第三級墓葬又是第二級墓葬的簡化版本，而最明顯的差異在於不隨葬青銅樂器。

第四級墓葬的數量居所有隨葬青銅器墓葬之冠，分佈於南陽、浙川與襄樊，又以後者最多。這類隨葬出土青銅器的內涵雖與第三級相同，亦以楚式器群為主，但組合不完整，也就是劉彬徽所說的丙類組合。

由上可見，雖說第二級墓葬的數量比第一級少，但整體而言，南陽盆地「楚文化」時期隨葬青銅器墓葬的等級與數量，呈現金字塔狀的分佈結構，亦即高等級墓葬的數量較少，低等級的數量較多，說明本階段南陽盆地不同地區的青銅器群，雖然共同以楚式風格為基調，特徵一致，但在使用脈絡上，呈現明顯階級性的差異。

## （二）中原因素的影響

南陽盆地「楚文化」時期的青銅器群，以鮮明的楚式作風為主要特徵。然而，由於當地離北方的中原地區接近，因此，南陽盆地出土的青銅器群，或多或少受到中原因素的影響。除了羅泰所論屬「特別器群」的簋、鬲、方壺外，以下，筆者將舉簋、鉶、豆為例，說明本階段南陽盆地青銅器群與中原地區的關係。

287 董全生、李長周，〈南陽市物資城一號墓及其相關問題〉，《中原文物》2004 年第 2 期，頁 46-48。

28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浙川縣博物館，《浙川下寺春秋楚墓》，頁 293-307。

289 湖北省博物館，〈襄陽山灣東周墓葬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83 年第 2 期，頁 1-35。

290 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陽團山東周墓〉，《考古》1991 年第 9 期，頁 781-802。

291 湖北省博物館，〈襄陽蔡坡戰國墓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5 年第 1 期，頁 1-37。

292 王先福、王志剛、范文強，〈湖北襄樊市賈莊發現東周墓〉，《考古》2005 年第 1 期，頁 92-95。

293 陳千萬，〈穀城新店出土的春秋銅器〉，《江漢考古》1986 年第 3 期，頁 13-16。

銅簠（圖七十）的基本特徵為長方體，器蓋與器體造型相同，上下一對，屬粢盛器。這類青銅容器源於中原地區，始見於西周早期後段，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數量漸增。<sup>294</sup>不過，由於中原地區的粢盛器流行使用銅簠或銅豆，因此銅簠通常只出現在等級較高的貴族墓葬中，諸如虢國墓地M2001與M2012，<sup>295</sup>低級貴族墓葬則不常見。相對之下，銅簠則是南陽盆地最常見的器類之一。目前南陽盆地所見最早的銅簠，出土於新野小西關71年墓與棗陽郭家廟M1，<sup>296</sup>屬春秋早期。進入「楚文化」時期後，直到戰國早期，無論等級高低的墓葬大多隨葬銅簠。不僅如此，銅簠更是楚式隨葬銅器組合的基本配置。由此可見，雖然作為粢盛器的銅簠源自中原，但在包括南陽盆地的楚文化影響地區，則已轉換使用脈絡，成為最重要的基本青銅容器之一。



圖七十 【棄疾簠】

（採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0·東周(4)》，圖版25）

南陽盆地出土的銅鉶（圖七十一），則是另一項受到中原因素影響的青銅容器。銅鉶通體做橢圓形、腹部微鼓、器身附以兩耳、平底，屬於飲酒器，不僅是春秋時期中原地區新出現的器皿，更是春秋中、晚期中原地區流行隨葬銅器組合的基本配置。<sup>297</sup>南陽盆地「楚文化」時期亦出土這類銅器，但是卻非常罕見，只有5件，分別出土於淅川下寺M2，<sup>298</sup>襄樊余

294 馬承源，《中國青銅器》，頁135。

29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三門峽虢國墓（第一卷）》，頁56-58、248-249。

296 鄭杰祥，〈河南新野發現的曾國銅器〉，《文物》1973年第5期，頁15；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路公路考古隊編著，《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頁238-240。

297 高明，〈中原地區東周時代青銅禮器研究（上）〉，《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1期。

29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頁136。

崗 M237、M241、M279，<sup>299</sup>以及穀城新店墓葬。<sup>300</sup>



圖七十一 【鑲嵌龍紋鉶】

(採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0·東周(4)》，圖版 54)



圖七十二 左：淺盤銅豆 右：方形蓋銅豆

(採自湖北省博物館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貴族大墓》，頁 35、36)

至於本階段南陽盆地出土銅豆的情況，則與銅鉶有相似之處。銅豆亦為東周中原地區常見的銅器器類，是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隨葬銅器的基本配置。<sup>301</sup>然而，相較之下，南陽盆地只有 4 座墓葬出土，分別是淅川下寺 M2 與徐家嶺 M10，<sup>302</sup>以及棗陽九連墩的 M1 與 M2。<sup>303</sup>引人注意的是，南陽盆地的銅豆目前只出現在高等級的貴族墓中，此外，造型變化多端，除下寺 M2 因只剩殘片而形制不明外，至少包括淺盤豆（圖七十二左）、深腹豆、方形蓋豆（圖七十二右）與圓形蓋豆。更特別的是，僅棗陽九連墩 M1、M2，就各出土 12 件銅豆，<sup>304</sup>情況相當特別。由此可見，在中原地區

299 王先福，〈襄樊余崗墓地楚式青銅禮器分期研究〉。

300 陳千萬，〈穀城新店出土的春秋銅器〉，《江漢考古》1986 年第 3 期，頁 14。

301 高明，〈中原地區東周時代青銅禮器研究（上）〉，《考古與文物》1981 年第 1 期。

30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頁 13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頁 262-264。

303 王紅星，〈九連墩 1、2 號楚墓的年代與墓主身分〉，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六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頁 435；湖北省博物館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貴族大墓》，頁 33、35-37、57。

304 王紅星，〈九連墩 1、2 號楚墓的年代與墓主身分〉，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六集）》，頁 4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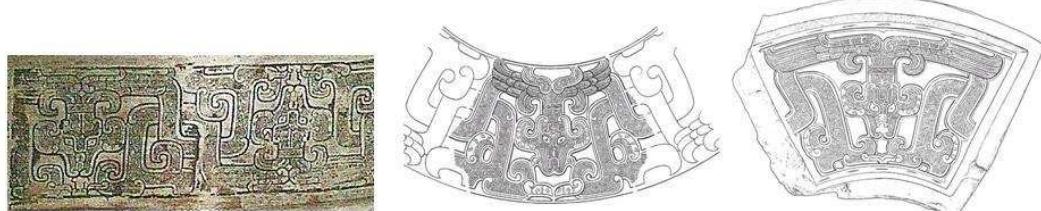
普遍使用的銅豆，在引入南陽盆地之後，反倒成為極具身分象徵的青銅容器。

雖然整體觀之，本階段南陽盆地青銅器的楚式風格鮮明，中原因素較少，不過在某些特定墓葬出土的青銅器群上，仍可以看到較多中原因素的色彩。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棗陽九連墩的 M1 與 M2。



圖七十三 九連墩 M1、M1 出土晉系銅器 左：銅鼎 中：銅圓壺 右：銅鑑  
(採自湖北省博物館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貴族大墓》，頁 53、63、64)

這兩座墓葬屬戰國中、晚期，經鑑定，M1 墓主為男性，M2 墓主為女性，兩者的關係應為夫妻。<sup>305</sup>就墓葬本身的形制而言，帶有典型的楚墓特徵：墓上皆有封土、墓坑四壁皆設 14 層逐級內收的台階、墓坑東側則均設有斜坡墓道。<sup>306</sup>就隨葬品而言，除發現典型的楚式銅器外，九連墩 M1、M2 還出土一些晉系風格的青銅器。而這批青銅器的來源，可能來自於山西侯馬鑄銅作坊。<sup>307</sup>



圖七十四 左：九連墩 M2 銅鼎局部紋飾 中：山西侯馬鑄銅作坊出土陶範紋飾復原圖  
右：2003 年山西侯馬鑄銅作坊出土的陶範

(圖左採自湖北省博物館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貴族大墓》，頁 53；圖中採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侯馬鑄銅遺址》，頁 242，圖 131；圖右採自李夏廷，《晉國青銅藝術圖鑑》，頁 134)

305 王紅星，〈九連墩 1、2 號楚墓的年代與墓主身分〉，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六集）》，頁 434。

30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棗陽市九連墩楚墓〉，《考古》2003 年第 7 期，頁 11-13。

30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侯馬鑄銅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九連墩 M2 的鼎、圓壺、鑑（圖七十三）等青銅容器，其上的紋飾相同，均為正面剖半的交纏龍紋，正反交錯，相互纏繞，並向二側延伸，環繞器身（圖七十四）。在侯馬陶範中，相同的紋飾也分布在鼎、圓壺、鑑等青銅器上。此外，在山西太原金勝村 M251 的列鼎上亦飾以相同紋飾。<sup>308</sup>可見正面剖半的交纏龍紋，為典型的晉系風格，流行於戰國早、中期。

此外，前述九連墩 M2 出土的銅鼎、銅圓壺與銅鑑，其形制也屬於典型晉器。即便如銅鑑耳部的獸面裝飾風格，渾圓而充滿層次感，亦為晉系銅器所常見，侯馬鑄銅遺址即出土不少類似陶範，<sup>309</sup>山西長治分水嶺 M126 的鑑耳亦屬此類（圖七十五）。<sup>310</sup>



圖七十五 左：九連墩 M1 銅鑑鑑耳出土晉系銅器 右：山西長治分水嶺 M126 鑑耳

（圖左採自湖北省博物館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貴族大墓》，頁 64；

圖右採自邊成修，〈長治分水嶺 126 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 年第 4 期，圖 7）

M2 還發現 1 件立鳥盆（圖七十六左），盆中有一振羽立鳥。類似形制的陶器在中原地區時有所見，是頗具特色的器物，<sup>311</sup>盛行於戰國中期晚段以降。<sup>312</sup>再者，M1 出土 1 件銅製的高柄壺（圖七十六右），如前所述，在戰國早、中期的南陽盆地亦曾發現造型相同的陶器，應該也是受到中原因素的影響。

由上可知，在戰國中、晚期的九連墩 M1、M2 中，發現較多明顯與中原風格——甚至就是晉系風格——相同的青銅容器，而且又以 M2 的數量較多。前面已經提到，M2 的墓主為女性，而 M1 與 M2 的墓主應為夫妻

30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晉國趙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頁 25。

30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編，《侯馬鑄銅遺址》，頁 181-182。

310 邊成修，〈長治分水嶺 126 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 年第 4 期。

311 張辛，《中原地區東周陶器墓葬研究》，頁 8。

312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頁 1933-1935。

關係，如果以上推論無誤，那麼 M2 之所以出土較多中原風格的青銅器，可能是由於 M2 的墓主本是中原地區的貴族女性，因嫁給 M1 的墓主，於是把這批中原風格鮮明的銅器帶入南陽盆地。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另一個可能，亦即九連墩 M2 的墓主，向山西侯馬鑄銅作坊訂購了這批銅器。



圖七十六 左：九連墩 M2 銅立鳥盆 右：九連墩 M1 銅高柄壺  
(採自湖北省博物館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貴族大墓》，頁 41、66)

### (三)「周文化」時期的餘架

南陽盆地自進入「楚文化」時期後，當地的青銅容器隨即展現強烈的楚式作風，與「周文化」時期本地特色鮮明的狀況形成強烈對比。雖然楚式的青銅器作風主宰本階段的南陽盆地，然而，仍有少量當地「周文化」時期的銅器特徵仍為「楚文化」時期所繼承，只是在後者整體的青銅器群中，所佔比例極小。舉其要者，包括敞口折肩盆與方形器座。

敞口折肩盆出現於春秋早期的南陽盆地與鄰近的淮河上游地區。在進入「楚文化」時期後，南陽盆地雖然亦曾出土形制相同的銅盆，但目前僅在淅川下寺 M2 發現 1 件，<sup>313</sup>屬春秋晚期早段。

如前所論，造型奇特的方形器座，最早出土於南陽盆地境內的棗陽郭家廟 M17，屬春秋早期，而在淮河上游的黃君孟夫人墓中 (G2)，亦曾出土 1 件形制相近的銅器，但時代稍晚。進入「楚文化」時期後，南陽盆地又分別在淅川下寺 M1 與和尚嶺 M2 中，<sup>314</sup>各發現 1 件造型類似的銅器。

313 報告稱這件青銅容器為「蓋」。在下寺 M2 中，另出土 1 件銅製的「盆」，但造型與南陽盆地「周文化」時期典型的敞口折肩盆不類。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頁 136。

31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頁 93-9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頁 109。

此外，上述 4 座發現方形器座的墓葬均為女性墓。由此可見，不論在器物形制上，或在使用脈絡上，前後期均有明顯的繼承關係。值得注意的是，方形器座不僅發現於南陽盆地，自春秋晚期以降，類似造型的銅器亦出現於長江下游的浙江紹興塘坡 M306 與安徽屯溪奕棋 M3<sup>315</sup>、山東半島東南的山東長青仙人台郭國墓地<sup>316</sup>，以及中原地區的河南輝縣琉璃閣 M76<sup>317</sup>，然而造型略有改變，如在紹興塘坡 M306 出土的 2 件銅方形器座中，1 件在器底四角設跪坐銅人（圖七十七左），另 1 件則做「房屋模型」的型態（圖七十七右）。張昌平指出，源於南陽盆地的銅方形器座，可能因東周楚國外征伐的關係，傳至其它地域，並產生不同的特徵。<sup>318</sup>



圖七十七 左：【獸紋人形足方座】 右：【鳩柱房屋模型】

（採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0·東周（5）》，圖版 107、105）

總之，南陽盆地「楚文化」時期的銅器作風，僅繼承了本地「周文化」時期較為次要器類，包括敞口折肩盆與方形器座。至於更具身分性的寬體附耳鼎與折肩扁體鬲，則在進入「楚文化」時期後迅速消失。而這樣的狀況，亦正宣告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315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紹興地區文化局、紹興市文管會，〈紹興 306 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 1 期，頁 16-17；殷滌非，〈安徽屯溪周墓第二次發掘〉，《考古》1990 年第 3 期；李國梁主編，《屯溪土墩墓發掘報告》（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頁 18-20。

316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9·東周（3）》（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圖 92。

317 余慧君，〈浙川下寺器群研究——楚系青銅器區域風格及其成因〉，頁 58，註 25。

318 張昌平，《曾國青銅器研究》，頁 318。

### 三、速變與漸變

進入「楚文化」時期後，南陽盆地的考古遺存，不論是反映本地居民日常生活的陶器，或者代表統治階層喜好與品味的青銅器，均增添了許多新興的楚式作風，而當地原有的物質文化，亦出現顯著的變化。毫無疑問，「楚文化」的確是引領南陽盆地的文化面貌出現新局的關鍵因素，但透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卻可以清楚看到在南陽盆地「楚化」的過程中，下層的居民與上層的貴族在吸收楚文化因素時，兩者間存在明顯的時代落差。

極具政治意涵、象徵統治階層威望與財富的青銅器，自春秋早期轉入中期，也就是從本文所論的「周文化」時期跨進「楚文化」時期後，由原本受周文化影響但地方風格強烈的情況，迅速轉變為典型的楚式風格，淅川下寺墓群所出土的青銅器，更是今日學界判斷春秋中、晚期楚式銅器的標準器。儘管本階段的青銅容仍帶有一定程度的中原因素，甚至在隱微處延續本地「周文化」時期的影響，但就整體的狀況而論，「周文化」時期與「楚文化」時期的青銅器風格，繼承的部分少，斷裂的部分多，說明南陽盆地的統治階層已經迅速接受楚文化，正與一般認知本階段南陽盆地是楚國領土的看法相符。

相對之下，陶器的發展則呈現另一番風貌。楚文化雖然亦對本階段南陽盆地的陶器造成明顯的影響，但是自始至終，「周文化」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本地傳統與中原文化因素，卻以不同的方式，持續對南陽盆地施加不同的影響，只是隨著時代變遷，影響力逐步衰退。換言之，即便邁入了「楚文化」時期，南陽盆地的陶器仍延續「周文化」時期的作風，只不過楚文化因素漸增，本地傳統與中原因素漸減，正反映一段緩慢發展的變化過程，與青銅器迅速楚化的狀況大異其趣。

青銅器的速變與陶器的漸變，揭示了南陽盆地不同層次的物質文化，在面對外來強勢文化系統時所產生的不同反應。隨著統治集團的更迭，象徵統治階層的青銅器隨即敏感地產生劇烈變化，但對於代表一般庶民生活的陶器而言，固有文化因素的影響則更加深遠，而對於政治情勢變化的反應也更加遲緩。因此，即便本階段的青銅器可以直接歸入楚文化的範疇，然而陶器的發展是否亦可等同視之？這是一個有待考慮的問題。

## 第四節 「秦文化」影響時期（279-221 BC）

### ——本地傳統與外來因素的交融

周代南陽盆地的最後一個階段是「秦文化」影響時期。所謂的「秦文化」與「楚文化」的概念類似，均是以傳世文獻中記載的「國名」或「族名」，也就是「秦」，為特定時空範圍的考古學文化命名，有些學者則逕將「秦文化」等同於「秦族」所使用的考古學文化。<sup>319</sup>一般認為，「秦文化」的起源可追溯至西周早期，甚至是商代晚期，下限則到西漢初期；分佈區域以甘肅東部與陝西關中為中心，戰國中晚期後隨著秦國勢力的擴張，才逐漸遍佈於古代中國各地。<sup>320</sup>根據文獻史料記載，南陽盆地在西元前 279 年以後成為秦國的領地，而就考古材料而論，當地在戰國晚期後段亦開始出現許多外來「秦文化」因素的影響，兩者的關係可相互對應。儘管本階段南陽盆地文化面貌變化明顯，然而仍以固有的特徵為主，因此本階段稱為「秦文化」影響時期。

相對於早先的「楚文化」時期，本階段時間較短，前後僅約 60 年，考古遺址亦大幅減少。目前經正式報導屬於「秦文化」影響時期的考古遺存，主要發現於盆地南方的襄樊地區，大多為墓葬，至少有 62 座，包括王坡、蔡坡、余崗與鄭家山等地，其中又以王坡墓地發現 39 座最多；<sup>321</sup>生活遺址甚少，僅在賈莊發現水井。<sup>322</sup>另外，在南陽的宛城遺址亦見屬於本階段的水井。<sup>323</sup>

319 牛世山，〈秦文化淵源與秦人起源探索〉，《考古》1996 年第 3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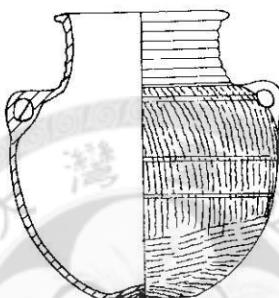
320 王學理、梁雲，《秦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 3；滕銘予，《秦文化：從封國帝國的考古學觀察》（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頁 3-5、40-42。

32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頁 64-217；湖北省博物館，〈襄陽蔡坡戰國墓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5 年第 1 期，頁 1-37；襄樊市考古隊，〈湖北襄樊市蔡坡戰國墓第二次發掘〉，《考古》2005 年第 11 期，頁 30-41；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陽余崗戰國墓發掘簡報〉，《考古》1992 年第 9 期，頁 795-802；〈湖北襄樊市余崗戰國至東漢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6 年第 3 期，頁 339-357；〈襄樊余崗戰國秦漢墓第二次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3 年第 2 期，頁 3-1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鄭家山戰國秦漢墓〉，《考古學報》1999 年第 3 期，頁 367-392。

322 襄樊市考古隊，〈襄樊市鄧城古井清理簡報〉，《考古》2005 年第 1 期，頁 19-23。

323 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陽市宛城遺址戰國水井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03 年第 4 期，頁 12-14、40。

墓葬形制多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口大底小者較多，口底同大者居次，墓向以南北向為主，東西向較少。比較特別的是，王坡墓地還發現1座洞室墓M7。<sup>324</sup>就葬式而論，儘管人骨的保存狀況較差，但有跡可尋者均為仰身直肢。隨葬品以陶器為最大宗，包含仿銅陶器與生活陶器，前者以鼎、盒、壺（或加上豆）組合為主，後者有釜、罐、孟、豆等器類，還常見混出兩類陶器的墓葬。此外，還新出現一種雙耳陶罐（圖七十八），為同時代其它地區所罕見。<sup>325</sup>銅器則以帶鉤、銅鏡與兵器較多，容器少見，僅發現數量甚少的鼎、壺、鋗、鍪、盤、匜、盃與缶。



圖七十八 雙耳陶罐

（採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頁145，圖108：3）

顯而易見的是，本階段襄樊地區的文化面貌，與前個階段相比，增添許多新的因素，諸如洞室墓的發現，墓向朝北的比例明顯上升，新增鋗、鍪等青銅容器與鍪、釜等生活陶器作為隨葬品。這些現象皆不見於本地的「楚文化」時期，而是受到秦文化影響的產物。<sup>326</sup>儘管如此，大多數的學者認為，本階段襄樊地區的物質文化面貌仍以楚文化為主，秦文化為輔。<sup>327</sup>

32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頁85-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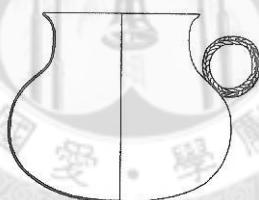
325 雙耳陶罐另見於盆地北方的南陽宛城遺址，但時代偏早，而且形制與襄樊地區有別，反倒與關中同類陶器接近。丁蘭指出，襄樊地區戰國晚期出現的雙耳陶罐，可能源於關中的秦文化。筆者認為，南陽宛城遺址的雙耳陶罐，為探索襄樊地區該類器物的來源，提供重要線索。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陽市宛城遺址戰國水井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03年第3期，頁12-14、40；丁蘭，《湖北地區楚墓分區研究》，頁168。

32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頁413。

32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鄭家山戰國秦漢墓〉，《考古學報》1999年第3期，頁388；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陽余崗戰國墓發掘簡報〉，《考古》1992年第9期，頁802；丁蘭，《湖北地區楚墓分區研究》，頁170。

筆者認為，更精確地說，本階段襄樊地區的文化面貌，延續的是本地「楚文化」時期的物質文化特徵。

首先，不論是「秦文化」影響時期或「楚文化」時期，墓葬形制均以口大底小的土坑豎穴墓為主，而口底同大者則佔一定比例，與江陵地區一律口大底小有別，<sup>328</sup>此外，亦罕見秦文化相當具代表性的洞室墓；<sup>329</sup>其次，前後兩期的墓坑內多填埋五花土，填青膏泥的狀況遠不如江陵地區普遍；<sup>330</sup>第三，前後兩期的葬式均為仰身直肢葬，不見秦文化常見的屈肢葬；<sup>331</sup>第四，本階段以鼎、盒、壺為主的隨葬陶器組合，在襄樊地區「楚文化」時期的末期（即戰國晚期前段）即已出現，具備鮮明的時代特徵，相對之下，江陵地區的陶盒少見；<sup>332</sup>最後，本階段部分的陶器特徵，諸如鼎的高足與壺的圈足作風，均見於本地的「楚文化」時期。當然，「楚文化」時期與「秦文化」影響時期仍有明顯不同之處，比如前者隨葬陶鬲的現象不見於後者，而前者常見的鼎、敦、壺組合在亦罕見於後者。不過，整體而言，正因為襄樊地區「秦文化」影響時期，仍保有濃厚「楚文化」時期的文化特徵，因此丁蘭指出，本階段襄樊地區的墓葬應屬楚遺民墓。<sup>333</sup>



圖七十九 銅鑊

（採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頁 164，圖 121：2）

328 王先福，〈襄北楚陶器墓綜述〉，《江漢考古》2000年第3期，頁89。

329 秦文化的洞室墓大約出現自戰國中期，此後成為標誌秦文化的主要特徵之一。以屬於戰國晚期至秦國統一六國時期的咸陽塔兒坡秦墓為例，洞室墓共發現281座，佔墓葬總數的73.75%。王學理、梁雲，《秦文化》，頁194；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塔兒坡秦墓》（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頁5。

330 王先福，〈襄北楚陶器墓綜述〉，《江漢考古》2000年第3期，頁89。

331 屈肢葬則為秦文化另一項極具代表的特徵。以時代上起春秋中期，下迄秦國統一六國的咸陽任家嘴秦墓為例，在234座葬式清楚的墓葬中，屈肢葬有185座，佔79%；而塔兒坡秦墓則在372座葬式清楚的墓葬中，發現屈肢葬267座，佔72%。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任家嘴秦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頁13-15；《塔兒坡秦墓》，頁10-12。

33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頁413。

333 丁蘭，《湖北地區楚墓分區研究》，頁170。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秦文化」影響時期的襄樊地區，經常出現融合當地「楚文化」時期傳統與新興秦文化因素的墓葬。舉例而言，在本地常見的長方形土坑墓中，往往發現同時帶有不同因素的隨葬品，如王坡 M111 除隨葬鼎、壺、雙耳罐等本地因素強烈的陶器，另埋有秦文化常見的銅鑊（圖七十九）；<sup>334</sup>相反地，在王坡墓地唯一帶有鮮明秦文化特色的洞室墓 M7 裡，則出土本地固有的鼎、盒、壺、豆陶器組合，而伴出的【四葉立鳥銅鏡】（圖八十）亦為楚文化的流行樣式。<sup>335</sup>



圖八十 【四葉立鳥銅鏡】  
(採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頁 168，圖 124：2)

綜上所述，隨著秦文化的輸入，南陽盆地的文化面貌發生顯著的變化。儘管如此，前個階段的文化特徵並未因秦文化的出現而迅速消失，反而在各個層面持續影響當地的物質文化，顯示南陽盆地以楚文化為中心的本地傳統早已落地生根。另一方面，雖然新舊因素共存於本階段的南陽盆地，但彼此並非相互排斥，而是處處可見本地傳統與外來秦文化因素相互交融的景象。相當有意思的是，這種雜糅本地與外來因素的物質文化，不僅形成南陽盆地新興的本地傳統，而且被當地居民持續沿用，直到西漢早期。<sup>336</sup>

33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頁 198-199。

33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頁 166-167、188、413。

33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頁 414-416；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市余崗戰國至東漢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6 年第 3 期，頁 355-35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鄭家山戰國秦漢墓〉，《考古學報》1999 年第 3 期，頁 388-389；襄樊市博物館，〈襄樊余崗戰國秦漢墓第二次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3 年第 2 期，頁 12。

## 第五節 小結——考古材料描繪的歷史圖像

在本章中，筆者沿用前一章的分析方法，仍舊以考古材料為基礎，嘗試勾勒周代南陽盆地的歷史發展趨勢。

有別於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零散分佈於南陽盆地境內河流沿岸臺地上的狀況，進入周代以後，當地遺址相對集中分佈於南陽、淅川、襄樊與棗陽等地，而上述四個區域，正是盆地聯繫鄰近地區必經的交通樞紐。在這些地區，除了發現生活居址與墓葬外，還包括城址。顯然，當時的人類選擇這南陽等地發展聚落，其用意正在控制這些重要的戰略要地。至於居址位置的改變，也間接透露出新石器時代與周代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階段。更具體地說，前者要求的是生活的便利性，後者則看重國家整體戰略上的佈局。

據傳世文獻記載，周代的南陽盆地先後曾受到周王朝、楚國與秦國的統治，一般則認為，當地的物質文化亦先後受到周文化、楚文化與秦文化的影響。因此為方便討論，筆者亦將周代南陽盆地物質文化的變遷歷程，分為「周文化」時期、「楚文化」時期與「秦文化」影響時期三大階段。至於當時出土的考古遺物，則以青銅器與陶器最具代表性。

青銅器是古代中國社會裡最具身份性的威望物品，代表上層統治階級的喜好與風尚。南陽盆地「周文化」時期的青銅器，主要見於西周晚期以後，儘管銅器作風明顯受到周文化的影響，但在周文化基礎上，卻有展現較為強烈的本地特色，並與鄰近地區的隨棗走廊與淮河上游，共享部分的文化因素。換言之，南陽盆地「周文化」時期的銅器風格，並不只是一昧仿效周文化，而是企圖創造屬於自我的文化品味。筆者認為，南陽盆地「周文化」時期的青銅器之所以能呈現鮮明的區域特色，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這個階段，正是北方周王朝勢力漸衰、南方楚國勢力尚未崛起的過渡時期，而位於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南陽盆地，趁此機會，才有可能展現屬於自我特色的文化面貌。進入「楚文化」時期後，南陽盆地的青銅容器迅速與楚式銅器趨同，與「周文化」時期的風格判然二分，亦說明蘊含強烈政治性格的青銅器，對時代的變遷極度敏銳的特性。

陶器則是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物品，亦是最能反映下層居民物質文

化的考古遺存。南陽盆地西周早期的陶器，明顯受到關中地區典型周文化的影響，然而自西周中期以後，當地的陶器吸收了大量長江中游地區的文化因素，在兼融南北特徵的同時，已經發展出獨樹一幟的陶器風格。進入「楚文化」時期後，南陽盆地的陶器雖然新增了楚文化因素，但卻仍然繼承「周文化」時期的傳統，只是隨著時代變遷，楚文化的特徵逐漸轉變為本地陶器的基本內涵。下至南陽盆地的「秦文化」時期，當地的陶器在受到秦文化影響的同時，仍保留大量「楚文化」時期的作風。由上可見，周代南陽盆地的陶器特徵，儘管在不同階段均加入不同的文化因素，但始終呈現連續不斷、一脈相承的發展趨勢。



附表二 南陽盆地周代遺址分期表

區域 分期		南陽	淅川	襄樊	棗陽	其它
西周	早期	十里廟	下王崗	小馬家	毛狗洞	
	中期		雙河鎮	小馬家、真武山、沈崗		
	晚期	北郊、萬家園	雙河鎮	真武山、黃家村、韓崗、解放店	周台、郭家廟、曹門灣、段營、杜灣	
春秋	早期			真武山、黃家村、王坡、賈莊、解放店	周台、郭家廟、曹門灣、段營	新野小西關、穀城擂鼓台
	中期	西關、萬家園	下寺、毛坪	真武山、韓崗、彭崗、山灣、賈莊、鄒灣	周台	鎮平程莊、穀城新店、老河口楊營
	晚期	西關	下寺、和尚嶺、徐家嶺、毛坪	真武山、韓崗、團山、彭崗、山灣、南楊家、卞營、余崗	周台	鎮平程莊、老河口楊營
戰國	早期		徐家嶺、毛坪、大石頭山	韓崗、團山、彭崗、山灣、蔡坡、小馬家、卞營、余崗	周台	鎮平程莊
	中期	五交化儲運站、麒麟崗、彭營、宛城	徐家嶺、毛坪、大石頭山、吉崗	真武山、韓崗、團山、彭崗、山灣、蔡坡、賈莊、余崗	周台、九連墩	鎮平程莊、穀城過山、老河口曹營
	晚期	宛城		韓崗、團山、彭崗、山灣、蔡坡、賈莊、王坡、余崗、付崗、鄭家山	九連墩	老河口曹營

說明：

1. 本表對於南陽盆地周代遺址的年代分期，主要依據原始報告與相關研究的討論。
2. 部分遺址被歸入「商周之際」、「兩周之際」或「春秋戰國之際」，筆者將這類遺址的分期，分別歸於前後相鄰期別內，如將兩周之際的棗陽段營遺址劃入西周晚期與春秋早期。類似狀況的遺址還有南陽十里廟（商周之際）以及襄樊卞營（春秋戰國之際）。
3. 襄樊的鄒灣、洪山頭、許指巷、運動路等四處遺址，由於原始報告提供的資料有限，且籠統將這四處遺址歸入戰國時期，並未明確指出屬早、中或晚期，故不列入本表。

附表三 南陽盆地「周文化」時期墓葬出土青銅容器統計表

墓葬基本資料					隨葬青銅容器						
區域	墓地	墓號	保存狀況	時代	鼎	簋	壺	盤	匜	其它	件數
南陽	北郊		破壞	西周晚期	1	2		1			4
新野	小西關	1974年	完整	春秋早期	3	4	圓2	1	1	鬲4、甗1、盆1	17
		1971年	打破	春秋早期	2			1	1	簋2、甗1、盆1	8
襄樊	王坡	M1	完整	春秋早期前段	1						1
		M55	完整	春秋早期後段	明5	明6	圓明2	1	1		15
穀城	擂鼓台		破壞	春秋早期前段	2	2					4
棗陽	段營		破壞	兩周之際	3	4	圓2				9
	曹門灣	1972年	破壞	西周晚期	2	2					4
		1983年	破壞	兩周之際	1	2	圓1				4
	郭家廟	M21	盜掘	西周晚期		殘	殘				2
		M01	破壞	春秋早期前段	1			1			2
		M02	破壞	春秋早期前段	1					醞2	3
		M7	盜掘	春秋早期前段			殘				1
		M17	盜掘	春秋早期前段	3		圓2			鬲1、杯1	7
		M1	破壞	春秋早期後段	1		方2	1	1	簋2	7
		M6	完整	春秋早期後段	1						1
		M8	盜掘	春秋早期後段					1		1
		M25	破壞	春秋早期後段			圓1				1
	杜灣		破壞	西周晚期	2	2		1	1	簋蓋2	8
青銅容器總計件數					29	25	圓12 方2	7	6	18(鬲5、簋4、 甗2、盆2、醞2、 杯1、簋蓋2)	99
百分比 (%)					30	25	12/2	7	6	18	100

說明：

1. 本表對於南陽盆地「周文化」時期隨葬青銅容器墓葬的斷代，主要依據各報告與相關研究。
2. 銅器標有「明」字者為明器；標「殘」字者指僅存殘件，無完整器，為統計方便，殘器均視為1件。
3. 據報告指出，棗陽杜灣遺址發現的銅簋，器身與器蓋大小不一，非完整組合，故將兩者分別計算。

附表四 南陽盆地「楚文化」時期墓葬出土青銅容器統計表（一）

墓葬基本資料	地區		南陽								
	墓地		西關					萬家園	彭營		
	墓號	煤場	物資城 M1	煙草 專賣局 M2	八一路 M22	八一路 M1	八一路 M40	八一路 M44	M181		
	保存狀況	破壞	不明	完整	完整	完整	完整	破壞	破壞		
	時代	春秋 中期	春秋 晚期	春秋 晚期	春秋 晚期	春秋 晚期	春秋 晚期	春秋 中期 晚段	戰國 中期		
隨葬青銅容器	食器	鼎	3	5	1	1	1	2	3	4	
		簋	2	4		2	2	2	2		
		敦		1				2			
		盞							1		
		盆			1						
		鑊								1	
	酒器	尊缶		1							
		圓壺	2							2	
		盃				1					
	水器	小口鼎		1							
		浴缶							1		
		盤		1		1			1	2	
		匜		1					1	2	
	其它								獸尊 1	爌杯 1 器蓋 1	
小計			7	14	2	3	5	3	6	10	13

說明：

1. 本表所列墓葬，除隨葬青銅容器外，部分墓葬另出土青銅樂器、兵器、車馬器與雜器，但未列入統計。
2. 為方便統計，數量標為「殘」者，以1件計。
3. 淅川徐家嶺M11的簡報由於僅提供部分青銅容器的資料，因此數量不明者以「？」表示。
4. 襄陽九連墩墓地雖出土大批青銅容器，但由於簡報的資料有限，因此不列入本表。
5. 襄樊余崗墓葬出土青銅容器的相關資料，至今尚未正式發表，參見王先福，〈襄樊余崗墓地楚式青銅禮器分期研究〉（未刊稿）。

附表四 南陽盆地「楚文化」時期墓葬出土青銅容器統計表（二）

墓 葬 基 本 資 料	地區	淅川								
	墓地	下寺								
	墓號	M7	M8	M36	M1	M2	M3	M4	M10	M11
	保存狀況	完整	盜掘	破壞	完整	盜掘	完整	破壞	完整	完整
	時代	春秋中期後段	春秋中期後段	春秋中期後段	春秋晚期早段	春秋晚期早段	春秋晚期早段	春秋晚期後段	春秋晚期後段	春秋晚期後段
隨 葬 青 銅 容 器	食 器	升鼎			2	7				
		鼎	2	1	2	10	11	5	1	4
		簋	2	4	2	2	1	4	1	2
		簋				1	2			
		鬲				2	2			
		盞	1			1	1	1		
		敦							1	1
		豆					1			
		盆					2			
		匕				3	9			
		鑊				2				1
隨 葬 青 銅 容 器	酒 器	尊缶				2	2	2		2
		方壺				2	1			
		圓壺						1		
		盉		1		1		1		
		鉶					1			
		勺	1			2	3	2	2	1
隨 葬 青 銅 容 器	水 器	小口鼎				1	1	1		
		浴缶	2	1	2	2	2	2	1	2
		鑒					1	1		
		盤	1		1	1	1	1	1	1
		匜	1	1	1	1	1	1	1	1
		斗				1	1	1	1	1
		其它						有足盒		
小計		10	8	8	36	50	24	5	16	14

附表四 南陽盆地「楚文化」時期墓葬出土青銅容器統計表（三）

墓 葬 基 本 資 料	地區	淅川									
	墓地	和尚嶺		徐家嶺							毛坪
	墓號	M1	M2	M3	M9	M1	M10	M11	M6	M8	M18
	保存狀況	盜掘	完整	盜掘	盜掘	盜掘	完整	盜掘	完整	盜掘	不明
	時代	春秋 晚期	春秋 晚期	春秋 晚期	春秋 晚期	戰國 早期	戰國 早期	戰國 早期	戰國 中期	戰國 中期	春秋 晚期
隨 葬 青 銅 容 器	升鼎	2		4	3		5				
	鼎	4	7	4	1	5	6	5	2		2
	簋	1	2		1	2	2	3			1
	簠						4				
	鬲				3		5	?			
	敦		1			2	2	?	2		
	豆						4				
	甗							?			
	盆				1						1
	匕			1			4				
水 器	尊缶				2	2	2	?			
	圓壺		2				4	2	2		
	勺		1				1	?			
	小口鼎							?			
	浴缶		1	1	2	1	2	1			
	鑒				1		2				
酒 器	盤		1		1	1	2	?	1		1
	匜		1		1	1	1	?		1	1
	斗		1	1	1						
	小計	7	17	11	17	14	46	25	7	2	5

附表四 南陽盆地「楚文化」時期墓葬出土青銅容器統計表（四）

墓 葬 基 本 資 料	地區		襄樊							
	墓地		山灣							團山
	墓號	M15	M6	M11	M14	M22	M33	M19	M23	M1
	保存狀況	完整	完整	被盜	完整	完整	完整	完整	完整	完整
	時代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春秋晚期	春秋晚期	春秋晚期	春秋晚期	戰國早期	戰國早期	春秋晚期
隨 葬 青 銅 容 器	鼎	1	2	殘	1	1	2	1	1	2
	簠		2	殘	1		1		1	2
	敦					1	1	1		
	盞	1								
	尊缶									2
	勺									1
	浴缶	1	2		1		1		1	
	盤	1	1		1		1	1	1	1
	匜	1	1		1		1		1	1
	斗		1		1		1			
小計		5	9	2	6	2	8	3	5	9

墓 葬 基 本 資 料	地區		襄樊							
	墓地		蔡坡						賈莊	付崗
	墓號	M4	M8	M9	M12	M14	M18	M13	M1	M3
	保存狀況	完整	完整	完整	完整	破壞	破壞	破壞	完整	破壞
	時代	戰國早期	戰國中期	戰國中期	戰國中期	戰國中期	戰國中期	戰國晚期	戰國晚期	戰國晚期
隨 葬 青 銅 容 器	鼎	2	2	2	2	1		2	2	1
	簠	1								
	敦	1							1	
	盒	2							1	
	匕				1			1		
	圓壺	2							2	
	勺			3	3	2				
	浴缶	1								
	盤	1		1			1	1	1	2
	匜	1		2	1	1	1	1	1	1
	斗	3								
器蓋					1	1		1		
小計		14	2	8	8	5	2	6	8	4

附表四 南陽盆地「楚文化」時期墓葬出土青銅容器統計表（五）

墓 葬 基 本 資 料	地區		襄樊							
	墓地		余崗							
	墓號	M279	M268	M241	M237	M199	M215	M178	M180	M194
	保存狀況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時代	春秋 晚期 前段	春秋 晚期 前段	春秋 晚期 前段	春秋晚期 前、後段 之際	春秋 晚期 後段	春秋 晚期 後段	春秋 晚期 後段	春秋 晚期 後段	春秋 晚期 後段
隨 葬 青 銅 容 器	食 器	鼎	1	1	1	1	2	1	1	1
		簠					1		1	
		敦				1	1	1		1
		盞	1		1					
	酒 器	盆			1					
		尊缶					1		1	
		鉶	1		1	1				
小計		3	1	3	3	2	5	2	3	2

墓 葬 基 本 資 料	地區		襄樊						穀城
	墓地		余崗						新店
	墓號	M214	M227	M175	M177	M289	M112	M173	
	保存狀況	不明	破壞						
	時代	春秋 晚期 後段	春秋 晚期 後段	戰國 早期 前段	戰國 早期 前段	戰國 早期 後段	戰國 早期 後段	戰國 中期 前段	春秋 中期
隨 葬 青 銅 容 器	食 器	鼎	1	1	1	1	1	1	5
		簠	1						4
		敦		1	1			1	
		盒				1			
	酒 器	尊缶	1		1				
		圓壺							2
		鉶							1
		勺							2
	水 器	浴缶							2
		盤							1
		匜						1	
小計		3	2	3	2	2	1	3	17



# 第五章 南土與北疆

## ——傳世文獻中的周代南陽盆地

在前兩章，筆者已經利用考古材料，勾勒新石器時代至周代南陽盆地物質文化的演變趨勢，而在這一章裡，將改採另外一種取徑，暫時將考古材料放在一旁，直接分析傳世文獻中與南陽盆地有關的史料，探討文獻中所見南陽盆地在兩周時期的政治格局。

相對於數量豐富而又持續出土的考古材料而言，傳世文獻對周代南陽盆地的描述相當有限，往往只涉及部分的國名、地名與歷史事件。不僅如此，與南陽盆地有關的記載，或者過於簡略，或者未直接點明發生地點，因此只能透過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討論。儘管我們無法利用傳世文獻重建周代南陽盆地的區域發展史，但透過傳世文獻隱約透露的訊息，仍可一窺當地政治格局演變的趨勢。以下，筆者將分別就周王朝與楚國的立場，討論南陽盆地對這兩大政治集團的意義。

### 第一節 周王朝的南土

西元前十一世紀中葉，周武王（1,049/45-1,043 BC 在位）率領諸侯盟軍擊潰商紂王，<sup>1</sup>下開長達八百餘年的周朝。為了有效控制東方的殷人故地，在周公（1,042-1,036 BC 在位）平定「三監之亂」後的成王（1042/35-1006 BC 在位）、康王（1005/3-978 BC 在位）時期，<sup>2</sup>隨即在東方展開大規模的武裝殖民活動，並將新征服的殖民地，分封給與周王室同為姬姓或異姓的同盟諸侯國，<sup>3</sup>以保護關中盆地東部的周人政治中心——宗周豐鎬。此即《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所述「封建親戚，以蕃屏周」。<sup>4</sup>

1 本文所述周王的絕對年代，皆採夏含夷之說。Edward Shaughnessy, *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xix；中譯本：夏含夷著，劉源譯，〈西周諸王年代〉，收入朱鳳瀚、張榮明編，《西周諸王年代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頁 268-292。

2 許倬雲，《西周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頁 139-140。

3 杜正勝，〈封建與宗法〉，收入氏著，《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文化，1992），頁 349-352。

4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420。

施行封建的範圍，除了廣大的中原地區，外圍的邊鄙之地亦涵蓋在內，後者則包括了文獻中所謂的「南土」、「南邦」與「南國」，也就是漢水與淮河流域。本文所論的南陽盆地，亦屬周朝南土的範疇。<sup>5</sup>至於南土的諸侯國有那些呢？《左傳·昭公九年》載：

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鄧，吾南土也。<sup>6</sup>

《國語·鄭語》則云：

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sup>7</sup>  
如上所引，西周王朝的南方確實存在眾多的諸侯國，但究竟哪些諸侯國位於南陽盆地之內，當代的學者則持不同看法。儘管意見分歧，不過大抵而言，一般均認為南陽盆地包含申、呂、鄧、唐、蓼、穀等國。

## 一、南陽盆地的諸侯國

### (一) 申國

據《國語·周語中》，申與齊、許、呂等國相同，均為姜姓之國，乃四嶽之後。<sup>8</sup>早期的申國可能位於陝西或以西地區，<sup>9</sup>但文獻難徵，史蹟難尋。比較可靠的記載，見於《詩經·大雅·崧高》：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召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躋躋，鈞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帳，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啴啴。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sup>10</sup>

5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頁 10-70。

6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 1308。

7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460-464。

8 《國語·周語中》：「齊、許、申、呂由大姜。」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頁 46-47。

9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頁 28。

10 裴普賢編著，《詩經評註讀本（下冊）》（臺北：三民書局，2001），頁 537-541。

西周晚期，周宣王（827/25-782 BC 在位）將其元舅申伯，分封於南國的謝邑，目的是為了加強對南土的控制。初封之時，宣王先遣召公為申伯營建住所、修砌城垣；到任之前，宣王又賜予申伯豐厚的禮品，諸如車馬玉飾。引人好奇的是，為何宣王要以如此慎重的態度，將申伯封於南土？謝邑重要的戰略位置，當是其中的關鍵因素。

學者大多認為，謝邑即位於今日河南省南部的南陽，<sup>11</sup>也就是申侯封邑的所在地。在申侯封於謝邑之前，徐少華推論，南陽即古謝國的所在。<sup>12</sup>另外，有的學者指出，其實古代的申國有三，即東申、西申與南申，而南陽之申即南申。<sup>13</sup>無論如何，西周晚期的申國確實位於南陽。

前文曾經論及，南陽是南陽盆地北方最大的城市，由此往西至淅川，再自淅川往西北而行，溯丹江而上，越過秦嶺，即可直達周朝的政治中心灋鎬，這條道路，即本文第二章所述之【路徑 6】（圖七）。其次，南陽周圍的腹地廣大，農產豐富，亦適於較多的人口生活。由此可見，控制盆地北部的南陽，不僅即控制聯繫灋鎬與南方長江中游的地區最直接的交通通道，良好的自然環境，更為負責周朝南土安全的申國，提供穩定的物資來源。

下逮東周時期，王都已由關中盆地的灋鎬，東遷至洛陽盆地的王城。儘管如此，但申國仍是王朝南土重要的軍事防禦據點：由南陽向東北行，出方城缺口後，隨即到達中原，此即前述的【路徑 1】（圖七）。若繼續北行，經許昌、開封，至黃河南岸西行，可通王城。據《詩經·王風·揚之水》，為繼續固守南土，東周初期，周王仍派兵「戍申」。<sup>14</sup>總之，自西周晚期以來，南陽的申國便一直是周人控制南土的重要據點。

## （二）呂國

呂國與申國相同，是另一個南陽盆地境內的姜姓諸侯國。除前引《國

11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譏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頁 302-310；何浩，《楚滅國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1989），頁 203-210；何光岳，《楚滅國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 111-124；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頁 28-39；馬世之，《中原楚文化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 97-102。

12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頁 47-54。

13 何浩，《楚滅國研究》，頁 203-210；馬世之，《中原楚文化研究》，頁 97-102。

14 裴普賢編著，《詩經評註讀本（上冊）》（臺北：三民書局，2001），頁 169-171。

語·周語中》外，《國語·周語下》亦述及四嶽因輔佐禹有功，因此堯封之於呂：

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sup>15</sup>

早期呂國的地望仍有爭議，或以為在山西境內，<sup>16</sup>或以為在陝西的涇河上游地區。<sup>17</sup>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大多學者認為，至遲於西周晚期，呂國便已經遷至南陽盆地境內，在前述申國的西邊約 30 里處。<sup>18</sup>由於呂、申兩國距離相近，西北與東北均可分別聯繫關中盆地與中原地區，戰略地位同樣重要，因此西周晚期以來，南陽呂國亦是周人控制南土的重要據點。

傳世文獻中的呂，亦作甫。<sup>19</sup>前引《詩經·大雅·崧高》載：「維申及甫，維周之翰。」<sup>20</sup>而在《詩經·王風·揚之水》中，東周時期的周王不僅派兵「戍申」，同時亦「戍甫」。<sup>21</sup>這兩條史料共同顯示，周人十分看重申國與呂國在周朝南土的地位。

附帶一提的是，《國語·鄭語》載有「申、呂方彊」一語，<sup>22</sup>學者多認為這條史料亦說明申國與呂國同是周朝南土的大國。不過李峰則提出不同的意見，指出此處的申實為西申，是幽王（781-771 BC 在位）時期王子宜臼出奔的母舅之國，並非南陽之申；而所謂的呂，亦非南陽之呂，可能位於陝西關中盆地北方的涇河上游地區。<sup>23</sup>李氏的看法頗具新意，值得參考。

### （三）鄧國

鄧國是南陽盆地內另一個重要的諸侯國。《左傳·桓公十一年》載：

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sup>24</sup>  
西元前 701 年，鄭莊公（757-701 BC）取鄧曼為妻。由於古代女子稱姓，

15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頁 97。

16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頁 41。

17 李峰，《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260-262。

18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譏異》，頁 859；何浩，《楚滅國研究》，頁 233；何光岳，《楚滅國考》，頁 131-133；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頁 41-43；馬世之，《中原楚文化研究》，頁 103。

19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譏異》，頁 839-843。

20 裴普賢編著，《詩經評註讀本（下冊）》，頁 536。

21 裴普賢編著，《詩經評註讀本（上冊）》，頁 170。

22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頁 475。

23 李峰，《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頁 260-262。

24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 132。

故知鄧國曼姓。<sup>25</sup>

相對於前述申、呂兩國可能來自黃河流域，鄧國似乎原本就位於南方。前引《左傳·昭公九年》提及，據春秋晚期周人詹桓伯的回憶，至晚於周武王克商後，鄧國與巴、濮、楚等國一樣，均屬於周人南土的一部分。<sup>26</sup>然而，徐少華根據西周初年整體的局勢研判，當時的南土尚未納入周人的控制範圍，而西周初期鄧國的地望則不得而知。至遲於昭王（977/75-957 BC 在位）年間，鄧國已經位於南陽盆地境內，<sup>27</sup>而前引《國語·鄭語》，亦顯示鄧國在成周雒邑的南方。

關於鄧國的地望，石泉（1917-2005）考訂為位在南陽盆地南方出口處的襄樊。<sup>28</sup>襄樊是長江中游漢西地區北上中原的必經之地，而連接襄樊的鄧國與漢西地區的道路，亦即前述的【路徑 4】（圖七）。由鄧國北行，則可抵達盆地北方的申國，而這兩個諸侯國，正是盆地南、北的交通要津。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時期除了鄭莊公外，楚武王（740-690 BC 在位）亦娶妻於鄧國。自鄧國的立場而言，與中原地區實力方強的鄭國及南方逐漸崛起的楚國聯姻，目的應是希望在強國的軍事角力間自保。就楚國的立場而論，若與鄧國結為親家，則自然打通北上中原的道路，《左傳·莊公六年》所載即為明證：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sup>29</sup>

由此可見，對新興的楚國來說，鄧國與申國的戰略位置皆十分重要，是北上中原必須打通的關節。

#### （四）唐國、蓼國與穀國

除了前述的申、呂、鄧三國外，唐、蓼、穀等國亦位於南陽盆地境內。

唐國，姬姓，<sup>30</sup>據石泉考證，位於盆地東部的唐河。<sup>31</sup>由唐河東行出南

25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譏異》，頁 423。《世本》亦載：「鄧為曼姓。」〔清〕茆泮林輯，《世本》，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世本八種》（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65-66。

26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 1308。

27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頁 6、12。

28 石泉，〈古鄧國、鄧縣考〉，《江漢論壇》1980 年第 3 期，頁 91。

29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 169。

30 茆泮林輯，《世本》，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世本八種》，頁 58。

31 石泉，〈從春秋吳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荊楚地理〉，收入氏著，《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頁 360-376。

陽盆地後，經前述的【路徑 2】(圖七)，即可通於淮河上游地區。

至於文獻中的蓼國，有東蓼、西蓼之分，後者位於南陽盆地境內。一般認為，西蓼位於盆地的東南方，亦即今日河南省的唐河之南，湖北省的棗陽之北，<sup>32</sup>與前述的唐國相鄰。

穀國則地處今日南陽盆地西南方的穀城，<sup>33</sup>前述鄧國所在的襄樊即在穀國東方。由穀國向西北溯漢水谷地而行，亦即【路徑 7】(圖七)，則可通往漢中盆地。

## 二、昭王南征與南陽盆地

除了對諸侯國地望的記載，傳世文獻亦隱約觸及西周時期南陽盆地所發生的歷史事件。其中，又以周昭王南征最具代表性。《史記·周本紀》載：

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sup>34</sup>

太史公以隱諱的筆法，好比「南巡狩不返」與「卒於江上」，描述周天子駕崩於南方的重要事件。相較之下，《竹書紀年》則更清楚地論及昭王南征的對象與經過：

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遇大兕。

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曠，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

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反。<sup>35</sup>

昭王征伐的目標實為南方的楚國，但是過程並不順利，不僅率領的六師盡亡，就連昭王自己亦賠上性命。然而，《左傳》對這段西周早期歷史上重要的事件則有不同的記載。

據《左傳·僖公四年》載，西元前 656 年，稱霸中原的齊桓公（？-643BC），率領魯、宋、陳、衛、鄭、許、曹等八國聯軍，揮兵攻打南方的楚國。開戰在即，齊國的管仲與楚王的使者有以下一段對話：

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32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譏異》，頁 484-486；馬世之，《中原楚文化研究》，頁 96-97；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頁 55。

33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譏異》，頁 420-422；何浩，《楚滅國研究》，頁 216-219。

34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143。

35 方詩銘、王修齡撰，《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45-47。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sup>36</sup>

管仲提出兩項理由，作為以齊國為首的諸侯聯盟討伐楚國的藉口，一是現在的楚國不向周王進貢濾酒用的苞茅，二是當年的楚國導致南征的昭王喪命。使者雖然坦承前者是楚國之過，但卻不認為楚國必須為昭王之死負責，因為殺害周昭王的並非楚人，而是當年居住在漢水邊上的土著。

姑且不論昭王討伐的對象，以及使「昭王之不復」是否為楚人，昭王南征以及命喪漢水的記載應是定論。如前所論，由宗周澧鎬前往漢水流域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向南越過秦嶺，順丹江河谷而下，直到盆地西北部的淅川，而淅川正是丹江匯入漢水之地。儘管我們無法確定得知六師喪於何處，昭王又亡於何地，但「昭王南征」與其相關的歷史事件，應發生於淅川以下的漢水沿岸，或在南陽盆地境內，或在襄樊以南的漢水谷地，而南陽盆地正是周人南下發動武裝攻擊的必經之地。相反地，當西周王朝無力征討南方的外族勢力，南陽盆地則成為鞏衛南土最重要的防線，而這也正好解釋了為何周人會在南陽盆地封建申、呂等諸侯國。

## 第二節 楚國的北疆

自西周時期至春秋早期，長年以來，南陽盆地一直是護衛周人南土的戰略要地。隨著南方楚國勢力的逐漸壯大以及周王權威的式微，原本散佈於南陽盆地的諸侯國漸次為楚人擊潰，南陽盆地亦納入楚國疆域。清人顧棟高（1679-1757）在《春秋大事表·楚疆域論》中，面對當時天下情勢的鉅變，發出以下的感嘆：

余讀《春秋》，至莊六年滅申，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天下之勢盡在楚矣！申為南陽，天下之膂，光武所發跡處。是時齊桓未興，楚橫行南服，由丹陽遷郢，取荊州而立根基。武王旋取羅、鄀為郢之地，定襄陽以為門戶，至滅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然其始，要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平王東遷，即切切焉戍申與甫、許，豈獨內

36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 290-291。

德申侯，為之遣戍，亦防維固圉之計，有不獲已。逮桓王、莊王，六七十年之久，楚人入擾日甚，卒為所滅。自後滅呂、滅息、滅鄧，南陽、汝寧之地悉為楚有，如河決魚爛，不可底止，遂平步以窺周疆矣。<sup>37</sup>

在顧棟高眼裡，申國所在的南陽是當時天下的中心。就周王室而論，即便都城東遷，國勢不如西周強盛，為確保南疆的安全，仍不得不派兵戍守申、甫、許等南土諸侯國。反觀南方的楚國在勢力漸增後，首要任務亦為佔據申國，隨後則快速席捲同在南陽盆地的呂國、鄧國，以及位於淮河上游的息國。至此，楚國的實力已不容小覷，同時還掌控北上中原的交通要道，有能力進一步「以窺周疆」。換言之，分立於南陽盆地南北雙方的政治集團，誰控制了這個聯繫黃河中游與長江中游地區的戰略要地，誰就具備向對方主動出擊的優勢。因此，為了問鼎中原，楚國必須先佔領南陽盆地。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楚國控制南陽盆地的過程並非一蹴可幾，而是歷經約六、七十年的經營。為達目標，楚國在這段期間用力最深者，莫過於兼併領地周遭的小國，以求壯大自己。據何浩的研究指出，楚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共滅 61 國，而南陽盆地則早在春秋中期以前便納入楚國的統治範圍。<sup>38</sup>清人高士奇（1645-1741）在《左傳紀事本末》亦云：

春秋滅國之最多者，莫楚若矣。……夫先世帶礪之國棋布星羅，南捍荆蠻而北為中原之蔽者，最大陳、蔡，其次申、息，其次江、黃，其次唐、鄧，而唐、鄧尤逼楚方城之外，為楚門戶。自鄧亡，而楚之兵申、息受之；申、息亡，而楚之兵江、黃受之；江、黃亡，而楚之兵陳、蔡受之；陳、蔡不支，而楚兵且交于上國矣。<sup>39</sup>

高氏所論雖然不盡符合歷史實情，好比楚國並非先亡鄧國，繼之消滅申國，卻也清楚地點明楚國在掌控南陽盆地的支配權後，除了打通了北上中原的門戶，同時亦以南陽盆地為基礎，逐步向東攻佔淮河流域，直到山東南部的泗水流域。再者，若就防禦的角度而言，每當楚國遭受外來勢力的挑戰與威脅時，若無法有效堅守南陽盆地這道北方的軍事防線，必將動搖國本，波及楚國的政治中心。因此，南陽盆地在楚國的歷史上，是進可攻、退可

37 [清]顧棟高輯，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

38 何浩，《楚滅國研究》，頁 3-14。

39 [清]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9）。

守的戰略關鍵要地。

## 一、楚國控制南陽盆地的經過

若自西元前十一世紀下半葉，亦即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sup>40</sup>算起，楚國國祚前後約有 800 年。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裡，西周時期的楚國封於丹陽，春秋早期則遷都於郢。關於丹陽的具體地望，歷來爭議頗多，懸而未決，<sup>41</sup>加上史料缺乏，因此使得西周時期楚國明確的統治範圍不甚清晰。下逮東周時期，儘管春秋時期郢都的地望仍有待商榷，不過透過較為豐富的文獻記載，學者已能大致掌握楚國疆域的變化過程，本文所論的南陽盆地，則基本上在春秋早期晚段，受到楚國的控制。

關於春秋時期楚國疆域變遷的明確描述，始見於楚武王（740-690 BC 在位）時期。前此，楚國在蚡冒（757-741 BC 在位）的帶領之下，「始啟濮」，<sup>42</sup>「服陘隰」，<sup>43</sup>已經開始向外擴張勢力。下逮武王主政，雖然楚國地處漢西地區（亦即長江以北、漢水以西一帶），但由於勢力漸強，位居中原南側的蔡、鄭兩國，已於武王三十一年（710 BC），因「懼楚」之故，開始相互結盟，尋求自保之道。<sup>44</sup>

另一方面，楚國對外的軍事活動亦更加積極。漢東地區的隨國是當時楚國周遭勢力最強大的國家，楚武王曾先後三度討伐隨國。武王三十五年（706 BC）楚國首次侵隨，但因隨國早有防備，無功而返。兩年後（704 BC）楚國二次伐隨，因隨國大臣對楚作戰意見分歧，因此「隨師敗績」。武王五十一年（690 BC），楚國三度伐隨，途中武王喪命，只得匆匆與隨媾和返國。<sup>45</sup>

除了討伐隨國外，文獻中另記載了楚武王年間其它的軍事活動。武王

40 司馬遷，《史記》，頁 1691-1692。

41 徐少華指出，關於丹陽的地望，歷來說法大抵分為安徽江蘇交界的當塗、湖北的枝江或秭歸，以及河南的丹淅四說。根據目前所能掌握的文獻史料與考古材料顯示，以枝江、丹淅的可信度較高，然而仍有待更多的材料證明。徐少華，〈楚都丹陽地望探索的回顧與思考〉，收入徐少華、晏昌貴主編《荊楚歷史地理地長江中下游開發——2008 年中國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頁 51-63。

42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頁 477。

43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 618。

44 《左傳·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 90。

45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 109-112、121-122、163-164。

三十八年（703 BC），楚國曾大敗南陽盆地南方的鄧國；<sup>46</sup>武王四十年（701 BC），楚將與貳、軫兩國結盟，意欲對漢東地區施加影響力，但鄖則欲聯合隨、絞、州、蓼等國共同伐楚，趁五國會合之前，楚國大敗鄖師；<sup>47</sup>武王四十一年（700 BC），楚國擊潰絞國；<sup>48</sup>武王四十二年（699 BC），楚師進攻羅國，羅國則與盟國盧戎，擊潰進犯的楚國，<sup>49</sup>其後，羅國與盧戎則為武王所滅。<sup>50</sup>總之，楚國在武王時期，基本上已經鞏固了漢西地區，並將其影響力擴及漢東地區、隨棗走廊與南陽盆地的南方。

武王逝世後，其子文王（689-677 BC 在位）繼位，在這個階段中，本文討論的南陽盆地，基本上已受到楚國的控制。為了打通連接中原的道路，文王二年（688 BC），楚國借道南陽盆地南方的鄧國，北上攻擊盆地北方的申國。伐申後，楚人於返鄉途中，又順道進攻鄖國，並在其後的文王十二年（687 BC）滅鄖。<sup>51</sup>此外，南陽盆地北方的申國，亦在楚文王時期為楚所滅。史料雖然並未直接指出楚滅申的時間，然而《左傳·哀公十七年》曾載：

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sup>52</sup>

這段史料述及，楚文王曾以申國的俘虜彭仲爽為令尹，並在楚滅的申、息二國故土設縣管理，顯示申國已納入楚國的版圖之中。在佔領位於南陽盆地南北兩側出口處的鄧國與申國後，楚文王已經控制了江漢平原北上中原的主要通道，儘管當時的南陽盆地內仍有尚未臣服於楚國的小國，諸如盆地北方的呂國、西南方的穀國與東南方的唐國，<sup>53</sup>但基本上，南陽盆地已成為楚國疆域的一部分，直到戰國中期以後，南陽盆地才逐漸脫離楚國的掌控。

46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124-125。

47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130-131。

48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134-135。

49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136-138。

50 何浩，《楚滅國研究》，頁152-160。

51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169-170。

52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1708。

53 何浩，《楚滅國研究》，頁5-6。

## 二、楚國北疆的軍事重鎮

如前所述，為加強對南陽盆地的控制，楚國滅申以後，隨即在當地設縣，以便治理。所謂的縣，《說文解字》記載的原意為「懸」，<sup>54</sup>在此則將意義稍做轉換，借指遠懸於國境邊緣的軍事據點。楚國在申設縣，具備多重意涵，除了作為防禦北疆的軍事要塞外，更希望藉此以確保楚國北上中原道路的暢通，並將當地視為北伐中原的軍事根據地。

據前引《左傳·哀公十七年》所述，楚國不僅在申國故地設縣，亦於兼併息國後以同樣的方式治理當地。息國於楚文王十年（680 BC）為楚所滅，<sup>55</sup>地處淮河上游北岸，即今日河南省東南部的息縣。當地的地理位置亦十分重要，北側與中原接壤，往南穿越大別山，可通漢東地區，不僅與申國同為楚國北進中原的據點，還扼守著聯繫中原地區與江漢平原的次要通道，亦即前文所述的【路徑 8】（圖七）。由此可知楚在息地設縣之故。

楚國不僅在申、息故地設縣，還在兩地籌組軍隊，此即文獻上所謂的「申、息之師」。《左傳·僖公二十五年》載：

秋，秦、晉伐鄀。楚鬪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sup>56</sup>

這段文獻是最早明確記載「申、息之師」的史料，顯示楚國以這兩支軍隊與北方的諸侯國作戰。至於率領「申、息之師」的則是「申公」與「息公」，亦即由楚國中央所指派的縣公。以申公為例，傳世文獻中至少有鬪班、鬪克、叔侯、巫臣、子牟、壽餘、子亹等七位，<sup>57</sup>其中，除鬪班、鬪克為父子關係外，其餘的申公均來自不同背景，<sup>58</sup>顯示申公乃由中央直接指派，說明當地並非特定家族的封邑，而直接由中央管轄。《左傳·成公七年》亦指出，由於申縣與申師肩負防禦楚國北疆的重責大任，因此必須由楚國中央直接管轄：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

54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2001），頁184。

55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198-199。

56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429。

57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247、434、442、749、1119、1626；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頁500。

58 李玉潔，《楚史稿》（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頁87。

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sup>59</sup>  
至於位於淮河上游地區的息縣，情況應與申縣相同。

此外，楚國許多重要的政治活動，亦在申、息兩地舉行，諸如楚穆公九年（617 BC），楚王與陳侯、鄭伯在息會面，<sup>60</sup>楚靈王十年（531 BC），楚王則在申召見蔡靈侯。<sup>61</sup>總之，對楚國而言，南陽盆地之申與淮河上游之息，均為楚國北疆的軍事重鎮，其根本的原因在於，這兩個地區均佔據了聯繫南方江漢平原與北方中原地區的咽喉之地。

### 三、列國侵擾下的南陽盆地

楚國自從佔領南陽盆地、順利打通聯繫中原的道路後，無論是北上中原與華夏爭勝，或是向東討伐淮域諸國，大多取道此地。不僅如此，每當楚國受到來自北方或東方的敵國侵犯，群山環繞的南陽盆地則成為楚國北疆最堅實的防禦工事，護衛著南方楚國的政治中心。反之，一旦衝破南陽盆地這道軍事防線，敵軍便可長驅直入，進軍郢都，瓦解楚國的政治核心。

#### （一）齊桓公伐楚與楚方城

楚國以南陽盆地作為軍事屏障最早的記載，當出於《左傳·僖公四年》。如前一節所述，楚成王十六年（656 BC），齊桓公率領八國聯軍，揮軍南下攻打楚國。面對強敵壓境，成王遣使屈完，拜會桓公說道：

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sup>62</sup>

聽聞此語，桓公打消伐楚的念頭，僅與屈完簽訂盟約便匆匆返國。如此戲劇性的轉折，當與屈完所言的楚國軍事屏障，亦即方城與漢水有關。漢水無待解釋，但方城則需稍做說明。

文獻中所謂的方城，至少有三種不同意義。有的學者或釋為「方城山」，指盆地東側的桐柏山與北側的伏牛山；或以為「楚塞」，指桐柏山與伏牛山之間的隘口；或認為即「楚長城」，特指楚國在南陽盆地周圍所修築的長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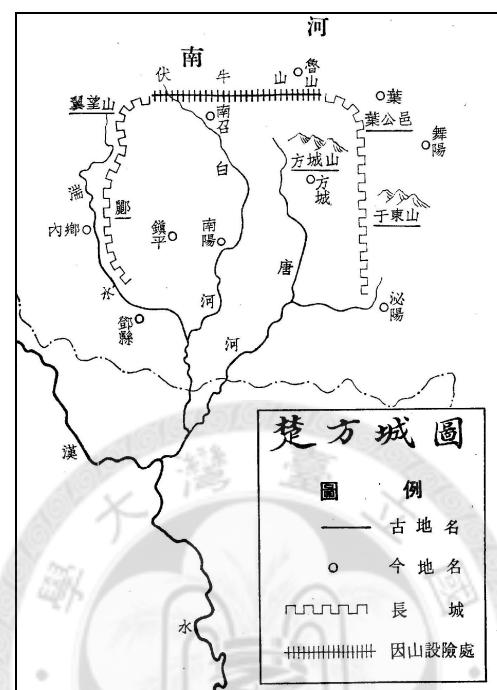
59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 833-834。

60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 577。

61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 1323。

62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 292-293。

共有東、北、西三面，開口向南，呈「匚」字形（圖八十一），大抵修建於戰國中、晚時期。<sup>63</sup>筆者認為，前引《左傳·僖公四年》所載方城，由於與漢水共舉，故應為山名。



圖八十一 楚方城

（採自張維華，《中國長城建置考（上編）》）

引人注目的是，儘管齊桓公以極盡優勢的軍力南下伐楚，然而在面對楚國北疆的方城與漢水時仍有所顧忌。由此可見，環繞南陽盆地的山脈與其盆地南方的漢水，確實對於入侵的敵軍具有相當程度的嚇阻功效。

## （二）吳人入郢

經過長年的軍事征伐，約於春秋晚期，楚國的版圖已擴及長江下游地區。正當楚國向東推進之際，新崛起於長江下游的吳國，則開始對楚國東境發動攻勢。面對來勢洶洶的吳師，楚師節節敗退，終於在楚昭王十年(506 BC)，雙方爆發激戰，楚國甚至險遭滅亡。《左傳·定公四年》載：

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

<sup>63</sup> 張維華，《中國長城建置考（上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36-45；陳偉，〈古地新探（三則）〉，《江漢考古》1992年第4期，頁43-45；柴中慶，〈楚長城西段考〉，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四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259；張卓遠，〈淺論楚方城〉，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四集）》，頁268。

馬戊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概王曰：「……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庚辰，吳入郢。<sup>64</sup>

石泉曾對吳師進軍楚國路線進行考證：首先，吳師自本國溯淮河而上，先與蔡國（河南新蔡）會合，接著向西穿越南陽盆地東側的山間隘道，與唐國（河南唐河）會師，其後，繼續往西南前進，吳楚雙方則在南陽盆地南方缺口處的漢水東岸與北岸展開激戰，楚師敗績，於是吳軍度過漢水南下，直接攻入了楚郢都。<sup>65</sup>

其實早在吳人入郢之前，中原列強的軍隊曾經逼近南陽盆地，如《左傳·襄公十六年》：

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sup>66</sup>

楚康王三年（557 BC），晉師曾敗楚師於楚國北疆的湛阪，然而受制於方城的阻擋，無法繼續南侵，僅能轉而攻擊方城外的許地，悻悻然返回北方。相對於此，51 年後的吳、蔡、唐三國聯合伐楚之役，由於唐國位於南陽盆地內的東部，在唐人的接應下，吳、蔡聯軍得以直接穿越盆地東側山地進攻楚師。楚國在方城防線失守的局面下，只能在漢水沿岸與敵軍交戰。然而，一當漢水防線不保，楚國郢都迅速為吳、蔡、唐聯軍攻陷，楚昭王亦

64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 1542-1545。

65 石泉，〈從春秋吳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荊楚地理〉，收入氏著，《古代荊楚地理新探》，頁 355-391。

66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 1027-1028。楊伯峻註曰：「湛水源出今河南寶豐縣東南，東經葉縣，至襄城縣境入於北汝河。湛水之北山有長坂，即此湛阪，在今平頂山市北。」張維華則云：「湛阪，杜《注》謂『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是湛阪乃因臨湛而得名也。昆陽縣故治，在今河南葉縣治北二十五里，為楚北境之地，晉師既敗楚師於湛阪，再進而侵方城之外，則所謂方城者，必北去湛阪未遠。」可見湛阪即在楚國方城北側。張維華，《中國長城建置考（上編）》，頁 31。

被迫出走。所幸關中的秦國出兵解圍，否則楚國可能在春秋末期就已經退出古代中國歷史的舞台。

比較上述兩場戰役的過程與結果，即可清楚地瞭解南陽盆地在楚國邊防上極為關鍵的戰略價值。若能堅守這道防線，楚國即便國勢不振，仍能自保；假若盆地周圍的天險為敵軍突破，楚國必定受到重創。

### （三）秦師破郢

楚惠王十六年（473 BC）越滅吳後，楚國東方的心腹大患終於消失，楚人於是趁此機會重振旗鼓，逐漸收復先前為吳所佔領之地，並將勢力，向東擴及山東南部。然而好景不常，自從韓、趙、魏三家分晉後（453 BC），亦即戰國時期以降，韓、魏兩國不時南下侵楚。儘管楚國與北方列國間的軍事衝突互有勝負，版圖亦持續向東、南、西三面擴張，甚至成為當時疆域最大的國家，但總體而言，楚國北方的領土卻逐漸喪失，列國之師亦逐步逼近南陽盆地。

楚懷王十七年（312 BC），關中盆地的秦國順南方的丹江谷地而下，與楚國大戰於南陽盆地西北方的丹陽，結果大敗楚師。秦國則乘勝追擊，南下奪取南陽盆地西部的漢中郡。懷王一怒之下，派遣大軍攻秦，溯南陽盆地西北方的丹江河谷而上，翻越秦嶺，與秦國大戰於關中南部的藍田，楚師再敗。<sup>67</sup>丹陽與藍田之役不但導致楚國的軍力蒙受重大損失，更使得秦國的勢力伸入南陽盆地的西部，對楚國的安全帶來直接的影響。

楚懷王二十八年（301 BC），秦國與齊、韓、魏三國聯軍分別從東、西兩路討伐楚國。<sup>68</sup>據《荀子·議兵》載，東線戰事發生於「垂沙」，<sup>69</sup>而《史記·楚世家》則云，楚師敗，三國聯軍取「重丘」而去。<sup>70</sup>徐少華指出，「垂沙」位於南陽盆地東方的泌陽附近，「重丘」則在盆地東側，是楚方城重要的關塞。<sup>71</sup>《戰國策·西周策》則載，齊、魏、韓三國「取宛、葉以北」，<sup>72</sup>其中的宛即南陽，<sup>73</sup>葉即方城缺口外的葉縣。換言之，垂沙之

67 司馬遷，《史記》，頁 1724。

68 司馬遷，《史記》，頁 210。

69 [戰國]荀況撰，[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5）。

70 司馬遷，《史記》，頁 1727

71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頁 345。

72 [漢]劉向編集，《戰國策》（濟南：齊魯書社，2005），頁 12。

73 南陽原本為西周時期申國的所在地，楚國滅申國後成為置縣，其後又更名為宛，文獻

役後，楚國在南陽盆地北部及方城以外的部分領地已為敵軍所奪。

其後，楚國雖然收復宛，不過秦國卻對加強了對南陽盆地的攻勢。楚頃襄王七年（292 BC），秦國大將白起（？-257 BC）攻楚，取宛，<sup>74</sup>南陽盆地就此一分而二，北部屬秦，南部屬楚。頃襄王二十年（279 BC），白起再度伐楚，攻佔南陽盆地南方的鄧。至此，南陽盆地轉入秦人之手。至於失去南陽盆地護衛的楚國郢都，隔年（278 BC）便迅速為白起攻下，而楚國的政治中心，亦遷至淮河上游的陳城。<sup>75</sup>

綜上所述，東周時期的南陽盆地，始終是楚國北方最為重要的軍事屏障。每當外敵入侵，楚國總是利用南陽盆地易守難攻的自然環境，作為保衛楚國政治中心的屏障，即便春秋時期稱霸中原的齊桓公，均對這道天防線有所忌憚；相反地，如果能設法突破楚國這道北方高大的邊牆，往往立即對楚國造成莫大的威脅，吳人與秦師前後兩次攻破郢都，便是最好的例證。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認為，在東周楚國的歷史上，真可謂「成也南陽盆地，敗也南陽盆地」！

### 第三節 小結——政治中心視角下的歷史

在勾勒傳世文獻中所見周代南陽盆地的歷史後，讓我們回過頭來，重新思考一個基本的問題：傳世文獻如何描繪周代南陽盆地的歷史？

顯而易見的是，在傳世文獻中，從來就不曾出現過「南陽盆地」這個詞彙。南陽盆地其實是當代地理學的概念，特指位於黃河與長江之間，並由群山環繞、中央低平的地理區域。雖然傳世文獻僅零星記述與周代南陽盆地有關的史料，諸如經學者考訂位於南陽盆地的國名與地名，以及可能發生於南陽盆地內的歷史事件，但這些史料大多僅涉及政治或軍事活動。因此，透過傳世文獻，吾人充其量僅能一窺周代南陽盆地在「政治史」或「軍事史」上的變遷趨勢：在西周時期至春秋早期，南陽盆地一直是保衛黃河流域周王朝的南土；春秋中期以後，南陽盆地納入南方楚國的疆域之

<sup>74</sup> 中雖未提及更名的確定時間，但王建中指出，應在春秋晚期以後。王建中，〈南陽宛城建置考〉，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四集）》，頁 348-350。

<sup>75</sup> 司馬遷，《史記》，頁 212。

<sup>75</sup> 司馬遷，《史記》，頁 1735。

中，不僅是楚國問鼎中原最主要的通道，更是楚國北方最堅強的軍事防線；戰國晚期以後，南陽盆地再度易主，除了成為秦國領地的一部分外，秦國還取道此地攻破郢都，瓦解楚國數百年來在漢西地區辛苦經營的成果。

以上是一般對周代南陽盆地區域發展史的認識。然而，筆者必須指出的是，這種運用傳世文獻所描繪的周代南陽盆地的區域發展史，其實是以「政治中心」為基礎的歷史論述，更具體地說，是以「周王朝」、「楚國」或「秦國」為本位所進行的歷史論述。就這層意義而言，傳世文獻所記載的只是周代史上、楚國史上，或秦國史上的南陽盆地，至於以南陽盆地為主體的歷史根本就不存在。

相較之下，考古材料的出現，則使得研究以南陽盆地為主體的歷史成為可能，因為當地出土的考古材料，就是與當地歷史最為密切相關的史料。儘管如此，考古學者在整理資料與進行研究的同時，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仍是將新發現的考古遺存，置入傳世文獻所描繪中的政治架構之中，尋找其在古代中國歷史上的定位。當然，傳世文獻與考古材料間存在一定的對應關係，但是，若不跳脫傳世文獻以「政治中心」為論述架構的模式，我們將很難以不同的眼光，重新理解古代中國的歷史。筆者認為，以考古材料為主，傳世文獻為輔，並利用區域史的研究方法，將為古代中國歷史的研究，帶來新的契機。



## 第六章 結論——不斷變動的傳統

歷史的演進是不斷的，前後有聯貫性的，朝代更換了，也只是統治者的更換，人類社會的一切仍是上下聯貫，並無突然的差異……。

——嚴耕望，《治史經驗談》<sup>1</sup>

正如本文第一章所言，這是一篇探討古代中國區域史的論文，討論的核心區域，是位於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南陽盆地，研究的中心議題，則是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的互動關係。

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南陽盆地就是溝通中國南北最重要的橋樑。當地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使得南陽盆地不僅只是交通通道，更是一處適合人類發展生息的歷史舞台。在古代中國的歷史上，雖然南陽盆地佔據聯繫北方黃河流域與南方長江流域的關鍵位置，但在過去歷史學或考古學的研究中，由於當地既非政治中心，又非考古學文化中心，因此總是備受學界忽視。在本篇論文中，筆者則嘗試轉換視角，以位於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南陽盆地為主體，並同時運用考古材料與傳世文獻，討論當地的區域發展史。

就考古材料而論，南陽盆地曾先後歷經諸如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亂石灘文化、二里頭文化、殷商文化、周文化、楚文化、秦文化的洗禮。雖然上述的考古學文化分屬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系統，然而除了二里頭文化與殷商文化因材料不足而出現斷層外，較早的新石器時代與較晚的兩周時期，其物質文化的演變趨勢，大抵均各自呈現前後連貫、一脈相承的狀態。換言之，南陽盆地的物質文化儘管在不同時期增添了新的文化因子，但整體而言，自有其發展的內在理路。

相對之下，傳世文獻並非描繪周代南陽盆地本地的歷史脈絡，而著重於當地政權的更迭：西周時期至春秋早期為周王朝的南土，春秋早期末葉成為楚國的北疆，戰國晚期則納入秦國的疆域。上層統治階級的改變，造

<sup>1</sup> 嚴耕望，《治史經驗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頁 12。

就了三段不同的歷史格局，彼此間相互斷裂。然而，這種對周代南陽盆地三段論的認識，其實是以周王朝、楚國或秦國為中心視角的論述。也就是說，礙於傳世文獻本身性質的限制，我們根本無法利用傳世文獻，建構以南陽盆地為主體的歷史，而唯一的門徑，仍必須仰賴當地出土的考古材料。

有別於石器時代以「首次發現地名」或「典型特徵區域」為考古學文化命名的方式，學界通常以傳世文獻所見的「朝代」、「國別」或「族屬」，為歷史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命名。這種命名原則，背後預設了相同歷史背景的人群，必然使用相似特徵的物質文化。換句話說，當特定地區原有的統治階級為新興的統治階級取代，該地區的物質文化必隨之產生不同的文化面貌。以本文討論的周代南陽盆地為例，據傳世文獻的記載，當地先後為周王朝、楚國與秦國所統治，因此一般認為，南陽盆地的考古學文化亦先後受到周文化、楚文化與秦文化的影響。政治格局的切割，往往讓人誤以為當地物質文化的發展亦前後斷裂。然而透過對周代南陽盆地的個案研究，筆者想要指出的是，實際的狀況可能比上述的理解更加複雜。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周代南陽盆地在歷經不同政治勢力支配時，當地的物質文化亦隨之發生變化。以最能代表上層統治階級身分的青銅器而言，在周王朝統治時期，與中原的周式風格相近，在楚國控制階段，則與典型的楚式銅器相同，前後兩期的作風判然二分。此外，代表下層庶民日常生活的陶器，亦隨著上層統治階層的更迭，添加新的文化元素。

其次，儘管周代的南陽盆地曾受到不同政治勢力的控制，但當地的物質文化性質，卻不一定能與傳世文獻的記載相互對應。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南陽盆地春秋早期以前物質文化的特徵。傳世文獻透露，本階段的南陽盆地是周王朝的南土，當地的諸侯則與中央維持密切的關係。然而自西周晚期以來，反映當地統治階級身分與喜好的青銅器，除了帶有周文化的特徵外，又與周邊地區共同發展出特徵鮮明的區域風格。換言之，趁著北方周王朝權威漸衰而南方楚國尚未崛起的空檔，當地的貴族開始嘗試擺脫周文化的束縛，並嘗試創造強調自我品味的物質文化。就同個時期的陶器而論，儘管西周早期的作風與關中地區典型的周文化接近，但西周中期以後在汲取長江中游地區的文化因素後，開始發展出以紅陶與柱足竈釜鬲為代表的陶器群，本地特徵強烈，可見代表當地下層庶民生活的陶器，自西

周中期就已經反映強烈的本土意識。是故，儘管傳世文獻強調本階段南陽盆地與周王朝之間的聯繫，但考古材料則顯示本地更加鮮明的獨立性，可見兩者所各自建構的歷史圖像，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落差。

最後，儘管政權的改變，的確影響南陽盆地物質文化的發展方向，但其中仍有階級上與程度上的差別。就青銅器而論，由於這類極具身分性的威望物品，本身即帶有強烈的政治意涵，因此對政權的改變十分敏感。相較之下，陶器則表現出更加固守本地傳統的性格。簡言之，南陽盆地在進入不同的歷史階段時，當地的陶器雖會出現新的文化特徵，但仍大量繼承前一個歷史時期所形塑的文化特徵。考古學者已經指出，周代南陽盆地的陶器特徵，自早到晚乃一脈相承。換句話說，當地的陶器不因政權的更替而出現劇烈的變化，只是隨著時代推移，陶器特徵將逐步與當地統治政權的主體文化面貌趨同。具體而論，南陽盆地的陶器在進入楚國統治階段後，仍延續前個時期的特徵；在受到秦國控制後，當地陶器在楚式作風的基礎上融入秦文化因素，而這種混合新舊特徵的陶器作風，影響力甚至下達西漢早期。是故，政權的更迭並非主導陶器發展的唯一因素，不斷變動的本地傳統，才是孕育新時代、新風格的文化底蘊。筆者想要強調的是，就反映當地庶民物質文化的陶器而論，周代南陽盆地的歷史發展並非分為三段，而是連綿不絕、前後承繼。雖然利用器物類型學的方法，學者可以細緻地區分周代南陽盆地陶器特徵的不同來源，但對於生活於當地的居民來說，這些來源各異的文化特徵，其實無法分割，因為它們共同組成了南陽盆地的陶器內涵，並將之內化為本地特色。

總而言之，將考古材料與傳世文獻連結，是研究古代中國文明最常觸及的課題，也是爭議最大的問題。儘管傳世文獻述及的政治支配與考古材料反映的物質文化，兩者的關係的確密切，但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實屬不同範疇的概念，無法簡單劃上等號。透過本文對周代南陽盆地的個案分析，筆者希望能藉此機會，重新檢討兩者之間看似理所當然的對應關係。



# 引用書目

## 一、傳世文獻

- [戰國]荀況撰，[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2001。
- [漢]劉向編集，《戰國策》。濟南：齊魯書社，2005。
- [清]茆泮林輯，《世本》，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世本八種》。北京：中華書局，2008。
- [清]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9。
- [清]顧棟高輯，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
- 方詩銘、王修齡撰，《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
- 裴普賢編著，《詩經評註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1。

## 二、考古報告

### (一) 專著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晉國趙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侯馬鑄銅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遲寺——皖北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存的發掘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青龍泉與大寺》。北京：科學出版社，1991。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張家坡西周墓地》。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蒙城縣文化局，《蒙城尉遲寺·第二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上村嶺虢國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澧西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
-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駐馬店市文物保護管理所編著，《駐馬店楊莊——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遺存與環境信息》。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
-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商周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著，《天馬—曲村：1980-1989》。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 半坡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潼縣博物館編，《姜寨——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省博物館，《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
- 西北大學博學院，《城固寶山——1998 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 李國梁主編，《屯溪土墩墓發掘報告》。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舞陽賈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三門峽虢國墓（第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編著，《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編著，《淅川下王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編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武漢大學考古教研室、襄樊市博物館、隨州市博物館，《西花園與廟台子》。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 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塔兒坡秦墓》。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 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任家嘴秦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編著，《少陵原西周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市博物館編著，《丹鳳古城楚墓》。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江陵九店東周墓》。北京：科學出版社，1995。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宜都城背溪》。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盤龍城——1963-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編著，《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 湖北省宜昌地區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系，《當陽趙家湖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岳麓書社，2006。
-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大河村》。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 隨州市博物館編著，《隨州擂鼓墩二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 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編著，《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 (二) 簡報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三次發掘〉，《文物》1994年第8期。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四次發掘〉，《文物》1994年第8期。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澧西考古隊，〈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墓清理簡報〉，《考古》1965年第9期。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豐鎬考古隊，〈1961-62年陝西長安澧東試掘簡報〉，《考古》1963年第8期。
- 孔繁剛，〈山東沂水縣出土一批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92年第2期。
- 王子今、周蘇平、焦南峰，〈陝西丹鳳商邑遺址〉，《考古》1989年第7期。
- 王先福、王志剛、范文強，〈湖北襄樊市賈莊發現東周墓〉，《考古》2005年第1期。
- 王壽芝，〈陝西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文博》1988年第6期。
- 王儒林、崔慶明，〈南陽市西關出土一批春秋青銅器〉，《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南陽地區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1998年度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第11期。
- 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河南省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第9期。
-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二次發掘〉，《文物》1994年第1期。
-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五次發掘〉，《文物》1995年第7期。
-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淅川雙河鎮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2年增刊。
-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南陽市文物研究所、方城縣博物館，〈河南方城縣八里橋遺址1994年春發掘簡報〉，《考古》1999年第12期。
-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南陽地區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市八里崗遺址1992年的發掘與收獲〉，《考古》1997年第12期。
-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南陽地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的調查與試掘〉，《華夏考古》1994年第2期。
- 田海峰，〈湖北棗陽又發現曾國銅器〉，《江漢考古》1983年第3期。
-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繁昌縣文化館，〈安徽繁昌出土一批春秋青銅器〉，《文物》1982年第12期。
-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舒城縣文物管理處，〈安徽舒城縣河口春秋墓〉，《文物》1990年第5期。
- 老河口市博物館，〈老河口市曹營戰國墓清理簡報〉，《江漢考古》1997年第3期。

- 李 煉、張歷文，〈洋縣出土殷商銅器簡報〉，《文博》1996年第6期。
- 長江水利委員會文物考古隊，〈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丹江口水庫淹沒區文物調查概況〉，《江漢考古》1996年第2期。
- 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河南淅川黃棟樹遺址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0年第3期。
- 河南省丹江庫區文物發掘隊，〈河南省淅川縣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年第10期。
-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南召二郎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59年第7期。
-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鎮平趙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考古》1962年第1期。
-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唐河茅草寺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65年第1期。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鄧州市穰東遺址的發掘〉，《華夏考古》1999年第2期。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頂山市文物管理局，〈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八號墓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07年第1期。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頂山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平頂山應國墓地九十五號的發掘〉，《華夏考古》1982年第3期。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頂山市文管會，〈平頂山市北滍村兩周墓地一號墓發掘簡報〉，《華夏考古》1988年第1期。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南陽地區文物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河南淅川吉崗楚墓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3年第3期。。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河南淅川大石頭山楚墓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3年第3期。
-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調文物保護辦公室、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淅川縣徐家嶺11號楚墓〉，《考古》2008年第5期。
- 河南省信陽地區文管會、河南省羅山縣文化館，〈羅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學報》1986年第2期。
- 河南省博物館、信陽地區文管會、信陽市文化局，〈河南信陽市平橋春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1期。
- 河南省博物館、新野縣文化館，〈河南新野古墓葬清理簡報〉，收入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資料叢刊（2）》。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 河南信陽地區文管會、光山縣文管會，〈春秋早期黃君孟夫婦墓發掘報告〉，《考古》1984年第4期。
- 武漢大學考古教研室、湖北省宜城市博物館，〈湖北宜城郭家崗遺址發掘〉，《考古學報》1997年第4期。

-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東郊 C5M906 號西周墓〉，《考古》1995 年第 9 期。
- 南陽市文物工作隊，〈南陽市西關三座春秋楚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92 年第 2 期。
- 南陽市文物工作隊，〈南陽市彭營磚瓦廠戰國楚墓〉，《中原文物》1994 年第 1 期。
- 南陽市文物工作隊，〈南陽市十里廟遺址調查〉，《江漢考古》1994 年第 2 期。
- 南陽市文物工作隊，〈河南南陽五交化儲運站戰國墓〉，《江漢考古》1996 年第 3 期。
- 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陽市宛城遺址戰國水井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03 年第 3 期。
- 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建七局南陽設備公司材料庫 M1 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07 年第 5 期。
- 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陽市萬家園 M202 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07 年第 5 期。
- 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萬家園 M181 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09 年第 1 期。
- 南陽市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南陽市煙草專賣局春秋、西漢墓葬的發掘〉，《華夏考古》1999 年第 3 期。
- 南陽地區文物隊、方城縣文化館，〈河南方城縣大張莊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83 年第 5 期。
- 南陽師範學院獨山玉文化研究中心，〈南陽黃山遺址獨山玉製品調查簡報〉，《中原文物》2008 年第 5 期。
- 武漢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襄樊市博物館、宜城縣博物館，〈湖北宜城曹家樓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8 年第 1 期。
- 信陽地區文管會、固始縣文管會，〈河南固始萬營春秋墓清理簡報〉，《考古》1992 年第 3 期。
- 信陽地區文管會、信陽市文管會，〈河南信陽市平西五號春秋墓發掘簡報〉，《考古》1989 年第 1 期。
- 信陽地區文管會、信陽縣文化館，〈信陽發現兩批春秋早期呂國銅器〉，《中原文物》1979 年第 4 期。
- 信陽地區文管會、信陽縣文化館，〈信陽縣明港發現兩批春秋早期青銅器〉，《中原文物》1981 年第 4 期。
- 信陽地區文管會、潢川縣文化館，〈河南潢川縣發現黃國和蔡國銅器〉，《文物》1980 年第 1 期。
- 信陽地區文管會、羅山縣文化館，〈河南羅山縣蟒張商代墓地第一次發掘簡報〉，《考古》1981 年第 2 期。
- 信陽地區文管會、羅山縣文化館，〈羅山縣蟒張後李商周墓地第二次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81 年第 4 期。
- 信陽地區文管會、羅山縣文化館，〈羅山縣高店公社又發現一批春秋時期青銅器〉，《中

- 《原文物》1981年第4期。
- 信陽地區文管會、羅山縣文管會，〈羅山躉張後李商周墓地第三次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
- 殷滌非，〈安徽屯溪周墓第二次發掘〉，《考古》1990年第3期。
- 柴福林、何滔滔、龔春，〈陝西城固縣新出土商代青銅器〉，《考古與文物》2005年第6期。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地區文管會，〈陝西丹鳳縣輩家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6期。
- 陝西省博物館、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
- 唐金裕、王壽芝、郭長江，〈陝西省城固縣出土殷商銅器整理簡報〉，《考古》1980年第3期。
- 原長辦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集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中原文物》1989年第1期。
-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紹興地區文化局、紹興市文管會，〈紹興306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1期。
- 陳千萬，〈穀城新店出土的春秋銅器〉，《江漢考古》1986年第3期。
- 陳千萬，〈湖北穀城發現的鄧國銅器及相關問題〉，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 淅川縣博物館、南陽地區文物隊，〈淅川縣毛坪楚墓發掘報告〉，《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 崔慶明，〈南陽市北郊出土一批申國青銅器〉，《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 商洛地區考古調查組，〈丹江上游考古調查簡報〉，《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3期。
- 商縣圖書館、西安辦坡博物館、商洛地區圖書館，〈陝西商縣紫荊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3期。
- 焦枝復線襄樊考古隊，〈襄陽鄒灣遺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97年第4期。
- 棗陽市博物館，〈湖北穀城、棗陽出土周代青銅器〉，《考古》1987年第5期。
- 棗陽縣文化館，〈棗陽東趙湖再次出土青銅器〉，《江漢考古》1984年第1期。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棗陽市九連墩楚墓〉，《考古》2003年第7期。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老河口市博物館，〈湖北老河口楊營春秋遺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3年第3期。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穀城縣博物館，〈穀城過山戰國西漢墓葬〉，《江漢考古》1990年第3期。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遺址〉，《考古學集刊》第9集，1995。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市彭崗東周墓群第三次發掘〉，《考古》1997年第8期。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鄭家山戰國秦漢墓〉，《考古學報》1999年第3期。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陽鄧城韓崗遺址發掘報告〉，《江漢考古》2002年第2期。
- 湖北省博物館，〈湖北棗陽縣發現曾國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
- 湖北省博物館，〈襄陽山灣東周墓葬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3年第2期。
- 湖北省博物館，〈襄陽三步兩道橋遺址調查〉，《江漢考古》1984年第2期。
- 湖北省博物館，〈襄陽蔡坡戰國墓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5年第1期。
- 萬樹瀛，〈滕州後荊溝出土不鏽簋等青銅器群〉，《文物》1981年第9期。
- 楊亞長、王昌富，〈商鞅封邑遺址的考古調查、發掘與初步研究〉，收入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市博物館編著，《丹鳳古城楚墓》。
- 劉江生，〈湖北襄陽蔡坡20號戰國墓〉，《考古》2007年第7期。
-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北北調文物保護辦公室、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陽市程莊墓地東周墓葬發掘簡報〉，《考古》2008年第5期。
- 鄭杰祥，〈河南新野發現的曾國銅器〉，《文物》1973年第5期。
- 襄石復線襄樊考古隊，〈湖北襄陽法龍王樹崗遺址二里頭文化灰坑清理簡報〉，《江漢考古》2002年第4期。
- 襄石復線襄樊考古隊，〈湖北襄陽法龍付崗墓地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2年第4期。
- 襄陽首屆亦工亦農考古訓練班，〈襄陽蔡坡12號墓出土吳王夫差劍等文物〉，《文物》1976年第11期。
-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陽城內遺址發掘報告〉，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
-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沈崗西周墓發掘簡報〉，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
-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彭崗墓地第六次發掘簡報〉，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
-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鄧城黃家村遺址2005年西區周代灰坑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08年第3期。
-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樊市黃家村遺址周代灰坑的清理〉，《考古》2009年第11期。
-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棗陽市文物考古隊，〈棗陽周台遺址發掘報告〉，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
-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陽區文物管理處，〈襄陽伙牌南楊家遺址灰坑清理簡報〉，收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
-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陽區文物管理處，〈襄陽黃集小馬家遺址發掘簡報〉，收

- 入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
- 襄樊市文物管理處、襄樊市博物館，〈襄樊彭崗東周墓地第一次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99年第4期。
- 襄樊市考古隊，〈襄樊市鄧城古井清理簡報〉，《江漢考古》1999年第4期。
- 襄樊市考古隊，〈襄樊團山下營墓地第二次發掘〉，《江漢考古》2000年第2期。
- 襄樊市考古隊，〈襄樊市彭崗東周遺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0年第2期。
- 襄樊市考古隊，〈湖北襄樊市蔡坡戰國墓第二次發掘〉，《考古》2005年第11期。
- 襄樊市考古隊，〈襄樊市牌坊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7年第4期。
- 襄樊市考古隊、襄樊縣文物管理處，〈襄陽東津洪山頭遺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99年第4期。
- 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陽毛狗洞遺址調查〉，《江漢考古》1988年第3期。
- 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陽余崗戰國墓發掘簡報〉，《考古》1992年第9期。
- 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市余崗戰國至東漢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6年第3期。
- 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陽團山東周墓〉，《考古》1991年第9期。
- 襄樊市博物館，〈襄樊余崗戰國秦漢墓第二次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3年第2期。
- 襄樊市博物館，〈湖北省襄樊市鄧城遺址試掘簡報〉，《江漢考古》2004年第2期。
- 襄陽縣文物管理處，〈襄陽縣三處舊時器時代遺址調查〉，《江漢考古》1999年第4期。
- 臨沂市博物館，〈山東臨沂中治溝發現三座周墓〉，《考古》1987年第8期。
- 邊成修，〈長治分水嶺126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4期。

### 三、近人研究

#### （一）專著

- 丁 蘭，《湖北地區楚墓分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 方 輝主編，《聚落與環境考古學理論與實踐》。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
- 王明珂，《華夏邊緣》。臺北：允晨文化，1997。
- 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 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
- 王煥林，《里耶秦簡校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7。
- 王學理、梁雲，《秦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兩周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 印 群，《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東周墓葬制度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朱鳳瀚、張榮明編，《西周諸王年代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
- 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文化，1992。
- 何介鈞，《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何光岳，《楚滅國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何 浩，《楚滅國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1989。
- 李友謀，《裴李崗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李玉潔，《楚史稿》。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
- 李孝聰，《中國區域歷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 李 峰，《西周的滅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岳洪彬，《殷墟青銅禮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 施勁松，《長江流域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馬世之，《中原楚文化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 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
- 孫慶偉，《周代用玉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容 庚，《商周彝器通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 陳夢家，《西周年代考·六國紀年》。北京：中華書局，2005。
- 陳 榕，《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譜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
- 郭立新，《長江中游地區初期社會複雜化研究（4300B.C.-2000B.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郭德維，《楚都紀南城復原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 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河南分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
- 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湖北分冊》。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2。
- 許倬雲，《西周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 許倬雲，《傅鐘回響——許倬雲先生臺大講學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8。
- 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臺北：稻香出版社，1999。
- 張光直著，印群譯，《古代中國考古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
- 張 弛，《長江中下游地區史前聚落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張 辛，《中原地區東周陶器墓葬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 張昌平，《曾國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張維華，《中國長城建置考（上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 張江凱、魏峻，《新石器時代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 張緒球，《屈家嶺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 楊寬，《戰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楊權喜，《楚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 鞏啟明，《仰韶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 劉莉著，陳星燦、喬玉、馬蕭林、李新偉、謝禮暉、鄭紅莉譯，《中國新石器時代——邁向早期國家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 襄樊市文物普查辦公室、襄樊市博物館，《襄樊市文物史蹟普查實錄》。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5。
- 滕銘予，《秦文化：從封國帝國的考古學觀察》。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
- 嚴文明，《仰韶文化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 嚴耕望，《治史經驗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 Chang, K. C. *Rethinking Archae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中譯本：張光直著，曹兵武譯，《考古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
- Chang, K. C. ed. *Settlement Archaeology*. Palo Alto: National Press Books, 1968.
- Chang, K. 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Archaeology*.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 Falkenhausen, Lothar vo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 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6.
- Rawson, Jessica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Shaughnessy, Edward. *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xix。中譯本：夏含夷著，劉源譯，〈西周諸王年代〉，收入朱鳳瀚、張榮明編，《西周諸王年代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
- Trigger, Bruce G. *Time and Traditions: Essays in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 （二）論文

- 丁清賢，〈鄂西北、豫西南仰韶文化的性質與分期〉，《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
- 尹俊敏，〈〈南陽市西關出土一批春秋青銅器〉補記〉，《華夏考古》1993年第3期。
- 尹俊敏，〈南陽出土的彭伯壺〉，《文物》1997年第12期。
- 方輝，〈對區域系統調查法的幾點認識與思考〉，收入氏著，《海岱地區青銅時代考古》。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

- 牛世山，〈秦文化淵源與秦人起源探索〉，《考古》1996年第3期。
- 王少泉，〈襄陽市博物館收藏的襄陽山灣銅器〉，《江漢考古》1988年第3期。
- 王文楚，〈歷史時期南陽盆地與中原地區間的交通發展〉，《史學月刊》1964年第10期。
- 王仁湘，〈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收入氏著，《中國史前考古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 王先福，〈襄北楚陶器墓綜述〉，《江漢考古》2000年第2期。
- 王先福，〈襄隨地區兩周遺址出土陶鬲分析〉，《江漢考古》2002年第4期。
- 王先福，〈古代襄樊城市變遷進程中的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5卷第1輯，2010。
- 王先福，〈襄樊余崗墓地楚式青銅禮器分期研究〉，未刊稿。
- 王 宏，〈論江漢流域西周時期的文化分區〉，收入荊州博物館編著，《荊州博物館建館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 王 杰，〈雕龍碑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收獲〉，《江漢考古》1995年第3期。
- 王 杰，〈湖北棗陽雕龍碑遺址的考古收獲〉，《江漢考古》1997年第4期。
- 王建中，〈南陽宛城建置考〉，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四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 王紅星，〈九連墩1、2號楚墓的年代與墓主身分〉，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六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 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收入氏著，《觀堂集林（外兩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 王壽芝，〈從漢中出土文物看商與巴蜀氐羌的關係〉，《文博》2003年第4期。
- 王 巍，〈聚落型態研究與中華文明探源〉，《文物》2006年第5期。
- 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河南鄧州太子崗遺址複查記〉，《古代文明》第5卷，2006。
- 史念海，〈古代的關中〉，收入氏著，《河山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
- 史念海，〈春秋時代的交通道路〉，收入氏著，《河山集》。
- 石 泉，〈古鄧國、鄧縣考〉，《江漢論壇》1980年第3期。
- 石 泉，〈楚郢都、秦漢至齊梁江陵城故址新探〉，收入是著，《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
- 石 泉，〈從春秋吳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荊楚地理〉，收入氏著，《古代荊楚地理新探》。
- 石興邦，〈橫亘東西的淮漢中介文化帶——青連崗一下王崗文化傳統〉，《長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屆亞洲文明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96。
- 安金槐，〈河南南陽地區在我國考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收入氏著，《安金槐考古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 朱 泓，〈中國南方新石器時代居民體質類型的聚類分析〉，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編輯，《中國考古學會第七次年會論文集（19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 杜正勝，〈夏文化可能討論嗎？〉，《新史學》第 1 卷第 2 期，1990。
- 杜正勝，〈新史學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收入許倬雲、張忠培主編，《中國考古學的跨世紀反思》上冊。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
- 杜正勝，〈中國古代社會多元性與一統化的激盪——特從政治與文化的交涉論〉，《新史學》第 11 卷第 2 期，2000。
- 李天元，〈襄陽山灣發現的幾件打製石器〉，《江漢考古》1983 年第 1 期。
- 李伯謙，〈城固銅器群與早期蜀文化〉，《考古與文物》1983 年第 2 期。
- 李伯謙、鄭杰祥，〈後李商代墓葬族屬分析〉，《中原文物》1981 年第 4 期。
- 李修平，〈動手動腳找東西——記 2009 年春季南陽盆地探訪之旅〉，《臺大歷史學術通訊》第 7 期，2010。
- 李桃元，〈應城門板灣遺址大型房屋建築〉，《江漢考古》2000 年第 1 期。
- 李桃元，〈湖北應城門板灣新石器時代遺址〉，收入國家文物局主編，《1999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 李陳廣，〈南陽地區楚文化的發現和研究〉，《中原文物》1992 年第 2 期。
- 李朝遠，〈城固洋縣所含中文化因素之我見〉，收入氏著，《青銅器學步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 李零，〈「楚叔之孫朋」究竟是誰〉，《中原文物》1981 年第 4 期。
- 李零，〈再論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 年第 1 期。
- 李零，〈論楚國銅器的類型〉，收入氏著，《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 李學勤，〈論漢淮間的春秋青銅器〉，《文物》1980 年第 1 期。
- 李學勤，〈論仲冉父簋與申國〉，《中原文物》1984 年第 4 期。
- 李學勤，〈二十一世紀的古代文明研究〉，收入氏著，《中國古代文明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 李學勤，〈由新見青銅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 年第 1 期。
- 李濟，〈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東方雜誌》，第 31 卷第 7 號，1934。後收入張光直、李光謨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 李濟，〈田野考古報告編輯大旨〉，收入李濟總編輯，《田野考古報告》第 1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李驥、范海，〈方成大張莊新石器時代文化源流〉，《中原文物》1998 年第 4 期。
- 宋豫秦，〈夷夏商三種考古學文化交匯地域淺談〉，《中原文物》1992 年第 1 期。
- 宋豫秦，〈生態過渡帶之人地關係芻議〉，收入周昆叔、宋豫秦主編，《環境考古研究》第 2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 沈強華，〈油子嶺一期遺存試析〉，《考古》1998 年第 9 期。
- 沈湘芳，〈襄陽出土徐王義楚元子劍〉，《江漢考古》1982 年第 1 期。
- 佟柱臣，〈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三個接觸地帶論——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綜合研究之一〉，《史前研究》1985 年第 2 期。後收入氏著，《中國考古學要論》。福州：鶩江出版社，2004。

- 佟柱臣，〈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多中心發展論和發展不平衡論——論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的規律和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1986年第2期。
- 余西云，〈下王崗「仰韶文化一期」遺存試析〉，收入張忠培、許倬雲主編，《中國考古學跨世紀的回顧與前瞻——1999年西陵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 吳汝康、吳新智，〈河南淅川的人類牙齒化石〉，《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第20卷第1期，1982。
- 周厚強，〈孝感地區西周時期文化初析〉，《江漢考古》1985年第4期。
- 林麗霞、王鳳劍，〈南陽市近年出土的四件春秋有銘銅器〉，《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
-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國科學》1973年第2期。
- 段紹嘉，〈介紹陝西省博物館的幾件青銅器〉，《文物》1963年第3期。
- 苟保平，〈城固縣文化館收藏的青銅器〉，《文博》1996年第6期。
- 胡永慶，〈試論淅川縣境內的小型楚墓——兼談與中原地區文化的關係〉，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四集）》。
- 南陽市博物館，〈南陽市博物館館藏的商代青銅器〉，《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
- 南陽地區文管會，〈南召縣小空山發現舊石器時代文化〉，《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 俞偉超，〈先楚與三苗文化的考古學推測〉，《文物》1980年第10期。
- 俞偉超，〈關於當前楚文化的考古學研究問題〉，收入氏著，《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柴中慶，〈楚長城西段考〉，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四集）》。
- 柴中慶、喬保同、王鳳劍，〈河南南陽楚彭氏墓地〉，收入國家文物局主編，《2008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高至喜，〈論戰國晚期楚墓〉，《東南文化》1990年第4期。
- 高明，〈中原地區東周時代青銅禮器研究（上）〉，《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1期。
- 高崇文，〈東周楚式鼎型態分析〉，《江漢考古》1983年第1期。
- 馬保春，〈早期鄂豫陝間文化交流通道的初步研究〉，《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
- 馬保春、楊雷，〈新石器時代晚期鄂豫陝間文化交流通道的初步研究〉，《江漢考古》2007年第2期。
- 夏鼐，〈楚文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江漢考古》1982年第1期。
- 夏鼐，〈什麼是考古學〉，《考古》1984年第10期。
- 徐少華，〈鄧國銅器及其歷史地理與文化〉，《華夏考古》1996年第1期。
- 徐少華，〈楚都丹陽地望探索的回顧與思考〉，收入徐少華、晏昌貴主編《荊楚歷史地理地長江中下游開發——2008年中國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 徐少華，〈南陽新出「輔伯作兵戈」的年代和族屬〉，《考古》2009年第8期。

- 徐少華、江陵，〈明清時期南陽盆地的交通與城鎮經濟發展〉，《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第 10 卷第 3 期，2001。
- 徐正國，〈襄陽首次發現商代銅尊〉，《中國文物報》1988 年 2 月 3 日。
- 徐俊英，〈南陽徵集「楚子棄疾」銅簠〉，《中國文物報》1989 年 5 月 26 日。
- 孫 華，〈中原青銅文化系統的幾個問題〉，收入許倬雲、張忠培主編，《中國考古學的跨世紀反思》下冊。
- 袁廣闊，〈鄧州市陳營二里頭文化遺址〉，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年鑑（199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袁豔玲，〈高柄壺初探〉，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五集）》。合肥：黃山書社，2003。
- 祝培章、卜哲民、程學華，〈陝西城固、寶雞、藍田出土和收集的青銅器〉，《文物》1966 年第 1 期。
- 常懷穎，〈淅川下王崗龍山至二里頭時期陶器群初探〉，《四川文物》2005 年第 2 期。
- 陳芳妹，〈盆、敦與簋——論春秋早、中期間青銅粢盛器的轉變〉，《故宮學術季刊》第 2 卷第 3 期，1985。
- 陳星燦、劉莉、李潤權、〔美〕華翰維（Henry T. Wright）、〔英〕艾琳（Arlene Miller Rosen）著，〈中國文明腹地的社會複雜化進程——伊洛河地區的聚落型態研究〉，《考古學報》2003 年第 2 期。
- 陳昭容，〈從古文字材料談古代的盥洗用具及其相關問題——自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的青銅水器自名說起〉，《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1 本第 4 分，2000。
- 陳昭容，〈從青銅器銘文看兩周漢淮地區諸國婚姻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5 本第 4 分，2004。
- 陳振裕、楊權喜，〈襄陽山灣五座楚墓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江漢考古》1982 年第 1 期。
- 陳 偉，〈淅川下寺二號墓主及其相關問題〉，《江漢考古》1983 年第 1 期。
- 陳 偉，〈古地新探（三則）〉，《江漢考古》1992 年第 4 期。
- 陳樹祥、李桃元，〈應城門板灣遺址發掘獲重要成果〉，《中國文物報》1999 年 4 月 4 日。
- 郭立新，〈屈家嶺文化的聚落型態與社會結構分析——以淅川黃棟樹遺址為例〉，《中原文物》2004 年第 6 期。
- 陶衛寧，〈陝南漢江走廊新石器時代考古聚落研究〉，《經濟地理》第 23 卷第 4 期，2003。
- 許倬雲，〈另一類考古學〉，收入氏著，《倚杖聽江聲》。臺北：三民書局，2003。
- 許順湛，〈史前民族融合在豫西南地區的反映〉，收入南陽市博物館編，《學術研究文集——紀念南陽市博物館建館四十週年（1959-1999）》。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 張之恒，〈生態環境對史前文化的影響和中國史前文化的三個過渡地帶〉，《考古與文物》2008 年第 2 期。

- 張之恒，〈秦嶺至淮河一線史前文化的特徵〉，《中國歷史文物》2008年第5期。
- 張天恩，〈丹江上游西周遺存與早期楚文化關係試析〉，收入氏著，《周秦文化研究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 張正明，〈淮漢之間——周代的一個文化交錯地帶〉，《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
- 張光裕，〈從𠂇字的釋讀到簋、盆、盂諸器的定名問題〉，《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3期。
- 張弛，〈史前聚落與房屋的研究〉，收入嚴文明主編，《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世紀回顧·新石器時代考古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 張弛、魏尼，〈裴李崗文化墓葬隨葬品研究〉，《古代文明》第7卷，2008。
- 張君，〈湖北棗陽市雕龍碑新石器時代人骨分析報告〉，《考古》1998年第2期。
- 張昌平，〈試論真武山一類遺存〉，《江漢考古》1997年第1期。
- 張昌平，〈論隨州羊子山新出的噩國青銅器〉，待刊稿。
- 張卓遠，〈淺論楚方城〉，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四集）》。
- 張勇，〈明器起源及相關問題探討〉，《華夏考古》2002年第3期。
- 張亞初，〈淅川下寺二號墓年代與一號墓編鐘的名稱問題〉，《文物》1985年第4期。
- 張振標、陳德珍，〈下王崗新石器時代居民的種族類型〉，《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 張國碩，〈論考古學文化的命名方法〉，《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
- 張劍，〈淅川丹江水庫區的文物調查與發掘〉，《中原文物》1979年第3期。
- 張劍，〈淅川下寺楚墓的時代及其墓主〉，《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
- 張臨生，〈說盃與匜——青銅彝器中的水器〉，《故宮學術季刊》第17卷第1期，1982。
- 馮祖傑、周旗、王軍、谷保俊，〈豫西南中新生代古地理環境變遷〉，《河南地質》第15卷第4期，1997。
- 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收入氏著，《傅斯年全集》第4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賈漢清，〈從顧家坡墓地的發掘看史前時代文化交叉地帶的部落衝突〉，《華夏考古》2004年第4期。
- 賈蘭坡、張振標，〈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中的動物群〉，收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編著，《淅川下王崗》。
- 黃尚明，〈城固洋縣商代青銅器群族屬再探〉，《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5期。
- 黃運甫，〈略談淅川毛坪楚墓的分期及其特徵〉，《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 湖北省博物館，〈襄陽山灣出土的東周青銅器〉，《江漢考古》1988年第1期。
- 遼耀東，〈試釋論漢匈之間的甌脫〉，收入氏著，《從平城到洛陽》。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
- 喬保同、李長周，〈南陽發現蔡侯申簠〉，《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
- 曾昭岷、李謹，〈曾國和曾國青銅器綜考〉，《江漢考古》1980年第1期。
- 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收入文物出版社編輯

- 部編，《文物與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 游清漢，〈河南南陽市十里廟發現商代遺址〉，《考古》1959年第7期。
- 棗陽市博物館，〈湖北棗陽發現一件商代銅尊〉，《文物》1990年第6期。
- 棗陽市博物館，〈湖北棗陽市博物館收藏的幾件青銅器〉，《文物》1994年第4期。
- 董全生、李長周，〈南陽市物資城一號墓及其相關問題〉，《中原文物》2004年第2期。
- 靳松安、任偉，〈略論漢水中游地區的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 楊育彬、孫廣清，〈從考古發現談南陽在華夏古文明中的歷史地位〉，收入南陽市博物館編，《學術研究文集——紀念南陽市博物館建館四十週年（1959-1999）》。
- 楊亞長，〈老官台文化研究〉，收入嚴文明主編，《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世紀回顧·新石器時代考古卷》。
- 楊寶成，〈試論西周時期漢東地區的柱足鬲〉，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四集）》。
- 楊寶成，〈楚國青銅禮器組合研究〉，《華夏考古》2000年第2期。
- 楊寶成、〔法〕杜德蘭（Alain Thote）著，何竟譯，〈南陽附近的龔營遺址的發掘：方法和結果〉，收入《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法國漢學》第11輯，2006。
- 楊權喜，〈襄陽山灣出土的鄀國和鄧國銅器〉，《江漢考古》1983年第1期。
- 楊權喜，〈襄陽楚墓與楚國勢力的擴展〉，《江漢考古》1986年第2期。
- 楊權喜，〈江漢地區楚式鬲的初步分析〉，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一集）》。武漢：荊楚書社，1987。
- 楊權喜，〈襄陽余崗楚墓陶器的分期研究〉，《江漢考古》1993年第1期。
- 裴明相，〈「棄疾簠」與「析鼎」釋略〉，《中原文物》1989年第4期。
- 趙世綱，〈再論淅川下寺2號墓的墓主與年代〉，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二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 趙世綱，〈淺論楚文化的淵源〉，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三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 趙春青，〈裴李崗文化研究〉，收入嚴文明主編，《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世紀回顧·新石器時代考古卷》。
- 趙輝，〈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 趙輝，〈中國的史前基礎——再論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文物》2006年第8期。
- 趙叢蒼，〈城固洋縣銅器群綜合研究〉，《文博》1996年第4期。
- 樊力，〈丹江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存試析〉，《江漢考古》1997年第4期。
- 樊力，〈亂石灘文化初論〉，《江漢考古》1998年第4期。
- 樊力，〈論屈家嶺文化青龍泉二期類型〉，《考古》1998年第11期。
- 樊力，〈論石家河文化青龍泉三期類型〉，《考古與文物》1999年第4期。
- 劉彬徽，〈罍、缶辨正〉，《江漢考古》1982年第2期。

- 劉彬徽，〈長江中游地區西周時期考古研究〉，《考古學研究》5，2003。
- 潘其風，〈中國古代居民種系分佈初探〉，收入蘇秉琦主編，《考古學文化論集》第1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 齊烏雲，〈湖北棗陽雕龍碑遺址孢粉分析研究〉，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棗陽雕龍碑》。
- 盧雲，〈戰國時期主要陸路交通線初探〉，《歷史地理研究》第1輯，1986。
- 韓茂莉，〈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的形成與氣候影響〉，《考古》2005年第10期。
- 襄樊市文物管理處，〈湖北襄樊揀選的商周青銅器〉，《文物》1982年第9期。
- 魏京武，〈中國史前文化的多樣性與融合性——論中國文明形成的融合性〉，收入《遠望集》編輯委員會編，《遠望集——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華誕四十週年紀念文集》。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
- 蘇秉琦，〈從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問題〉，《江漢考古》1982年第1期。
- 蘇秉琦，〈中國考古學從初創到開拓——一個考古老兵的自我回顧〉，收入蘇秉琦主編，《考古學文化論集（2）》。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 蘇秉琦、殷瑋璋，〈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文物》1981年第5期。
- 譚其驥，〈鄂君啟節銘文釋地〉，收入氏著，《長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羅運兵，〈漢水中游地區史前豬骨隨葬現象及相關問題〉，《江漢考古》2008年第1期。
- 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物》1987年第3期。
- 嚴文明，〈中國新石器時代聚落形態的考察〉，收入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編輯組編，《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 嚴文明，〈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 嚴文明，〈走向21世紀的中國考古學〉，收入氏著，《走向21世紀的考古學》。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
- 嚴文明，〈序〉，收入張弛著，《長江中下游地區史前聚落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顧頡剛，〈古史辨自序〉，收入氏著，《走在歷史的路上——顧頡剛自述》。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 顧鐵符，〈楚三邑考〉，收入湖北省楚史研究會、武漢師範學院學報編輯部編，《楚史研究專輯》。武漢：武漢師範學院學報編輯部，1982。
- 〔日〕安田喜憲，〈從地理環境和氣候變動看文明的誕生〉，收入高崇文、安田喜憲主編，《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 〔日〕宮本一夫著，張國碩譯，〈從交錯地帶看社會集團的地域性和文化交流〉，《華夏考古》2006年第3期。
- 〔法〕杜德蘭（Alain Thote）著，劉玉堂、賈繼東譯，〈異質文化撞擊與交流的範例——淅川下寺墓隨葬器物的產地及相關問題〉，《江漢考古》1996年第2期。
- Bagley, Robert W., 〈Changjiang Bronzes and Shang Archaeology〉，收入國立故宮博物

- 院編輯委員會編輯，《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器物（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中譯本：〔美〕貝格立著，任汶譯，許杰校，〈長江流域青銅器與商代考古〉，《南方文物》1996年第2期
- Bagley, Robert W. "Shang Archaeology." In M. Loewe and E.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Chang, K. C.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Historical Period." In M. Loewe and E.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 Rawson, Jessica. "Statesmen or Barbarians? The Western Zhou as Seen through their Bronze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75, 1989. 中譯本：〔英〕羅森著，黃愛梅譯，〈是政治家，還是野蠻人？——從青銅器看西周〉，收入氏著，孫心菲等譯，《中國古代的藝術與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 Rawson, Jessica. "Western Zhou Archaeology." In M. Loewe and E.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 四、學位論文

- 余慧君，〈淅川下寺器群研究——楚系青銅器區域風格及其成因〉。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 海寧，〈試論青銅盆、孟、敦的關係〉。西安：西北大學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碩士論文，2005。
- 張鴻亮，〈豫南地區楚系墓葬初步研究〉。鄭州：鄭州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碩士論文，2007。
- 樊力，〈豫西南地區新石器文化發展序列及其與鄰近地區的關係〉。北京：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碩士論文，1993。後發表於《考古學報》2000年第2期。

#### 五、圖錄

-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5·西周（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6·西周（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8·東周（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9·東周（3）》。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0·東周（4）》。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1·東周（5）》。北京：文

物出版社，1997。

李夏廷，《晉國青銅藝術圖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曹 琦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頁 2005。

曹 琦主編，《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200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曾國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湖北省博物館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楚國貴族大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趙叢蒼主編，《城洋青銅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隨州市博物館編，《隨州出土文物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六、網路資料

「Google 地圖」：<http://www.google.com.tw/maps>。

「漢字構形資料庫」：<http://cdp.sinica.edu.tw/cdphanzi>。

周振鶴，〈秦代漢初的銷縣——里耶秦簡小識之一〉，「簡帛網」：<http://www.jianbo.org>。



